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遭遇美国（下）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遭遇美国（下）

华文漪

华文漪背景

1954 年讲入上海戏剧学校学习昆曲，1961 年毕业后进入上海青年昆剧团。1971 年进入上海京剧院工作，曾经担任著名京剧《磐石湾》中“巧莲”一角。

1978 年出任上海昆剧团团长职务，1979 年主演《蔡文姬》获得中国文化部演出一等奖。1981 年演出《钗头凤》获得首届上海戏剧节个人表演一等奖。1982 年主演《牡丹亭》获得第二届上海戏剧节演出二等奖。1986 年演出《碧玉簪》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1938 年演出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的作品《游园惊梦》，引起轰动。

1989 年赴美定居。1990 年参加洛杉矶国际艺术节演出，1991 年参加西班牙国际艺术节演出。1991 年 12 月在美国组约获得美华艺术协会颁发的“亚洲杰出艺人奖”。

1992 年 4 月起在全美伯克利加大、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康州大学等院校任教讲课，并曾赴台湾进行私人讲学演出活动。

目前担任洛杉矶“洛城双语广播电台”总裁助理、美国华文漪昆曲研究社负责人。

华文漪录音——

我唱戏的生涯开始得很早，12 岁的时候就进上海戏曲学校学戏了。

其实，我选择唱昆曲作为我终身职业这件事实在来得非常偶然。我小学毕业的时候看到报纸上有戏曲学校招生的广告，就去报考了。我本人倒是从小就喜欢戏，尤其是小时候常和奶奶一起去看绍兴戏，但是那时候年纪小，只觉得唱戏这个事情挺好玩的。

我参加考试的那一次招生实际上挑选得相当严格，因为那次报名的人很多，学校要在一千多个考生中招收 60 个学生，淘汰率相当高。当时，出面招生的学校叫做“上海华东研究所昆曲演员训练班”，这也就是现在上海戏曲学校的前身。但是当时训练班只招收昆曲演员，而现在的戏曲学校已经是各种戏派都有了，成为一个戏曲类综合学校，但这是很后来才出现的改动。

说到昆曲，很多人不是很熟悉，受后来京昆剧团成立之类事情的影响，常常把它和京剧混为一谈。昆曲其实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也是中国各种戏曲的戏祖宗，它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现今存在的各剧种都受它的影响很大，但是行外人对这个剧种的了解实在不多。我是唱京剧里面类似于“青衣”角色的，这个角色在昆曲里有它特定的名称，叫做“闺门旦”，也叫做“五旦”，当然，昆曲里也有“青衣”，只是往这里，它已经不是京剧意义上的那种“青衣”了。

当年在学校里，我们虽然是主攻昆曲的，但是老师们也曾经安排我们学习京剧。毕业之后，京剧班和昆曲班干脆结合在一起成立了京昆剧团。这个京昆剧团在上海方面一直是受到高度重视的，除此之外，在上海戏剧界比较受重视的还有青年话剧院。因为这个原因，领导上也十分重视培养我们。

文革的时候，昆曲因为它唱腔的缓慢和道白的晦涩难懂，被称为是最最典型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剧种，因此，运动一来，一下子就被砍掉了。京剧和昆曲结合之后，我就开始转唱京剧，因为当年在学校里也是学过的。

真正说起来，我唱京剧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时候才开始的，也可以说我们是没戏可唱之后才转向京剧的。

转学京剧之后，我曾经到过样板戏的“威虎山剧组”，并且曾经随同“威虎山剧组”去过日本演出。我在《智取威虎山》里演一个很小的角色，小到只能刚好在节目单上露个不像样的名字，叫做“夹皮沟老百姓甲”。

再后来，我演出了当年红遍全国的“样板戏”中被称为“最后一个样板戏”的《磐石湾》，我在这部戏里演一个渔家妇女“巧莲”。看过这部戏的人都知道，这个角色是一个年轻的、对敌意识上有些松懈的落后角色。

这部戏因为也沾上了“样板戏”的光，被称为“第九个革命现代样板戏”，还被拍成了电影，片子是请上影著名导演谢晋拍的。这个戏当时也和其他八个样板戏一样，要全国人民都来学唱，没想到我反而因为这个“巧莲”的原因唱京剧唱出名了。我唱昆曲的事情至今也还有人不知道，但大家都知道我是京剧《磐石湾》里的“巧莲”。

因为恰好赶上的是文革后期出来的，因此，这部戏在知名度上也有它后天的不足。因为，电影《磐石湾》拍摄上演了才一个礼拜，“四人帮”就倒台了，它仅仅赶上了个人入学唱的尾巴，因此，这部戏远没有其他的八个样板戏影响大。

其实类似我这种昆曲演员唱京剧的还有不少人，八个样板戏《沙家浜》中演阿庆嫂的女演员洪雪飞，原来就和我一样，也是唱昆曲的，样板戏开始之后才被调去演京剧，也是一唱就因为京剧出名了，而她原来是唱昆曲的这件事，反倒很多人不知道。

四人帮倒台之后，到了 1978 年，我们这批学昆曲的同学说还是应该成立昆曲的剧团，从这以后我就回去唱昆曲了，没有再呆在样板团。

那时候，中国有一阵子曾经兴起过“让名演员当团长”的模式，1985 年，我就当上了上海昆剧团的团长。当了一阵团长之后，我感到自己实在受不了这个职务的繁琐，但是一直又没有人替上去，感觉非常苦恼。这种职务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合适的，我一直是搞艺术的，完全不应该去搞行政，因为我没有任何行政经验，也没有处理各种矛盾和纠纷的能力，但是由于一直没有人来替补，我还是被放在那里“在火上烤”。

再后来，我就出国了。

回想我自己过去在国内走过的艺术道路，我相信我是幸运的。我一直被别人说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我的演戏条件不错，成长中一直能够得到不错的待遇，在学校和在剧团里，我一直是受到重点培养的演员。

1961 年毕业后我们整个剧团曾经到香港演出，那时候我就曾经被当地人称为“小梅兰芳”。这种幸运的情形也一直延续到我决定到美国生活之后。

1989 年的时候，我到美国来演出，演出之后我决定留在美国生活。我的这个决定当时在中美两地曾经很轰动过一阵子，美国方面也有很多报章发表有关文章。但其实，这个决定做出之后，我个人并不觉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我从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人，因此我把自己决定留在美国生活也想成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那时候，美国正要给中国大陆人士特赦绿卡，这对我个人未来的生活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机会。

决定在美国生活之后，我遇到了很多愿意帮助我的人，我在美国最初的生活中，也多亏这些朋友们的帮助。这下子，我身边的人就更有的可说了，他们说我在国内就“有福气”，到了美国还是“有福气”。

我留下来之后，有些人觉得不能理解我的这种行为，觉得一个中国的名演员到人生地下熟的美国住下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是直到今天，我仍

旧觉得我自己当年的选择不是个错误的决定，而且从后来的发展上看，我自己到美国生活后，艺术上和生活上也没有什么损失。当时的我在国内已经到了要退休的年龄，这种情形下我觉得人应该见好就收。况且当时我之所以留在美国不是为了别的，主要是想换一个环境，看看自己未来能够有什么发展。

倒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本来，我留在美国是决定改行的，几十年来我一直在一个戏曲环境中生活，我觉得很疲劳，这种心情我嘴上不说，其实心里很累。我也知道，在美国如果要靠中国的一个戏剧来生活实在是太难太难了，根本无法想象。我想改行的根本想法，也是从这里来的。

但是，在美国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不但没有改行，实在没想到的是美国给予中国戏剧的机会、给予我的机会竟然还蛮多的。

我决定在美国定居下来之后就有人接我到他们家里去生活，同时也有一些学生来跟我学昆曲。我的学生们都是付钱学习的，我的收费不低也不高，开初的时候因为是刚刚开始，大约是一小时十几块钱。其实，讲实在话，教书授艺我不是专门要收费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大家都是朋友，希望能够多多地聚一聚。

就这样，我在美国最初的教学生涯一教就是好几个月。

在这期间我碰到了我早年就认识的一个美国朋友，她叫苏珊，虽然是美国人，但是她的中文很好，一直在攻读中国戏剧方面的学问，她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中国的“川剧音乐”。她对中国的戏剧实在是了如指掌，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通”。

在我留在美国生活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 1990 年的时候，洛杉矶要举行一个国际艺术节，苏珊邀请我代表中国的文化人才参加演出，这次演出，我一炮打响，在此之后，我的美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巡回讲学和演出活动就开始了。

从中国到美国来，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多年的戏曲生涯中，我也不是个把名利看得很重的人，我保持着这样一种姿态唱戏和做人，不去刻意追求名利，因此，这种淡泊的心态也可能是我一切成功得来比较容易的真正原因。

实话实说，我唱戏的条件相对而言是比较优越的，扮相、嗓子和个头都不错，我曾经提到朋友之间常常有人说我福气很好，说的多半也就是这些。我到美国来搞我的艺术，基本上也都是机会来找我。我和我的朋友苏珊再次相遇就是我的机会，还有很多其它的活动，也全是机会。

在我这么多次全美巡回表演讲学过程中，最难忘的大概要算在美东普林斯顿大学的讲学活动了。

普林斯顿大学的文学系系主任叫做汤尼摩森，是美国得到过诺贝尔奖金的黑人女小说家，非常有名。她请了曾经导演过《尼克松在中国》这部著名舞合剧的导演彼得塞恩斯去普大讲学，而这个彼得似乎和我很有缘，常常给我各种教学机会。在美国这么多年来，我们两人常常联手教学，每次都是我帮助他一起去上课。比如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学计划中，我们是这样安排的，本来校方要他去上三天课，但是他把一天的课时拿出来让我去上，由我来示范中国戏剧的各种实际状态和要求，我们的合作基本上是用他的理论和我的实践相辅相成，共同完成讲学任务。

我们之间的艺术展开一直是互相有意联合来做教学和研究的。现在说起

来这种讲学非常简单，在美国搞戏曲的中国人不少，很多人也羡慕我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但是这种讲学活动实际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就拿普林斯顿大学来说，这个全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里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贵族子弟，而且基本上都是白人，学生们一个个家里都非常有钱，因此，这些一向幸运的青年人心里非常骄傲，根本看不起人，以为自己是很了不起的人物。我去讲学之前，汤尼摩森已经向我介绍过了，但是她明明白白地同时说：“我就是想制一制他们，从而争取能够改变他们。”

面对这样的学生，我们到台上讲课，必须用自己的真艺术感动他们，同时也用实际表演告诉他们，你们家庭无疑是富有的，可能生活中什么都不缺，但是你们至少是不会唱昆曲的。我必须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他们还有不会的事情，他们就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认认真真地讲，认认真真地教，效果非常好。我讲课完后，汤尼摩森还专门表扬了我，专门提到我讲课的水准和贡献。

不光如此，我和我的合作伙伴还曾到过很多美国其他著名学校讲学，足迹走过美国很多城市。我在耶鲁大学讲学时，为了听我的课，教室里严重满员，实在坐不下的学生只好坐在楼道里听讲，整个教室内外坐满了人。

除了和彼得合作，我其实合作最多的还是我提到过的我美国旧朋友苏珊，我和她的合作形式与和彼德合作类似，她在美国讲课一般是讲中国的戏剧历史，同样是她讲理论，我做实践，两方面一结合起来，效果常常轰动，听完课之后，就有许多师生来跟我学习唱功。

我就是这么靠着我的戏剧在美国生活下来的，这在我没到美国生活以前是不能想象的。因此，我的日常生活作息也常常不定，随时可能有讲学演出任务，任务一来我有时一走就是一个月，有时甚至是好几个月。在美国大学里讲学酬劳一般非常正规，虽然每次讲课的报酬不大一样，但总的来说是一份不错的收入，再加上我又喜欢演戏，这种安排使我觉得生活很充实。

事实上，我并不在乎酬劳的多少，因为这对我而亨是一种难得的经验。

当然在讲学过程中，我也遇到过一些困难。比如，我在饿亥俄大学讲学的时候就很麻烦，那里一个中国人都没有，我被学校安排在美国人家里住，我的英文也不好，连和房东都难于沟通，后来，我是靠着自己的信心硬住下来、硬和他们沟通的。

1992 年，我开始到台湾宣传我的昆曲、到台湾“国家”剧院演出。在台湾，我又遇到了一个想不到，我去台湾的演出一共是四场，场场客满，场面轰动。我在台湾演的是《牡丹亭》，这个剧目在昆曲中是一出名戏。说起来，台湾在 1992 年的时候还没有昆曲专业，但奇怪的是很多大学里却都有昆曲社，因为这样一层原因，台湾的观众们大多数没有看到过专业的昆曲演出，因此，我们这些受到过中国专门科班训练演员的到访演出，使他们开了眼界，对他们而言，也是一次机会。

从 1989 年到今天，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了，现在回想起自己的以往，我觉得自己当初决定“走向世界”是很值得的。

这么多年来，我的美国生活也和当年我的中国生活大不相同，我逐步在熟悉美国的环境，在熟悉这里的人。这么多年来，我说过我曾经遇到过很多好人，大家都非常愿意帮助我，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就曾经帮助过我，我后来到台湾去演出也是白先勇安排的。但是，当年我决定留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国内国外有报导说我的这个决定是白先勇一手策划的，但这其实实在是冤枉

了他，为此，我觉得他很倒霉。

现在的我虽然还保持着对昆曲的一份感情，但是每天基本上已经不练功了。我未来的事情主要是帮助我先生做一些他需要的工作，毕竟年纪不饶人。我是在美国和我现在的先生结婚的，他是我当年戏校的同学，我们都是第二次结婚，两人相处得非常好，他是洛城双语广播电台的董事长。

我一直强调自己当初留在美国是为了未来的生活，如今，我觉得当初所期望达到的生活目标已经达到了。我这个人是靠感觉生活的，生活决定也大多是靠感觉决定的，演戏也是这样。在美国生活下来之后，这么多年里，我父母也到美国来过了，如今，我女儿也到了美国，她现在已经在大学念书念到第四个年头了。

对于过往，我已满足。

对于未来，走着看吧。

陈燕妮思绪

华文漪当年决定留在美国不走的时候，骇世惊俗。

当时我正在纽约，和同做新闻的同事看到美西传来的大段有关新闻，一个个都目瞪口呆。那时候有关的文章做得有声有色，常年陷在凶杀案之类新闻的美国华文新闻人将泥足拔出，对这件其实还算普通的事情，好好地搜刮了一回。

一直就说是她在演出之后失踪了，遍寻不着。说良心话，那时候这类事情并不非常少见，大家虽然已知就里，但是众多的猜测又搞得人不知就里了。

更有台湾报纸开始大作文章，她被当做一个“起义者”的面目被推出来。

她当然不是。但她也真的顶过来了，看见她时，觉得她虽然大气，却仍旧屠弱，只为了自己的一个想法和做法，承担了太多外人的津津乐道，看来，人有时是不能出大名的。

回说过往，她有些犹豫，决断地说“我们是不是只诙艺术”？她目前的境遇令人羡慕，东有齐淑芳，西有华文漪，该二位戏界之亨各把一方，美国疆土巨大，东西常有不犯，但是从足迹上来看，华文漪却常常是过界之人，走得很远。

也就精僻。

我知道这篇访谈并不精彩，很多规避不得不避，很多深问不能就问，但是字里行间中不乏流露，也算是另一种说法和写法吧。当然其它访谈中也有同样不精彩的，只不过，华文漪本是满身的故事，不够火候，总有遗憾。

她仍旧很美，身高、体型乃至皮肤绝对标准，举手投足都是很亮的焦点，动或不动都是风韵。不谈岁数，她是个美人；谈到岁数，更是个美人。

《磐石湾》我会唱，但她曾经是“巧莲”，我还是第一次认真地听说。

这“第九个样板戏”曾经陪我做完不知多少回初级功课，我会唱那出戏里几乎每一个主要唱段，先是发现疑点，后是刀鞘对证，尤其是那句一板一眼的“刀出鞘，鞘离刀，对故人，正可交……”

仍旧风韵的她，也算我们牵牵挂挂的故人罢。

陈丹青

陈丹青背景

曾经以“西藏组画”闻名中国画坛。1978 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1980 年毕业，毕业后留校在油画系第一工作室作教师，作品曾经参加中国各种画展，获得一致好评。

1982 年 1 月赴美，同年 5 月与美国纽约瓦里森德利画廊签约，成为专属画家，此也是中国画家和美国画廊签约的第一人。1983 年 6 月举办第一个个人油画展览，成为中国画家在美国举办个人画展的第一人。后与部分中国知名画家联合成为美国大中央画廊画家。

1987 年成为自由画家，从事自己的大型“三联张”油画的创作工作到今。

陈丹青录音——

从根上讲，我其实是广东台山人，广东的台山人在美国的华人中是很著名的，我家里有很多台山人亲戚在美国。

我是 1982 年初来到美国的，当时，中国大陆出国的人非常少。早在我出国一年前，1981 年的时候我在北京第一次看到喇叭裤，正巧我弟弟会做衣服，他就用灯芯绒布为我做了两条喇叭裤。

当然，这种裤子以往在美国电影中是早就看到过了，但是那时候真正穿出来芽到大街上来，北京还是刚刚开始。这时候我就到美国来了。我就穿着这两条我当时认为“最美国”的喇叭裤“啪哒啪哒”地到美国来了，而且那个时候中国画画的人尤其是中央美院的男人都时兴留长发，就是留那种一头又乱又长的头发，当时的我也和所有人一样，一头长发。

我就这么到美国来了。一头长发和两条灯芯绒喇叭裤。

我到美国的第一站停在旧金山，我在那个城市里的亲戚把我直接接到他们自己开设的珠宝店里。初到美国，我当时感到非常兴奋，就到街上去走。

当时刚从中国到美国的我对两件事情感触非常大，一是我忽然觉得我在大街上是唯一看到美国的红灯没有感觉的人，每次红灯亮起来了只有我一个人还是要往前走。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别人就拽住我，认真地告诉我所有的人都在等红灯，我一看，真的是所有的人都在那里等候。为这件事我觉得很不好意思。第二个感触是来自我自己的穿着。在街上走的时候我时常可以路过各种玻璃橱窗，这时候我左顾右盼，在街道两旁的橱窗的反光中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喇叭裤裤腿在那里一甩一甩的。与此同时我惊讶地发现，整个街道上没有一个人穿喇叭裤，而我一直还以为这是美国最时髦的样式呢。

为了赶快顺应局面，我的亲戚后来赶紧给我买了当时正流行的牛仔裤，接过裤子来之后我发现，这种在美国非常时兴的裤子和喇叭裤的裤腿尺寸正好相反，这种裤子的裤腿是上面大、下面小。

为了这种裤腿的转换，当时真有点闹不明白。

这时的我虽然知道自己穿上裤腿上面大下面小的牛仔裤之后已经和美国街上的人一样了，但是心态上其实一直还是停留在北京那里，真正适应过来还是后来很久以后的事情。

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根本不会说英文，也不会说广东话，可是我的亲戚们大多数都是生在美国的中国人，他们除了讲英文就是讲广东台山话，不会讲普通话，我和我的这些亲戚们在一起，在旧金山一共呆了十多天，这十多天可把我憋坏了。我的亲戚中只有一个人可以讲一点点非常拙劣的广东普通话，他们看到我完全不能沟通的样子，自然也很着急。再后来我要去纽约，

在把我送上去纽约的飞机上的时候，我的这个亲戚帮助我在机场里找到一对台湾夫妇，因为台湾人都会说国语，他们和我正好同乘同一个飞机。

当时的大陆和台湾两地相当隔绝，我的亲戚们在队伍中找到这对台湾夫妇的时候，我非常高兴。这对夫妇看上去和我同样年纪，我上去一搭话，我们之间就用国语沟通起来了，那时候的感觉实在是非常亲切。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见台湾人，我后来知道，对于这对台湾夫妇而言，我也是他们看见的第一个大陆人。所以，在旧金山飞往纽约的班机上，我和他们一直在不停地聊天。

可惜的是，下了飞机之后直到今天，我和他们再也没见面了。

在国内时我其实对西方实在太不了解了，认为只要穿上喇叭裤就已经把西方穿在腿上了，这是不对的。不但这个不对，我和美院人当时非常喜爱的一头长发也非常不对。更要命的是，这种头发还有一个非常讨厌的缺点，那就是每天睡觉的时候长头发就被压扁下去，早晨起来的时候也就是那副头发扁扁的样子，但是当时我又发现要想到理发店去简单理一下发，要花十几块美元，我就决定不去理发了。

我现在看到我当年的照片，实在感觉到当时的样子像个越南船民一样，也实在感觉那个样子非常无耻。

真的，我后来看到的是我当年在纽约林肯中心参加画展时的录相，我操，那样子真他妈无耻。

当时，顶着这样一个无耻的形象还居然到处和人见面。

我记得我到纽约的那天非常冷，据说是纽约十几年来最冷的一天。因为当时天气冷得飞机的肚子都被冻住了，我们的行李因此完全拿不出来，我的所有箱子都是在第二大由航空公司根据旅客所填写的地址一家一家地送过来的。

一到纽约我就对纽约的印象非常坏，因为我的那些在唐人街的亲戚把我从纽约肯尼迪机场接回来，直接就送我到唐人街建在一个地下室的餐馆里吃饭，我的亲戚是那个餐馆的股东之一。可能当时的样子已经告诉了别人我是刚从大陆来的，总之，吃饭之后就有一个人走过来对我进行训话，他说自己原来是在中国中山大学学医的，但是现在到美国来还是要老老实实地打工，把自己的所有架子放下来。

到纽约的第一天我所经历的情景非常像我当年在农村插队接受再教育时候的情形，我想我已经被教育伤了，所以，现在我和我件在唐人街的亲戚们已经很少来往，只是逢年过节打个电话、见见面而已。反而在那些年中，在来自中国大陆的画家人数很少的情况下，我和台湾画家的接触比较多，当时的他们也非常乐意和大陆人接触，也可能是分隔太久的关系吧。但是再后来的时候，双方的这种感觉都淡化了。记得当时很有意思，台湾人和我们一讲话，起始句常常是“李们宗冈（你们中共）……”他们中有很多人“F”这个音是发不出来的。

我在中国中学毕业之后就到农村插队去了，一直到我 28 岁出国，我的前 28 年生命中只有三年的时间是有“单位”的，其他时候全是没有“单位”的。

我是在 1981 年 10 月份拿到我出国护照，同月拿到我的签证。那时我在中央美院教书还没有满一年，我一直赖到第二年的一月份才走。当时，别人能够拿到签证出国都非常高兴，但我不那么高兴，因为我知道：我又要去插队了，我又要没有人管了。

到美国之后，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我没有打过其它工。一来到美国之后就有一个美国画廊的老板来找我签约，因为他在中国时曾经看到过我的画，他后来又向中国的其他人问到有关我的画的事情，别人告诉他我已经到纽约去了。他就到纽约来找我，我们就签约了。

这个画廊地点是在纽约的五十七街，叫瓦里森德利画廊，我和这个画廊签了五年的合同，但是事实上两年之后它倒闭了，所以我和这个画廊真正的合作只有两年的时间。当时，中国画家和画廊合作的几乎没有，所以我是在这里第一个和美国画廊合作的中国人。

在我过去的这些美国画画生涯中，我被人家帮助过，也帮助过别人。我这个人在本性上是比较喜欢看到有才能的人的，所以多年来我从来不在意尽我所能力其他朋友提供方便，另外我想这可能和我自己的经历有关。我插队的时候也是靠别人的帮助才完成自己的想法的。当然，这可能也和一个人的习惯有关系，这就和习惯去害人一样。美国的美术界竞争是非常大，很多人不愿意把自己的机会告诉别人，其实画家之间竞争的局面在国内也是一样，只不过在美国的情况更尖锐一些。但是我觉得机会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了不起，有个画廊合作也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不是很看重这些，我对这种事情也并不很敏锐。

但是我说一句实话不知你相信不相信：帮助别人其实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很多人帮助别人是为了自己满足自己享受的“私心”。

我本人也饱尝过没有机会的苦头。我在自己考取研究生之前一直考不上大学，我一连考过七八回了，都不能过关。当时在中国江南一带画画的人大家可能大都已经知道我了，但是每次招生的人来，老是因为我出身有问题而不能录取我。我父亲是右派，招生的一看到这一条，马上就放弃对我的考虑。

69 届的学生中我插队八年是非常长的时间了，我就这样一直待在农村里画画。这种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些平时拿着自己的画要我来“说一说”、向我请教一些问题的哥们都已经在学校里上学了，只有我还是在农村里呆着。更有趣的是，学校里放暑假的时候，他们还会拿着画来找我，让我指点一下，可是，当时我连个户口都还没有。

我的成功只是在上中央美院研究生的这次比较顺利，因为这次是择优录取的。所以我知道机会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再加上我本性上也愿意帮助别人，我就一直尽我所能。

我在美国的合作画廊倒闭之后，有一段时间我没有事情可做，就画些小画零零星星地拿出去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85 年。

1985 年的时候我和来自中国的画家张红年、金高等人一起被美国的“大中央画廊”纲罗。1986 年的时候我和大家一起在“大中央画廊”举行了一个联合画展。我当时拿出去的作品还是我的西藏画，这个画展在当时的确轰动一时，美国的很多媒体都来采访过，因为这是中国大陆写实画家在美国举行的非常重要的一次画展。

瓦里森德利和大中央画廊是在美国和我有过正式合作关系的画廊，我和这两个画廊的合作时间前后加在一起，大约总共有五年的时间吧。

到了 1987 年左右，我就决心不再和任何画廊合作了，因为那样的话我根本不能画自己想画的东西，而且我发现这样下去自己的东西会越画越差。但是因为生计问题，我仍旧持续地画了一两年的时间，因为这时候我太太和小孩从中国到美国来了，我必须为家里的生活问题考虑，但是后来，我还是停

下来了。

我知道自己的画路需要做些修改，但是当时我不知自己一旦不画西藏画了该去画什么，对于这件事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我一向是个不太喜欢立即就改动自己的人，我比较喜欢在一个路子上走下去，现在这个改变必须产生，但是问题是“新的路子应该怎么样走”？就这样，我一直想来想去，磨磨蹭蹭地两年没有画什么东西。

当时我挺苦恼的，我知道我在艺术创作上的状况是需要开窍的，但是我也知道我这个所谓“开窍”中的“开”是早已经开了，但是“窍”还是找不到。

“在美国生活”这件事对搞艺术的人来讲最大的好处就是开阔了眼界。但是这也是特指居住在纽约这个城市，即使是在美国，纽约以外的地方就相对会闭塞许多。如果从有博物馆的城市数量来说，美国有博物馆的城市数量比中国也要多得多。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纽约生活，我对西方艺术有了很多见识，我不太能够想象，如果我这十几年没有到美国，没有看到这些东西，我会是什么样子。

和美国比，中国的信息量就显得非常有限。虽然中国现在已经非常开放了，从画面上来说，许多情况已经和世界同步了，但是对于视觉艺术来说，闭塞的状况还没有根本的改变。因为这个原因，我非常感激我在美国生活的这许多年时光。

但是也有一些东西是人在美国所不能得到的。在中国，人有一种自己的状态，我在中国的时候就有过这种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到美国来我到今都没有完全找回来。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你自己都不知道是“状态”的状态，这是一种创作状态。在中国的时候，你作为一个画家你这么想就可以这么画，这么画了就可以这么拿出去。中国的文化环境虽然有它的种种问题，但是它是自给自足的，你作为一个中国画家到底是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你就正好处在自给自足的状态中。

可是在美国就不一样了，美国的文化是多元的，你不知道自己应该向哪个“元”中间走去。就是走了你也还是不属于其中任何一“元”。在美国，你从构思到落笔去画到最后拿出去展示，各种状态都是在一种相对扭曲的情况下进行的。就是说你在这么想的时候你很可能不太确定你这么想究竟对不对、究竟有没有价值，因为周围有太多的想法。当你想通了之后你去画，你还是不大确定，等你拿出去时你更加不确定，因为美国这个地方是现代艺术的大窗口，是风口浪尖。在这里，你对自己和外界的认同不平衡，有时候你会太肯定外界，有时又对自己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而且在你眼界开阔的同时，你的对话系统消失了。在美国这个地方作为一个从中国来的画家你没有观众，在这儿甚至许多美国当地艺术家的观众也非常有限，因为这里艺术家太多了。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也有一些中国画家是在国内找不到感觉，而到了美国就找到了的，比如许多搞前卫艺术的画家。但是我想我不属于这类画家。

这里面自然牵涉到美术方面的商业问题，只是美国的一个问题，我现在所说的基本上还是在艺术方面。

我因为这些原因就常常愿意回国去找感觉，我和现在国内的一批年轻人都很合得来，不论是不是美术界的，我和他们在一起非常高兴，就是看着他们都高兴。

我一直以来对任何竞赛的东西和得奖的事情都不感兴趣，我是从来不看体育比赛的人，这么说倒不是说艺术是不能竞赛的事情，我在国内就没有得到过任何奖。

我的那种持续找不到感觉的日子一直持续到 1990 年和 1991 年的时候，在那之后，我在美国感受到了当年我在国内时的那种创作状态，也就是说，当年的那种创作状态又回来了。

这个时候是我想到要画大型“ 三联画 ”的想法。

我按照当时的热情一直画下来，直到现在。

那时我还没有画室，只是在家里画画。但是我家里的居住面积并不大，而我所想画的“ 三联画 ”构想都很大，因此限于条件不足，我一直无法完成自己的想法。1991 年的时候，从浙江美术学院出来一位教师，他在加州圣地亚哥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中国人一般喜欢把这种东西叫做“ 学习班 ”，当时从中国大陆来的很多画家，包括曾经非常有名的画家徐斌都参加了这个“ 学习班 ”，我也参加了。

我就是在参加那个“ 学习班 ”的时候开始画我的三联大系列画的。其中的一幅画还是在作家阿城家里的厨房中完成的。因为当时“ 学习班 ”办完之后我的大画还没有画完，那时我很来劲，一个暑期一共画了三套画共六大张，“ 学习班 ”散了之后我飞回纽约回了一趟家后又飞到加州，完成我的大画。

画完我的这些大画再回到纽约之后的第二年，我下决心租下了自己的画室。我现在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早上起床之后到画室来画画，然后晚上再回家，每天这么做的动机就是因为“ 昨天一张画还没有画完 ”，非常简单和单纯。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想我还能走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在近年来的创作上没有感到有枯竭的问题，但是在生活中它出现过。我相信所有呆在国外的人，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会有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时候的你离开自己往周围一看，就是有问题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们和周围的人都活得很不高兴，而一回到大陆，看到大家都很高兴，大家会为各种事情高兴，亚运会开成了大家高兴，四环路修成了大家也高兴。我时常也渴望回国和大家一起高兴高兴。但是我想我已经不大可能回国发展了，因为这么多年了，一个摊子已经摆在美国了，再回国等于又出国了。

我很不赞同有人说的所谓在国外必须“ 融人主流社会 ”的问题，我很怀疑这种说法，其实我想这种说法指的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东西，一种认同。我的认同是有保留的。

我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什么展望，从我的习惯和天性上，我都不大赞同去做这种展望。我这个人只是喜欢画画，我就活着、画画。当然我也有不少梦，比如我很想去欧洲等地旅游，还想去苏联。

我们这种自由职业者的收入很奇特，有时突然就有一笔钱进来，少则几千，多则过万，也有时候好几个月里一分钱也没有。这么多年来我早就习惯了过这种日子，钱多的时候，我就过得松一点，紧的时候就省一点，所以我不太想这些问题。

我活着一向是自给自足的。

陈燕妮思绪：

他的确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种喇叭裤和长头发的装束了。他现在有很精致的一个平头，坐在一个新旧适度的椅子里。

他的画室地点不错，位在曼哈顿四十二街红灯区的心脏地带，门外有人在兜售成人用品和表演脱光衣服的小电影，他们的楼在那里显得有点高级和不恰当，好在整个楼是有警卫的，上楼之后，铁门重重，拉开一道又见一道，不开玩笑地认真说，这种地方的复杂和多变乃至无牵无挂，其实是出灵感的最佳地点。

他的画室面积不小，他的三联画摆来摆去都足够，可惜那个地段据说是要被市政府认真改造了，整个相关区域完全要被西移三四条街，就这个“据说”问到他时他果真说不但是他而且他许许多多已经在那个楼里住熟了的邻居都正在为这事情苦恼，楼内的艺术家也曾联名写信给有关方面陈述自己的“不愿意”立场，但相信早晚也是“胳膊扭不过大腿”。

见面时的他一直还处在找到状态的满足中，他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你看不出来，和他见面和握手，这种满足却能够在不到两分钟之内甚至从他的背影和体温上感受到。

他心绪躁动。

很年轻的时候我一直是他作品的崇拜者和鼓吹者，如今再看和再谈，从我个人的心态上，有一种天然纯正的亲切和兴奋。

中国画家在美国对自己的出路从来都讳言，但他不是。我个人就不止听到过一个画家讲自己的某次画展机会是陈丹青居中介绍的，我不由得更加认为自己很年轻时候的崇拜者竟是超常地准确。

当然也非常非常乐见他在美国好不容易寻找回来的中国式躁动。

程珑

程珑背景

上海人，1983 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分配进入上海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中心工作，主要从事电视机器维修工作。

1989 年赴美留学，进入费城天主教 FAINTJOSEPH ’S 大学计算机专业读书，1990 年进入费城天普大学（TEMPLEUNIUERSITY）攻读传播系电影专业。在学期间，其创作的电视短片作品《狂想曲》获得美国艾美奖学生组娱乐类音乐片奖第一名。

1994 年毕业后，进入美国三大电视网中 ABC 电视网费城电视台担任电视转播车上的工作助理。1994 年 8 月份到 1995 牟 1 月份进入美国国家电影学院（AMERL-CANFILMINSTITUTE 简称 AFI）进修，1995 年 7 月份起在洛杉矶电视制作场任电视剪接，并自组天艺传播媒体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程珑录音——

当年我在上海毕业分配进入上海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中心的时候，这个连锁机构正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得到很大一笔基金，上海中心是由这笔基金建成的全国三所重点计划生育中心之一，这种重点中心当时只有北京、上海和成都三个地方有。

我分配进去之后负责槁电视，当时，我在那个中心里所使用的电视设备除了上海电视台，就是我们的最好。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对制作电视节目感兴趣，但是，在国内的环境里，你如果是做技术的，就必须老老实实搞技术工作，因此，我的想法一直没有办法实现。后来，我的单位要我去上海外国语学院强化英语，出来之后我就改做翻译之类的工作了。

1989 年的时候，我就出国了。

当年我之所以出国，其实想法并没有很多，只是看到当时周围的同学、朋友们都出去了，所以也想出去。但是说到究竟为什么要出国这个问题，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在美国上的第一所大学是一个天主教大学，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这个学校里的计算机专业不很好，加上我在国内的计算机底子不是那么好，因此觉得未来自己在这个行业没有什么竞争力。那时做学生，常常要在晚上去计算机前面 RUN 计算机，RUN 不出来，计算机又不会讲话，这种时候我觉得自己很痛苦。后来我又进入天普大学，这是美国唯一一个授予过邓小平荣誉法学博士的学校，也有人说它的电影系是很好的系。这个学校电影系的纪录片做得特别好，有好几个同学得到过奥斯卡学生奖。我就进入这个学校读书了。我之所以能够进入这家学校是因为我懂有关的技术，他们需要这样的人。我因此得到全额奖学金。在这个学校里，我的这个电影专业中我读的是最高学位，这个专业侧重于电影制作。

我的这个学校做法一般说来有点反好菜坞，学校成立的宗旨就是希望成为一个不同干好莱坞的。比较讲究个人意识的、非主流的实验电影制作中心，我在上学的时候，对学校里的这种提倡不是大认同。因为，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大家也是反好莱坞的，但是我觉得好莱坞多年以来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功总是有它的原因的，更而且，现在反好菜坞的人中大多数人其实都没有好好研究过好莱坞的东西，那么，凭什么去反人家？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情结在里面。另外一点，我认为我的这个学校过分强调了个人的东西，而众所周知，一个电影拍出来，都是靠大家合作的方式、大家帮忙。在那里上学时我就常

常在想，在这里学到的东西老是在强调一个人拍电影，如果将来我真正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摄制组，有人给你钱拍片子，你能不能够和各个部门进行协调和沟通？再另外，我们的学校仅仅注重纪录片，我其实对纪录片不感兴趣，但是我还是学了下来。

1991 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作品，是我一门课中要求的作品。当时，我们那门课很重，一门课要做七个制作。我集中精力作自己的制作，我也喜欢日夜做，我这次又是采用这种日夜做的方式。作品出来之后，我自己很喜欢。我的作品拍的是一座桥，作品的题目叫做《狂想曲》。这座桥是连结美东宾州和新泽西州的一座桥，叫做“本杰明富兰克林桥”。这个桥造型满抽象的，是一个斜拉桥，有四根钢索拉着，这个桥上既可以步行，也可以开车，我看到这个桥的时候脑子里就开始想做一个东西，我并且想用钢琴音乐来表现。后来在作品里我采用的是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因为这个曲子很壮观，我的创意是把桥本身作为一个大钢琴，桥上面的钢索就是钢琴里面的弦，通过这个想象来把桥拍出来。

我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做的，从拍摄到构思都是自己想到就拍下来的，没有什么导演，剪接到后期制作也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这个作品也可以算是一个 MTV，是个电视片，但是很象电影。

我做的是黑白的，我一直很喜欢黑白的东西，无论照片还是电影。

那段时间里，我日夜在我们学校的剪接房里面工作，晚上我累的时候就会到走廊里走来走去，有一大，我在走廊的墙壁上看到一个广告，说是学生艾美奖正在征作品，我就按照要求请我的老师给我的作品签名并在寒假中把作品寄过去了。后来，到了一月底的时候，就有通知来说是我获奖了，说是我的作品已经被评为全地区的第一名。

当时学生艾美奖在全美设立六个地区，每个地区选出一个第一名，然后选出第一名一个，第二名一个，剩下的就是四个第三名。那时如果能够拿到第三名的话就会有四百元的奖金，我想我一定至少已经拿到第三名了，那时我很穷，一直想买一个好的照相机，我就和我的朋友在去纽约的时候添了一点钱买了一个还不错的尼康照相机。

等我从纽约回来的时候，听到学校在我的留言机中留言告诉我，我已经获得第一名了。这个奖的奖金是两千美元。

1992 年 3 月份的时候我到洛杉矶来领奖。这个奖的全称叫做美国电影科学技术学院颁发的艾美奖中的大学奖。对于这个奖，大家反应不错，为我颁奖的人得到过奥斯卡的作曲奖，而且也是每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中的乐队指挥。我的这个作品得到了所有学生奖中关于艺术音乐电影的奖。我作品其实是凭自己的热情来做的。做完这个东西之后我觉得自己可能真的应该好好地念念电影了，因为我已经被肯定有这方面的能力了。

得奖之后，美国《电视技术》杂志的记者来采访我，他们问：“你在这部片子上所花的经费是多少？”我告诉他们我的这部片了的经费是数字是“没有”。我解释说，我就是拍一个桥，桥一直在那里，去拍就是了。我用的胶片是我的学校提供的，我们在学校交七十元钱，学校就会提供你胶片让你在学习过程中使用，片子的剪接也是在学校里做的。我自己只是开了一辆破车、从学校里租了个摄相机忧到桥那里去拍了。后来《电视技术》杂志专门为我的回答出了一条新闻，说是“今年的学生奖片预算从两万到六千元不等，但是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视技术人员出人意料地没有任何预算”。

当时，我没有钱，但是不能没有钱就不拍东西了，美国学生都没有钱，我们在学校里的学生百分之七十五的人是靠学生贷款学习的。因此，在构思的时候就应该想些省钱的东西和办法来拍。

我说过这时我知道自己能够搞电影。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在美国，得过奖的人是很多的，在得奖的人之中只有很少的一些人能够继续作下去。后来，我曾经上过美国最好的电影学院，那里的学生出来后第二年的作品直接就曾经得到过奥斯卡短片奖，但是这些人中很多人到现在在电影界都没有什么，这说明美国的人才实在大多了。

但是我还是决定走自己的路，既然我曾经被肯定过。但是，美国电影界的情形还是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比如说如果你的东西得到了很好的奖，就会有经纪公司来找你签合约，在签的时候人家第一句话就会问你：“你有没有剧本？”人家就是上来就这么问你，不管你千里的剧本是自己写的还是和人家合作的，他们只是问你手里是不是有剧本好拍？如果你有剧本的话，他们就会先把剧本要过去看剧本，如果剧本好的话，经纪公司就会找人投资你拍电影。如果你手里没有剧本的话，人家就会和你说“拜拜”。

在电影圈待过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知道，一个好的人才常常的情形是，一个短片在拍的同时，其他的好几个剧本都已经准备好也要开拍了。但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种情形。

那个时候我经常跑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图书馆，看国内的小说集，后来我在《收获》上看到了一篇青岛一个不出名作者的小说，我觉得很有意思，觉得可以改排成电影。现在，我已经开始改编这部小说，我先想拍一个短片，这部片子大约需要三万美元左右的预算，这其实只是我迈出的第一步，因此你必须有东西来证明自己，让人家相信你能够做导演。

1994 年我从天普大学毕业后进入 ABC 电视台工作，我在费城地区做电视转播车上的一个小助理。按说这是进入了美国主流媒体，而且这种结果也是很多学生所盼望的。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的感觉非常不好，因为费城的犯罪率特别高，我上的是晚上或者下午班，每天所做的不是杀人就是放火的新闻，全是这种东西。干这种活儿危险倒是不危险，因为如果我们已经到达现场而警察还没有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守在转播车子里不出来，等警察到了再出来。

但是这种新闻拍多了，我们看到的全是社会最底层、最阴暗的一面。还有的时候，如果命案死亡原因是自杀的案件，我们的新闻中就不能去报道死者的真名实姓；我们去拍了这种东西却经常不能放出来。费城那个地方一大到晚都在着火，我们常常也要去拍着火新闻。我们外出拍东西回来，常常大家一见我们就知道我们又去拍着火新闻了，因为从衣服上的味道一闻就闻出来了。

有一天是一个星期六晚上，那一个晚上就发生了 11 起死亡事件，整天看到的都是这种事情。

有一次我们去拍一个新闻，竟然是这样一个事情：两个黑人兄弟因为一个三明治吵起来了，其中一个人拿着三明治就跑出去，另外一个人拿枪追出来把他打死了。这种新闻拍下来之后，让我觉得很没意思，我当然觉得美国犯罪的素质大低，同时也想到自己竟然傻乎乎地会来拍这种东西，这使我的感觉非常不好。

在 ABC 工作的日子里，当然也有时候是拍有意思的事情，比如我们曾经

拍过一个女子学院，也拍过有 120 个房间的房子，但是我总觉得自己这么下去就是在混日子。

再后来我就到洛杉矶来了，我比较喜欢这里，因为一来，这里亚裔移民比较多，二来，好莱坞在这里。

1994 年 8 月份我就开始申请我后来读的国家电影学院。当时我申请做导演职位被拒绝了，原因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拍过故事片。但是我要上的这个学校中有很多人都已经在电影场做事了，大家都比较有经验。在这里，有人曾经是做声音的，但是可以通过这个学校导了片子之后做导演。而且，学校中有很多人也已经是在好莱坞做事了。在学校里如果你给人家的印象不错，就会有人在有工作机会的时候想到你、推荐你，因此，行内人比较清楚，电影圈在外面的人是很难找到事情的，因为工作机会都在内部消化了。

所谓在好莱坞做事一般是在两个地方做，一是在一般的公司做；另外是在大的制作室里做，比如派拉蒙、华纳兄弟、21 世纪福克斯等。工会在这里面起的影响力非常大。因此圈子里制作电影也分为工会的片子和非工会的片子。比如说你现在拍一个电影，这是有一千万美金预算的，你找到一些哥们来帮助你搞，这样非工会电影一出现，工会就会来找你麻烦，他们会问你的电影是不是“工会的片子”。这种问话里有两种意思，一是你的电影用人是不是达到工会会员的水准，另外为了保护工会会员的权益，他们要了解你的基本工资付的是多少？有没有低于工会最低工资？加班有没有额外工资？片子到达一定规模就会有这方面的麻烦，他们是根据预算来决定管不管你的，同时也是为着保护工会会员的利益。一般而言，如果一部片子的预算大约超过六百万美金左右，工会就会出面。有时候，你的片子三四百万的预算也会受到工会的干涉。

但是话说回来，工会的事情其实对会员来讲是一种很好的保障，如果你是工会的成员，那么你如果参加一部片子作为剪接的话，每个礼拜就应该至少收到两千美元的工资，超过 50 个小时就要加工资，加到一倍半，超过 60 个小时还要再加，这时就已经是惩罚性的加工资了，工资要求达到平常的两倍或者两倍半。

加人工会不用有人介绍，但是有一些资格和条件，也需要交不低的会费。以我做剪接工作的人来讲，我们必须在圈子里的片场做满正规付薪水的剪接工作一百天才可以成为工会会员；另外一种途径就是比如我的一部片子如果找一个人来担任剪接，但是这个人不是工会会员，这样，工会的人就会干涉说：你可以走两条路，一是把这个人解雇掉，我们为你介绍一个工会会员来做这个职位；或者你认为他真的好的话，我们可以现在就发展他进人工会。

在美国电影业内，工会的势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美国有很多片子都会拿到欧洲去拍，就是因为不想和工会打交道。一个电影在美国境内拍摄通过租东西、租场地之类的事情，工会会根据各种途径来知道你正在进行的事情。电影在美国是个著名的工业，所以就会有正规的管理办法。

我现在正在参与制作的是一个电视剧节目，用到很多计算机的东西，在迪斯尼第九频道播放，讲的是有关美国海关的片子，真实的事情用表演方式来显示出来。这个工作就是我的同学帮我介绍的，我做剪接，工作地点在环球影城的对面，地理位置是绝对的好莱坞。但是我们的片子不在好莱坞的区域里放。

在美国电影圈，所有参与片子制作的人从根本意义上来讲都是临时关系，除非一个片子做很多年，不然的话劳资双方随时可以散伙。在这一行里工作，在自己家的住房上也有很多讲究的，比如常常同行中不是住在好莱坞就是住在圣塔莫尼卡，看到你住的地方不是这两个或者其他电影人聚集的地方，别人就会觉得奇怪。

美国电影界做事讲究专业，没有人会让你来“试一试”。拿剪接这个工作来讲，要求也非常专业化，对基本功要求相当严格。比如一秒钟有 30 个画面，如果你剪接的时候多放了几个画面，就会有人指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回头看中国国内的电影，我觉得张艺谋和陈凯歌的片子剪接比较精良。陈凯歌的片子《霸王别姬》的剪接满准确的。但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的地方就太粗了。

在电影界，美国和中国的区别很大，这里要求的是专业的，这里面也包括你自己只做你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一原则。比如说你是做编剧的，我是做剪接的，那么你不要来干涉我的事，我也不要去干涉你的事，当然这里面的前提是我们都很称职。我们在学校里学习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如果打灯光的人忙得满头大汗，你上去帮忙，他心里一定会非常不高兴，他觉得你要抢他的饭碗。即使是人手不够也是他们内部的事情，用不着你操心。但是在大陆拍片，情形就不一样，你如果在一旁看着人家忙，那别人要讲话的。当然，熟悉了美国的这一套之后，回国之后工作可能会不太顺利。国内的电影没有什么规章。

我在美国制片场做过之后觉得在美国拍电影没有什么可怕的。目前，已经开始有中国大陆的人士进入美国电影圈子里来了，有的也加入了电影工会。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大陆人在我们学校里学习的在我之前只有两个，做电影商业方面的人还是有的，但是做技术的还没有。在加人工会方面我知道中国著名的摄影顾长卫已经是加入美国的摄影工会了，演员陈冲、邬君梅也已经是加入演员工会的会员，我自己也已经够资格加入工会了，但是我还是想在制作下一个工会制作片子时再加入进去。

在美国搞电影很不容易，关键是你要喜欢这个，从学习到实践是一个满长的过程。对于我来说，在美国学电影已经五年了，过程很长。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美国人圈子中间工作，我和美国人相处基本上没有什么困难，生活习性上也没有什么不融洽，和他们一起吃生的东西都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有一次，我们在剪片子的时候看到一个片断是描写一个美国男人起床之后，刮胡子、梳头、涂面油之后往自己的腋下部位喷撒调和狐臭的那种香水，我当时看到这里说，这个镜头其实没有普遍意义，应该可以删除，因为狐臭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但是我的美国同事惊讶他说：“怎么没有？美国每一个男人都有狐臭的。”

说来说去，在美国电影圈子中，搞故事片在影视通俗艺术中是属于最高层次的，因此，故事片是任何电影人都想做的片子。美国的影视圈中就有这样的话：“每个人都想进入制片场，每个人都想做故事片。”

1995 年 10 月份开始的时候我们和国内的人一同成立了一个公司，叫做“天艺传播媒体有限公司”，为国内介绍了一些美国的片子进去，现在，我们的事业等于到了一个转折点，我希望未来逐渐能够向国内靠拢。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理念：真正靠做电影做出来的人，不一定是有才气的人，而是坚持最久的人。

陈燕妮思绪

他梳美国文艺人常爱梳理的中分长发，坐姿已经十分“美国”，在凳子里几乎从来没有坐直过，一直就是半躺着，东倒西歪。我们一开始就乱七八糟地讨论了很长时间的有关“好莱坞”定义的问题，但是感觉中还是非常不清晰。

的确，好莱坞有过很多好片于和滥片子，有各种不同形式的电影类别和表现手法，常常听说的“反好莱坞”提法，其实给人的是一个彻头彻尾“乱七八糟”的理直气壮。

我本人非常倾向纪录片，可能因为职业的关系，比较偏重于纪实的东西，听到他有关独尊“故事片”的说法，觉得有点心凉。

谈话的当时，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回中国拍片，他也谈起他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另外一个本子，那是一个大约半小时的移民故事，他说自己会先争取到几万块钱来拍出来，其他的事情接下来再想办法。这样，将来如果寻找投资者的话他也可以有东西给他们看。

他说他的目的只是要让别人有东西可看，而且能够看出功力就行了。“唯一，我能够做到的就是这些。”

没钱，没人力荐，没人在身后做一个必须的基石，这是一大痛苦，究竟怎样化解，我觉得程玩的目标仍是软弱。但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

在美国生存，常常的一个饥谒就是无从进入别人的势力。我常常就此在想，无论行业，美国行之有年的体系是早就建立的了，自然有着枝蔓错节的关系，而且这类关系秉承中国圈内的繁衍走向，恩泽袍众，子承父业，出夫唱妇随，也出世家。里面的人把酒言欢，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几个脸。

也如同四川之类地区的民工带着微薄的盘缠齐齐入京寻出路，若果有人竟刻苦到有志于电影，如果让他哪日成为陈凯歌家里的座上宾，你想有多难。

这种比喻一直就有，但深藏在内怀不敢泄露，今天借给程珑收尾大胆一说，也算“酒壮 尿 人胆”以及诸如此类吧。

不然你就得找缝隙，中国的移民史算起来还是太短，中国人中有太多人完全不能确定缝隙在哪里？程珑已经找到了他的学校，但是至今相信也没能正式确定。

程珑说，如果他的小片子做出来之后感觉不错的话，他还很想去争取拿到美国犹他州“日舞影展（SUNDANCE）”的一个奖。“日舞”是一个很多独立制片人都想去争取奖项的影展。中国导演田壮壮的片子《蓝风筝》就是在那里得过奖的。

但愿，这是他的缝隙。

真成了，自然也会是日后人的缝隙。

陈中

陈中背景

1949 年出生于中国南京，1953 年随家人进京，后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1969 年去黑龙江建设兵团。八个月之后回城。

1972 年进入北京市机械局当技术员。1976 年进入清华大学自动化控制系，曾撰写及发表过许多有关论文。

1979 年赴美，自费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工程学院航空工程专业。1980 年进入美国工程中心，担任工程索引编辑（ENGINEERINGINDEX），1981 年进入美国东部著名照相机专卖店“四十七街照相公司”。1982 年开始从事照相机及家用及办公电器生意，开设名为“美辰洋行”至今。

陈中录音——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我得到得以留学美国的签证是第 67 号。

中国大约是从 1978 年 11 月 1 日出台关于开放自费留学文件的,我知道，那份文件就叫“教外字 1034 号”。紧接着，不到一年的时候，1979 年，我就出来了，相信就是第 67 个自费出国的。

我是清华毕业的，是个工农兵学员。在上清华之前我就是一个“搞洋务”的洋务官，我搞技术情报。从清华出来之后我又开始为洋人做事。

1979 年，拿着第 67 号签证的我最早是到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来的。

来美国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我曾经找到当时的苏联领事馆，我当时一门心思地准备去苏联，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美国这个地方。当时的苏联领事馆在纽约的东六十几街。我到了那里之后，总领事还真的就为我安排了一下，去苏联的喀山航空学院。他一共为我安排了四个礼拜的学习时间，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我自己却变褂、决定留在美国了。

我就是用这后来的四个星期时间熟悉起美国来的。

我来美国的时候还是在普林斯顿的暑假期间，学校没有开学。但是后来我还是决定不读书了，这种考虑基本上是出于“财富和自尊心”方面的。我当时的教授是我们系里的副校长，他带我去他家里去看看，他太太在旁边给我讲美国的生活。我的这个教授是一个学生都做科学的人，但是到了晚年，他很失望，他说如果他不是做科学的话，他的成就更会比现在更加多。

从他的惋惜和后悔中，我开始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美国。

我到美国的担保是由美国的一家公司提供的，这家公司和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弟弟爱德华·肯尼迪相当熟悉，因为这层关系，我后来也曾经到爱德华家里去看了看，主要是看他们在波士顿的龙虾湾海边的一些房子。我直到现在也不能确定当时我看到的是他家的哪一栋房子，但是至今深深记得我去看到这栋房子的时候，才刚进大厅时根本看不到房间，都是树之类的，墙上全是大幅的画作这栋房子的屋里有很多礼品陈列室，大概总也有四五个房间甚至六七个房间全都是这样的，被陈列的礼品里面也有东方象牙雕球。看到这些东西之后，联想到我在普林斯顿看到我教授家里的情况，我就决定不上学了。

我那年正好是 30 岁，到美国身上带 960 元美金，这是我在北京为洋人工作得到的所有钱，我把他们全带出来了。

我随后就开始工作，先是进入一个工程中心，因为我在国内一直是搞技术情报的，我可以用这一行来吃饭。再后来我进入了在纽约等地相当出名的“47 街照相公司”（47ST.PHOTO），我今天之所以做这一行，完完全全是受

了在这家公司工作过的影响。

“ 47 街照相公司 ”在纽约曾经是很出名的，这个公司的老板在公司破产之前年薪是八百万美元，在独立经营的照相机等电器业界，它的零售在全美国是第一位。在鼎盛时期，它的工作人员有六百人，现在大约只剩下一百个人。它是在 1992 年破产的，但是它是受美国破产法十一条保护的，属于重整财务的破产。当时我在公司里的位置是技术咨询工作，我进去的时候这家公司还只有一家店，在纽约的西 47 街 67 号。

我在这家公司做了几十月之后就自己出来做生意了，我从“ 47 街公司 ”实在学到了大多的东西。那时是 1982 年，我出来之后，8 月 1 日，我自己的公司就开张了。我的公司我把它取名叫做“ 洋行 ”，之所以这么叫，是对中国传统的一种怀念。

开张之初我没有什么困难，我当时一分钱没有。当时在生意上给我最大支持的支持者是一个名叫山姆 · 恩纳汉姆的美国人，他是全美国最大的照相机收购商，他现在已经死掉了。那时候，他支持了我将近 20 万美元。我的另外一个支持者是一位全美国最大的日本照相机进口商科林顿 · 斯但，他也支持了我将近 20 万美元。他们给我的支持其实都是放货，不是现金，他们把东西给我，要我拿去卖。他们并不怕我赖帐，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家庭，他们也有他们的办法。

我当时自己差不多只有个两万块钱，这点钱作为临时周转是够用的了。公司一开张我就卖的是照相机，虽然别人现在看到的我店里有许多其它的电器，但是实际上直到现在，卖照相机仍旧是我生意上的主线。

我的公司在一开始就成为山姆 · 思纳汉姆生意的一个延续，我们的经营宗旨实话实说就是“ 乘人之危 ”，也就是说，我的公司乃至我们这类人的公司并不是常规经营。我们是这样经营的：同行之中当谁有困难的时候，我有钱，我就用半价或四分之三的价格把有困难公司的货品买下来。比如，一个照相机如果 100 元买进来的话，在梅西等大百货公司里要卖到两百元，如果进货 1000 台，卖掉了 500 台，剩下的 500 台等于几乎没有什么成本了，我在这时就会去买这剩下的 500 台，但是我绝对不会出 100 块钱来买，我大概只会出 50 块钱或者 30 块钱。

在纽约，我们这行中有自己的“ 行业会 ”，我所处的这个行业的“ 行业会 ”出席者全部是传统的犹太人，说得详细点就是哈西迪伍教派的犹太人。

你可能不知道，我其实是一个有着他们血统的中国人。我是回族人。中国的回族人分为“ 白帽回回 ”和“ 蓝帽回回 ”。也就是戴白帽和蓝帽子。我的家族就是属于“ 蓝帽回回 ”。我家起码有两三代人生活在开封，那里曾经有很多犹太人。回族人做小买卖的人很多。我想经过多少代的混血，我可能还有百分之五左右的犹太血统。

很巧合的是我到美国来又和犹太人在一起了。也可能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很多人觉得他们很古板，但是我挺喜欢他们。我周围的犹太人也不把我当成犹太人，他们说中国人中间没有人象我这么高这么大这么胖的，我告诉他们说“ 你们见过的中国人其实大都是广东人 ”。

全美国大约有一千个哈西迪伍教派的犹太家庭在经营我的这个行业，我想我是唯一一位和他们混在一起的中国人。这个行业十分独特，行业内谁家有麻烦了，行内人会互相通知，寻找愿意出钱买剩货的人。在这种相互间的通知当中，我需要用商业眼光对这些商品进行判定。磨练到现在，我可以很

准确地判定有困难人存货的价值，这样的判断可以彻底决定我购买的决定。这种“判定功能”不行的话会很麻烦，我的“恩师”，也就是我第一支持人就是因为判定的事情做得不漂亮最后自己给自己一枪的。我说过他已经死了，他最后负债了两百多万元。他临死前的两个星期辽间我能不能借给他三十万美元。他死的时候大约七十岁左右。他很要面子，住在纽约著名林肯塔的楼中，平时吃饭也要比别人多付一倍的小费，负债这事可能让他觉得很丢人。我们这一行其实并不黑，但是规矩相当清楚。

直到今天我经营得不错，我想是有一些原因的。在我刚才所说的我们行业中的这一千多个犹大传统家庭，他们的教育水准没有那么好，以我所受到的多年工程教育，我想我比他们强。在我们照相机这个行业中，在普林斯顿大学受过教育的大概只有我一个，其他人都不知道是从什么学校来的。

再一个是我肯出钱。很多商人在别人家倒闭的时候不敢下手买货，总是东看西看，等到他们觉得需要这批货的时候，我已经早把它们买走了。

买来买去，最后我色曾经买过当年我的东家“47 街照相店”的东西。1995 年 1 月份，我的这个老东家已经彻底倒闭了，也就是成为美国破产法中的第七项。这种时候，我当然又是曾经“乘人之危”了一次。这其实就是我的商业核心，遇到这种时候，我再忙，即使把店关掉我也要去。

在纽约很有名的“卡朵”等百货公司就是我常常就打电话去的地方，电话一打过去，我常常直接就问：“怎么样老兄？现在缺不缺钱花？我有。”“卡朵”公司的照相机部可说是几起几落，起的时候你不要理他，等它下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它。西方人做事有他们短见识的地方，常常是已经失败过的事情，他们还会再重新去做。我常常利用这一点。

事实上，在我买进这些商品的时候，我大部分已经早就把它们全部卖掉了，我起到的是一个调节人的作用。我知道有行业内的哪些公司生意最好，货卖给他们会很快就销出去，我和主事的人也是很好的朋友，常常是一个革于传过去就问他们要货还是不要？

经营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在行业里建立了信用，我的货别人就敢用。美国人的商场上是十分残酷的，你如果是一个销售员，你去“47 街照相公司”销货，你说自己有五千台小型的照相机，他们会说“好，货可以放在这里。钱？现在没有钱。”这种货到了他的仓库中可能一个星期就卖掉了，但是等你两个星期后再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你的货根本卖不掉，你要不要取走”？但是怎么取呀，那么多东西，又不是一个小背包，你如果不取，那他们就再跟你谈减价的事情。这就叫做“吃死你”。如果当时你真看准了说是“好，我就取走我的货”，那他还真没有。

在美国，大家都说犹太人是生意场上最坏的人，但是依我看，如果以族裔来区分的话，东方人是最坏的，做生意的生意人当中，中国人是最坏的，所谓坏的意思就是“聪明”、“精明”。

未来，我的生意路子要改了，我想把自己的生意办得企业化。但是话说回来，于我们这一行如果企业化起来是会赔钱的。最近的《华尔街日报》已经指出这样一个问题了，它说“美国家用电器销售中的消费至上主义已经使得企业亏损累累”。情形确实是这样的，比如，在美国，一个客人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拿回家即使都被狗啃了，但是如果你拿回去退，商店还会为你退换。美国 40 年前就开始了消费主义运动，直到现在才开始在要求商店讲究商业道德的同时，也该讲讲消费道德。如果你小看这种道德，你就错了。

其实，在我们电器行业中，有很多因素是来自这个方面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这类未规范化公司的利润其实也来自这些方面，比如大公司买来 100 台传真机，卖出去 10 台退回来 5 台，这时候，大公司就会对这种产品产生怀疑。那么这剩下的东西我就可以用很少的一点钱买下来，再卖出去，在市场心理学上，不论男人或者女人，买回来东西之后会无缘无故地退货的人占西方消费者的百分之三十，在东方人中是百分之七十到六十，中国人中比例更高，黑人中占百分之十左右。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状态。大公司中专门人才来研究这个问题，然后为自己的公司制定销售政策。

但是也有例外，纽约经营最好的一家公司在销售苹果电脑的时候，不仅明定不能够退换，而且你如果想在同一型号中进行交换都不行。这家公司的老板是个女的，非常的棒，她叫做瑞·塞勒。她的公司中有十种发票，有最多 60 天可以退货的发票，最严的一种发票就是只要付了钱就是不能退换的了，她根据不同的商品的特点制定出不同销售制度，我认为这种做法很聪明。

我的利润拜西方的衰退和中国的经济起飞得来。如果说真的，我的年营业额大约在 1000 万左右，年毛利在 50 万美元左右。我店的背后还有很多的批发生意，店里的是零敲碎打。中国大陆现在也开始有整批的人到我这里来买货。转到企业化经营之后，我主要是想追求一种成就感。很多大公司在经营上其实都是赔钱的，未来我想发展的另外领域可能会是在自动化仪表方面。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很信仰居里夫人，总想着追求和工作。

到美国这么多年，如果以现在的我和当年我对自己的期望而言，我想我应该算是勉强及格，我仍旧欠缺对商业社会广度和深度的了解。

我深深知道：在美国，我当年的理想只完成了一半。但是想到过去十多年在美国的所做所为，我不后悔。

陈燕妮思绪

在纽约，提到陈中的名字，但凡知道一点“电器路数”的人，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

他位在曼哈顿中城的店，相信是全美大陆人开设的第一家电器店。可能这之中多亏他是他自己所数说的犹太人的缘故吧。

细看之下，他果真是一张隐约的犹太之脸。他所应该属于的那种犹太人其实相当古板，他们穿通身黑衣，戴黑帽，脸旁留有带着小卷的长长胡须，一年四季，从早到晚，给人以面目不清的第一印象。他们聚集地居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和皇后区交界的地方，自成社区，刚愎自用。我一直不能理解在美国这个万事多变而且充满诱惑的国家中怎么还会留下这样的一大批倔梗之人，凛然不可侵犯，没有亲眼目睹的人一般难于想象。有时候车子从那里的高速路上飞驰而过，撞进眼里的也都是这种一闪而过黑黑的嘴脸和剪影。

陈中的店壁垒森严，纽约的治安不难从他公司特定的进店过程就可以看出来，你必须按各种门铃直到到了他的店门外。他很忙，往来所有货款基本上都是现金，他把那些成打的钱谨慎而随便地放在货架子后面地上的盒子里，绿油油的一大片。

他早已买了房子，位在纽约皇后区的著名的最后一块净土“森林小丘花园”之内，当年我在纽约当记者的时候，那个如花似王的地方曾经出现过一个专门的强奸犯，拍摄新闻时，好好地看了看那个地方的里里外外，那里，家家户户门前都是不准停车的，因为，马路的两旁已经高级到属于每一个住户的了。

在纽约，他的人缘相当不错，很多人带着客人去他那里，常常大家就成团成簇地立在他的面前，看着他和他的伙计一个一个地忙过来。有人有时就轻微地喷有烦言。电话来时，如果不是客人的，他会叫你在线那端无休止地等候，直到你自己耐不下去挂断为止。

他极精明，收放有度，张弛自知。外人看不见时，他已经举重千斤了。

他很忙，他有枪。

你知道就行了，不要告诉别人。

殷新

殷新背景

1978 年考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为该剧院主要演员，曾经拍摄过电影《骆驼祥子》、《血总是热的》、《大桥下面》等。并在剧院中所排演的话剧《风雨夜归人》、《明月初照人》、《原野》等剧中担任主要角色。1984 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

1987 年赴美，抵美之初做过各种工作，1989 年进入纽约苹果电视台工作。与此同时，她和现已离异的丈夫王伯昭成为纽约华人艺术界的活跃人物，时常组织大陆艺术家举办各种联谊活动，并参加当地的各种业余话剧排练及演出工作。

1995 年与王伯昭离婚后曾经回国发展，后回到纽约进入一家韩国人开办的大型广告公司作媒体研究追踪工作至今，同时进入学校学习花布设计技术。

殷新录音

中国给我的经历是一个顺利的过程。

真的，我觉得我这个人从小到大，直到没到美国来之前生活都是很顺利的，更尤其是我开始从事艺术工作以来，一步一步走得不错。

当年在中国我考进青年艺术剧院之后就开始参加拍电影，我演配角的片子《骆驼样子》、《大桥下面》等片子在当时都还是比较轰动的。但是，我演主角的一些电影比如说《一个女人的命运》等片子，就不是那么轰动。

当年我的状态不错，那时候，中国演员界中舞台剧演得不错、电影又演得不错的演员并不多，我却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我出国的机会也比别人多，又摊上了几个好戏，因此去过法国参加电影节，然后又去西德参加电影周，再后来又到香港参加《风雨夜归人》演出一百场纪念。在菲律宾参加中国电影周的时候我们甚至曾经到过菲律宾的总统府，马科斯夫人还接见了我们。

我后来和同是电影演员的王伯昭结婚之后就调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在拍片子的同时我也走穴，有时候一天走两场，钱挣得都没有了一个具体的数字，收入非常不错。那时候我到自由市场买东西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向卖主问过价钱，也从来不会讨价还价，那时我觉得这种事情挺丢人的。

再加上从小我们家的生活就挺好的，我父母又是从部队下来到珠江电影制片厂工作的，工资挺高，因此，我从来没有太多节省的概念。

我是在 1987 年到美国来的，那时候，我对出国这件事真的没有抱什么目的，只是因为当时大家都出国，我们家又有很多亲戚在国外，就随着潮流出国了。

我是以陪读身份到美国的。

我到美国未的第一站是洛杉矶，王伯昭当时先我半年到美国来，虽然我也有到美国必须过艰难生活的思想准备，但是真正到美国之后我才明白美国生活是那么那么地艰难。

一到美国之后，我整个的感觉无论是吃还是住，所有所有的一切都完全改变了，而且到美国的第三天我就出去打工了。

在国内的时候，我每大的生活非常简单，尤其是在剧院工作的时候，每天都是排练场、饭堂、演出场地，吃饭也都是在食堂吃的，演电影出名之后，有什么电影下来还会挑一挑。

可是到美国之后这些全没有了，在这里，给我的感觉是一个人要想生存

下来，就需要什么技能都得会。

我在美国没演过电影，不是我不想演，而是完全没有机会。我虽然没有去试过各种机会，但是别人告诉我：你如果想在美国演个角色就得首先参加有关公司的报名，而且去那里之后人家第一句话就是问你："你有没有工卡？你能下能合法打工？"

为了能够在美国参加电影演出，我自己也打电话询问过，但是询问下来的结果非常不好，这让我感觉到像我这样的中国人要想在美国拍电影实在是件太遥远的事情了。

但是我到美国来之后还是有比别人幸运的地方，刚来美国的时候第一年在洛杉矶生活的日子是比较苦一点，但是到了第二年当我们决定搬到纽约来之后，情况就好了一些。因为我家的亲戚全部都在纽约，我妈妈的家庭里有兄弟姐妹六个，全部都在纽约，我外祖父也在纽约住，他们虽然都比较美国派，不会大多地给你没完没了的帮助，但是刚来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扶你一下。

到纽约来之后，我们最先是住在亲戚们的家里，然后再慢慢地搬出来，这样，生活的压力就会减轻好多。而且，因为我有这些已经在美国发展得不错的亲戚们，纽约任何高级的地方我们都去过，比如说好多美国人都没有去过的高级餐厅——曼哈顿中城的"彩虹西餐厅"等地方，我们去过很多次，新泽西州像宫殿一样的餐厅"迪曼德"我们也常去。家里的亲戚们不会给我们什么经济资助，但是这些高级豪华的地方他们都带我们去。有这些亲戚在，我们也不会像许多留学生那样觉得很孤独。一到周末，我们就上我姥爷家去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面更是热闹得不得了。

我们到纽约来的目的之一是要解决自己在美国的居留身份问题。因为我们到了美国才知道，没有身份的人在美国生活实在是寸步难行，什么都是不可能的，更不要提去演电影了。没有身份的人连个工卡都没有，还要借别人的工卡来打工，年底又要给别人报税。美国那时的基本工资非常低，在洛杉矶做工一个小时才三块七毛五分钱，再交税就剩不下什么了。那时候查非法打工也查得很我个人节省的习惯也是在那时开始的，我这时才知道钱是这么重要，每次去买东西也开始非常小心地计算计算，过去没计划花钱的习惯全改了。

到纽约之后我们的生活情况好了很多，虽然也是打工，但是都是去录相带店一类的地方做事，轻松不说，还和自己的专业多少沾边，再加上后来我和王伯昭同时进入了纽约的苹果电视台工作，状况已经比在洛杉矶的时候好很多，还算是不错。

但是进入电视台之后我才发现我每天面对的工作非常多，我一个人又报新闻、又剪接、又要采访，我和王伯昭当时是同时在那个公司办身份的，我们办的是工作签证，这种签证规定只能为一个老板工作，不然的话就得重新再办另外一个工作签证，但是我们在电视台的身份问题迟迟没有下来，我们也不敢去催老板，与此同时，工作分量却是一点一点地往上加。那一阵子实在感觉有点昏天黑地的。

但是如果说到当时就回国去我又觉得有点不甘心，因为当时我既没有拿到一个学位，也没有解决自己在美国的身份问题，也没有做出什么非常辉煌的事情，因此我实在没有勇气回去。

再后来，我和王伯昭离婚了。

离婚这件事情才开始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很难过，我们当时已经结婚十年

了，我想不通为什么结果会是这样，如果说我有地方做得不对，或者说我这个人根本就不上进，这样的离婚理由还算是说得过去，但是，我都没有。我想我作为一个妻子来讲是非常胜任的，我自己也经得起各种诱惑。

当时我实在承受不了这种事情，我们曾经还买过一栋属于两个人的房子，离婚的事情出来之后，我决定还是让他留在房子里住，我搬出去住。因为当时我从他的角度考虑出的结果是，这段时间我可以搬出去和自己的父母挤一挤，如果他要搬出来，又能到哪里去住呢？直到这时候我还是在为他着想。

当时我真的是有一段很痛苦的过程，非常非常的痛苦，觉得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那时候非常脆弱，我希望自己不要看见他，上帝对我也实在不错，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一年之后，我大概也是花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才走出这个阴影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再次遇见他的时候我已经平静下来，大家聊聊天，像朋友一样。

从根本上来讲，我这个人在感情上是比较专一的，我的一次恋爱和一次婚姻都是蛮失败的，我总是想不明白我为什么总是对别人那么好，但是别人总是有负于我？我当时甚至觉得他如果能回心转意我都能够原谅。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信上帝的，我的这个新信仰使我得以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现在的我已经成为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不然当时如果我再不找一个精神支往的话，我可能会做出一些便事来。

走出这个阴影的我像是变了一个人，不沦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很多朋友都说我无论从外貌上还是精神上发生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我已经不再软弱了，已经敢于面对生活了。

很多人看到我的经历，看到我已经离婚了的现实，认为我无论从婚姻还是事业上，来美国都是来错了。

但是，我不这么想，因为我知道，当年在国内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也许我会比过去还红，也许我会更加平淡，当年和我一起来的很多演员，现在很多人在国内也已经默默无闻了。没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很难说的。

如果说到婚姻的问题，我最近回国，看到当年我那批演员中，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已经离婚了，因此我同样可以断定，我如果留在国内未必就能够保住我的婚姻。这么多年的美国生活过来之后我回头再看，我并不后悔，因为这么长的美国生活我觉得对我的人生和性格来讲，不论是我的事业和婚姻上，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磨练。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发展实在太顺利了，因此，到美国来我想就应该走这样的一段路。所以我觉得我到美国来并不是一个错误，相反，这种经历让我改变很多，对生活各方面都有新的认识。

现在我感觉很好。

当然，每一个女人选择结婚时都不是希望离婚的，尤其是我这种属于比较保守的人更下希望，但是离婚的事情现在看来也和美国生活一样锻炼了我，综合地来看，这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而且我还能够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发现自己很多潜在的能力。

离婚之后，我开始慎重地去想这方面的事情，我仔细地想过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

过去，我这种个性的人，当婚姻存在的时候我往往比较容易去依赖别人，但是当我自己一个人要面对下一步生活和事业的局面时，我增长了这方面的应付能力。也大约在这之后，我开始自己寻找自己的生存出路。我找到了一

个我认为很好的工作，我开始在一家很大的广告公司里做事，我的日常工作是做市场追踪，把中文、韩文和日文报纸之类的亚裔报纸上有关我们客户广告的情况进行统计，审查客户广告的刊登情况，并记录下来。

与此同时，我开始学花布设计，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能力，真的是想也没想到。我画得不错，但是我知道这全是生活给逼出来的。因为，和我一起学花布设计的人全是有底子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员全是从中央美院、浙江美院等学院毕业的。我和老师谈话的时候，老师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会画画吗？”我说“我不会画，但是我特别喜欢看画”。这倒是真的，我常常会去看画展，我也有很多画画的朋友。凭着这一点，我就开始学花布设计了，一段时间学下来，老师都开始惊讶我在这方面的才能。

我在美国拿到绿卡之后就把电视台的工作辞掉了，这之后我就回国了。当时我的想法和许多在国外闯荡的中国演员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在美国发展的演员盖克、王姬等人都已经回国发展了，我也想回去寻找一下机会。但是说实在的，我已经离开国内这么长时间了，别人已经把我淡忘了。更何况，国内的新演员也已经起来了，我以前认识的又都是老导演，他们大部分都已经退下来了，因此，重新要打入这个圈子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如果说完全没有剧本来找我那倒也不是，也有很多的剧本来找到我，但是凭良心讲，我觉得这些剧本的戏不好，我想我已经这么多年没上戏了，因此我一定要很慎重，我过去在中国时候的表演是被大家承认的，如果我找了一个不好的本子上了，很久没看过我表演的观众会很失望。因此，现在的状况变成了——好剧本人家可能不会来找我，因为现在又已经有很多新人出来；而不好的剧本我自己又不愿意上。为了未来的发展，我也回过几次国，但是事情变得有点高不成低不就。

我告诉自己不要强求这种事情，有好的本子就上，没有，就不

仔细想一下，我觉得还是必须抓紧时间学一点技能。到美国来，我学会了现实地面对生活。所以回美国之后我就马上学了花布设计，我差不多已经学了两年了，现在只差电脑设计的部分没有学，但是无论如何我现在已经是可以去找花布设计工作的人了。

另外我还想学点别的东西，比如说我还想考纽约的房地产经纪人执照，我平常有时候会为朋友介绍一些房子的买卖生意，结果大都挺好的，交易进行得很顺利。而且我自己也开始买银行拍卖的房子，把室内装修一下，再出租出去，利用这种手段来慢慢地进行财富积累，这样就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份成就在里面。

我现在看自己的生活觉得自己活得挺潇洒的，我靠自己的能力来生活，这也是离婚给我带来的好处。真的。从今天再看回去，虽然我没有读出很光彩的学位，也没拍出什么好片子，但是我一直是在脚踏实地地生活着，而且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现在我活得很轻松，完全依靠自己，我生活中不论吃的、穿的还是用的名牌货色，都是我自己挣出来的。

至于再次成立家庭的事情，我想我会顺其自然。

到今年，我到美国的时间已经九年了，这九年的时间让我生活得很充实。未来，我没有一个很大的目标，我只希望自己能够继续脚踏实地地生活，对得起自己就好了。

到美国来之后我的专业演艺事业基本上就中断了，但是我的工作，再加上我在纽约还参加了一些业余剧团的演出，比如演出《雷雨》等等，还是让

我在演出方面有施展的才华，直到今天还有人要成立一个活剧团，想演《日出》，希望我能够演出里面的陈白露。我想上帝对我还是不错的，我虽然在演艺方面不能像在国内那么辉煌，但是还是给我机会的。当然，直到今天我内心对演电影这件事情还是放不下，周末的时候我会去看电影，看到银幕上好演员的演出常常会勾起自己想演戏的欲望。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等我的状态一切都稳定下来以后，我就想去周游全世界。这样，我觉得就没有到这个世界上白来。我计划明年要去以色列，去看看基督诞生的地方那路撒冷。

今天的我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到好莱坞发展的梦，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不大现实，对别人可能还现实一点，我的年龄已经不小了，我现在最大的享受就是在画我的画的时候听着古典音乐，我常常一画起来就会画到半夜两三点钟，那种时候的感觉特别美。

再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听着音乐、开着车走在高速公路上，那时候，天地给我的感觉真的是好美好美。

陈燕妮思绪：

在国内就常常看她的电影，她在《骆驼祥子》中演出小福子的不少合词，做为观众的我至今没有忘记。

我目睹了她离婚前后的状态，对她的精神状态的变迁非常非常有感触。

离婚前的地跟随苹果电视台的转型成为我后来进入的中文电视台的同事。当时的她已经早没有小福子时代的光辉，第一次见到久仰的地是在电视台里，她平淡、顺命的精神状况，给我一个不小的惊奇。

她离婚的时间蛮早的，这之前的确有一些征兆。她一直忍住不说，像没有事情一样地和我同事，她那时爱穿一件土黄色的外衣，人纯净的和一个初出社会的小女生一样，不声不响的。

也曾带着当年仰慕她的人半专程地为她而去台里走走，见到之后，常常就听到问说：“她脸色蜡黄，是病了吗？”

然后，她就离婚了。

离婚后她离开了电视台的位置不见了很久，有很多传说过来过去地变。后来有一天偶然地在街面上遇到她时竟被惊住，想打招呼的手竟然犹豫地停在半空之中。当时是在一个马路的人行横道上，她像一面精致的旗帜迎面过来，透过很多很多灰暗的颜色，透明得晃眼。

那时的她已经剪掉过去最平常不过的马尾，梳开那种当时最时髦的垂直短发，眉眼中一反常态地透出许多从未见过的英媚之气，让你倒吸一口冷气。

你甚至会觉得有一种时空错置的感觉，这么一个离婚之后的女人，竟然能够改变你的判断，你就一定吃惊不已。

在后来也曾经在洛杉矶见到她，她依旧神采飞扬，见得多了，你就不得不为她庆幸。

因为，一个全新的地已经不再痛苦和回头。

心里，常常对她道声“恭喜”。

卢新华

卢新华背景

江苏南通人，1973 年 1 月份在山东曲阜济南军区炮兵当兵，在部队时即酷爱文学创作。1977 年 3 月份退伍，进入江苏省南通柴油机厂做油漆工人，半年多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1978 年 8 月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著名短篇小说《伤痕》在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

《伤痕》曾经获得 1978 年中国“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及上海地区解放 40 年优秀短篇小说奖等奖项。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及上海分会理事，并为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作协代表团最年轻成员。

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文汇报》文艺部工作，发表过中篇小说《魔》（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森林之梦》（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84 年下半年辞职，与一批文化人士筹办公司，并曾任该公司负责人。

1986 年赴美国留学，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东亚语言文化系，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进入洛杉矶利民图书公司负责英文图书的销售和订购工作，1992 年进入洛杉矶吉祥大赌场担任发牌员工作至今。

卢新华录音——

当年进复旦上学是我的第一志愿。我是 1978 年 2 月底进入大学的，大约 3 月份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伤痕》。这篇小说其实最先是在复旦大学里的墙报上发表的，引起轰动，同年 8 月份的时候才在《文汇报》上发表出来，发了一个整版。

当时这篇小说也不是我投稿的，是报社里的人听说复旦有一篇这么轰动的小说，然后通过他们在复旦认识的一位中文系女教师找我要了这份稿子，然后在报纸上发表的。

为了这篇稿子，《文汇报》当年曾经在打出小样之后多次征求意见。这篇小说后来在发表之前根据报社方面的意见改动过几次。我记得改动稿子的那一段日子里天气热得不得了，那时正是上海的七八月份，我就在复旦校园一进门的草坪一侧放了一张桌子，最后的《伤痕》就是这么出来的。当时，我一个人在路灯底下改稿，蚊子在天上飞着，房间里已经完全呆不注入了。当时我穿了一个靴子，我把自己的裤管全部放进去，天气热到我的手压在小样上，干脆把纸都印湿了。

稿子改完之后就发表出来了。

《伤痕》在《文汇报》发表的当天下午，我就收到十几封读者来信，在此之后，每天有关的读者未信总是一大包。我们在学校当时用的是学生信箱，代号叫做“7711 信箱”，这个信箱每天一打开，就全是我的信。我总共收到了大约两千多封读者来信，与此同时，报社方面也收到了不少来信。为了这篇小说，复旦大学方面也组织过大型讨论会，在复旦教师们对这篇小说的看法中，也有很多激烈、尖锐的反对意见，反响非常强烈。当时在中国的报纸上，有很多著名的文学界人士就《伤痕》发表了各种意见，我的同学中也有人到报社中提出向己的反对意见。

我一直不能忘记的是，当时的读者来信中有很多事情很感动我。其实，《伤痕》本身并没有任何生活原型，我只是在写我自己对那个时代的一种感受，但是读者来信中却有很多人说他们都有着和《伤痕》同样的经历。众多的来信中，有一封西安的读者来信十分有趣，她说“我和你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王晓华同名、同龄，更神奇的是她说她并且和王晓华有同样的生活遭遇。

我妈妈也是做中学校长的，也被打成叛徒，我不清楚身在东海之滨的你是怎么这么详细地知道远在西北古城的我的个人遭遇……”

这封信我一直留到今天。

雷同的是，当时很多读者来信的一开头都写着“新华大姐”，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是一个男人。可能因为他们觉得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是个女的，因此作者也一定是个女的。这篇小说当时让很多人都哭了有人说，读《伤痕》的眼泪可以流成河。我相信这是有可能的。“出自内心才能进入内心”，我从来相信这一些，因为我当时在写作的时候自己确实是流着泪的。我知道，写作的人如果没有动情，读者也不会流泪的。

1978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的时候，据说《伤痕》得票最多，但是没有评名次，那年有十几篇短篇小说得奖。当时有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和赵丹等人都找过我要拍电影，但是后来因为《伤痕》牵涉的政治、社会等因素，最后终于没有拍成电影。

《伤痕》发表后的 1978 年，我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新人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从这个时候起，我想我才开始正式地走上文学道路。

其实，我在部队的时候就喜欢写东西，但是那时我对哲学方面的东西更加感兴趣，对诗歌方面的兴趣也很大，我当兵的时候在部队驻地的《曲阜文艺》等文艺刊物上也发表过一些诗歌作品。也许是因为这层原因，我进入大学时在所有文学门类中我还是比较偏重诗歌，我所在的专业是文学评论专业，大家课余自发地橱起了一些兴趣小组，因为我爱好诗歌的原因，大家一度还想过把我分到诗歌组去，是我自己要求到小说组去的，因为和诗歌比较，我觉得小说的“容量”比较大。《伤痕》其实是我正儿八经地开始小说创作的第一篇作品。

事实上在当时的大学里，我们这些学文学评论专业的人是应该专门去学文学评论的，大约是因为《伤痕》的出现，复旦也就对中文系的学生们搞创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放手让大家去干，或者因为他们觉得这一批人经过了十年的社会生活，在体验方面会有很多积累，因此也可以写东西。

再后来，我们那一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也可以用创作稿来代替，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

写《伤痕》的时候我和我太太还没有结婚，当时的她还在黑龙江建设兵团，没有回到上海来。后来有一次她回来探亲，我到她家里去看她。《伤痕》的最初草稿就是在她们家的楼上写完的。

《伤痕》的初稿我是一气呵成的，写完之后我泪流满面，把稿纸都湿透了。这篇稿子写完后我就把它放进抽屉里去了。再后来，我们学校兴趣小组的小说组组长要我交自己习作的时候我还想重新写一篇，但是因为时间来不及了，所以就把这篇稿子交上去了。这一交之后，这篇小说结果就被放在小说组墙报的头版头条去了。

我们当时在复旦所住的学生宿舍楼叫做“四号楼”，楼上住是女生，楼下是男生，我们的墙报贴在一楼，结果每天都会围着很多人看墙报，因为人多拥挤，有的人还不得不站在凳子上看。因此，《伤痕》最早的一位经手编辑应该是复旦兴趣小组的小说组组长，如果没有他当年来逼着我交稿，我还不会拿出来呢。

《伤痕》在《文汇报》上发表之前，有人曾经建议我把这篇稿子投到《人民文学》去，但后来我接到的是一封写着“谢谢你的来稿”的铅印迟稿信。

写《伤痕》的时候我 24 岁，《伤痕》之后我又写过一篇中篇小说，题目是《魔》，是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的。再后来又发表了十几、二十个短篇，其中比较有印象的是一篇叫做《典型》的，是写一个电焊女工的事情，因为她是一个典型，因此别人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总是用典型的标准来要求她，她因此很苦闷。

在当时，很多人把我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相提并论，归纳为“伤痕文学”，现在我和刘心武还会被人称为是“伤痕文学”的两员干将。

从复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上海《文汇报》工作，但是做了阵子记者之后，我觉得自己和记者这种职业格格不入，我觉得自己不适合，我觉得大部分记者这种职业很难让入静下心来，没有时间让人思索生活中一些有底蕴的事情，每天在忙着写“本报讯”。

后来，我曾经向报社请过一年的创作假，由上海作家协会发薪水，这在《文汇报》报社内是没有前例的。我当时主要是为了创作长篇小说《森林之梦》，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当时的我，作品出来后虽然也有一些评沦，但是比起《伤痕》所引起的轰动来讲，还是远远不够。

在读者对我的期望来讲，《伤痕》出来之后引起轰动，人们很容易要求我以后的作品也写得像《伤痕》所达到的水准，但是其实这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况且，时过境迁，社会等各方面条件也已经回复不到当年的状态。

到了 1984 年的时候我从《文汇报》辞职办公司了，最初是从上海着手，组建了一个文化艺术公司，但是后来，这个公司又搞到蛇口去了，叫做“新亚洲实业有限公司”。后来这个公司的发展不很顺利，我就读国内的托福班，开始办理出国手续。

留学也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出去看看世界，对世界有一个了解。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教授为我开了邀请，并且为我争取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费全免的奖学金，就这样，我到美国来 1986 年我到美国之后，先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读书，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在这期间，我一边上学一边踩了两年三轮车，就在学校附近，我就是靠这个来付我的房租和其他一切所有开支的，因为当时我虽然学费全免，但是生活费还是要自己去挣，这些经历和心路历程我的作品中今后也会写到。我也是靠这个三轮车上赚到的钱，把自己的太太和孩子从国内接出来的。

除此之外，同样是为了生活，我也开着汽车帮餐馆送过几个月的外卖。

1988 年我拿到硕士学位毕业后，就到了洛杉矶一个名叫利民图书公司的书店做与大陆文化有关系图书的发行工作，我的绿卡就是在利民图书公司办的。

1991 年年底，我离开利民图书公司，自己开始办公司，当时我的基础其实并不够。我开始时是作金融，结果把钱亏掉了一万美元；后来跟一个名叫“东海财团”的做期货，在那里又被别人骗掉一万多块；再后来，我又有一个很好的同学搞股票，我看着他人老实，就给他七千块钱让他代我去做股票。哪知道当年买股票的时侯是十块六毛一股，搞到现在已经是两毛五分钱一股了，这么着来来回回一折腾，把钱全部弄光了。

面对自己的失败，我就只好再去为别人打工。1992 年的时候我就到赌场去做发牌员，这份工作收入不错，到那里就纯粹是工作去了，要养家，而且我到美国的这几年又增加了两个孩子。靠着这样的一份工作，我经济上的元气才慢慢恢复过来。

这份工作不用费什么脑子，我工作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很多人和事，这些生活我今后可能也会写下来。

除了在美国生活，我现在在中国也开了一家服装公司，我弟弟在那里负责所有的管理工作，公司里大约有一百多个工人。

我家里有兄弟四个，但是我们为我们的父母生出的第三代清一色都是女孩，我妈妈一天到晚在外面看到人家的孩子就像祥林嫂一样，老是寄录音来给我们听。希望我们再生一个，她说：“国内

已经不可能再生了，你在外面好生”。出于对母亲的孝心，我在美国就又要了两个孩了，直到我们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才是男孩。

我本来有一个计划，我想趁自己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多做一些经济方面的活动，我还很想搞教育，我想我如果办不了大学，就办一所中学；办不了中学我想办一所小学；小学办不了我想办一所幼儿园。

近年来我也写一些东西，写一些片断，写自己的一些感觉，也写一点诗歌，大多数是给朋友们看一看，这些东西也没有计划发表。但是我现在在写一部东西，很认真地在写。我在工作的时侯是从来不请病假的，但是我为了这篇东西请了很多天假，算起来，一连请了四天病假。

这次创作在大约一个多月前开始的，当时我正在生胃病，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棺材，后来我情不自禁地涌起了一个创作冲动，第二天早上爬起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写结尾，写完结尾又写开头。这个东西现在大约有十一万字，原来有八万五千字，算中长篇，现在这篇稿子现在已经完成了二稿，在朋友之间传阅。

这篇东西其实是我没有想到过会有的，它是忽然出来的，是受创作冲动不能自己地写下来的。写作时候我回想到我创作《伤痕》时候的感觉。

在美国这么多年来，我看到了很多在中国看不到的东西，在中国也不可能想到的东西，如果说到美国十年的生活只是让我写出这一本书，我想也是很值得，哪怕吃再多的苦。

陈燕妮思绪：

和他的约谈进行得很艰苦，他一直在闪躲，我一直不放过，电话一个又一个地硬找过去。后来终于和他约定了日期，这个日期是在一个雨天，我走过他家长长的走道终于找到他的家门。他的孩子们都在家，其中最大的一个叫“晓梦”的，因为曾经在我们的报社举办的《中国孩子在美国》全美征文中得到很好的名次，因此记忆深刻。

那天，正是这个“晓梦”顶着千万条雨线，跑来开门。

我们的谈话很紧凑，他那时刚刚睡醒，洗漱整齐后顺势就斜斜地靠在床头的墙上，谈起自己“原本是计划外”的新作时而眼放光，你会觉得他因此有如再生了一般。很多朋友说会给他为这部新著开一个庆祝会。

我们的谈话录音中有很多雨声，声声不绝。回到办公室我再听录音的时候，一开机就被这种声音惊讶住了。后来我想，这种雨声的清凌可能也的确是在昭示他新著带给他的一种清流吧。他给我提纲享领他讲了一下他新著中的第七章《鼠笼》故事，里面有很多状态和很多性爱，果然听上去也清凌。

他是靠着一篇《伤痕》出名的，多年奔波之后的我已经完全忘记当年也看过多遍《伤痕》是怎么样一段故事，看着他讲解新著的时候以及后来的很长时间，也一直没有能想起来。

他说他未来老了的时候还是想去写诗。

在我们谈话的这个时候，他的妻女在一门之隔以外已经开始静静地吃饭，他新著未成熟的三稿摆在我身边，这种时候，这种清凌的感觉尤其显明，似乎就是可以伸手触摸得到。他说自己的新著是试图换一种思维方式认识世界。凭着他简单的对《鼠笼》一节的描述，我觉得想必的确。

他的新著紧接着我就看到了，很长。新著被他细细地用大红文件夹裹好，打字纸整整齐齐地装订在里面。那几个星期里的每一个晚上，我入睡前难得的一段时间里统统是抱着他的大红文件夹做细读功课的。他为文的认真，给我印象深刻。

谈到未来他对自己的安排是什么的时候，他一本正经地说要“听从命运的安排”，他说因为原来有很多次他自己安排自己之后都被命运改变了，所以他不再自己安排自己了。

几十月之后他果真来电说他要回国了，而且是他自己先行。他说因为劝说不动已经习惯了美国生活的其他家人，就只得自己先他在上海有一个复式的房子，很漂亮，升值得也一如预期，现在空着，等着他回头。

谈到的那篇呕心沥血新著会什么时候发表出来，他说他希望自己的作品首先能够在朋友中“看得过去”。

问他说“你这里还存有《伤痕》的稿子吗”？他听见了，但是一直没回答。

那就只好感受清凌，感受本身就也滔滔不绝。

张卫平

张卫平背景

1965 年 15 岁时进入北京什刹海业余体校打球，1970 年底中国正式纽建国家篮球队，1973 年被从北京篮球队选拔进入中国国家蓝球队。

曾经代表中国参加各种重大比赛，自 1975 年开始接连五次夺得亚运会、亚洲锦标赛冠军。

1980 年自国家蓝球队退役回到北京队，1981 年由北京体委挑选做为北京“十大优秀运动员”之一第一批进入北京体育学院攻读首届运动员大专班。毕业后进入北京篮球队做教练，两年后进入中国国家篮球队任教练四年。

1988 年底结束国家蓝球队教练生涯赴美探亲。曾经在芝加哥大学队做校篮球队训练辅助工作，后进入该校财务部门工作。

1992 年进入中国青岛啤酒美国代理公司莫纳克公司工作，现为该公司青岛啤酒市场销售部门美西地区高级经理。

张卫平录音——

我进入专业队打篮球时才十五岁，中国的体育制度是从很小的时候就让孩子进入体校一边读书，一边打球，讲究的是早期专业化，等都练完之后再去接受其他教育。我个人就是在退役之后才上大学的。

最早时，我是在什刹海业余体校打球，后来我进了北京第二十五中学，就转到东毕业余体校去打球了，因为它离学校近。在业余体校搞体育的孩子们一般都不太读书，心思全在练球上，如果训练的成绩好，被教练认为是“苗子”的话，就会被选进专业队打球。所以在中国，真正的专业运动员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就练习打球的。这样，孩子一般都没有好好地学文化，也就是说，相对而言，训练水平越好的运动员，他的文化水平越低。当然，运动员如果自己能够抓紧文化学习也能够学点东西，但如果你自己不抓紧你出来就几乎是一个文盲。所以这一点也局限了我们中国运动员的水平提高，因为这至少妨碍自己理解教练的意图。这和美国如今的状况整个是相反的。在美国，你要先从中学读到大学之后你才能成为专业运动员。

都说运动员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其实也不是，许多时候对战略的理解和掌握，都需要头脑。所以一般运动员就其本身的素质来讲也不但，傻的那些人大部分已经被淘汰了。

我是后来上了体育学院听心理课的时候才知道这些的。老师告诉我们，运动员从小到大都是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成长的，因此他们特别适应竞争，无论在任何方面都合体现出来。其实这从我们的经历上确实也能够看得出来。比如说文革开始了，大家都搞文革，谁是聪明人这时就看出来了，这种时候，谁还在偷偷练球不甘落后的后来就都进了国家队了，比如我，比如当年也是中国男蓝的选手张大维，都是例子。

而且这也可以从我们进入体育学院学习这事看出来，我们退役后进大学时是插班生，人家都已经学了一半了，再加上我们都是初中文化水平，直接就进入大学学习，确实困难重重。我当时是作为由北京体委选出的十个优秀运动员进入体院学习的，这一学习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专业水平越好的运动员功课成绩越好。当时，我们的同学中很多人是经过小学、中学直到高考进入大学的，但是他们学不过我们这些后来进去的专业运动员，而一般的专业运动员又学不过那些运动成绩特别好的运动员。我在这时才体会到，我们这些当过运动员的，都会有这些心理。当然我说的是当时的人，不是现

在的人，现在的人眼里都是钱了。当年我们打完亚洲冠军一分钱都没有，有的就是一张纸做的奖状，没有任何物质奖励。但是我们当时比现在练得苦多了。当时我们的工资每月只挣三十多块钱，和所有老百姓一样，但是没有人说不好好练。

我是在打完 1988 年汉城奥运会之后以探亲名义到美国来的，到美国之后，我做的所有工作其实都是从零开始的。

到美国来之后，我以前在中国多少年的“人力投资”统统算是白费了。也就是说，我过去进行了二十多年的体育投资，到美国之后全等于零了。这不光是我一个人如此，我相信任何到美国来的人差不多都是这样，中国的医生在国内是主刀的大医生，到美国来之后能让你去宰宰狗就不错。

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先是到芝加哥，因为当时我太太在芝加哥大学学习。

我来美国时已经三十七八岁了，英文程度永远是“第一课”程度，后来在体院学过两年公共外语课，但是这种水平到美国来想要和美国人沟通实在差得很远。

美国篮球是世界上最好的，又是篮球的发明地，世界上没有人能跟他们递上手。我在中国时就是“美国大学篮球教练员委员会”的委员，们是不要说我了，就是当年苏联队的那个率领苏联队在奥运会赢美国的教练，到美国之后说自己就是想做一个美国大学队的主教练，想教篮球，并说明自己有的是钱，可以不要钱，他又是“美国篮球名人堂”的人，那都是要有极杰出的成绩还要经过人家投票才能决定能不能进去的地方，但是人家美国人就是不要他教，美国人就是不信你，没有什么为什么。

从那以后我也就死了在美国干篮球的心了。因为我知道是不可能的了。

在芝加哥大学时我一边在大学图书馆里做兼职工作人员，同时也曾经在大学队里的“TREANINGROOM”里于过，我做“TREANER”。这个职位在中文翻译中可以叫做“训练员”，但是其实并不是训练员，实际上要按咱们中国人的说法就好像是医务室的一样，工作就是拎一个冰桶，在练习场边上一坐，谁一有伤赶紧冲上去为人家做处理，这些我们在体育学院时是学过的。

但是也有我没学过的，比如说给运动员裹脚，这件事情听起来好笑，但是这都是很专业的，你得现学。在美国打篮球，无论你是任何一级的运动员，只要你去训练，就得先把脚裹上。这种裹脚的方法就是先拿薄薄的海绵把运动员的脚包上一层，然后再拿绷带把脚绷上，这样就起到保护作用了，把运动员的脚“固定”了，哪儿有伤在哪儿“加固”。裹上脚的运动员然后再穿上鞋、穿上袜子，外人看不见。经过这样裹起来的脚不容易受伤，照样跑、跳。打完球之后，拿剪刀“刷”地一剪开就行了，裹过脚的东西就扔了，这在美国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规矩。

虽然说我一个中国国家队的教练到美国来裹脚听着有点丢人，但是我能够拿到这种“裹脚”的工作还是经过副校长介绍的，千这个工作每小时的工资是五美元。

我不是正式的“TREANER”，只能算是学生兼职，所以薪水不高。

但是话说回来，在美国大学里干这行的其实普遍工资不高。当时，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击剑队，有一阵有一个职位空缺。学校就在全美国范围内找人，在全美国击剑学会里找人，当时要找的是主教练，教三个剑种。这时候就有人来申请，其中有一个是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当年在中国也是参加过奥运会

的好手，在美国也学的是击剑，但是他的英文不太灵。我们学校里就让我跟他联络，因为我会说中文，学校需要我告诉他我们这里的各种条件。因为这个关系，我才知道这个职位有多少钱。这个职位“一季”，也就等于是一年的薪水才五千五百美元，这实在是令人不能相信的低工资。

面对这样一个工资数目，那个中国人还是同意了，但是芝加哥大学最后还是没有要他，五千五百块钱的低工资要的还是美国人。后来我又去了财会稽查室中做付帐部门的工作人员，所以我知道整个芝加哥大学每年的教育经费是二十个亿。可是他给体育主教练的薪水竟然是这么低，真让入觉得不可理解。相比之下篮球项目比较特殊，篮球运动队的主教练工资挣得不少，很多都是年薪十几万的。美国杜克大学的篮球队是在美国大学篮球队中相当有名的队，杜克又是美国相当好的学校，有一阵，他挣十几万的篮球队主教练受伤了，由他的第一助理教练出缺，这个第一助理教练的年薪才挣一万多。其实，美国人就是要当第一，第二的就是“NOTNING”。

虽然在美国体育项目的工作就是这么难找，我心理还挺平衡的，我觉得美国对任何人都是开放的。

我后来到学校财会部门的工作开始是全职工作了。这个工作我是从学校里的工作招贴中看来的。我得到的工作就是为学校做帐单，学校里要付的帐单来了，一大堆，有很多有关的资料在电脑里，你把它拿出来，你自己要核对，并且输入一些有关资料。我在美国工作得到的体会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计较”，这样才会“吃小亏占大便宜”。都说到美国未做事情只要别人付给你一毛钱你就不能干一毛一的活儿，但是我不是这么想的。这也许是和我当过运动员有关，有竞争心理存在，老想着要把事情做好，老想赢别人。

刚到那里工作时，我是一个新手，什么都要从头学。当时我们部门规定你第一个月里一个小时里要做出多少帐单，出错率只能限制在多少以内。第二月指标就开始调高，第三个月再调，做不到标准，你就走人。

我在这个部门做事非常用心，慢慢的没两个月时间我就是全办公室里做帐单做得最快的人了。可能也有人能够比我做得更快，但是他们不愿意多做，因为多做也一分钱没有。但是我倒不是有意识要和别人比，我是一直在和自己比，这个月我每小时能做二十张.下个月我就想做二十五张，最后干脆就一人做两人的事情，虽然这份工作时常做得我头昏脑胀，但是我就是不想跌这个份，如果做得不如以往好，我就会间自己是不是”臭大粪”呢？

我没想到这个工作为我后未能够顺利进入在美国经销中国青岛啤酒的莫纳克公司工作，帮助实在太大了。那时，申请经销青岛啤酒这个工作职位的人有一百多人，虽然这份工作是份半职工作，似是所有前去应招的人都比我更合格。因为我一来从来没有做过推销工作，二来以往做过的事情和啤酒行业根本也不沾边，等于什么也没有，但是最后，公司百里挑一只要了我一个人。其中关键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工作需要申请人原来的雇主做为其推荐人，我就提出让芝加哥大学财会稽查室做我的推荐人，到我后来进入莫纳克公司工作之后同事才跟我说，说我其实根本就不够申请这个工作的资格，但是我原雇主给我的推荐评语实在太好了，而且芝加哥大学是个可信赖的大机构，我们的主管说：“我们不要你都不行”。

我之所以后来不再在芝加哥大学干了是因为听从了一些朋友的话，我有一些朋友住在洛杉矶，他们老跟我说让我到洛杉矶来，说是工作好找，也能打球，我就去了一趟。当时也有人给我提供工作，是在期货公司里做经理，

1991 年底就搬到洛杉矶来了，可是来了没有多久那家期货公司就关门了。我一下子就没有工作了，这个时期对我来说很漫长，大约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在莫纳克公司主管青岛啤酒的销售工作职位就是这时候得到的。

那时候，我有一个表妹在亚里桑那读书，1993 年夏天的时候，她到洛杉矶来打工赚钱，就住在我那里了。她那时天天看报纸找工作，有一天她就看到莫纳克公司“青岛啤酒”的招工广告了。当时莫纳克要找一个中国人在洛杉矶做业务代表，招工的人从纽约到洛杉矶来面试申请人，公司的人住在机场附近的酒店里，我表妹要去应招又不爱开车，她又打电话又联系，都弄好之后就让我开车带她到机场那边去参加面试。我后来想了想，觉得这个工作不错我也试试得了。我就也试试了。

我们去面试的情形相当奇特，从纽约来面试的公司里的人好比是餐馆老板，所有应招的人好比是青岛啤酒的业务代表，你得努力说服他们来买你的啤酒。后来，我进入公司之后我的工作也比较奇特，我并不需要直接卖啤酒，因为莫纳克公司主要进口公司，他们只卖啤酒给批发商，零售啤酒是由全美国的五百五十家批发商来做的事情。我的任务是在市场上看一看各方面的情况需要、服务好不好之类的，对于这些情况我每周都要给公司写报告。这个职位是没有人监督的，所以他要求这个人是真正干活的。一个星期下来你要填一个单子说你在过去一周内已经去了哪里哪里，再写上几条情况汇报，但事实上没有入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去过这些地方，没人知道你干没干活。

我的这个工作是没有前人做的，以前青岛啤酒的批发商除了其中的两家是中国人做之外，其它都是美国人。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人市场，而青岛啤酒主要是在中餐馆里卖的。作为莫纳克这个代理公司没有一个人知道洛杉矶中国人对青岛啤酒的市场需求情况是什么样的，所以就需要一个中国人来了解这方面的市场。我一般是在家里和外面做事的，平时不去办公室，我如果想偷懒很容易。我当时虽然得到的是半职工作，但丝毫不愿意松懈自己。我做事的宗旨就是“你做事，就有人在瞧着你”。

我的这个宗旨和做法后来又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在公司里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度我这种职位上的半职人员增加了很多，他们分散在全美各地，但是到最后所有人都被解雇了，只留下一个人并且升为美西销售经理，那就是我。

在得到这份工作的早期，我的工作就是到各餐厅里跑情况，然后向公司汇报，其他人跑没跑我不知道，我真的是规规矩矩地一个一个去跑了。一开始我感觉也很难，首先，频繁地写英文报告对我来说就十分困难，但是在当时如果你斤斤计较这是一份半职工作每天只能做几个钟头，那你根本做不出这么多事情来。那时候的我相当勤奋，反正是把自己的所有周末时间全搭上了，当然这也不能怪别人，你写不出英文报告来，可不就得利用周末时间接着写吗？我做市场调查，总是想把报告写得更好，为了更好地完成报告，我还时常加上图标，以求做得更专业和易懂。

有一段时间我们公司推出“青岛淡啤酒”往美国市场上打，市场反应不太好。但是在推展初期的时候状态并不明显，你就得一家一家餐馆地去说，求人家先试一试。到这时我要做的事情就是销售了，因为这是试销。

半年下来，公司通过试销的业绩看出来不少地区对淡啤酒反应不好，但是在我这里，虽说很多用户也是只试了一箱就不试了，但是我手下有很多户头，虽然没有人再要，但是公司也能从中看出来谁干活谁没干活。

我现在在公司中的职位其实是密西西比河以西的美西地区和洛矶山脉地区的总经理。我当年代半职职位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相关经历，但是因为我过去的工作态度好，顶替了我的“经历空缺”。

1994 年 1 月份我升地区经理的时候，也有很多人竞争，我在所有经理资格条例里只符合一条，那就是“会说流利的中文”。但是，凭借我过去的工作成绩，我还是得到这个职位了。

这个职位的任务比我以往的工作提升了一大步，主要是要到整个美国西部十个最大的市场去观察，过了半年多之后公司又给我加上了五个市场，工作要求我老得跑来跑去。

我的工作日程是一个月至少要去两次旧金山，公司专门有人给你订飞机票，你自己去了之后自己租车去干事情。一般情况下我一个月内会有三个星期在外面，周末回来只有一个星期在洛杉矶的家里住。

说句实在话，直到现在，我的英文水平也还很差，写出的报告也不够专业，但是我们的上司并不挑剔，只要你把他要知道的事情告诉他就行了。

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来，感到生活很满意，当然，说到我心底里的想法，那我告诉你，我还是惦记着我的篮球。

人这个东西真奇怪，有些事情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多少年了，我一直记住我在体院学习时老师说的话，他说“你必须做好备方面的准备，以便一旦有机会你不会错过”。这话真对，很多事情可能你一辈子也用不上，但是如果你不做准备，机会来了，它就不是你的。

这句话，多少年来，我不敢忘。

陈燕妮思绪：

他身高一米九三，人难得地一直没有发胖。

和他相识有相当一段时间了，记忆中他为人从来是宽厚的、容忍的、礼让不止的。

他一直还总是穿着五花八门的老式运动服，通常是旧的，不起眼的，脚下拖拉着一个扁片拖鞋。他急匆匆地给你来开门，像是刮来一阵高大和风，他周身的这老一套常常可能是他的“当年”剩给他的，也有一些是青岛啤酒因为赞助由他挑头的民间篮球队所赠之物。他直说自己“从来就不要样儿”。

刚到美国时他还曾经教孩子打篮球，二十块钱一小时。后来，他说自己根本顾不上了。这可算是他到美国之后唯一的专业“准确对口”了吧。

穿拖鞋时，他两只脚的大拇趾趾甲就能被看见是紫黑色的，他说“总是这样，打球打的”。他说他的大拇趾趾甲打球时总是被踢，一踢，整个指甲就全都掀起来了，老是这样，不知道有多少回了。也只有这时他辉煌的运动员生涯才能被你猛然想起。

直到今天，中国很多老牌篮球爱好者一提起他的名字来仍然感到如雷贯耳，然而我对他采访完后才知道我自己原来对美国的认知，相比之下竟也是皮毛。在认真做人的学问上，他高出所有人，无论从本质上还是性质上。

他的平常之心，给了我相当温厚、扎实的震憾。

我也知道他现在已经又成单身之身，看见他自寻温暖地、十分“运动员”地把运动衣自然地绑系在肩头，竟隐隐地有些伤恸。

吕大渝

吕大渝背景

1954 年因在新中国第一部儿童故事片《祖国的花朵》中担任小队长刘菊角色，萌发了对文艺的兴趣，后曾在另一部儿童片《罗小林的决心》中担任角色。小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女 12 中学习，同时参加北京市少年宫舞蹈组的活动。

1960 年 6 月 20 日被选调进至中央电视台任播音员，1960 年 9 月 1 日曾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播音专业深造，后回电视台工作，其间历经坎坷，1968 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曾经中断播音工作。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才全面恢复工作。1978 年赴日采访邓小平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深受好评。80 年代初任中央电视台专题部“人物述林”组编辑、记者、节目主持人。从 1960 年进入中央电视台直到后来出国，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时间长达 27 年。

1987 年固治疗车祸骨伤原因赴美，1990 年与在美国太空总署工作的丈夫李杰信结婚。1988 年至 1995 年任美国华文报纸《国际日报》驻华盛顿记者。

吕大渝录音——

我是在快上完高二时去当电视播音员的。那时是 1960 年，我和赵忠祥一起从全北京的高中生里被广播局选了出来，他二月份报到，我六月份报到。当时的我对电视没有什么概念，只觉得自己是”服从国家需要”，挺“革命”的，我原来最想学的是电影。

那会儿，中央电视台初创，名字还叫“北京电视台”，台里最早的播音员沈力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过来的。那时国家有严格规定，不准从高中生里直接招工，大概得等高考落了榜才行。我和赵忠祥得到的这两个播音员名额是以“特殊工种”名义，由周思来总理特批的。我 1996 年夏天回北京时，看见一份报纸上登着这样的消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倪萃说赵忠祥当年当电视播音员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挑选的，这离谱远了点，我和赵忠祥当年只是用了局总理特批的两个名额，周总理哪有那闲功夫亲自去挑选电机播音员啊。

当时我、赵忠祥、沈力三个人把整个电视台的播音工作全包了，从新闻、文艺、少儿、社教连带值班我们全干。那时候电视台尽是直播，最早连电视剧都直播，不准出错。那时的工作气氛真令人怀念。

再后来，闹“文革”了，我被夺了权的人打成了“反革命”，说我“炮打中央文革”，可是受了一阵子罪。其实，我什么也没干，就是太年轻，没吃过“祸从口出”的亏，对人又毫无防备。1996 年初，英国的《天下华人》杂志在“新春特刊”中刊登了一篇《文革忏悔录》的文章，文章中提到过我的事情。1996 年初夏，他们的总编来华盛顿时送给了我一本，说是她去北京采访时听到的。她让我以当事人的身份写出这段历史，但是我不打算写，虽然往事历历在目，但我想，“文革”好比一场戏，我别无选择地摊了个挨整的角儿，说白了，上面在权力斗争，咱平民百姓全是牺牲品，蒙在鼓里跟着瞎起哄，还跟真事儿似的。不过，有些事得过多少年以后才能反思，才能忏悔。我现在并不记恨那些整过我的人，都挺不容易的。

在中国工作这么多年，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要到美国来，直到我遇见了我现在的丈夫。

80 年代中期，美国第一个华裔太空人王赣骏上天以后，中国的航天部邀

请王赣骏和他的一个同事、也就是我现在的先生李杰信到中国访问。李杰信是东北人，1948 年他们全家去了台湾，1979 年李杰信受父亲之托回沈阳老家看看，他那次拍了三百多张人物照，但是没有一张照片上的人有笑脸。这对他的震动很大，他后来告诉我，那趟中国之行后他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没怎么讲话，心情非常不好。他同时也开始觉得，中国的希望可能得放在青少年一代了，他觉得有必要提高中国青少年的科学文化水平。美国太空总署（NASA）有个“零星搭机”计划，就是为了开发全世界青少年的智力，以非常便宜的价格把航天飞机每次飞行时的空余舱位租借给青少年，让他们在上面做航天飞机科学试验，当时已经有 21 个国家，包括挺穷的印度都有学生参加这个计划，唯独中国的学生没有参加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李杰信希望能够利用陪同王赣骏回中国的机会到看一看路子，想叫中同青少年也有这样的机会。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和他认识的。他是个太空科学家，他们来中国的事儿和我没什么关系。当时中央电视台专题部里的两个同事胡诤和傅思是两个大男孩，对航天技术特感兴趣，所以想跟拍来自美国的航天科学家访华全程。一开始他们遭到了拒绝，因为航天部曾经请中央电视台新闻部来拍片，但是被告知：电视台的规矩是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重要人物活动才能派人去拍，来的这二位不够级别。外事司负责办这事情的人正生气呢，电视台的又找上门来，他们就干脆拒绝，来个一比一“心理平衡”。后来，傅思灵机一动地说：“这是我们专题部吕大渝的选题，我们只是来帮助联系工作的。”

就这样，这件事就被提了上去，等人家“研究研究”了好几个钟头，给了回话之后，我才知道这事。我和胡净他们平常挺“铁”的，于是就跟着他们出了一趟差。

这次跟拍我们走了中国很多地方，片子出来之后做成了一个三集的电视专题片，叫《故乡行》，这个节目后来还获奖了。当时王赣骏是带着老婆和孩子来的，李杰信是一个人来的。我们的摄制小组是一个非常快乐的集体，我一向主张：干活的时候谁也别惜力，歇着的时候撒开欢儿地玩，眼见我们拍摄小组的活力，李杰信由衷地说：如果中国的青年人都能像你们这样，中国还能不强吗？

我当时已经和我的第一个丈夫离婚好几年了，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开始，我对李杰信一直没有注意，但是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那天我们正在西安宾馆里录制与王赣骏的对谈，突然，李杰信兴奋地从外面窜进来了，像发现“新大陆”似地报告：“我看见大雁塔了。”他说过去他只是从教科书上知道大雁塔，今天第一次看见真的了。一个古迹能令一个人如此兴奋，我是第一次见到。

我当时感触非常深，既为我对大雁塔这种旧东西的无动于衷深感自己差劲，同时，也对他那种漂泊海外的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故土深深眷恋的情怀有所领悟。这一感受，后来也成了《故乡行》解说词的结束语。自此之后，他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后来知道，我们摄制组的伙伴们在“侃大山”时，也曾经对他聊起过我的婚姻遭遇。这次，他和我们相处了两个星期，最后一站是上海，上海之后，他们就该回美国了。在他们临走前一天的晚上，我们像往常一样在宾馆的房间里检查白天录相的质量，李杰信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他可能觉得和我们在一起很有生活乐趣。我们的小伙子根本没有把他当外人，在他面前满嘴

“国骂”，非常热闹，听得李杰信直乐。

看完片子后时间已经很晚了，大家各自回房休息，在走廊上，李杰信问我：“我们能不能通信？你告诉我你的经历，从你出生开始与起。”我答应了。

然后他就走了。

在这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我和他通信的数目加起来大约有七百多封，他曾给我过很多暗示，他说“我如果这辈子再结婚的话，只有一次机会，”他也曾借用歌词中说的“不要阻挡了他的来时路，”表露他的愿望。

从我当时的感觉来讲，我和他的交往有一种初恋的感觉，因为我的第一次婚姻和中国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背景联系得太紧，加上当时我的幼稚，因此整个感觉是不对的。

后来，我接受了他的爱情。

紧接着的问题是，他问我有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到美国去？他告诉我他在美国太空总署工作，而中国又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如果他到中国来有很多不方便。我也知道，从事业上来讲，我们两个人只能牺牲一个。

这个时候正好他还是不能忘怀自己想搞的“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在和他通信的这两年多时间里，他的这个活动被搞起来了，第一届和第二届青少年航天飞机实验活动已经开展，他是这个活动美方“美国促进中国科普协会”会长，中国方面则由“中国宇航学会”出面，但是这里面的很多具体工作比如宾馆预订、会场赞助、新闻宣传等等，都是由我出面协调。1985 年 4 月份他再次到中国来，给我带来了经济担保和邀请信，但是我把这份经济担保一直放过了期也没有动，我觉得当时自己工作的情况是不可能出去的，因此我一直没做任何动作。

1986 年我们电视台要我到深圳拍一个电视片《霜叶红于二月花》，片子拍好后在准备回北京的时候出了车祸。我记得那天是 9 月 5 日，我们摄制组凌晨 5 点开始就从深圳往广州赶路，想赶上广州早上 9 点钟的飞机。结果刚出深圳，就出了车祸。我的伤势最重，彼摔成颈椎骨折。算我命大，后来没留下任何“运动障碍”，这一点连北京骨科专家都感到奇怪，他们说：“你的情况闹好了也得是高位截瘫，你为什么没有运动障碍呢？”我说：“这得感谢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时候没书可看，只有《农村医疗手册》，这个手册我看烂了两本。出事之后我用手给自己圈了一个颈托，所以没再伤到骨髓。”

李杰信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改变了原来直飞北京去主持第二届青少年航天活动颁奖仪式的路线，他走过罗湖桥先来看我。他说，“假如你瘫痪了，我要照顾你一辈子。”他还说，等他办完青少年活动从北京再回来看我的时候，希望我能够站着迎接他。他还用他那没有什么乐感的嗓子给我录一首《寒雨曲》：“雨啊雨，你不要阻挡了他的来时路，我朝朝暮暮盼望着有情侣。”

颈椎骨折是要命的事，所以，我一进医院，脑后的外伤根本没顾得上缝，头骨上被钻两个洞时连麻药也没顾得上打，就用 25 公斤的大铁锤作牵引，把我“钉”在了病床上整整 25 天，一动都不能动。那是一种长时间的、难以言传的疼痛，隔壁房间伤势比我轻的小伙子疼得一直叫喊，还吃了吗啡，我害怕上瘾，坚持不吃还一声役吭，从那以后我明白了，女人忍受痛苦的能力要比男人强许多。为这个世界上爱我和需要我的人们我一定会站起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

我在深圳的华强医院里一直住到冬天，春节回北京的时候断骨并没有钙

化，只是“软组织连接”。北京的医生说我需要做植骨融合手术，就是从大腿骨上片下一块骨头植于骨折处融合。但是医生说，在国内做这种手术要睡三个月的石膏床，还需要家人伺候。当时，我的条件并不好，我的两个孩子还需要我照顾，我实在不具备这种治疗条件，这时候，我想或许能到美国去治疗，李杰信说这种手术在美国没有那么麻烦。

这样，我就以探亲求医为由拿了B—1签证到美国来了。

初到美国，我没有受什么苦，因为有李杰信在这里。当然，如果不是因为李杰信，我也没有想到过要离开中国。

到美国之后，我先是去成人学校学英文，后来，我又在家里组织了一个小班，和两位台湾同学天天跟着录音带读英文。在国内的时候，我根本不愿意破人管着，我知道怎么做事效率高。在电视台的时候，我绝对超额完成任务，年年大小总获个奖。做大节目的时候，我曾经一天只睡两个小时的觉，脑子里全是镜头、音乐和解说词，特别精神。可是等到节目一完成，我非得睡够两天大觉才去上班，是够“自由散漫”的。可刚到美国那阵子，没有人管了，真自由了，我又六神无主了。不过，现在已经习惯了，在美国什么都得靠自在美国生活，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是头等大事，我一直希望自己也能挣些钱。如果我没有什么责任和义务，可能挣钱的愿望不会这么强烈，但是我还有两个孩子,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在美国成功经验中首要的一条就是‘重视教育”，为了自己孩子的大学教育费用，很多工薪阶层的父母要提前许多年做好财务准备。我还在北京的时候，李杰信就和我说过，将来他担心自己无力负担我两个孩子的大学教育费用，因为他没有准备。我了解他的为人，但凡他心里有底就不会这么说。他只是一个薪水阶层的人，但是我一定要让我的两个孩子在美国完成大学教育。学会一技之长，找到安身立命之本，这是我能留给孩子一辈子受用的财富。当时我想，“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一年后，美国的华文报纸《国际日报》为我办了工作签证，我为他们做驻华盛顿记者，是李杰信的朋友把我介绍进去的。在那儿，待遇虽然不高，但总算有个稳定的收入，新闻路线也都熟悉了，如此，一晃就是七八年。虽然我每天得发一千多字的稿子，周末还经常要出去采访，活得好像挺热闹，但我始终不能忘情于当年在中国广播战线上那紧张、丰富又有创造性的生活，那可以称之为“享受”的工作，即使有时把人累得跟活驴似的，但也乐在其中。

在美国跑新闻，总希望中国人办出的事儿能给中国人提气，还是在布什总统任上的时候，那年五月，定了个“亚太裔传统周”，往后又改成了“亚太裔传统月”，各少数族裔的人在华盛顿纪念碑前的大草坪上搭了个戏台子，各族裔人等轮番登台露一小手，这叫做“展示各族裔文化”。那一阵子，华盛顿蓝天白云，阳光灿烂，轮到展示中华文化的时候，只见几个五短身材、来自“中国城”不知哪个“武馆”的老少爷们儿登台“武术”了一番，真丑！看得我恨不得有一个地缝钻进去。打那以后，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华民族高水准、多品种的文化艺术便成了我的一个梦。我也明白，这年头，让梦想成真也得有钱，但是，谁也挡不住我做梦。

为此，我曾花了两年功夫想在华盛顿创办一个播放大陆节目的电视台，我连电视台的名字都想好了，叫做“神洲电视台”，我和几个朋友一块写计划、发传真、做公关，折腾了好一阵，到头来，终因钱财不足而告吹。

我在美国做记者，很多事情全是仗着胆大又没有退路硬给逼出来的，有时连我自己都觉得挺神的。

我刚来美国给《国际日报》做事的那会儿，有一天，总社通知我去白宫采访布什副总统任命华人赵小兰做交通部长的新闻，因为怕自己找不到门，我就邀了《世界日报》的记者同行，最后总算找到了白宫举行仪式的那间屋子。

仪式一开始，我恨不得把录音机塞到布什的嘴里。美国三大电视网之一的 NBC 大汉子摄像师曾经想跟我抢地盘，但我自岿然不动，一则是当年我在布什嘴边晃动的那个破录音机才二十多美金一个，机器放远了录不上，全不似如今我的小二百块买来的新闻专用录音机，放八丈远都没有问题；再说，美国记者抢新闻的架式，谁在电视里都见过，不全跟狼似的，谁跟谁都不温良恭俭让，这就叫竞争，没办法。

类似的采访，让我觉得白宫挺好进的，在总统、副总统这些政客们身边站一站、握握手也不是难事，只需要告诉门卫自己是哪个新闻单位的，人家看看证件就让你进去了。可是这种场合中我只求拿到新闻就行了，站在大人物身边又能怎么样？我现在挺明白，平民百姓挣钱养家才是正题，不然，谁管你呀。特别是在美国。

1995 年夏天，李杰信想让我陪他两个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孩子去“接受中华文化教育”，我和以往几次一样，找好了替我工作的资深记者，准备到时候把我的薪水给这位帮我忙的朋友便是。那时美国经济不景气，报社的大本营在洛杉矶，他们正准备关掉华盛顿、西雅图等外埠的几个点，我一请假，分管人事的副总经理正好顺水推舟，在美国私人办中文报纸的难处我很明白，自此，我离开了《国际日报》。没过多久，这家报纸整个地被卖掉了。

我是 1990 年和李杰信在美国结的婚，他的年龄比我大一岁半。这么多年来，我和李杰信的关系挺好的，我的两个孩子也在美国，他们和李杰信的关系也挺好，李杰信是一个工作狂，对工作非常认真，他周末也常常要去加班，有时也会让我和他一起去加班，我常常说他可以当“劳模”。

平常家里的事情全是我干，帐目也都是我管，好在李杰信吃喝不挑，不算难对付。我颈椎的骨伤现在已经稳定，憋了几年，从 1992 年起，大夫已经让我开车了，我在国内长大的两个孩子很懂事，学业刻苦，成绩上乘，帮助家务，还拼命打工，争取自立。我的儿子与李杰信几乎成了忘年交，越是这样，我越是希望他们的学业有一个连贯性，不要中途辍学。

有时候我回国，很多人跟我说，当年你如果不出国的话，你现在在国内就是一个“腕”了，但是我自己知道，当年我在国内的时候，状况并不好，那时候我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我一直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朋友借给我的房子里。我的工资也是从二十七块五起家，后来成为三十七块五、四十九块、五十六块，大概拿到七十几块的时候我走的。

我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还可以。而且出国久了，我再回国去，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国内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我自己出生在重庆，祖籍江苏，在北京工作，但是我一直在北京没有一个房子，每次回去还是要借朋友的房子住。因此，近几年每次回国我呆一段时间就想跑回美国来，因为我已经觉得我的家在美国了。

人生的路绝不是自己能刻意安排的，人走到哪步就算哪步了，这点我挺相信的。

也正是带李杰信的孩子回中国“接受中华文化教育”的那一趟，有一天晚上在北京，我的一个老朋友来电话，那时都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之后了，这位朋友还是坚持要我到三里屯去见一位“高人”。

去了高人那里之后，我只问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回美国之后到哪儿去找工作”？这位“高人”说：你不用急，也不用找，工作自动会来找你。

她甚至为我描绘了一番，说是能给我带来工作机会的这个人是“五十多岁、男的、华人”。

我不迷信，可是有点好奇，我真希望她说的是灵的。

回美国后一直思着想着“高人”的说法，没准还真有门儿。

陈燕妮思绪：

大渝快人快语，我去东部采访的时候，她曾坚持要我去华盛顿她家一住，她说：“聊天，住几天，成为朋友之后文章才能写。”

她家当时已该是天凉好个秋正到最美的时候，但是秋天的这次美东之旅对我来说时间实在过紧，最终我也没能成就这趟华府之行。

采访她，条件颇多，长途电话采访全完之后，先是她的照片迟迟不予寄出，再就是她坚持必须由她本人逐字审阅最后的成文稿。采访对象除非是盛名之下正在气势中的角色，不然我绝对保持自己的坚持，大渝的此两条依我的原则都不想迁随，又觉得当初在国内并不是听她之名听到如雷贯耳，她的事情就放在一边了。

书写到一半时先行回国，签订此书的出版合约诸事顺利，只是原订本书该是对一百个人的采访，因为字数的关系不得不大砍成为五十人，这时候，因为与大渝方面沟通的诸多不顺，心里决定放弃的，首先是她。

在北京和出版社责任编辑“把茶言欢”，指天发誓一定尽快返回洛杉矶将后续书稿完成。临回美前去了趟天津，在那里和《八小时以外》的总编师宜和闲谈起这本书的构成，无意中谈到大渝时，她两眼登时放亮，连问“她竟然也去了美国”？

师总编年约四十，非常风度，对大渝的热衷令我惊奇。后来我想大抵是年龄的关系造成我对大渝的认知不足。果真，回京后又问了几位年在四十上下的朋友，听到大渝名字，该批人等有一个算一个竟通通缠住才说了一半话的我追问不已。

也因此，回美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络大渝，心里虽有万千波动嘴上却不说，先就是把稿件飞速地发传给她候审，再就是火急火燎地催促她迟迟不到的照片。

如果说这是我为书的势利庸俗之类我也毫不恐惧，因为我一旦知道很多迫切则没有道理置之度外，我其实在这方面相当追随和现实，读者的知欲毫无疑问是我择言尺度的唯一鞭策。

笑骂由人。

此时说时，都有些后怕。

王维

王维背景

1975 年毕业于天津第十六中学，后进入天津渤海无线电技术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电视机厂工作，后进入天津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担任放射科技术员。1979 年考入天津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市计划生育研究所工作。

1984 年赴美留学，进入纽约医学院攻读病理博士学位。1992 年通过美国外国医生资格考试，同年进入纽约下城医院年科做实习医生。1995 年 6 月份结束实习，同年 9 月份在洛杉矶西医诊所，为大陆人在当地开办的第一家西医诊所，同时，其在当地中国城协和医院、嘉惠尔医院及艾尔蒙地医院兼任主治医生。

王维录音——

我出生于医学世家，父亲是天津医院的外科主任，母亲是天津医学院的医生，家里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孩子，人口非常简单。我技校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正赶上中国文革后第一次宣布可以高考入学，我父亲那会儿正在外地开会，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打电话回来要我赶快复习功课考大学，但当时我因为是技校学生按政策不能报考，我就只好先毕业然后去工厂工作了。但即便是工作了，我也一直想考大学，我爸爸这时又为我找了些路子，我就调到天津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做放射科技术员，这样可以有多一点时间复习功课，但是第二年该考大学的时候仍旧有政策，技校学生要工作两年之后才能报考大学，这样，我就一直干等了两年。

等到 1979 年我按政策可以考大学时，各学校里高中学生的功课也复习得相当不错了，一考下来，我的分数不够好，考进了天津医学院。但是即便是学校不理想，我总算是实现了自己上大学的愿望。

1983 年我面临毕业，那时候中国的“ 出国热 ”已经开始了，我也想赶上这个潮流，就开始努力看英文书，和当时所有的人一样学习“ 新概念英语 ”。那时候我爸爸已经到香港定居了，被剩在国内的我给人的印像当然也是早晚要出国的人，因此很多单位因为怕我占名额不想收我。后来我通过关系进入新成立的天津市计划生育研究所，那个所的所氏是从海外留学回国的，对我的处境比较理解，但是不巧的是，当我左手拿到研究所工作通知的时候，右手也真的接到了美国学校的入学通知书。

说白了，如果今天有人问我 1983 年时为什么要出国留学，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只能说这是一股潮流，是潮流把我和大家推出去的。

在美国读医学院和在国内情形非常不一样。美国的医学院规矩是先要读大学预科四年，毕业之后考试考到医学院之后再读四年，出来就算是“ 医学博士 ”，整个读书的过程是八年。医学院出来之后的学生还要接受训练，这种训练视你选择的科目而定，时间稍有不同。一般说来，做内科医生的要训练三年，做眼科的要做四年到五年，外科的也要五年。硕士这个学位在美国医学院中是没有的，们是可以走另外一条路，那就是攻读美国病理硕士、生理硕士之类的学位，但是读这种学位的人已经不是医生了，是属于学术方而的研究人员。

我是在中国上过医学院的人，到美国来情形确实有点尴尬，不知道应该进医学院的哪一级才好。幸好，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因此他们对外国医生也留有一条路：如果你是一个外国医生，你可以通过美国设定的一种“ 外国

医生考试”，这种考试里面分两个组成部分：第一是基础部分，第二是临床部分，你如果能够通过这两部分的考试，美国就认可你的水平相当于美国医学院毕业生了。

当然，这个外国医生考试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通过的，这种考试中，临床部分相对容易一些的，但理论部分就很难。中美两地医学临床方面的经验其实差不多，但是在基础方面美国学生学得比较深。比如说中国的医生看到一种病就会用一种药来治疗，但是美国基础医学讲究看到一个病例之后要研究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临床诊断有多少种病和这种病类似？如何来鉴别这些病？并且有多种查证结果，做得比较彻底。相比之下，当年我在中国的医学院里学得东西还是很薄浅的。美国有关的书籍非常多，通常都是很厚的，你必须一本一本地念。

我通过这个考试的时候整个外国医生的考试通过率大约只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也就是说如果有一百个外国医生参加考试，只有十五到二十个人能够通过。但尽管这个考试这么难，外国医生还是拣了很大便宜。因为这个考试通过之后，用不着到美国学校里去激烈地学习和竞争八年，外国医生就可以像美国医生一样，想做哪一科就可以做哪一科，出来之后就可以在美国开业了。

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还很不清楚自己到美国来要干什么。那时我的语言很差劲，在中国时觉得自己的语言还不错，但是到美国之后一下飞机感觉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然后飞到自己的那个学校去，学校又在乡下，花不开鸟不叫。

我出国的时候口袋里只装了八十美元，我爸爸也给我了一些钱，他把钱汇到他在美国的一个朋友那里，我的学校里后来也给我全额奖学金了，大约是每年六千块钱加上免学费，情况还可以。因为有这些经济来源，我到美国来没有受太大的苦，当然，我的生活也不宽裕。我做研究生的时候，学校离医院很近，我就到医院里上帮助医生做抽血，每小时挣八块美金。我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去抽血，干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挣两个小时的钱，也就是十六块钱。在我找到这个抽血的工作之前，我从来没有到学校里的餐厅去吃饭，虽然饭费并不是太贵，但是总不如自己在家里做饭吃便宜。干上抽血的工作之后，记得第一次发工资一次就发了我将近两百块钱，拿到这笔钱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学校里的餐厅吃一顿饭。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次经历带给我的感觉，我排队买饭，然后坐在餐厅的椅子上慢慢地吃，尽情地享受这种时光。这是我一直想做但是有没有机会做的事情。这时候我已经来美国半年了。在中国的时候，我的情况虽然不能和高于子弟比，但是我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又是一个独生子，走到哪里大家都知道谁是谁，因此，有点什么事情我只要找人随便说一下就行了，在家里花钱也从来没有考虑到要节省一点。但是到了美国之后，真是叫天天不应，没有人理你，更何况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是一个大陆来的中国人，我来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校里的大陆人很少很少，我基本上是第二个到这个学校来读书的大陆人。美国人本身就看不起中国人，中国人之中，台湾和香港来的人又看不起大陆来的人，因此，无形中我的位置一出现就低人一等。那种时候确实很自卑，我从天上一下子掉到地上来了，关系和地位、金钱什么都没有了，那时候还是 1984 年左右，大陆人出来的还很少很少，平常聊天的时候，有的人一听说我是从大陆来的，扭头就走了，因此我心里承受到的很多压力根本没有人去讲，但是我也知道，

我自己要想站起来就得完全靠自己。

我在美国这十年的时间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地爬起来的。我一开始读病理，拿到硕士后就往下读博士，但是读到一半时我觉得我必须放弃了，不是说我读不下来，实在是我看不到前景。我清醒地知道，如果继续读病理我除非回大陆工作，那样的话国内可能会封我一个教授职务，我可以领导一个实验室。但是在美国，你如果没有一个医学执照，单卑凭一个病理博士，那就根本什么都不是，每年可能挣个可怜的两三万块钱，而且还要做得很辛苦，别人对你也没有太多崇敬。在美国就是这样，如果你拿到一个医生执照，社会地位一下子高很多不说，你的年薪一下子就会到 10 万美金以上，那时候你可以自己开业，如果你不愿意自己开业也可以做一些研究，年薪也是 12 万左右，每小时的时薪也在 60 块钱上下。在美国，这对我是一种诱惑，我觉得这样比较灵活。

刚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美国的医学界对外国人而言还会有什么特别的出路，我的学校很闭塞，很多消息都不知道。后来我的导师带我到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做短期工作，在那里我才知道外国医生在美国还可以走另外的一条路，那就是考外国医生执照，考西医。也就是说只要是大陆医学院毕业的，就可以参加这种考试，通过了这种考试之后，你就可以找工作。很多印度医生就是拣了这个大便宜，他们在自己国家里读完医学院之后，赶紧就拿了护照到美国来参加这种考试，他们的英语通常很好，很容易考过。在美国医学界的外国医生群中，印度医生对我们的威胁很大，在外国医生总数里面，印度和巴基斯但的医生占了百分之四十左右，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如此，整个医生群一下子就起来了。

因为这是一条捷径，因此，连很多美国医生也都是先到国外去读医学院然后再回来参加考试的，他们通常选择去菲律宾等国家读书。

外国医生到美国通过考试之后必须到医院接受医生训练，这种时候其实你连自己未来主攻的医学科目都还没有确定，你必须自己到医院里去选科目，如果医院里要你你就可以进去接受训练。这种训练大部分都会顺利通过，当然有的人也会被人家不喜欢最后被踢出来的，这样的事情也不少见。这种医生训练计划美国的医学界一直开放着，每年美国大约有三百到四百个项目可以申请。我的外国医生考试部分通过之后，也开始面临申请项目的阶段了，但是我对自己心里没数，我就把自己的简历写下来，向各医院发了三百多封信介绍自己，我的自我推荐成效不错，回头的信大约有五六十封，我遵照他们回信中的要求再把自己的详细资料寄过去，他们要什么你就寄什么，并且准备去医院面试。

这时候，如果医院对你有兴趣就会继续给你写信，接下来就会告诉你他们愿意对你进行面试。这个时候是你“丰收”的时刻，可能会有十几家医院对你表示欢迎，而你要到哪个医院去接受训练还没有最后定，这时候可以说是你选择的时候。轮到我处于这个阶段时，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坐飞机去各医院面试，但是仔细盘算下来，要去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总是坐飞机也飞不起，这都是要自己出钱的。我就买了火车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走，中途火车接不到的地方就坐公共汽车。

按照我自己给自己排的路线，我第一站去的就是纽约，因为纽约医院最多，穷人医院也最多，美国医生一般是不愿意去穷人医院的，因为各方面的状况都不是那么好，那么在这类医院里，我们这种外国医生自然就成主力了。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外国医生在美国寻找受训练医院的时候还会受到另外一些歧视，第一，作为一个讲话结结巴巴、没有一个美国名牌学校毕业背景的外国医生，美国好的医疗中心不会要你。比如哈佛、纽约大学等很好大学里的训练计划就不要你，这些好大学里面是有医学院的，医学院会有附属医院，这些好去处你根本不要想；第二，医学中一些好的科，比如眼科，骨科、外科、妇产科、耳鼻喉科，外国医生也不要想进去，尤其是眼科医生，美国全年的眼科医生训练名额也才三百个，因此会有很多限制。在美国好科、坏科的差别就是在一个所得的钱是多是少，做事情少但赚钱多的科就是好科，其他的坏科比如内科、家庭科之类的科目才可以轮到外国医生。

当然，出门面试之前，对此我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我对自己比较有自知之明。

那一次集中面试的过程中，我准备了 28 个到 30 个医院的面试，这些医院集中在美国东部，我几乎走遍了整个东部。我到了头三家医院去面试之后，心里一下子就感觉有了底，因为这三家医院中当场就有两家医院要跟我签合同，那两家医院都是黑人区医院。但是，当我问他们这个医院周围的治安怎么样，他们告诉我说有的时候医生下班从医院大楼走到停车场自己停车位的时候都要有保卫人员跟着一起去。听到这样的话，我不得不说自己要考虑一下。这样的地方，美国医生当然不愿意去，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兴趣和胆量留下来。

后来我到纽约下城医院去面试，当时已经知道自己价值的我最后还是选定在这家医院做内科实习医生。当然，这也不是一家好医院，设备也一般。他们之所以看中我是因为我讲中文，这家医院由于靠近纽约中国城，因此他们的病人中有百分之六十都是中国人，需要很多中国医生。我去面试的时候，医院负责招训练医生的人一开口就给我年薪三万九，并给我提供住房，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条件，而且我也愿意力中国人看病，这样，我就留下来了。

接受训练的时候，也就是做实习医生的时候大家都拿很少的钱，大约每年是在三万到四万块钱左右，几乎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做的年头越多，级别就越高。实习医生的等级基本上完全是按各个年度级别来划分的。比如说一个医院第一年招收进去 30 个实习医生，第二年的时候会砍掉一些不太好的，变成 25 个左右了，这些第二年的医生管着第一年新进来的医生；第三年这批医生再被砍掉一些就变成十几个了，这时的他们又管着第二年的医生。接受完训练之后医院方面会给你一个证书，你就自己出去找工作了，没有人再管你，在美国没有一个地方是管你一辈子的。

我去做实习医生的时候，刚一开始吓得够呛。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在加护病房里做，下班的时间一到，哇，整个病区只剩下我一个医生了。那时我们每四天值一次班，值班的时间就是从早上六点半的时候按正常时间上班，然后一直做到第二天早上的六点半钟，等别的医生都来了你还得继续做，一直做到十二点半的时候才可以回家，因为病人的很多事情做不完，必须继续做完为止，更因为前一天晚上只有你一个医生守着病人，你才是最了解整个病区情况的人。

我们那个医院一般爱在晚上收病人，病人在急救室里躺了一天，到晚上才决定要不要收进来住院，一个晚上差不多要收到六七个病人。这时候，作为一个实习医生，你的事情就来了。医院每收进来的每一个病人，你必须要

把他的病例从头写到尾，所有病人的医疗准备工作也都要做好，抽血、验便、验尿、拍 X 光之类的所有资料都要由值班医生准备齐全。第二天早上，医院里有早晨报告会，这主要是用于教学。如果你是第一年的实习医生，那么你就要到报告会上向上级医生作汇报。每个早上你都要为每一个病人做报告准备，你必须把病人的病因、病征和诊断根据等等准备充分，有时还得仔细翻书找资料。早晨报告会上，两个第四年实习医生就是老大，他们坐在中间的桌子前面，其他的人就都坐在下面，这两个人随便就问起来，这时候第一年的实习医生就哆哆嗦嗦地开始报告起来。这种会上，上级医生会问你各种问题，如果你没有做或者你答不上来，他们就把你当众大骂一顿，然后再问管你的第二年实习医生是哪一位？接着就把他再大骂一顿，有时候还会牵出来上面的第三年实习医生，但是他们对第三年的医生比较客气，多少留点面子。只有第一年的实习医生没有人留面子，像一只狗一样。被人大骂的时候你真是面子扫地，有的人被骂得直哭。回想起来，我多年的美同医生生涯中最可怕的就是这个早晨报告会。但也只有这样，你才能被训练出来。我做事情的优点是比较勤快，不愉懒，所有该要的资料我都做到了，因此被骂的时间少一点。一般说来，一个第二年的医生手下管着四个第一年的，四个第二年的上面又有一个第三年的管着，这是一个阶梯，再上面就是主治医生。有医疗问题的时候也是，第一年的医生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找第二年的，第二年的如果还解决不了就打电话找第三年的。这么一直循环下来，从这个圈子里熬出来的人真有点“媳妇熬成婆”的意思。我当实习医生的时候，工资每年都有一些小小的上涨，但是非常有限，我第一年的时候挣三万九，第二年是四万一千，第三年是四万三千。

在美国做医生对一个病人要从头讲到脚研究得很深，美国医生在看病时，会把很多科研方面的考察带到医疗中来。在国内的时候，一个星期也不见得有一次两次这种报告会，但是美国在这方面采取的做法就是天天讲，比如，除了早晨的报告会之外，医院里每天中午都还有教学会议，院方会请专家来讲课，在平常的工作中，没有人会督促你，但是竞争却是很激烈的，每到年终时医院里都会有一次考试，你必须过得去。而且我刚才说起过，我们做医生的要每隔四天值班一次，这时候你就要 29 个小时不合眼，时刻关注医院里病人的情况。因此，凡是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在美国医院里，你如果做第一年的医生，你一定是会掉很多磅重量的，因为你会做得很辛苦！做到第二年的时候你的体重才能够打平；做到第三年的时候你就有机会睡觉了。因此，在美国你想当一个医生虽然荣耀，但是实在也是很辛苦的。

当然，美国医生的生活条件实在是非常好，医院里每天都为医生准备了上好的饭菜，换着花样来，这些食物大多数是相关的药厂提供的，因为药厂希望医生们能多用他们的药品。

我们的实习合同每年都要续约，大约是在每年的 12 月份，大家的合同纷纷应该续签了，如果没有被叫到主管办公室去续约的人，前景就有些问题了。没被续约的人可以一直干到第二年的六月份，然后就要自己为自己找出路了，当然，他也可以去找另外的医学计划，可能会重新从第一年实习医生开始做起。

我就这样在医院里做了三年，然后就决定自己出来挂牌行医了，如果我现在不想自己开业的话，我还是可以到一家医院里去做第四年医生。

这么多年来，我在美国的医学界也见到过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西医，当

年我们一起考外国医生考试的就有广州医学院和第四军医大学的毕业生，那次考试大家全通过了，纷纷去做实习医生了。再后来，我到外地开会的时候也遇到过很多大陆医生，他们都已经知道这种考试并且积极争取通过，在这些人里面，让我最受感动的是一个和我同考外国医生考试的朋友，这位朋友是广东医学院毕业的，来到美国之后他姐姐就把他丢到餐馆里打工，让他自己养活自己，他为了保持身份还得在英文补习学校挂上一个名字，事实上他在英语方面什么都不懂。后来，他看到别人在看书准备外国医生考试就偷偷把别人正在看的书名字记下来，查字典搞懂是什么意思，然后自己也开始看这类的书。后来他告诉我，他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翻字典把外国医生考试要准备的书看完的。而且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考过基础部分了，我说过这是最难的一部分考试，但是他已经通过了。

去参加外国医生考试这件事情其实说起来很容易，但这条路实际上是很难找到的，包括要去哪里考试？念哪些书？做为到美国来的外国人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而且，考试之后又会怎样？去哪里找工作？这些我们也不知道。我曾经提到过我自己考试之后就面临过这种困惑，那时的我仍旧不知道自己的身价如何？不知道自己在美国医学界人士的眼里是处于什么位置？直到人家要我了之后我才确定了自己的身价。

我一直深深感激的是，我之所以能走上考试之路是靠着一位从广东医学院毕业的同行指点的，我是照着他的样子做的。当然，中国大陆留学生也有很多人是因为身份的麻烦，才不敢出来考试的。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只是因为对这方面的路子不了解而错过了这种考试，那就实在太可惜了。

我自己的美国道路走到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我的诊所开业对我也没有太大的压力，如果开业不成功的话，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到大医院里去做医生，南部等地有很多地方一般医生是不愿意去的，我如果去那里做事，薪水会很不错。我目前在自己开业的同时也在附近的两个医院做做事，我做的是夜间紧急处理病人的医生，每周做两天，每天从早上七点做到晚上七点。

现在的我常常想起过去刚到美国的日子。我刚到美国时，有台湾人问我在大陆是干什么的，当我回答说我是一个医生的时候，他回问我说：“大陆还有医学院哪？”这话让我听了很难受。我那时就觉得自己非要在美国当上医生不可。现在我终于当上了。可惜我再也没有碰到过那个台湾人。当然这个过程里你对自己目的的坚持是非常必要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可以在美国做什么，心很灰，也有很多转行的想法，我想到过要去给人家做正骨医生，想到去考一个中医执照，也甚至想到过要去做房地产生意。所幸，今天的我最后还是走上了一条很好的路。

这是我很大很大的幸运。

说到这里，我还是想感谢当年告诉我这种考试的同行，是他的帮助造就了今天的我，我当年知道这条路子之后就参加了考试，并且通过了，然后就到美国医院里当医生，很多人称赞我“了不起”，但是我知道最了不起的是当年第一位在美国通过这种考试并且进入美国医学院的大陆人，这个人才是伟大的。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我的前面是有前辈的。

我一直想找到那位走在最前面的前辈，一直想说出我的敬仰。

陈燕妮思绪：

他的“前辈”之说有点幻化，在你面前隐隐地就树立起一个无名的丰碑，让人屏息凝神。听了他关于外国医生考试改变了他一生的说法，采访之后，

为着这个不知名的“前辈”，连我也心情肃然。

采访王维，感触很多，他的路虽没有太大起伏，但确是一册讲解得纤毫毕露的教科书，相信将是能收获一大批领悟的好本子。

就这个结果细算自己的收支，他避免不了地有很多探寻的磕碰和代价，他所耗费的时间、他洋洋数千言上文中所触及到的过程以及下面这段小事，都是。

“在大学里读学位的时候，我的经济情况一直不怎么样。有一次我看到学校贴着有一个布告，上面说如果有学生愿意做骨髓奉献，就可以得到 75 美元的报酬，这对贫困的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我是当过医生的，知道这种捐献对人体来说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不过是打一针麻药，然后抽出一点骨髓来，我就打电话过去问了问情况，对方说‘你过来吧。我们只抽你一点点骨髓’。

“我就为着这 75 块钱去了。

“我去了之后，先和对方签了一个字据，算做“卖髓契”吧。这之后我往床上一趴，他们就开始抽。哇，他们的做法和电话中说的完全相反，真的是一管接一管地狠命抽，抽得我惊讶得不得了。虽说抽完之后他们当场就给我了 75 块钱，我知道他们是要做实验用，用人的骨髓来培养血癌的细胞之类，但是这 75 块钱真是抽得我很不高兴。抽骨髓其实只是疼一疼就好了，但我那次抽完之后三个礼拜都还在疼。因为骨髓就只是针扎到的那一点，一针下去抽不到太多，他们抽的大多数都是血，我实在是吃了一个哑巴亏。

“这事情我根本不敢和父母讲，他们听了之后准得难受，我还要挨骂。”

谈说这事时，他神情淡淡的，讲述的似乎仅是记忆中的一项，为了 75 块钱而后悔，这在当时的他来说，保留的应该只有一份难言。话才说到此，他诊所的门铃猛然大作，涌进来最少三个面色憔悴的病人，他通身雪白地迎了出去，他这样告诉你他的变化。

詹萍萍

詹萍萍背景

生于杭州，十岁进入上海戏曲学校学习京剧，主功花旦，八年后毕业进入上海京剧院，曾师从京剧大师童芷苓学戏。

1980 年开始在《南昌起义》、《快乐的单身汉》、《美食家》等二十多部中国电影、电视剧中担任重要角色，并曾经于 1986 年王 1988 年在安徽省电视台连续三年担任特邀主持，曾由中国唱片公司录制个人演唱专辑。

1990 年赴美，定居美国之后有各种工作经历，曾任超级市场工作人员、华人电台广播人员、美国电影背景演员、中文学校舞蹈教师、健身指导、京剧指导教师等。1992 年开始学习美容，后获得美国美容师执照，现为专业美容师。詹萍萍录音——

我相信我是中国国际级演员中第一个拿到美国美容师执照的人。

我是在 1992 年的时候拿到这个执照的,这可以说是我在美国改行过程中迈出的最重要一步。

我觉得我在中国是个很有悟性的演员，我是京剧演员出身，我是京剧大师童芷苓的学生，童芷苓最大的优点就是在舞台上非常的光彩照人，不得了。我学的是她的艺术，因此也学到和她很相近的东西，我在台上也能够很有光彩。

我后来的电影表演也得到过很多行内人的赞扬。一些同行在自己的谈话

中有时也会引用我的事情作为一个好的例子。当年我演陆文夫的小说《美食家》改编成的电影的时候，陆文夫在拍摄现场一看见我就说我“一点不像苏州姑娘，高高大大、粗粗壮壮的”，但是，等到他看完我演的电影，不得不连连夸赞说：“你完全就是我小说中的人物”。其实他小说中的这个故事全部是以男主角为主角的，女主角出场很少，但是很多评论家和陆文夫自己都说我每次出场都是一个亮点，给人很深的印象，我花了很多心思在这个角色上，在表演中我特地加进去很多戏剧表演的动作，正好这个女主角有个评弹艺人出身的背景，这样表演下来，剧中人就马上纤细很多。毕竟，江南女子总是有一点造作的。

但是我做演员有一些弱点，我出镜头的时候样子很丑，我每次看样片时候的情形，真的是不好意思看到自己的丑相，直想找个地洞钻进去。但是到美国来之后，很多人反而常常对我说：“你怎么会长得这么漂亮？”我告诉他们说：“长我这个样子的人在大陆已经算是相当不好看的人了。”

在演了许多部片子之后,我在 1990 年到美国演出的时候就决定留在美国生活了。

我一决定在美国住下来之后，就开始了自己打工养活自己的生活。那一段长长的日子里，我在超级市场做过工，也在华文电台播过音。最初的时候，无论在任何地方做事，我的工资全部拿的是美国的最低工资，每小时四块两毛五分钱，即使是在电台工作也是这个钱。其实，我在电台的工作是把武侠小说用评书的形式说出来，就像当年在中国非常出名的评书女主持刘兰芳一样，我讲过不少故事，讲过《雪山飞孤》，也讲过台湾作家廖辉英的爱情小说。

我在美国虽然是第一个用这种方式讲小说的人，也吸引了无数听众，但是电台当时给我的工资实在太低，低得我都活不下去。播音的所有准备工作都是我在自己家里免费进行的，当被播放出来的时候电台才按照时间算钱，播出来的时间是半小时就是半小时，是一小时就是一小时，即使每小时工资是四块两毛五分钱还要扣税，星期天的时候还被要求免费工作一天。

其实当时洛杉矶另外还有一个电台曾经想让我去工作，但是老板后来嫌我说话的口音中没有台湾腔，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在海外的这个行业里，其实还是有“标准”的。当然这也难怪，以我在美国多年的生活经验，现在再让我看中国大陆来美演出团体的演出，我会看出很多不足。我觉得他们个人技巧都非常好，但是他们和台下观众的交流远远不够，他们大专业了，而且表演方法也太死板了，这样就失去了一个和台下观众的呼应关系。台湾、香港一直都有很多影迷或者歌迷协会，这些阶会非常活跃，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偶像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我想，能产生这样的吸引力，除了和明星们表演得好有关之外，而且和他们的表演形式也非常有关。这是我到美国之后才明白的。

当然，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只要是有中国的演出代表团到美国来，我一定是要去看他们演出的，其实从我内心来讲，我去看这些演出，主要是想给自己“解解馋”。

我到美国来一直就是半天去上学，半天做其他的各种工作，在生活的压力下，常常我同时会做很多兼职工作。我一周工作七天，每天都做各种不同的事情，我会把这些工作安排得有秩序起来，把他们分好，社区里的各种演出我也会积极地参加。但是上午的时间我雷打不动地一直坚持去读书。

我在美国打工的经历很杂，我曾经在洛杉矶阿罕布拉市政府娱乐中心教民族舞蹈和健身功夫，后来也曾经自己开班教书。

事实上，我去不去读书是没有压力的，但是我就是非常想去做“读书”这件事情。刚来美国的时候我的英文非常糟糕，即使是打电话到别人家里去应征管家或者保姆，我都不敢讲话，紧张不说，我也讲不出来，现在我很后悔自己没有在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就住到美国人家里去，那样的话我的英文长进可以快很多。

现在，在美国已经住久了的我已经不会再去住到别人家里了，因为自己总还是要有自己私人生活的。

到美国之后，我曾经冷静地分析过自己到美国的前途问题。我知道如果我想在美国发展当然必须改行，因为我知道以我的条件想到美国电影界发展得非常好，是件相当遥远的事情，但是我知道我的性格中还是喜欢和艺术有关的东西的，我想到自己即便改行之后，未来的专业也要和艺术联系起来。

后来，我为自己选择美容这个行业之后，学成之后曾经设想过将来会到国内去开一间美容学校。目前，这个梦想也一直没有中断，关于这件事情，我有无数构想和心得，不知未来会不会真的实现。

我所学的美容是关于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就是皮肤保养，另一个方面是化妆。在学习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如果我在美国一直不能当演员，我还是可以以另外一种身份出现在舞台和电影场附近的。我现在也常常到一些电视剧演出场地或者广告制作公司去做化妆服务，现在的我完全不是像过去一样以一个明星的身份出现，我都是这样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化妆师。

当然，我也曾经有机会在美国做一些辅助性的演出，我甚至在美国华纳公司的电视剧《美国姑娘》中担任过女主角的替身，我和演主角的中国女孩个子差不多，美国演出有很多有关的制度，主要演员在化妆的时候要有人代替他（她）走位置。我得到的就是代替女主角走位置的位置。

我当时很紧张，因为要说不少英文台词，其实这些台词我是说得出来的，但是我一直觉得专业的人应该拿出最专业的演出水平来才行，如果自己觉得自己稍微有所不够的话就会变得很胆怯。小的时候我的老师就一直跟我说：“你要么不做，要么就要做最好的。”我记得第一进入戏校的时候，期末考试的成绩我是小组第一，但是我的老师说我的成绩不好，他说你应该成为全班第一，然后成为全校第一。

这种观念一直影响着我，直到现在我也总是想做最好的。

这个观念很自然地也被用在我学习美容这件事情上。我刚刚进美国美容学校的时候英文非常非常差，学起来又很笨，笨得我自己直想哭，但是我自己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打退堂鼓。那时候学校里抓得也很紧，一个星期考试一次，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考试时，考试时间是一个小时，卷子上面是五十道题，当别人全部都考完了交卷的时候，我一个人还在那里急得满头大汗，有的同学这时就跟我说：“你不要那么傻，这种考试是无所谓的，你随便抄一下我的答案就行了。”但是我说我不要，我不愿意，但是那些题目对我来说的确很难，结果，第一次考试的时候当考试已经宣布结束的时候我连五十道题中第三道题的提问部分都还没有查完字典。

可是，一年之后，当我快毕业的时候，我在班级考试中已经成为所有同学当中第一个交卷的人。每次考试完之后，很多同学还要来找我问答案。

我学习非常努力，我为了能够早些毕业，不论生活压力再大也基本上保

持着全日制上学的日程安排。在美国，一天不工作，人就会心慌慌的，但是我还是这么做了。在这之前我一个月四五份工作都做过，拼命地工作之后准备好钱为的就是早日开始我的全日学习生活。学校里每周除了会有笔试之外，还有很多手上操作练习，我为更好地听懂老师的话还买了电子字典，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很贵重的东西，但是我知道只有利用这个东西才能够在上课的时间里跟上老师的讲解速度。

我这样学出来的东西很扎实，毕业后我和所有同学面临的就是美容师执照考试，很多学习时偷工减料的同学毕业之后是不敢立即去考执照的，但是我则是提前一个月就早早报名参加考试了。

结果，我的考试一次通过，我很顺利地拿到加州美容师执照。

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的人，但是在这里的客人群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客人人数很少，而且整个美国的美容业也不景气，有人做过统计，七、八年前美国华人社区内的美容收费发展到今天，不但没有提高过一分钱，反而下降了很多。相比之下，美国人开设的美容公司价钱一直保持得不错，大约是在六十块钱做一次面部皮肤保养；但是华人社区的收费比这个要低很多，现在我在洛杉矶非常好的区域地帮助别人做美容，也只能收到三十块钱做一次皮肤保养的水平，参加会员的客人每次更便宜，二十五块钱就可以保养一次。

我的皮肤比较好，很多朋友见到我后都会说，你的形象非常适合当美容师，因为你的形象给人的感觉是很信赖的。很久以前，我就自己给自己订下过一个私人的标准：我一定要做到让自己的相貌比实际年龄至少看上去年轻十岁。

找想，这么多年来，我做得不错。

其实开始做美容的时候我的心仍旧是很慌张的，因为客人是掏钱出来的人，他们每个人都会对这种事情很仔细的，尤其是女人，更是挑剔。我的客人大多数是台湾女人，我刚出道的时候，同样是两个美容师，那个台湾来的美容师就会比大陆来的美容师生意好，客人愿意找她们，因为她们中很多人都说自己从小就会做美容，她们的确也是从很早就开始接触美容这件事情，反正真真假假的也闹不清楚，但是客人们对来自大陆的我们就非常怀疑，她们常常会问：“你来美国几年了？你是什么时候学的美容？”她们觉得大陆开放很晚、很落后，因此她们很主观地认为我们不可能做得好。我常常对客人说，“我十年前在大陆就是美容店的客人，如果说做化妆行业，我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了。”这其实是真的，因为从小我在戏校里就接触各种化妆，而且我在美国也为各种各样的演出化妆过，我的学生们做表演时，我也是化妆师。

就这样，我从开始的时候有点被人歧视，我忍下来了，以自己工作的质量去一点一点地争取客人，后来，我成为我所在的美容公司里做得最好的美容师。一对朋友来店里做美容，被我做过的客人明显就可以看出脸上非常光亮，感觉非常舒服。

但是，我也有胆怯的时候，比如说我一直不敢到美国人的公司里去做工，因为，相对而言，美国客人非常挑剔，出现一点小问题动不动就会去告你，我有些害怕这些事情。

在美国的这么多年来，我之所以这么认真地学习和工作，不但留意别人的工作，也留意人家的管理手法，我是想好好地体会一下美容业界的各方面知识，今后我可以回中国去应用。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很留意这些机会。

应该说，到美国之后的我已经全部改行了，过去的那个电影明星詹萍萍已经暂时不存在了。

但是真正改行之后，当我生活稳定下来，我还是会时常回忆起过去的演员生活。我仍旧很喜欢看电视剧和电影，有时经常看着看着就会用自己的角度来体会里面的各种表演和镜头处理。

我常常问自己，难道对于表演的事情我就永远放弃了吗？

在中国人的眼里，你混得好不好一定是要看你是不是在做本行，如果你改行了，哪怕你混得再不错，毕竟也是一个损失。因为我学了这么多年表演了，在自己的本行内浑身有本事。

但是，我同时也知道自己已经不年轻了。在美国，也有人说我不应该放弃电影，我和美国的经纪人也接触过，但是我一直有点不敢，我去和美国人面对面地进行交流，我常常不敢。

静下来的时候我也常常分析自己的弱点，我觉得我在美国发展演艺事业时遇到的最难关口就是语言这一关。曾经有一年的时间我在好莱坞做过各种尝试，那时我有一些工作机会，我前面说的给电影中的女主角站位置就是那时候的事情，甚至有一些美国的广告也来找过我，我也曾经加入了美国电影艺术家协会。但是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懂得力自己争取机会，一说到要有英文台词的表演我就连连说自己不行，这样，几次之后，机会就越来越少。在美国发展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我常常因为害怕而推托了。香港的明星周润发是非常有名的演员了，但是他为了到美国来发展还准备了两年的时间，不但如此，他还必须到美国来生活一段时间后，才能再谈发展。

在美国的这么多年生活中，我明白了很多事情，也从来没有对自己的要求有所松懈。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26 个字母都读不出来，但是现在的我已经能到美国的大学里去修课了。我在西洛杉矶学院纠正语音，也选修了舞台表演、舞台化妆等方面的课程，这对我来说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一直在坚持。

如果再说到我的本行京剧，在美国发展就更加困难，但是我知道也有例外，比如说昆曲演员出身的华文俯在美国就常常去各大学里讲授中国戏曲知识，这对中国的戏曲演员来讲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除了电影表演之外，在戏曲发展上，我一直渴望的也正是这种机会，但是我没有她那么幸运，她的做法实在让我觉得好心叨。

即便经受过这么大的改变，我并没有后悔自己当初选择到美国来，我觉得美国教会了我很多东西。甚至于对年龄的看法，我也是在美国改变的，美国是一个不太在乎年龄的国家，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一直认为电影是年轻人的事业，但是美国改变了我的这种想法。

我知道美国这个地方是要靠自己去努力，只要努力，有的是机过去的我一直运气不太好，我请人家力我算过名字，我的名字起得似乎不大好，算命的说通过这个名字可以看出我“会是演艺圈子里的人，能够出名，但是命运飘荡，婚姻下好，身体也不大好”，这些说法其实都说中了。

今年下半年我感到自己命运有些改变，我这个人是很相信命的，有人说我下半年会有很多改变，许多机会我预感到自己可以有希望得到，很多迹象显示出我可以变得越来越好。

我是在七年前离过婚的人，这么多年来我在美国一直没有碰见合适的结

婚人选，而且到美国之后也感到忙不过来，很多人说我这个人很傻，他们认为我应该把生活的重点放在“找老公”这件事情上，这样我可以生活得不这么累。我当然知道在美国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奋斗的，因为可以互相扶持。但是我可能是命中注定歇不下来的人，我也羡慕别人找到了好的伴侣，而我没有，这种状态使得我在美国一直有不安全感。

以前，国内的记者采访我时曾经问我：“你有没有被耽误的感觉？”我说：“我自己都没有时间去抱怨，都没有时间去想这些，我只是不停地往前走。”同样，在美国我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既然一直要面临这样不停歇前进的局面，丈夫的事情就只能等等再看了。在美国我再贫穷，我至少还拥有自己的美容事业。

很多事情，总是个缘字。

陈燕妮思绪：

她再三强调自己是40岁以上的人了，但是实话实说，实在是看不出来。她面貌光鲜，相对挺拔，或站或坐，给人一种难得的优雅。

找她找得相当吃力，当我知道她人在美国的时候，最初想到要写这本书的时候就一直想找她，但是她的电话似乎就在每个朋友的手边，但是又永远找不到，直到这本书即将完稿的时候，偶然在东方航空公司的开航五周年派对上恰巧就坐在她身旁。

搞戏曲的人是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的，不论是大是小，他们拥有一种神采，我就是依靠这种神采认出詹萍萍的。

她的个头竟然和我几乎一样高，很圆的一对眼睛，看着你的时候，有很多大把而出的感觉。

在国内的时候看到过她演的不少片子，实话说，对内容已经记不大清了，但是对她整个人的认知，却深刻。这大概就是说法中的明星们给普通人的感受之类吧。

和多年前中国银幕上的状态比，她几乎没有变化。

她是因为一个到美国演出的机会得以留下来不走的，这么多年来，她一个人在这个疯狂的地方，真够她受的。

她说：“每一年，到十二月份的时候，我都会回顾一下自己过去一年来的财务收入状况，我实实在在地发现我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好，凭着这个，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看着说这话的她，有点感动，一个独身女人的韧劲究竟能到达怎样的地步，好胜的她，该算是一个标注刻度的比例之尺。很想和她的感觉连在一起，就等下一个十二月份。

齐淑芳

齐淑芳背景

自幼受到嫂子、中国著名京剧武旦张美娟的精心指点学习京剧，1958 年考入上海戏曲学校插班，专攻文武花旦，曾是该校著名优秀学生，曾获 1959 年上海第一届青年汇演一等奖。1960 年十几岁时在北京演出《三战张月娥》受到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的高度赞扬和重视，一举成名。毛泽东、周恩来曾观看其演出作品，并给予好评。

1961 年毕业后进入以上海戏曲学校为基础组建的上海青年京剧院工作。1964 年起曾经前往法国、意大利、西德、比利时、瑞士、荷兰，日本等国家进行访问演出。

1966 年被选进红极一时的上海京剧院革命现代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剧组，演出“小常宝”一角，从此在当时的中国家喻户晓。

1979 年开始率领剧团出国进行访问演出，曾经出访西欧各国和日本。1988 年在中国上海成立“齐淑芳京剧团”。

1988 年 5 月 11 日到美国定居，与随同“齐淑芳京剧团”一同赴美定居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在美国各大学乃至艺术机构做各种演出活动，目前，“齐淑芳京剧团”已经成为美国颇具名气的专业京剧表演团体。

齐淑芳录音——

我当年进戏校学戏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京剧基础了，所以我是“一个插班生。我在家里一直跟我嫂子学戏，上戏校之后我是攻文武花旦，比较全才，又能唱又能打的。

我在学校里外号叫做“小老虎”，这说的是我的武功比较过硬。那时候我可以从三张桌子上翻下来，扎着靠还做倒翻，跟男人一样，翻完了之后就马上接着唱。所以，后来我们出国访问的时候，外国人问我：你们为什么可以又打又唱的？你的心脏能不能承受得了，我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人练的就是这种功夫，不光只是专攻一项。

1966 年的时候我被选进入“威虎山”剧组，到剧组之后先让我看了看剧本，然后就让我演“小常宝”。说句实在话，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不想去“威虎山”剧组，因为当时我在我们青年京剧院演戏演得很好，而且也开始排演现代戏了，而成立上海京剧院是一个老剧院，各方面都不够新，所以我不太愿意去，但是我们的领导告诉我说这是组织上的意思，既然是这样，我就只好去了。

我那时候嗓子具备很高的高音，很高很高的高音我也能唱得上去，而且我还能用真假声配合演唱，这在当时是一项突破，曾经全国都在推广学习我的这种唱法，中国当年很多的歌唱家比如吴雁泽、郭淑珍以及邓韵等人，都曾经来向我讨教过这种发音方法。

在“威虎山”剧组里参加演出要求是很严格的，上面要求我们演员每个字都要达到最佳发音状态。但是与此对应的是生活方面的待遇不错，样板团福利当时是比较出名的，伙食每个人是三十八块钱一个月，这在当时中国人大多数都是几十块月工资的环境里显得非常优越。

其实，在伙食方面我一直得到的都是还不错的待遇。即便是在戏校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正好在戏校，当时大家吃得都比较差，但是我因为是学校里的尖子演员，吃饭的时候我们业务好的十几个人吃的是小灶，那时候我们练功练得非常狠，学校里怕我们顶不住，就给我们这一点

特殊待遇，在戏校的时候我们一个个都练得非常苦，那时候我们一般是从早上八点钟起来练功一直练到中午十二点钟，我们练的又都是跟头和把子功之类的，累得连楼都上下去。我练功的刻苦比别人更甚，是全校有名的，我每天晚上十点钟睡觉，凌晨两点钟就起床练功了，在戏校的时候我三年如一日，从没间断过。

但是说来说去，京剧难学就难在这里，因为演员要练的东西太多，我们要练表演、要练刀枪、要练跟头、要练身段、要练台步、还要练厚底靴等等非常多的东西。我在学校里翻跟头是非常出名的，男同学都比不上我，我一口气翻的小翻比他们还多。学校当时有一个评比榜，我的红旗永远是插在第一个的。

毕业的时候我的工资数额定得很高，是全团第一名。

到威虎山剧组之后我演“小常宝”，面对这样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我被要求用大小嗓结合来唱。这对我来说其实并不困难，我接到角色之后就把音区分了分，把各个地方用什么音仔细考虑好。“威虎山”剧组当时是在全国调演员，找演“常宝”的演员更是找了很久，这个角色比较难演，不光是有大小嗓的问题，很多演员的高音上不到那么高。我到美国八年之后的最近听说国内又恢复了《智取威虎山》的排练，但是换上去的演员因为唱不上去常宝的高音，就把唱腔改了，把高腔改成很平的腔，而且也拉不到我当年唱的“飞—上—山———岗”中“山”字所拉的长度了，当年我的“山”字硬是拉了十六拍之后才出“岗”字的。

我在上海京剧院一直工作到我出国，“四人帮”倒了之后我们又排演了《闪光的果子》、《火凤凰》等一些不错的现代戏，这些戏出来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轰动。

1988 年的时候我在上海搞剧团承包，自己号召一批人跟着干，我的“齐淑芳京剧团”在一个星期就号召起来了。当时，这种承包剧团的演员有不少，有一些艺术家找人加入自己承包的团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的，成立相当困难。我们的团组成之后就开始在江苏一带演戏，一天演出三场，每天早上九点。中午两点、晚上七点都有演出，客满得不得了。演出所得到的钱我们和剧院六四分成，我们拿六，他们拿四。

这样，到了 5 月份的时候，我和我们剧团的一些演员就到美国来演出了，演出之后我们决定在美国定居下来。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当时我们看到美国，尤其是纽约的京剧界其实都是一些票房在演出，票房的演出质量也不高，只是演出一些陈旧的剧目，水平完全达不到专业程度，因此，我觉得这里实在是需要一个具有专业水准的京剧演出团体。

我们在美国的发展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影响也是一步一步地打开的。我和我们团里的演员们认真对待每一场演出，以专业的、认真的态度对待我们的事业，这种认真精神非常吸引人，常常连我都不知道就有美国英文媒体比如《纽约时报》这种重要的报纸刊登出我们演出的消息。

我们的演出是要一年一年地定合同。毕竟我们有一技之长，和美国人在艺术上又能够沟通，事情就靠着我们过硬的艺术水平做开了。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在美国纽约的中国人圈子里演出，后来就发展到去各大学演出，再后来就又发展成为要到剧场里去演出。现在，我们的京剧团每年夏季有夏季的艺术节演出，冬季就在学校做讲课演出。

现在，我们的情形已经达到常常人坐在家里时一个电话不知道是什么地

方打来的，电话里又来约你去演出了。

我们在美国的朋友之间也会把我们剧团的艺术水准介绍出去，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的推广工作，我们剧团演出和讲课的名声在全美国已经传出去了。我在康州讲课的时候休斯顿就知道了，然后传到缅因州，又传到纽约州，就这样一个一个地传过去。美国学校里的讯息是相通的，同时，我们也有一个美国的经纪人，他会代理我们的大部分演出安排事宜。

靠着演出和讲课的收入，我在美国的第一年就买了一部二手汽车，第二年我办了绿卡，第三年我们买了房子，同时买了辆全新的汽车，这样我就可以开车到加拿大去演出和讲课，因为从纽约到那里开车要七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有了新车之后就不怕车子在路上抛锚。

在国内演出基本上是国家养一个剧团，但是在美国不能完全走这条路，我们的剧团采取松散的组成结构，需要的时候我就通知大家什么时间排戏和演出，等到演出完成了，大家就散。我们团里的大多数人都往在我家附近，一有事情我一叫，大家就都来了。平时他们都在做不同的事情，各自有各自的工作，他们中很多人和自己的老板关系比较好，到有演出的时候就可以请假出来，有的人就找一个朋友替他做这一天的工作。我们很多演员的太太和孩子也陆续到美国来了，有的人的孩子还开始在美国上大学了，生活得不错。

我们的剧团常常排练，排练场地基本上就是在我家里，每次到演出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开始恢复排练，比如现在我们就每个星期天来我家里排戏，为的就是下个月的一场演出。我们的演出没有一定之规，完全是看演出合约的情况而定，大型的演出我们每年都会有个两三次，其它的就都是小型演出，在美国求生存，这种灵活机动的演出法，也使得剧团里的朋友们都生活得不错。

团里的演员即便是排练的时候我做为剧团的负责人也是管饭和点心的，到外州去演出的时候汽油费也是要给大家的，至于演出酬劳，我们是看所得经费的多少大家分的，钱多的时候大家的日子就都好过一些。当然这种演出的酬劳也需要看人而定，如果是名丑角孙正阳（《智取威虎山》剧中来平的扮演者）来演出，我会给他高出其他人很多的酬劳，比如每场戏一千美元，今年的十一月份我想请他到纽约来扮一场戏，我们会演出全本的《铁弓缘》。

活儿少的演员一场戏我们就给五百美元左右，但是，一般票房的演出给钱是很低的，每个演员顶多能拿到三百块钱。这种钱的数目在美国的华人演出界算是不错的了，我的信念是：我们既然是专业做剧团的人，就要给演员相对专业的工资。

至于我们有关京剧艺术的巡回讲课活动，也发展得不错。我们到很多大学去做示范表演，几乎整个美国都跑到了。

到大学演出的情形与一般的演出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讲课，因为大学里会有有关亚洲艺术类的课程，有些教师就会请我们去做现场解说，很实际、很直观地告诉学生们东方的京剧艺术究竟是如何发展和表演的。在课堂上，我会给学生们讲京剧的生旦净末丑、京剧的化妆、京剧如何练功、京剧的表演，我会做各种示范，台步、刀枪全部都要一一示范过来，使得学生们能够对京剧有进一步的了解。

在这种时候，我也会讲我们现在这一代中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是怎么把京剧的古代戏和现代戏进行揉合演出的，我会告诉他们我们如果演现代戏，手指应该是怎么样表现的？现代戏的唱腔在什么地方与古典的唱法不一样？

客观地说，中国的京剧其实是在我们这一代人中被发展起来的，美国人听到这些会感到非常新鲜。我每次到学校演出也都会演出一些新的剧目，我不想总是表演旧的东西。

与此同时，在有关京剧艺术的细节方面，我会告诉学生们中国京剧为什么要把脸谱画成这样，红脸、黑脸、绿脸、黄脸分别代表什么，过去的美国人看京剧只知道我们京剧女演员演戏的时候头上要戴很多东西，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就要告诉他们京剧中小姐、丫环分别要如何戴，要戴多少件。连大学里的老师和教授听了都觉得很有收获，因为这是从书本上看不到的东西。

我们的演出实在是很轰动，我曾经在大学里演出过《穆桂英破洪州》，把整个大学都轰动起来。我们到哈佛大学演出的时候，我上台之后简直下不来，那里有很多华人学生，知道我过去是演“小常宝”的，我唱了好几段戏之后台下还是鼓掌要我唱“小常宝”。观众中有很多人在国内没有看过我的戏，戏散了之后很多人兴奋地告诉我：“到美国来终于看到你的演出了。”

这么多年来我们在美国各地的演出得到很大好评，也收到很多感谢信，也有一些美国学生因为喜欢我们的演出就利用暑假作为学习一个课程到我这里学习京剧。为了配合不懂中文的美国观众理解剧情，我们演出时，常常会用字幕打出唱词来，这样，学生们能够看得很清楚，对京剧艺术也更加喜爱了。与此同时，我们的演出实况也常常会有电视台录相之后拿到学校里去放映。形式多样的演出活动使我们非常忙碌，就拿我今天和你谈话的这个月来说，我们 18 号要到林肯中心参加国际艺术节的演出，还要到康州去讲课。

对待各种规模的演出，我们已经能够应付自如。我们的做法非常专业，平时我们会安排对各种类型剧目的排练，我们会把不论是一刻钟的、二十分钟的、半个小时的或者一两个小时的节目组织起来，遇到各种情况就可以有各种剧目拿出来，根据需要确定演出。

美国有各种艺术团体，但是没有真正的京剧团，这点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到美国之后，我一直想在没有专业京剧团的纽约发展出一个专业京剧团来，也培养一些美国的孩子们学习中国的京剧。现在，我的这个目的基本已经达到。演出活动我们已经有了，外国孩子也非常喜欢跟随我们一起学京剧，

星期天的时候我这里常常有外国学生来学戏，其中的一个叫“阿龙”的外国学生已经被培养起来了，现在已经可以演《三岔口》了。

我们剧团的到来也把美国尤其是纽约的京剧艺术水平提高很多。我们来到这里后给热爱京剧艺术的民众也带来了丰富的专业艺术生活，大家觉得我们的戏不是陈旧的东西而是加入了一些改良之后的好东西，改革的东西就是好看。

有国内的人陆续出来之后见到我们，惊讶地夸奖我们功夫见长，我相信这是我们一直不断地练功得来的。直到今天，我仍旧保持继续练功的生活，现在我每大部会练功两三小时，场地就是我们家里的后院。这其实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我要冬天戴手套练，和大风搏斗；夏天戴墨镜练，和太阳搏斗。

到美国来我没有打过任何其他的工，我一直是在自己热爱的京剧艺术里生活，因为我首先觉得我有这个能力，而且我知道我们的艺术又是受欢迎的，所以我坚信我们是能够生活得很好的。我们这个团出去演出，又能唱又能打又能舞，外国人即便和我们语言不通，也是可以看得懂的，“好的艺术是没

有国界的”。

到美国来普及京剧艺术一直是我的一个想法。我到日本去过三次，到德国也去过三次，英国也是三次，可以说整个西欧我都访遍了，唯一的就是美国这个地方没有来。等我真正到了美国之后，我发现美国人更喜欢这个艺术。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念头就是：祖国培养了我们，我不能把它丢掉。从小我就喜欢艺术，可以说是为艺术而活着。到现在，我连孩子也没有生，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当家庭主妇，为了艺术我就只好牺牲了这些，我拥有我的京剧艺术就够

我现在和国内的京剧界还有联系,国内有的京剧团还要我做了他们的‘名誉董事长”，国内给我的各种邀请也很多，不少人随时欢迎我回去演出。我想我会在美国再做出点成就出来，带着我的外国学生一起回去，让大家知道我出国这么多年来究竟在做些什么。

当然我现在的合同还很多，这种情形之下我实在走不开，回不去，就只能等一等再说。

回想当初，一开始到美国来的时候我虽然意识到可以在美国开创自己的京剧事业，但还是心里有些打鼓，觉得美国又没有剧团，更没有谁能来领导我，不知道京剧应该怎么推广出来。当时，我脑子里还存有在国内时的框框，认为首先应该有个剧团，首先应该有个人来领导自己才能办成事情。但是到美国来之后我才知道，我实在是应该自己领导自己。

这一点在我来到美国后没多久就明白了。我直跟自己说：国内现在什么事情都讲改革开放，我到美国来也是一个“大开放”，没人管你，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去跑，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过问。比如即便是普普通通的演出活动其开销也很繁琐，什么场租费、灯光费、音响费、后台工作人员的小费、演员的吃喝等等都要我自己亲自过问和打理。出国前，我在中国也搞剧团承包，但是我的上面还是有京剧院领导我，演出完上交多少钱，大家分多少钱，我也都会报给剧团去，在美国，没人管你。

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我终于走出自己的路了。今后，我还想在美国推出一些新剧目，把我们的演出做得更好，就好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架式，先从华人社区开始，逐渐扩展到大学里，然后再扩展到美国社会。我相信这样坚持下来就会在美国普及京剧。

我常常觉得在美国的事业就要这样开创，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做每一件事情，千万不要三心二意，有些搞京剧的人到美国来急得跟无头苍蝇一样，一会儿去唱戏，一会儿又不唱了跑到餐厅里去打工了，这样就不行。

再有就是：你要忍耐，对自己要有自信：即便情况不好的时候自己的目标也一直要明确。我不会每天想着自己眼前的生活，生活中我从来不是一个在乎钱的人，这个月我赚的钱多了，就请朋友们来吃喝一通；赚钱情况不好的时候，我也不会感到太难受，够打平自己的生活费用就觉得满足了。更何况，有钱的时候我还会添置一些我们演出的道具，剧团的道具中有一部分是自己买来的，我们就是这么一点点地扩大的。我就这么积累着，等待未来更好的时机。在华人社区演出的时候我等待好一点的时机，在大学讲课的时候我还是等待更好的时机。现在，来敲我的表演之门的人都已经是美国人了，我还是要沉得住气，等待有名的美国剧院来请我，那个时候，去大剧院演出，不是要我自己拿钱出来的，而是别人花钱来请我们。

未来，我们最大的愿望是剧场里定期演出，这样相对要稳定一点，可能

我们这三个月专心演出，下三个月我们就专心搞剧本，再三个月我们就可以专心排练。这样，美国的观众可以比较固定地看我们的表演，我的团员们也可以不用再去打别的工。

我这一辈子运气不错，小的时候到北京去演出就得到过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肯定，这一关我就过了；后来我参加汉堡戏剧节又拿了一个冠军，到日本去演出又拿到冠军；现在我到美国来，经过一番努力已经站稳脚跟了，又是一个“冠军”。

这一辈子，我感觉自己一直幸运。

我信这话：一个人，十年不晚。

陈燕妮思绪：

感觉中她和你总是陌生，间隔的大概是她总是为之的京剧。

写她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两次之间间隔了三四年的日子，她还是昔日的相貌，但是却已经搬家。找她的第二个家颇费周折，在她们家的大区域里弯弯绕绕地摸索了很久才见到她从自己的房后操着把中国长刀、穿着件美国 T 恤燥热地闪了出来。

她自信，语句大多数是论证和结论性的。一席活谈下来，她告诉你所有的毫无疑问。

他们夫妻状态恩爱，她的一些眼神就能够达到无数效果。她先生丁梅魁一看便知是她最得力的扶佐。他也是京剧演员，唱武生的，后来兼学过导演。来美国之后为了齐淑芳能更好地与外界沟通，他学开车，也学英文。

对他而言这其实是项为难之差。他在国内从来没学过英文，但一番硬逼下来竟也暴露出他在这方面的天分。到美国之后他大着脑袋学习大学英文课程，结业的时候竟然辽考了个 65 分，连老师都惊讶他的这个成绩。

现在，经营这个剧团他们夫妻有明确的分工，丈夫是做对外联络的，话虽简便，事却在在都是沟壑丛林；妻子搞剧务、修改剧本、设计唱腔，属于有难度的高瞻远瞩。

也恰好，各善其事。

.521.进得他家，你坐下来，无处不在的“京剧”慢慢围绕上来，满墙都是齐淑芳有舞台剧照的姿态。京剧，那是他们的全部。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在紧张练功，房子后院的一块地毯上，他们把满装着京剧锣鼓的小小录音机猛地一打开，夫妻俩神态令我陌生地冲入其中，就是一处无人之境。

她在美国不讲国际而讲固执，也确实因为艺高人胆大，硬是挪出不少缝隙。

而且整日操练，锣鼓声声。

无暇旁顾。

张利

张利背景

自幼喜爱舞蹈，1973 年 8 岁时进入上海舞蹈学校学习，专攻古典芭蕾。1979 年毕业后进入上海芭蕾舞团担任主要演员，曾多次在《天鹅湖》、《唐吉柯德》、《吉塞尔》等大型古典芭蕾舞剧中担任主角，并曾多次代表中国出访法国、苏联、新西兰等国家，为中国国家一级演员。1988 年参加法国第七届国际古典芭蕾舞比赛荣获双人舞金奖和独舞最佳女演员奖。

1991 年赴美进入旧金山芭蕾舞学院学习，后考入洛杉矶古典芭蕾舞团担任主要演员。

1993 年 3 月，在洛杉矶开办“ 张利芭蕾舞蹈室 ”，教授芭蕾至今，成为洛杉矶第一个开设芭蕾舞学校的中国大陆舞蹈家。张利录音——

当年我进入上海舞蹈学校的时候，年纪很小，当时国家每月给舞蹈演员的待遇不错，我就报考了这个学校，因为想进去学跳舞的人很多，我进去得很不容易。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芭蕾舞团，这个团是大团，有一百多个演员。国内舞蹈学校一般是六年就会培养一批新人出来，年轻的舞蹈演员一批一批地毕业，我们每当看到年纪小的演员出来了就会觉得很可怕，为自己的未来担忧。特别是一些群舞演员，马上就会面临被淘汰的问题。后来，我到国际舞蹈比赛上参赛，得了奖，得奖的时候我已经 25 岁了，这个年龄距离国家规定的得奖、比赛的最后年龄已经很接近，是最后一轮了，我赶上的是末班车。这时候的我开始想到外面去看一看，希望学一点新的东西，正好我认识一些国外芭蕾舞团的团长，他们就给我发邀请信，并且给了我奖学金，希望我能够到国外学习，手续办好之后，我就这样出国了。

我到美国来拿到的是旧金山舞蹈学校最高年级，也就是八年级的奖学金。我在旧金山学了一个学期，一直很想进入美国的芭蕾舞团，但我来美国时已经是六月份了，错过了美国每年三四月份各芭蕾舞团招考新人的季节，所以相当遗憾。

我当时已经 28 岁了，在旧金山舞蹈学院里是年纪最大的一个学生，我的同学都是十几岁的人，我觉得自己很无聊。幸好九月份的时候，我通过朋友知道洛杉矶舞蹈团在招考新人，我去应考，结果一下子就考过了。这样，我就不读书了，一直在舞蹈团中工作了三年。

美国的芭蕾舞团结构非常松散，演员在练功方面非常舒服，常常练一小时就休息十几分钟。相比之下，中国的演员就非常苦，在上海时，我们这些演员每天都要练六个小时以上的功。对于美国的松散型练功方法，我感到很不习惯。

但是中国大陆的舞蹈演员也有自己的短处。我们以前在大陆作演员，基本功虽然都很扎实，但是眼界不够开阔，也缺少好的舞蹈，跳来跳去就是那么几个舞。不像在美国，团里每年的舞蹈季节都要换节目，大戏也是每年都换。团里会出钱请来纽约或者其他州甚至其他国家的专家来教演员们跳新的舞蹈，洛杉矶团就常常请专家来教舞，比如请纽约 ABT 的演员来讲课，苏联的专家也常常来教课。

美国最近一个时期内经济一直不好，洛杉矶舞蹈团的状况也十分不好，作为演员我们和团里只能签半年的合同，剩下的半年团里就放假，让演员自己找工作去做，这对于我们舞蹈演员来说情况非常不好，因为我们很不适应

放弃半年不练功，半年后再上台演出的工作。我在洛杉矶芭蕾舞团里待了三年，一直感觉很可怕，团里通常不会告诉你下一次团里还要不要你，演出季节完了之后只说是要放假。然后再一次的演出季节到来时，你必须自己给团里写信去问，如果他们愿意要你就会给你寄新的合同来，然后再让你去面试，重新考一次。

每年的三、四月份是美国舞蹈团招人面试的季节，考试的地点一般就设在舞团内，团里会在报纸或者舞蹈杂志上刊登广告招人。

舞蹈团招考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应考，每个参加考试的人都必须别上一个号码，舞团指定的老师统一给考生上一个半小时的芭蕾集训课，然后每人跳一段舞，团长一一看过来，最后给你一个合同书。美国舞蹈界对于身高体重的方面比中国要求要高一些，美国男演员通常很高，因此女演员的身高通常要求在一米六六以上。

我第一次参加这种考试的时候大约有四十多个人应考，但是只录取三个人，竞争非常激烈。当然，团里最终发给你的合同书你可以签，也可以不签，你也可以选择去别的团工作。

美国对演员的录用制度比较灵活，采取演员去考团的途径，今年你是演员，明年就可能换了面孔，团长喜欢谁就会让谁到团里来。而且，团里对演员挑选的口味也随着时间有所改变，今年可能是苏联人比较多一点，明年就可能是加拿大人比较多，如果你在这个舞蹈团里停留的时间可以比较长，就可以从不同国家的人身上学到不同的新东西。特别是主要演员，我们团里几乎是每年一换，换下来的人可以到别的团里去再当主要演员，来去自由，相当灵活。

舞蹈演员这个职业在美国并不是一个好工作。美国舞蹈演员的薪水分很多档次，一男一女两个最主要的演员薪水是最高的，我不知道我们团的演员薪水在全美来讲属于哪一个层次，我们团最高的主要演员大约的薪水是五千美元一个月。在这期间他们也可以到外面去演出，单独按场开价，有时一场就能拿到三千元。然后就是独舞的演员，独舞演员中也要分好几个档，在然后是群舞演员，这部分演员大约每月工资只有一千八百块左右。但是如果今年的合同只有六个月，那么团里就只发你六个月的薪水。美国舞蹈团往往很早之前就把第二年的节目排出来了，如果你的演出任务吃重，团里就会多给你一点工资。

在美国，舞蹈流派比较杂，有丹麦派、英国派之类的，我曾工作过的洛杉矶团比较喜欢苏联的训练方法，团里主要演员中有很多人是苏联演员，但是群舞演员中几乎没有苏联人。同在一团的苏联人基本上在自己国内就已经很熟悉了，彼此都是熟人，他们中不是基洛夫芭蕾舞团的就是波西芭蕾舞团的，这好像是我们中国演员在国内要么就是中央芭蕾舞团的要么就是上海芭蕾舞团的一样，苏联人彼此认识，大家互相之间也相当帮忙。中国大陆的训练一套教育大纲基本上全是苏联的，属于力量型，我想大概也因为我是使用了苏联的这一套教育大纲学成的缘故吧，总之我比较幸运，每年考试都会被选中。另外，美国的每一个团里都需要几个东方面孔，有的舞蹈剧情也需要有东方面孔出现，我相信这也是我能够总是得到机会的另外一个原因吧。

我是我们团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演员，除我之外，我们团里的亚裔演员还有一个是来自菲律宾的。

美国舞蹈团人员非常精简，除了演员之外，团里没有请什么道具、服装

之类的闲人，行政人员也不过是临时请来几个人做一下工作而已，不像中国舞蹈团里各个部门都十分齐全。

在中国，一个芭蕾舞团里的演员基本上是不换的，当年我们的上海芭蕾舞团一年到头就是这些演员，如果需要新人就得等六年之后毕业的新演员再分上来。在国内，芭蕾舞演员可以跳到三十多岁，但是理论上虽然这么说，到了这种时候领导上已经不那么用心地培养你了，舞蹈演员的舞蹈寿命一般到 35 岁时就差不多了。因此在大陆，芭蕾舞演员一到 30 岁以后，自己就很担心未来的退路问题。

而在美国，舞蹈演员只要能够跳得动、自己的体型和基本功如果也都还能保持住，就可以一直跳下去。我在美国看到很多好老的人，大约 40 岁左右的人还在跳舞。

当然，话说回来，这样年纪的人还跳舞实在很辛苦。

当年我出国时也有这种顾虑，我是在 28 岁的时候才出国的，当时一是面临着年龄的问题，二是确实也想能够学一些东西回国去当教练。

但是真的到了美国之后，面对这种艰难的舞蹈就业状况，我不得不给自己寻找退路，从这时起，我就开始一边工作一边教舞。

我想我的舞蹈教学工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刚开始时我是到学生家里去教课，慢慢地学生多起来，一直积累到有 30 个学生的时候，一些家长就开始鼓励我自己出来办一个舞蹈学校。我这个人胆子比较小，不敢自己开学校，但是耐不住热心家长的一直鼓励，我就开了“ 张利芭蕾舞蹈社 ”。

这样，我就放弃了在舞团的工作，专心教课了。

美国的舞蹈学校很少，我在舞蹈团里当演员的时候也看过别人上课，外国人教舞和到舞蹈团跳舞一样情况，他们对练功等方面的要求非常松散，你喜欢跳、你又有钱他们就让你进学校去学习，他们的重点只是培养你对舞蹈的兴趣。

529

我是一个靠苦练成才的专业演员，一开始我不能适应美国的情况，即便是我自己的舞蹈学校开了之后，在招生中，如果有我看不惯的学生，我就不会招进来。但是，我的学校开始全面运营之后，几个月下来，我的想法马上就起了变化，因为你如果不招生就会没有钱，没有钱你怎么继续办学校？所以，现在的我在招生过程中已经变得圆润多了，现在我只能在进来的人中挑选认为有前途的学生多加培养。我的学生中虽然不是个个未来都是要当专业演员的，但是如果条件比较好的，还是可以进入艺术高中或者大学深造的。

积累到今天，我现在已经有一百多个学生了，每天我要教课四、五个小时，一个班通常是十个人，我一个班一个班地轮流教。周末的时候我的课时更多，一天下来大约要教六、七个小时。为了认真以对我的工作，每天我都需要备课，还要自己编一点舞蹈，每天上课的时候我一般采用半个小时练基本功、半个小时和学生们一起跳的做法，出一个动作我先示范一下，然后由学生们自己跳。

我的学校在收费方面和美国人开办的舞蹈学校收费情形基本一样，一般分团体班和个人班两种，团体班人多一点，平均每个人八块钱一个小时，单独课因为属于个别辅导兴致，因此收费会高一点，大概是三十块钱一个小时。美国人的舞蹈学校收费基本上也是这个价钱，但是他们的程度比我们的慢，很多学生家长明白这种情况之后就纷纷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来。之所以出现

这些问题，和我刚才说过的美国人不受刻苦练习有关系，一是舞蹈学校的教师们很注重让学生们歇着，父母对此常常有意见，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地把孩子送过去但是老师就只是让他们在那里玩一玩就回家了。二是在洛杉矶家长和美国教师在沟通方面有很多问题，因此家长要想和老师有更多的交流还是需要找华人老师教课。

在美国的华人家长实在是很舍得在孩子身上花这种钱的，我们这里的孩子每周要到我这里来上两次课，每次都要家长开车接来送去。

算起来，我的学校里的儿童学生占大多数，他们大多是六岁到十五岁的人。办学这么久了，我已经积累出很多经验，如果你招收一个新班，开始一两个月的时候学生的流动性是会很大的，但是你如果坚持超过三四个月之后学生的状况基本上就稳定了。我的一百多位学生中，有六十多位是“老学生”。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是来自大陆移民家庭，但最多的还是台湾人子弟。现在在海外，如果谈到专业方面的事情，尤其是舞蹈专业，台湾人一般还是比较相信大陆教师的，因为他们认为，大陆上的专业人士即便没有得到过奖，也是很专业的。再说我曾经得过奖，他们更会比较放心。

这么长时间下来，我和学生的家长们相处得很好。开舞蹈社的最初，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人打交道，常常觉得这种事情实在很烦，认为有的家长一点也不懂得专业知识还要指手划脚，后来我经历的事情多了，再加上有朋友从旁告诉我，我才明白，我必须先和家长们搞好关系才行。

在海外做事，我已经深深知道，这个社会对你的做人方面是有所要求的，你人缘好的话，别人会愿意和你交朋友，他们也自然会把自己的孩子放心地交给你。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埋头教学，和过去中国同行的来往不多。但是我知道我的同行中，普遍来讲男生在美国发展得比较好一点，因为美国的男演员相对比较少一点，竞争也比较少，因此，我在中国大陆认识的一些男演员在美国舞蹈团中担任主要演员的人比较多。

而女演员方面，我认识的同行已经几乎没有人在跳了，有不少人是嫁人出国的，一来美国就已经不跳舞了，其它的人从打餐馆工的到做珠宝生意的干什么的都有，层次很不同。也有个别演员和我一样收一点学生，讲一些课，但是他们多数是到学生家中上课，或者自己借教会的场地教课。当然，在我们这个舞蹈教育行当里，如果是上门教学，收费就会贵一点。

在美国做舞蹈教师其实也很累，首先是美国对孩子们的人身安全要求很高，作为舞蹈教师你一边跳一边还得一直盯住孩子们，不要让他们扭到脚了。我虽然也已经为此买了保险，但我仍然十分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而且我上课从来都是十分投入的，因此每天教课超过六个小时实在是很累。不光如此，每年我都要教给学生们一些新的舞蹈，因为我的这个舞蹈学校是一个业余培训学校，因此，老是让学生们随着教师光练基本功就显得十分枯燥，如果是纯粹地教授专业舞蹈，那我在提高学生的学习趣味上要少费很多心思。

这么多年来，我们的舞蹈学校每年都要搞一次汇报演出，前几年都采用表演小节目的方式演出。但是今年开始我有意识地选择一些比较有剧情的舞蹈片断作为汇报演出的主要内容，比如说《天鹅湖》，我就选了二幕和三幕；《葛蓓莉亚》就选择第一幕，这些舞蹈片断中的动作相对简单，我的学生们都能跳。学生们跳舞还是穿软鞋，没有穿足尖鞋，这样跳起来不会非常吃力。足尖功是需要下力气去学的，足尖班我现在也开始上课，但是不是那么普及。

因为足尖的功夫一上来，对舞蹈动作的难度要求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一般学舞蹈的学生大约三年之后才可以练足尖功夫，这在大陆也是一样。

我开自己的舞蹈社已经三年了，到了今天去看未来，我想我还可以发展。今年以来我把我们舞蹈教室隔壁的房间也租下来了，这样，学校的面积扩大了一倍，我准备建立另外一个舞蹈教室，扩大教学。我先生当年在国内也是专业搞舞蹈的，我想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两个人一起教课。

另外，在未来的发展中，我还想找一些美国人做助教，这样，我们的教学力量就可以比较平均一些。我估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招生人数能够很快达到一百五十多名。

我去年回国过一次，我听说大陆方面现在有国际儿童舞蹈节，我想我的学生们未来一定可以代表我的舞蹈社去参加这些儿童们的节日。

我在美目这么多年来一直围绕着“舞蹈”在做事，没有做过什么其它的工作，工作中也没有碰到过什么太大的困难，我的美国经历单纯而且幸运。

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份单纯和幸运的。

陈燕妮思绪：

除了教学之外，她说自己现在每星期还练两次功。她的身材果真基本没有走样，在美国的“牛肉环境”中能保持这种程度的优雅，实属不易。

采访她的时候，她正在教一个中年妇女跳芭蕾。她们两人简单地穿了一些舞蹈和日常交杂的“穿帮”服装，在大约三十平方米的教室中飞来飞去。看得出这个“三十平方米”是一个承载过很多传授和温习的地方，她们脚下地板的木纹已经斑驳不清。

当然非常的日积月累。

她用专业的、英文的、外行人无从听懂的一些说法告诉那个妇女各种姿势和事项，对方则一本正经地听和学。可能是因为有我这样一个生人在旁外行地观看的缘故，这妇女虽然算是落落大方，但却一直腼腆地笑着。

张利神情专业，一脸汗珠之下，很多神采。

后来才知道她的这个学生是一个刚生过孩子的女人，找到张利来孜孜一学，完全为的是产后恢复。虽说纯是指望恢复，也算是单人辅导，为了学校的生存，张利一样收费不菲。她告诉我她在美国如果还想继续自己的舞蹈专业，如今的选择已经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她的新办公室才刚租下来，和隔壁的旧教室之间打通了一个大大的玻璃窗，彼此沟通，张利说：“也可以方便大人看到自己孩子在如何上课。”

这个大窗非常奇特，站在那里，你可以想象很多很多，一旦张利一脸严肃地开始动作，家长和孩子之间无从割舍的嘈杂和关注，都存在这里了。

这个新屋子正待粉刷，空无一物，很多簇新的灯光、声响器材放在屋内的地上等待安装，在这个空荡荡的环境中，她小小的个子显得单薄而吃重。

张利长相恬淡而巧妙，教室的墙上贴了大大的一群照片，那上面全是她瘦小的“天鹅”学生，有足尖的，也有不足尖的。这当然是她的延续和伸展，回说以往，她很满足，直到为她拍照时，她也坚持要站在这批照片之下。

她不施粉黛，轻轻地站在那里，心满意足的她一望便知已然心无旁骛。

欧阳小虎

欧阳小虎背景

1986 年 15 岁时做为大学少年班成员，由湖南省保送就读于全国十所重点院校中北京师范大学少年试点班，攻读化学专业，1990 年 20 岁时毕业。毕业后回到家乡湖南省郴州市，在郴州师范专科学校担任教师。

1991 年 7 月拿到美国方面的全额奖学金赴美进入纽约 API 理工学院，后于 1992 年 1 月拿到全额奖学金进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物理专业，1995 年 6 月份 24 岁时硕士毕业。毕业后经历过各种在美国社会寻找工作的艰辛，最终于 1996 年 3 月进入拥有五千多名员工的美国 AMGEN 药物制品公司工作。

欧阳小虎录音——

我大学毕业后，我哥哥已经到美国了，我知道自己也能到美国去，就一直没有放弃英文学习。

毕业差不多满一年的时候，我真的得到奖学金到美国读书来了。最先的时候我是在纽约的 API 理工学院读书。其实这所学院曾经也很风光过，是美国东部最老的一所理工学院，当年二战的时候搞导弹研究，它是和麻省理工学院齐名的大学，后来因为这个学校比较清高，慢慢结束了在军火方面的研究，因此，后来它就不行似是我在这个学校还是没上多久就转学到芝加哥大学读书了，我当时的想法只是意识到自己在美国应该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就转学了。等到我真的在芝加哥大学开始学习生活的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名牌大学的教育状况果然与一般院校大不一样。在芝大，经过严格的要求，我的学业在各方面都提高了很多。在我心目中，芝加哥大学是美国数三数四的大学，其实，这个学校在真正的美国学校排名中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在纽约和芝加哥的大学里拿的都是全额奖学金，但我并不觉得这是对我学习水平的一个肯定。对于这一点，我觉得好的大学是需要好的学生，反过来说，最好的人不一定能够幸运地进入最好的大学，关键是要看机遇。

我就是有点属于有点机遇的。当时，我哥哥已经在芝加哥大学读书了，学的是我后来进入芝大所学同样的系，主要做的是医学成象，搞电脑操作。我哥哥因为人头熟，所以为我引见了一些教授，这使得我能够从很早开始就可以和他们保持交流。他们觉得我是一个聪明人，表达能力也不错，对他们所研究的项目也是会有好处的。

我真正在学校里读学位的时间是两年半的，中间，我曾经到有关的公司里去做过实习生。在芝加哥的日子里，我做过两次实习生，中间也回过中国一趟，在快毕业前一年左右的时候，我开始为自己找工作。

这是我生命中一段艰难历程的开始。在美国这么多寻找工作的日子里，我感到自己的观念转变了很多很多，对美国的看法和对人生的价值也有了一番新的认定。

在美国，在我的同学里，其实大多数人都是能够找到工作的，最难找工作的是已经拿到博士学位的人。美国的博士实在太多了，而且他们基本上做不了别的实际事情，只能到学校里去教书，范围很窄；而大多数硕士会在工业类公司内找到工作，比如计算机公司等注重操作的公司。

我们这个行业里的新人一般会进入一些制药公司，但是现在美国经济不好，已经没有什么别人找上门来的事情，整个就业市场已经基本上形成大家都要自己出去找工作的局面。我也知道美国的就业市场曾经有过很好的时

候。像我做的这个专业，1982 年的时候很多学生一毕业就能拿到基本已经内定走向终身教授的助理教授职位，这在刚出校门而想继续做学问的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很高的职位了，现在，他们中间的很多人确实已经轻松地成为终身教授了。

美国这个地方工资是有等级和行情的，除了地区的差异，薪水一般是有一个大致标准的，但就看你有没有得到工作机会了。这就好像是做美国总统一样，做了总统的人就会拿一个固定的薪水，但是这个位置却只有一个。

在美国找工作的难易程度基本上是要看专业说话的，芝加哥大学这种好大学里也有学神学的，但是他们之中有太多的人希望尽快地能够去读别的专业；相反的，一些很不好的学校，即便学校的名字很多美国本地人都不知道，但是学校内学电脑专业的人也有在微软这种好公司里找到工作的。

在当今的美国市场，依我的看法，计算机行业仍旧是热门行业，这个行业不一定会有很高的薪水给你，但是总是有工作给你。在芝加哥，我随便参加一个什么舞会，随便一问，大家都是在做计算机的，而且很多行内人跳公司跳得很频繁，有的人在这个公司做两个月就转到另外的公司又做三个月，只要新公司能给他涨工资，他就会过去。

除了计算机行业，第二好找工作的就是会计行业，美国的经济非常需要这一行。更何况这个行业还有自己开业的机会，如果你考过美国会计师资格考试（CPA），你就可以自己开业做会计师。但是会计行业也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你必须为美国六大会计事务所工作过，自己出来做才可能拉得到客人。

这几年来我一直觉得美国的这两个行业是最好找工作的，在.541.美国，随便你翻开任何英文报纸，里面招工的广告基本上都是这两个方面的。再有的缺人专业就是护士等专业，对一般的人来说比较不适合。

其实，我真正开始为自己找工作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了，大约在快毕业的前一年我就开始向外面发我的自我简历，这也是在美国找工作必须经过的步骤。在这方面我是完全的单打独斗，什么靠山也没有。美国的一些做博上学位的人，他们的导师可能会帮助他们找工作，但是硕士学位的人，导师基本上是不会帮忙的。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尤其到最后一年时，大家业都开始谈论未来就业的资讯，比如说各公司的状况、薪水的水平、未来的前景是怎么样的等等。

我那个时候是把《美国公司名录》一类的资料以及各种报纸和刊物广告上的所有招工消息全都找来，向只要认为有机会的公司寄发自己的个人简历。一般和我们专业对口的制药行业是有各种专业杂志的，杂志后面常常有各种招人的广告，这是寻找工作机会的一个比较原始的手段；另外一种找工作的方法在美国属于比较新的方法，那就是在电脑中的国际网路中寻找就业信息，但是这条路上走的人很多，因为这很方便，你可以把自己的自传打在电脑里发出去，不用你写信和贴邮票。但是认真说起来，我个人的就业问题并没有从电脑网路中得到很大帮助。

在学校的时候，我曾经利用实习的机会到美国的大公司里实习过，这对于我后来寻找就业机会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后来，在我真正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有些公司的主管告诉我：之所以我们公司愿意请你来面试，就是以因为你曾经在两个比较著名的公司里做过事。他们告诉我，一般而言，公司是不太欢迎刚刚走出校门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过的学生的。

说实话，我当年得到进入大公司实习的机会也是很偶然和幸运的。一般

来说，工业界对于实习生的录取率大概以只有百分之五，但是当时我实在对实习和工业界的情况不懂，就随便乱发了一个东西给企业，对方就说“你可以来实习了”。

说老实话，等到我真正去实习之后才知道对方是要给我钱的，我第一个实习公司是我最难忘的地方，这个公司位于芝加哥北郊，公司里给的钱也非常可观，三千块钱一个月，听到这个钱数我一下子惊在那里，一直在美国做学生的我觉得这是很多钱，我当时做学生即便是全额奖学金一个月也才一千多块钱。

可观的事情后面还有。等到我正式到那家公司去实习的时候，搬自己的东西到公司告诉我的住处，我一到那里就问管理人员我什么时候要交房租？但是对方说，你的房租公司已经包下来了。

从那以后我下了决心，毕业后一定要到工业界工作，我不管名声是不是好听，总之工业界这个地方是有钱的，待遇好，环境也好，不像在学校里动不动就没有钱，什么实验也做不了。

在这个实习公司里我认识了很多人，比较高潮的是，我曾经为他们做了一个发明项目，这个项目是他们一直没有证实出来的东西，但是被我证实出来了，公司非常高兴，曾经说要给我五百块钱他们公司的股票。虽然对这个允诺他们后来食言了，但是后来他们一直为我写很好的推荐信，这对我后来找工作也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没有能够留在那个公司里，因为那个公司一直在裁员，为了改变药价太高的状况，他们一直在想办法削减自己的工作人员，当时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实验室同事，已经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被请走了。所以，我从根本上失去了留在这个公司的可能。后来我知道，实习其实是一个很好地留在那个公司做事的开端，只是可惜我自己没有在这里面得到好处。

在这个公司实习之后我就毕业了。我是不想去继续读博士的，我实习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博士同事告诉我，“不要去读博士，因为博士出来在美国只比硕士多一点点工资，但是身上的责任比硕士要重很多，工作也累很多。”

我就一直坚持自己旷日持久地找工作。

从我向外面发出第一封信开始，我大概一共发出了超过两百封自我推荐信，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回音。对于这个“没有回音”，我虽然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这种状况也的确使我非常失望，我在学校里和实习的公司里都比美国人做得好，但是等到我需要找工作的时候就是没人愿意回我一个电话。

我已经有经验了，通常找工作的时侯，你如果接到的是一封信，那多半是拒绝信；如果你收到的是一个电话，那则多半是一个有希望的电话。在这个漫长的找工作过程中，我的花费不少，邮票钱就是一个项目，然后还有自己花钱买机票去面试之类的，非常多的心血和财务放在里面，我前后大概花了有两千多块钱，这对一个没有什么钱的学生来讲是一个大数字。我直到现在一直还是一个欠了别人债的人。

我当时甚至想到过要改行，觉得实在不行是不是可以改学计算机，我当时已经拿到很多计算机方面的材料，或者我想要不就回国。因为我如果在美国不能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宁愿不在这里呆着，不然我就会有一事无成的感觉，好像自己在社会上没有发言权。

后来我曾经在中文报纸上找到一个华人经营的有关公司，他们要招我这样专业背景的人，我就去应征了，但是他们给出的薪水只有一年两万七千块

钱，比我现在找到的美国人公司低了将近一半。中国人的公司知道刚走出美国校园的学生需要借助于工作的关系依靠公司办绿卡，因此往往拿住这一点。

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两天，觉得自己还是不行，我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在这里浪费时间，哪怕是浪费几个月的时间我也不愿意。我暗自下决一定要找到一个好工作，我就是借钱、打工，也要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我找工作找到最困难的时候，连买车的贷款都付不出来，我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只好打电话给我哥哥，问他借钱，因为那个时候我想即便是把自己的车子卖出去也一定会亏很多，因为人家知道你需要钱就会卡你的价钱，如果你付不出贷款来，银行就把你的车拖走了。

我那时时常自己跟自己说：顶一顶，顶一顶，会有好消息的。但是说句实话，到最后，我顶得自己都没有信心了。

再后来我因为有点顶不住了就到一家中餐馆打工，那时候没钱进帐，车钱也付不出来，我到那家餐馆里去问他们“你们需要人手吗”？他们当时就让我到那里去工作。我的工作是送外卖，每小时五块钱，小费自己留下，讲明以后还可以加工资，一天工作十个小时。

我在那里干了两个星期，就觉得自己实在受不了了。我在那里什么都干，这个餐馆是一个夫妻店，我帮助他们干所有能干的活儿，扛牛肉、扛菜、切菜，我后来包一个炒饭的锅子，我的厨房手艺开始变得很好。

即便在这种时候我对自己未来的前景仍然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我自己如果现在不能达到现在的计划，今后的每一步计划也会都推迟或者达不到了。

其实，在这个漫长的找工作时间当中，我也是有几次机会的。出了校门的学生在美国找工作，费用问题是不太一样的。找工作过程中，大公司基本上是会提供你路费的，这是一个标准的程序，公司会为你买来回飞机票，并为你租一辆车子和一个旅店房间，请你前往面试你的一个来回中公司大概要在你身上花一两千块钱。当然这算是一种破费，但是他也可以得到一些旁的好处，比如说，这样的公司他的名声也传出去了，说是这个公司很慷慨、待遇不错，好学生也都愿意来。

我现在已经开始上班的 AMGEN 药物制品公司当初在我来回应征的时候就曾经结过我很好的待遇，比如说为我花高价买来回飞机票，在饭店里帮我租的也是一个套间，非常大，我好像农民进城一样，感觉非常别扭，觉得有点浪费。

当然也有很多情形是我自己花路费去面试的，有时候非常丧气，甚至在我自己花钱去面试了之后也得不到任何回音，这是真的是要看运气。

我最早得到的一个机会是在美国东部的康州，公司位于一个叫做“纽海兰”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大机场，我坐飞机到那里之后还要转坐出租汽车去公司。那天天气非常冷，我被冻得哆哆嗦嗦的，下飞机后转坐出租汽车，碰上的这个出租汽车司机是个印度人，我一坐上车就和他聊天，他说自己是印度科学院的一个硕士但是现在不得不在美国开出租汽车，我顿时觉得他太惨了，连带着觉得自己的希望也非常渺茫。

我去的这家公司是一个小公司，刚刚起步，是做神经方面药物的。这是一个耶鲁大学的教授想做点教学之外的事情，就找了一些人来投资做药物研究。我看见公司的第一眼感觉比较失望，这家公司的办公室好像是一个破工厂的厂房，里面有很多中国人在做事。我希望大家不介意我看到有很多中国

人在做事就自然产生的这种失望感觉，因为我觉得，凡是中国人比较多的地方，我总是感觉到公司是对中国人有所图的，他们可以利用给中国人办绿卡的机会，付给技术人员非常低的工资。

但是我还是精心地准备了自己随之而来的面试。

通常的面试情形是这样的，你要面试的那天早上起来梳妆打扮自己一下，简单地做一些服装调整，最好不带领带扣、戒指之类的装饰，穿着以简单为好。曾经有男人去面试的时候洒香水，但是结果非常不好。

这些事情做完之后，就开车到公司去。进入公司门后的第一件事情，你要告诉秘书说自己是来应征工作的人，秘书就会为你打电话上去，通常这时候来见你的第一个人是人事部门的人，他们会给你填表格、为你定薪水，这些人基本上是不管技术的，他们和你交谈只是看你的为人和你的举止，看看你自己是不是有很坏的生活特点，所以，在这种时候你的举止细节上要特别注意，尽量不要让他们感觉不舒服。

在接下来的一整天，你就要和搞技术的人聊天，通常的方式是你给他们做一个技术讲座，你多半是放自己早已准备好的幻灯片。我的幻灯片是当年在学校里做的，全部是自己做，讲的是科技题目，你也可以把自己的硕士论文拿出来讲。

在这个阶段，你必须有重点地挑出问题来说，因为幻灯片大约只有十几张的约定俗成的限制，片子千万不能太多，主题也千万不要太深奥，把越复杂的问题讲得越简单，越好。很多人在这个时刻故意将自己的东西讲得很复杂，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忌讳，很多参加面试的公司技术人员是最不喜欢这样的。这个讲座非常非常重要，公司方面会根据你的讲座一天之内就为你定了调。

然后你再分头与一个一个人见面，这里面包括你未来要去的部门主任、副主任、分组主任甚至一些和你背景类似的同事之类的人，基本上是每个人半个小时。

这样一天下来是很累人的，因为每个人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关心的是你这个人怎么样，关心你是不是对大家比较好；有的人关心的是你的技术，他们会给你提很细节很细节的技术问题，比如他们会出个题目让你回答，你如果答不上来就不太好。

根据一贯的作法，我在这个公司里也为他们做了一个讲座，讲自己过去曾经做过一些什么东西，然后由他们提问。我觉得我的这个讲座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但是我想我的失策是在后来。后来，在随便聊天的时候他们问我：“你以后还想继续读书吗？”我随口就说：“有可能，我现在还在申请一些好的大学里的研究计划。”

我后来想，这个回答很关键，而我明显是答错了。这种面试中，很多问题都是在不经意的问答中得到结果的。

我的结果就很不好，他们最后拒绝了我。我回到芝加哥之后，他们甚至没有打任何一个电话给我，这是比较少见的。

事实上礼貌的程序应该是：等到你面试之后飞回到自己遥远的住处之后，公司方面会再电话通知你你究竟有没有被录用。但是我这个人一般来说是看得出来自己状况的。我在面试当天就可以看得出来我究竟行不行，如果公司的人告诉你：“我看你比较有希望”，那就意味着你有可能是可以的。最后真正确定下来，还是要由公司的人专门汀电话通知你。

当然，最后还是要看公司和你签订的合同上的条件，通常公司给你的薪水比你想象的要低，你必须把他拉上去，这里面也需要很多技巧。

最最后要决定的时候是公司给你写一封信，信里把有关你的所有福利情况写在中间，比如你的薪水、福利待遇、有无人身保险、公司替不替你搬家等等。这个“替不替你不搬家”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是单身没有这种搬家的困扰，但是具体到了结了婚的人，这点就很重要，公司如果负责给你搬家的话会把你的所有东西包好运过来，然后再——摆放到你的新家中去，这其实是很花钱的事情。有的公司甚至会帮助新员工卖房子。

我的第二次比较大的机会是到同样是东部的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公司应征，这个公司是在《财富》杂志列一百名之内的大公司，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但是他们公司的人打电话来问我有没有绿卡，当我说“我没有”的时候，他们说“对不起，我们公司是不给外国人办绿卡的”。然后他很委婉地说“今后如果你有绿卡了，可以再到我们公司来工作”。

很多美国东部的公司都是以这样的一个姿态来对待员工的，而且越往东走这种情形就越严重。我不敢说这是种族歧视，但是他们对待外国人绝对没有美国西海岸的城市那么愿意接纳。

但是这种拒绝外国人的情况在计算机行业里就比较好一些，我的很多同学最后都进入计算机公司工作，每天的工作单纯是做项目，我不是太喜欢，因为这样的工作真的好像是做苦力一样。而且，计算机行业中的中国人实在太多了，现在，美国任何一个计算机公司的老板几乎没有不懂得移民法的人。我们的行业中，印度人也非常多，但是他们没有大多的移民人数，所以竞争力的构成有些不足，当然他们同样也面临着移民的问题。

在我的经历中，好的公司中，中国人还是不多，公司中出现的唯一一些中国人也是在美国出生的，讲一口地道的英文，除了可能是移民方面的原因之外，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那一阵子，我的感觉很不好，到手的工作就这样没有了。那种滋味是很难受的，我不比别人差，但是就因为我不是出生在这里的人，我就没有机会。我知道，如果我是一个有绿卡的人，我应该早就找到工作了，而且工资要比现在的公司还好，我肯定是会在新泽西州的一个大公司里工作，生活很舒服。说来说去，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学生，出来之后年薪一般都是不会低于四万块钱的，除非是学文科的人，一万多块钱或者两万块钱的工作也是有人愿意去干的。

从我毕业之后直到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之前，我去面试过的公司不下十个，我其实还算幸运的，很多人连去一个公司面试的机会也没有。面试常常是通过电话先进行的，公司里会打个电话给你，先看看你怎么样，然后再决定请不请你过去。通过毕业后找工作的漫长过程，我自己也成熟许多，很多东西你就是拿不到的，并不是你不行，只是因为你的出身。

今天的我已经进入美国 AMGEN 药物制品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位于加州的千橡市，有五千多名员工，公司自 1980 年创办之后成长非常快，从外观来看，公司的建筑楼群也比过去成数十倍地增长。在这个公司里，无论薪水还是公司规模都是我所满意的。

能有今天的这份满意，我知道得来不易。今后的发展，自然又是一个新的漫长过程。

陈燕妮思绪：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刚把家搬到加州来落户，一脸憔悴。听他说起自己过往的这些波折，听得有些瞠目结舌。

他说：“我的很多朋友告诉我，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千万要赶快定下来，然后就去上班，不然你越找到最后，就越没有自信心。拖得越长，对自己越不好。但是现在回头再看自己的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磨炼过程。我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十分紧张，但是磨炼到后来我觉得我甚至开始喜欢面试了，因为通过面试我可以和很多人接触，乐意卖弄自己的东西，这样的场面经历得越多，自己就越纯熟。”

面前的他已经俨然是一介面试老手，不禁替他想到这会是经由多少个希望和失望累计而成的甘苦之谈。他告诉我说，他的心得是，去面试的时候一定要面带微笑，和别人保持目光接触，这样可.以给人一种诚恳的感觉，让他觉得你说的是实话。

“但是，我朋友们的话中有一句是千真万确的：在美国，你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任何自信。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过我想到过回国，甚至想到过要移民加拿大之类的。美国总是说自己科学的人材很缺，但是我没有体会出来，没有体会到他们真的需要那么多人。”

他这个时候说起刚刚过去的夏季、秋季和冬季已经能够谈笑自如，过去一年这三个季节的交替，其实是他的一个再生与否的握柄。

他一身单薄，一个人行走，很中国色彩地竟真坚持了下来。

这个时候回头再看，替他一身惊悸。

李斌

李斌背景

1949 年出生于上海，初中毕业下乡到黑龙江省建设兵团务农，作为北大荒第一批油画家中的佼佼者，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美术展览。

1978 年经黑龙江省政府特批作为“特殊文艺人才”选调为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专业油画家，并任黑龙江省油画协会秘书长，1980 年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其与人共同创作的连环画《枫》、《伤痕》两次获得全国一等奖。1982 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进修班进修，创作出个人作品《油灯的记忆》系列组画。

1987 年赴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油画系研修，1989 年移居美国组约。在日本期间，他的作品曾在日本的“三越”、“西武”、“松阪屋”、美国的“SOHOSPACE”等画廊展出，作品并多次参加“佳士德”、“苏士比”国际拍卖会。

在日本及美国期间，他曾为许多知名人士绘制过订件肖像，如日本的岗琦嘉平太、台湾的朗静山、蒋纬国等，现为专业肖像画家。李斌录音——

我在黑龙江时，我是和同样在东北农场的女作家张抗抗等人一起经过省委特批调到省里工作的特殊人才，当时感觉很荣耀。我没有考大学，只是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农村户口转成了城市户口。

在国内画画，我想我的是靠画连环画《枫》起家的。画《枫》时候我们真是刻苦了一下的，这个作品我和我的创作伙伴一共三个人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告完成，也就是三个人三个月只画了一本只有三十几页的连环画，这个行业行情其实是可以一天画十张的，我们的速度之慢大概是史无前例的。但是我们做出来的的确是一个“细活”，听说当年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给导演系学生上课时也曾用这个连环画做教材，给学生讲蒙太奇的处理。

我来美国的经历和别人不太一样，我是先到日本之后再来美国的。我在日本曾经将签证延期一年，这之后，我就申请到美国来。第一次去美国领事馆签证的时候，我拿的是到美国留学的申请去的，签证官看了我的画之后说：“你根本不是一个学生，你的水准应产是访问学者的水平。”虽说这是一句恭维，但是他恰恰因为这个原因把我拒签了。

后来我利用到美国开国际会议的名义到美国来了，来到美国之后我就决定先留下来，这时是 1989 年 7 月份。

来到美国之后，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到哪个学校去学习了，我就在纽约住下来看各种博物馆。直到现在我也保持着当年的习惯，我现在的家离世界著名的大都会博物馆很近，我常常一个人去博物馆看看。在博物馆中，我耽搁的时间时长时短，有时候只为了看几张画也会跑一趟，看个二三十分钟就回来了。有时我也会专门去看哪个大师的画，比如专门去看伦伯朗的画，我尤其喜欢他的自画像，看过之后，有时候感觉又忘记了，就又去看看。

这样，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

我从日本到美国是带着钱过来的，因为我和我太太在日本挣了一些钱，我太太当时暂时留在日本，我一个人带着六千美元先到美国。我在日本的时候，我的老师、美院院长靳尚谊到日本去看我，但是当他看到我在因为想多挣点钱而对画肖像赶速度、就把我骂了一顿，他说“我说你这样下去要完蛋。”那时候我跟他解释说我是在海外谋生，而眼前的这种谋生方式我感到还不错，因为当时那种一千美元一张的肖像，我两天就可以画出来一张。此事过后不久，我的一位很有钱的日本客人在我的画展中看见一幅标价一万美金的

人体画，那是我当年在美院当学生时精心画的，他马上向我提出要退回过去从我这里订制的、标价五千美金的新制人体画，希望再增加五千美金要买我过去画的这幅旧画。成交后，他请我吃饭，在饭桌上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大多数有钱人是想买物有所值的好东西，不论价钱有多贵，只要货真价实就行。

自那以后，我觉得我开始明白很多事情是不能抄近路的。我开始用过去五六倍的时间画一幅肖像或一幅创作，同时把卖画的价钱提了上去，这样，不那么赶了不说，画画时也更尽兴了。

但是，在我的画画生活中，商业和创作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着。

告别日本到美国来之后，我觉得有点危机。在美国，我生活中有很多困难，一是语言不通，二是这地方的一般老百姓基本上是拿不出几千美元来买画的，不像在日本。为了生活，我也曾经在曼哈顿的四十三街街头给人家画过像，但是这种生活很危险，画着画着就会有人突然大叫“警察来了”，我们这些人就猛地从自己正坐着的小凳子上跳起来，冲到旁边的地下铁车站里去。我第一次和大家一起冲下去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呆住了，我不是嫌我这么做有多么丢人，而是觉得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我在日本是能挣到钱的，而且挣得还不错。那时候我曾经认真地问过自己“到美国来究竟是要干什么？”

这样的遭遇之下，我很想回日本去，因为日本的画像生意相对还是比较好的。1990 年的时候我真的回到了日本去，在那里画了一大批肖像。到了 1991 年我的全家都可以到美国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又有一些钱了，而且我和我太太这时都比较倾向于到美国来再闯闯看，而且在日本接到的肖像生意也可以拿到美国来画。

基于种种考虑，我们全家就一起过到美国来了。一到美国，我们就把现在在曼哈顿住的公寓房子买下来了，我们因为刚从日本过来，所以觉得美国房子的价格很便宜。

但是从我们 1991 年 1 月份离开日本到美国来，直到 9 月份，我和我太太在美国竟然一直摸不到可以挣钱的出路，她的工作找不到，我的代理商也找不到。

.557.

那时候情形很恐怖，我们刚刚买了房子，美国经济就开始下落，我们 9 个月分文未进，两个人紧张得浑身颤抖。我记得在小雨纷纷的季节，听说很多画画的人都可以进入纽约的花布界做花布设计，而且大都月薪不错，我就曾领着我太太到中城的花布设计公司一家一家地求人家留下她工作，但是就是没有人留下她。如果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窘况，我想我们是失败在不知道美国的状况这一点上。纽约有一份报纸叫做《WWD》，这份报纸上全是需要花布设计工作的启事，但是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张报纸存在。

而在我这方面也是一筹莫展，也曾联系过一些画廊，但都被人家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吧，有一天，我想起自己买房的时候在垃圾房里曾经看到过一盒废弃了的信封、信纸，看得出这是人家倒闭了的公司里的东西。我们住的这个楼是可以用做居民住家也可以做商业办公室的，凭借这个发现，我估计在我们住的楼里面可能还有艺术公司。果然，我一打电话询问，我们楼里果真还有两家公司。其中一家没有什么诚意；另外一家公司的老板叫做 PETER，他是搞艺术历史的人，人非常好。我打完这个和他搭上线的电话之后，他立即就下楼来看我的画了。看得出他对我的画非

常感兴趣，他看完之后立即提出要和我合作。他告诉我他可以帮助我打进美国市场，在这个前提下，他把他的一个合作伙伴介绍给我认识。他的这个合作伙伴是个台湾人本省人，台南人。这事情说来也非常巧，他和他的这个生意伙伴其实刚刚在开始讨论合作，而且他们的名片都还没有印出来，我的电话就打来了。

他的合作伙伴对我很好，是她帮助我打开了台湾的肖像画市场。然后我就到台湾去，认识了台湾知名人士蒋纬国、郎静山等人，我为他们画了肖像。紧接着，前年的时候我又第二次去了台湾，我把给蒋纬国等人画的肖像拿出来展览之后，得到很多好评，又收了一大批包括连战夫人在内的肖像订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台湾的另外一个画廊，这家画廊其实一直在找我，因为台湾的杂志 1986 年介绍过大陆方面的绘画，里面就登过我的画，我们的合作息愿立即形成了，双方马上就签了合同，这时候我正好和老公司的两年合同结束了，和新的画廊，又算接上了。

在这之后，我在我所住的大楼内又买了第二个公寓。我喜欢热闹，我在曼哈顿的房子外面车水马龙的，我喜欢这种环境，我不能到郊外去。住到郊区我觉得会太寂静，会把我憋死。

我的肖像画走上正轨之后，我一年接一次订件，一次接一年半或者两年的活。对于这些肖像订件我的态度非常认真，每天从早上起来直到晚上睡觉，这之间的时间一直是在画它们。但是这种事情做人了人实在是很烦，动作变得机械了，心情也会不好，人也会显得暴躁。我知道，按照通常的算法。每 15 天完成一张画是比较合算的进度，因为多画就能够多拿钱。有时候我太太会问，你这张画是不是该画完了？我马上就说：你不要跟我事儿多，我画画是需要情绪的。

这么多年的肖像画画下来，我知道自己在画画的时候是不能想到钱这件事情的，这是要分开的事情。连战夫人的肖像他们家的人看到已经说很满意了，她女儿也来我纽约的家中看过，但是我自己还是坚持把这张肖像画又留下来继续画了五六天才放手。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我的画有的已经卷起来被带到香港去，但是想来想去还是又带回来了，因为我自己觉得还是不行。我知道即便不是创作的作品，我画出来的东西也是要对自己负责，不是对别人负责。这之中有些事情是其他人看不出来的，也是客人看不出来的，但是我的肖像画标准是不但要客人满意，而且我自己也要满意，这么坚持下来，我因此也得到了很多信任。因为当你看到有的人全家花了好几万美金到你这里来，为的就是想请你力他们画一张像，你怎么能不弄得好一点。

我每天的日程安排是要保证八小时睡觉时间，然后从早画到晚。画画的时候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听广播，还一边打电话，不然我会被闷死在家里。我把我家的电话机上安装了一个像报话员那样的耳机，以便一边接朋友的电话一边画画，这样才不会显得单调。好在在美国，画画的人都很忙，大家基本上都用电话联络。因此我每个月的电话费不得了，一个月要三四百块。

我为我自己创作的画画环境是尽可能地使自己心态平下来，这就要求我能够达到不为吃住而发愁，但是所有在海外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到一个时期就会有一个时期的需要。比如说到我的现在，虽然我已经不发愁三餐了，但是我要为我女儿上大学的学费忙碌，一直，这是一个事情。

我画人一般是先画一张素描，在画素描的时候我会不停地和被画对象聊

天，问对方一些有关他自己的专业、性情之类的问题。然后为他拍很多照片。我绝对需要自己亲自去拍这种照片，拍照时，用光等方面都是用油画调子来做的，这种照片有时候一拍就得拍一百多张。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起，我的创作就开始了。西方对肖像画的计算方法是比较公正的，他们基本上是根据复杂劳动量来计算的，其中，如果肖像画是半身及带手的，会有一个计价方法，不然又会是另外的记价方法。但是在美国、日本和台湾则是以号来算，一张明信片大小的尺寸叫做一号，二十张明信片大小叫做二十号，号数不同，价格也不同。

其实画画这件事情没有量的累积是不行的，中国画家的累积实在太少太少了，特别是国内一直被养着的画家，一个个都像大爷似的，画画的速度实在是慢得可以，我自己在国内的时候也就只用三分之一的时间画画，剩下的时间都是在搞人事关系、政治学习方面的事情。包括讨论一些很小儿科的东西，讨论政治与业务的关系，讨论红与专的问题，成天都是这些。到国外之后，你会马上发现这一切都完全没有了。

我现在在美国主要画肖像画，我仔细想了一下，感觉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因为我现在毕竟在美国没有惨到必须去餐厅里洗碗，那样的话我可能真的要把手洗坏了。而且我画肖像毕竟还是在画油画，我可以把它当做练笔。自然，我在画肖像画的时候不能太放肆，我必须讲究画面的色调，但我还是可以在有限的空间中找到自己的可创作之处，比如说我可以在人体的形体处理上、色彩明亮度上作出选择。

这种情形下，我手下的画一半感觉仍旧是自己的，假如未来我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创作生活了，那我的态度就是能不画肖像就不画肖像。

世界上几个地方比较下来，我觉得在美国做一个画家有很多独到的享受。海外画家，尤其是美国画家比起中国画家来说普遍要真诚得多，和他们相处，你会感到事情很简单。中国画家的功利意识太浓，也往往自我定位太高，总认为自己应该受到别人的各种照顾。在美国则不一样，你和任何人经济上是平等的，大家各自为政，凭个人的兴趣做事情。

另外的享受就是国外的绘画材料太优越了。中国的油画中最后上的光油质量差极了，永远不干，变得黏黏乎乎的，遇到热更加不于，然后就自动往下坠。1984 年我还在中央美院进修时就开始让别人给我从香港带油画颜料了，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些颜料实在太昂贵了，买一小瓶油就能把我一个月的伙食费花掉，实在可怕。当时，国内的很多大画家也没有办法面对这个问题，常常是人还没死，画就崩开了，这叫“人未做古，画先做古”，这就是因为画的底料用的不是胶，而是立德粉。所以现在很多海外的人不敢买国内人的画，而且连我自己甚至也不敢拆国内带来的画，一拆下来就分崩离析，自动脱落，情况非常可怕。

现在我们在美国用的美国底料，各种各样的浓度的都有，而且全是经过几十年跟踪实验过的。现在我送国内画家都送这种东西，非常实用。

再有就是海外的学习条件比国内实在是好太多了。比如即便是日本，你想要看大师的原作也能看到一些，经常有，我在国内的时候，大师原作能看到的很少，现在我在纽约住，想看原作更加方便。我看到的世界珍品很多，因此就有很多直接的对比。而且国外方方面面的东西，包括建筑之类的东西，都具有相当的美感，这点对画画的人也算一种熏陶。画画这个东西就是要自己摸索怎么样好看的事情，中国人的油画和洋人的油画比起来我们就没有他

们的融汇贯通，看上去，总让入觉得累。就好像芭蕾舞演员一样，你在台上是不能一边跳舞一边喘气的。

中国的优势是培养出的整个一大批人都具有相当的写实基础，美国培养不出这样的普遍基础，因为他们这方面已经断掉了，但是他们中还是有精粹部队存在的。

我现在自己给自己订下的作画比例是画个人的创作占三，画挣钱的肖像画占七，但是即便是这个目标也常常达不到，我今年就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就是在画肖像，未来我想我真的是要加强创作画部分了，这个决心我下了很多次。在中国的时候我曾经画过一组红色调的《油灯的记忆》组画，每张画都没有自己单独的名字，大家都叫一个名字，只不过分第一，第二、第三之类的。我现在还想把这组画继续下去，这是我很久以前的一个创作。1986 年，中国画界曾经开过一个叫做“黄山会议”的重要大会，会议之后，与会者搞了一个画展，叫做《中国当代油画展》，在那个画展上，我就拿出了我自己的这组红色系列画中的两张。现在，当我把我的这个继续创作构想谈出来时，有些人感到奇怪，说是“为什么你还画过去的题材？”我觉得这其实很正常，有的人一辈子都在画同一个题材，能画好也很不错。历史的画卷中一个画家如果只留下一张画的面目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而且，红颜色的搭配我觉得比较抽象，未来我想把它变成我自己的招牌颜色。为了这个红色系列画，为了油灯的事情，我的一个朋友特地曾发动了当年农场里所有认识我的人用一百美金的邮费寄了一个油灯给我。

这么长时间的画画生涯下来，我很奇怪地已经养成了非画画不行的习惯，这个习惯让我连哪怕对旅游的兴趣都没有了。今年，我到香港去了几天就急急地想回来画画，一方面是想早早地把画画完拿到钱，这样我可以心安定些，当然，这样也可以早点完成我自己个人创作的想法。在国内的时候我一年画一两张画，就可以参加全国美展，但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到美国来就不行了，如果你是一个“少产”画家的话，你第一面临的就是活不下去的问题。我现在的问题是下决心要见好就收，因为我怕自己久而久之手会收不回来，曾经有几次自己跟自己下决心说要收手了，但是一听到旁边有人提到“再买个房子”之类的诱惑，我就又卷进去了。

在美国我早看出来了，人没有底气就别想有志气，这个底气在美国说的就是经济基础，有了这个，人才能有自尊，有自尊了才可能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否则这一切都是假的，但是你富裕到了一个地步又发现还有的是比你有钱的人，富是不封顶的。

多年的海外生活我总是觉得有贵人相助，运气不错，我没有打过一天工，除了上街画像被警察追过一次之外，但是我说过，那次也是迫使我做出很多思索的一次，并不那么凄凉。

我在美国也搞过几个小投资，但是全部失败，也不知道为什么手气这么背。我曾经找人算过命，人家说的一句话就把我说踏实了，人家说我这个人这辈子只能靠双手劳动，绝不能偷鸡摸狗。

陈燕妮思绪：

我和他是多年的朋友，很多理解也常有类似，他和我相差的岁数可以按轮来算，但友谊却竟然频繁地持续了下来。

直到我搬家到了西海岸，他也常常就直接打电话来，他带着耳机和我淡天说地，扯出一个个的话题，有时常常赶上我这里一片昏天黑地的忙，他语

调中的充分悠闲立即对我构成语言俯冲。这种情形其实是常事，我的美国忙碌常常让我感到整个人都悬浮起来，那时候，他正歇晌歇到一半。

春节，他的贺年片就是用他红色画系列自制成出的问候，隔着整个美国大陆从东到西地寄过来，很别致的一帧。

今年春天，他的妻女恰好到西部来我家小住，那时候的他正在台湾“收肖像”，听他的妻说他那里的状况一片“阳光灿烂”，因为那时候正好大陆对台湾的“演习”甫告结束，当地的选举也已分出结果，因此，人马平静，富裕者重又心痒痒地开始想买自己劫后余生的尊容一挂上墙。

也听说他可能会接下一个很大的孙中山历史画创作，这一大幅就是十多万块美金。他的妻说：“电话中，他说他又发了。”

他的妻是一个教养深重的贤惠正人，女儿具有少见的机敏和智慧。

最近几年，他常说自己非常怕死，大到飞机起飞降落小至日常中的各种揣度，都可导致他短期的心惊肉跳，在台湾“收件”的时候，他曾被地震从梦中撼醒，直钻到恰在近旁的桌下，他不幸人高，危机极了的那一刻，“整个大楼像钟摆一样摇荡”，他回忆说他所有的腿都无可奈何地暴露在外。

聊到深处，有时他的电话竟是绝早打来，突如其来的一通大说之后，复又突如其来地放下，所用的时间全不按牌理出张，所述人物和事件也全部闪回跳跃，出来进去无一定规，和他时差远隔三个小时的西部之我虽然睡意袅然，却能清醒地理解他一人面临的狠多纽约寂静。

一个人，一件事，说穿了全是能划归同一种孤独的孤独，这点他忘说了。真正的乐趣，大约只在心中的中国过去。

好在他的美国生活已经早可以心平气和，除怕死之外，所有的，也全是安慰。

袁志伟

袁志伟背景

1983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商业经济系，毕业后分配进入北京市第二服务局，1983 年 4 月转入中国农垦农工商总公司工作。1987 年 5 月进入民办企业中国社会调查所工作，直到出国。

1988 年 1 月 1 日以留学名义赴美，曾先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当马丁英文学校补习英文。1990 年 3 月在美国开办自己的运输公司，1991 年 2 月创办完美交通旅游公司，任公司董事长至今。

袁志伟录音

我五六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我一直跟着我母亲长大。我到美同的日子很巧，是 1988 年的 1 月 1 日，当时我 29 岁，说起来倒是可以干事情的年纪，到美国时，我身上只带了 50 块钱，我也不知道到了美国之后会遇到怎么样的情况，但是这 50 块钱绝对是我当时的全部了。

毫无疑问，处在这样一种财务状况下的我一到美国就成为赤贫，绝对没钱读书了。

我有一个亲姑姑在美国，她是我亲生父亲的妹妹，和我有二十多年没见过面了。我是在临出国的前两个月才知道我有一个姑姑在洛杉矶，也是在那时才得到她的电话。要到美国之前，离开北京的时候非常匆忙，没时间通知我姑姑，所以，我是在飞机到了洛杉矶之后在机场给她打的第一个电话。

我姑姑在电话里知道我已经到了美国之后很高兴，马上开着车到机场来接我，她在国内是当医生的，在美国还尝试着做医生。当时的她孤身一人，自己的诊所也正处于刚起步的阶段，也是在苦拼。

她把我带到自己才刚开张的诊所坐了一会几，就说要给我一个见面红包。我当时对她说：“ 姑姑，我需要的并不是红包，倒是有一件为难的事情想求您帮助一下。 ”我告诉她：“ 现在已经是 1 月 1 日了，我的学校 1 月 11 日就要开学，但是学校要我交的一千四百块钱学费还没有着落，您能不能先借给我一下。 ”

我姑姑当时想了想说：“ 一千四百块我现在没有，但是我可以借给你一半，也就是七百块钱。 ”大概是在这之后的第二或者第三天，她就把这七百块钱交给我了。

另外，她还是给了我两百块钱的见面红包。

我姑姑当时攥着这个红包对我说：“ 唯一，我能对你说的，就是祝你鹏程万里。 ”

我是以留学名义来到美国的，如果不去上学，在美国以学生签证合法居留的身份就会失去，所以从我姑姑那里借到一些钱后，我不得不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我在那里读了一个学期的英文，后来，因为这个学校的学费太贵，我又曾经转过学进入当马丁英文学校读夜校班。

我没钱，所有在美国所能做的就是尽早出门打工。

我到美国第四天就开始出去打工，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日子是 19s8 年的 1 月 5 日，开始打工的这天我连时差都还没有倒过来。11 日到来的时候我正式到学校去报到，当时，我跟学校讲了一个瞎话，说是我的经济担保人很突然地去了英国出差，他只给我留下了生活费，但并没有给我留下学费，听了我的这个理由，学校英文部的总监就让我填写了一张申请暂缓缴纳学费的表格，然后就让我先注册上课了。

我从此之后就开始了在美国漫长的辛苦生活。

那时候我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两点半钟读书，两点半之后，我去学校附近的一个年衣场中去烫衣服，我会在那里一直工作到晚上七八点钟。

一开始，我是乘公共汽车上下学的，那时候公共汽车单程车票的票价是一块五，这样，每天来回要花三块钱。后来我想来想去还是舍不得花出这笔开销，觉得每天三块钱的路费如果能省下来已经可以解决向己每天的饭钱了，所以我决定每天跑着上下学。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到我当时住的地方路途不近，单程要跑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左右，但是没钱的我毫无选择地开始了自己跑步上学的生活。

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选择，好在此后不久我姑姑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觉得我每天这么跑来跑去的不行，刚好那时她自己要买一辆新车，旧的车子可以送给我。

我姑姑送给我的虽然是一部很小的日本车，但是这部车在我后来的美国生涯中起到的是划时代的作用，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一个月之后，我曾经还剩的七百元一直没能凑齐的学费已经到了非交不可的地步，我虽然在到美国之后到处打工挣了点钱，但我的钱还要应付自己的日常花费和生活，因此，到了必须要交学费的时候我私人帐户上的存款数额离学校一千四百块的学费要求数目还差一两百块钱，也就是在这种时候，我这一辈子唯一一次跳人家支票的事情发生了。

我当时开了一张总额为一千四百块的学费支票出去，但是我知道自己银行帐户中的存款是不足数的，所以我在给支票签字的时候，故意把自己名字反过来写，而且也不按已经在银行中留底的草写体签名来写，有意改用一笔一划的方式来签名，我知道这张支票因为支票所有人签名的下一致一定会被银行退回来，我也知道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样的大型机构整个财务运作是很繁琐、缓慢的，我把学费支票交上去之后他们还会经过很多重手续才能最终兑现支票，这样前前后后我估计至少会耽误两个星期，再加上银行还要把支票退回来，这样又会花费一点时间，我可以利用这两个星期的时间把我银行中的差额补齐。

我的这张支票后来确实被退回来了，老师拿着支票找到我的时候我连说：“ 对不起，我不懂这些事情。 ”不知情的老师就要我重新再与了一张支票。这是我在美国唯一一次跳支票的经历，发展到今天，今年，我公司里的年营业额已经达到一千五百万美金，但是我敢这么说，除非出现商业纠纷我曾止付过自己开出的支票，除此之外，我从来没有跳过给任何人的任何一张支票。

这件事也像一个沉重的包袱，一直让我记忆犹新。

等到我上学的事情稳定下来之后，为了能挣到更多的钱，我开始过起到处给人打工的日子。缺钱缺到极点的我当时是出了名的有工就打的人，不管别人给多少钱，有一次，我的一个在治安很不好地区的汽车旅馆里打工的朋友给我来了个电话，他说自己晚上值班时非常害怕旅馆附近的妓女和毒品贩子会来找事，他要我每天晚上陪着他在他的汽车旅馆里睡一觉，帮助他壮壮胆子，有事的时候能够帮帮忙，这样，每天，也就是我在他那里每睡一晚上的觉，他可以给我五块钱。

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的要求。我毫不挑拣地睡在他旅馆里的过道上，为的是能够得到每天的这五块钱。好在那阵子他们的旅馆没有发生过什么大

大的事情，不然的话，这世界上的今天就可能没有我了。

就在我拼命挣钱的时候，我太太也到美国来了，她和我来美国的日子几乎相差准准的半年，她是 1988 年 6 月 17 号到的美国。在她来美国之前，我给自己算了一下，我在美国的这六个月的单身生活时间里，每个月用于吃饭的饭钱平均是十块五毛六美元。这半年中，除了我到外面打零工时雇主是管饭的，或者是在周末农场做工时老板管主食，员工自己带菜的情况，半年时间里，我的主食虽然米面全有，但是和别人家里的米面来源和做法都有很大的区别。我的米是白白得到的，没有花钱去买过，当时我住地区里有一家超级市场开张，为了吸引客人前往购物，这家超级市场打出的旗号就是白白送米给客人，那次这家市场总共送出五千包大米，送完为止，我就专程去扛米回未。而在面的方面，我虽然是买面回来，但是在做法上和各家的情况都有点不大一样。那时候我买回一包面后，会在同未有空时把它们和成一个大面团，然后把这个面团放进冰箱里，这样，含着水份的面团就会被冻上，每天晚上我回家后需要吃饭时就光烧一锅水，然后把面团拿出来往水里削，这样，煮熟之后这就成为我的“刀削面晚饭”，与此同时，为了节省中午带饭的开销，我也想出了一个很好的省钱办法。这个办法也是关于面的。每个星期我会烙出一摞面饼来，然后摊一个鸡蛋放在里面，我又从廉价批发商店买来一大玻璃缸酸黄瓜，需要的时候我就用一张饼加上一个鸡蛋再加上一个酸黄瓜三者在一起，这就是我的午饭。我相信这一定是最省钱的美国午餐了。我当时算过，一张饼的成本只有八分钱，一盒鸡蛋的价格也不过一美元，酸黄瓜的价格更是两三块钱一大瓶，这样，我当时一天下来的伙食费基本可以被控制在五毛钱以下。

在这个艰难的时候，我太太到美国之后的日子也不好过。

我太太来美国之后的第五天，我就把她送到一家汽车旅馆打工了，和我一样，她也是在自己的时差还没有倒过来的时候就开始尝到了美国生活的艰难滋味。她打的工说白了就是“抖床单”，也就是清扫旅馆房间，清扫一个房间可以得两块钱。这个工作虽然收入不多，但是却相对稳定一些，我则继续过着东找工西找工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做过的事情比较杂，我在电话簿公司做过拉广告的、在蛋糕店做过打杂的师傅，也做过装修工。无数次的找工经验已经把我锻炼出来了，每次我去应证工作时老板一问我“有没有干过这类工作，”我总是说“于过，”因为只有这样我才可以拿到这个工作机会，当然，等到你真的干起活儿来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干过的人，谎言很快就会被戳穿。所以，那段难忘的日子里我做每个工作总是很快就被人家解雇掉了。

在我所有的找工作经验中，有一次经历让我直到今天都深不能忘。那一次我是到一个搬家公司去找工作，这个公司是一个台湾人开的。当时的情形是我头一大已经给这个公司打过电话，公司老板要我第二天去面谈。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找到那家公司后我一进门，这个公司的台湾老板劈头就问我：“就是你要来找工作？”我说“是，”那个台湾老板二话不说走上来“啪”地给了我一个大嘴巴，紧接着就骂开了，说“就凭你这样长得又瘦又小，戴个眼镜的人，还来找搬家公司的工作，纯粹是他妈来捣乱的。”

我当时被打槽了，人木在那里。我当时不知道在美国挨了打还可以叫警察，不然我一定会打电话叫警察。

那干早上我是六点钟爬起来去应征这份工作的，当时我太太辽没醒，在

那个台湾人那里挨打受骂之后我再无心情干别的，八点钟就回家了，回家后我倒头就睡，我大太当时仍旧还没起床，迷迷糊糊地问我工作找得怎么样了？我什么也没说，心里觉得受了非常大的打击和伤害。

一个月之后，我也到我太太打工的这家汽车旅馆中做事了，这样，我和我太太形成了一个夫妻档，我们一起在这个汽车旅馆中干了十一个月，我们的日常工作除了打扫房间，还负责越来越多的其它事务，旅馆中最常见的麻烦比如水管之类的地方如果坏了我也负责修理，我们等于把这个旅馆中的所有日常事务全包下来了，我们的收入也随着这家旅馆的生意好坏而变化。旅馆生意最好的时候是在周末，收入不错的时候我们每天能挣一百多块钱。当然，大部分的平常日子里，旅馆的生意是不大评的，生意最糟的时候，整个旅馆一天只有五个房间被租出去，那样我们就只能赚十块钱。

我和我太太在这家汽车旅馆打工的时候，我其实还不懂任何水管技术，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把这个工作接下来了。这样，毫不懂得技术的我每次遇到问题都非常难办，这时的我没有任何办法。只得把水管坏了的零件整个卸下来，把它带到五金店去配新零件。这么干久了之后，五金店里的老板允许我把所有可能用得着的零件全部带走，能用的就用，用了的零件才跟我算钱，不能用的就再带回五金店里去。一来二去，我真的就慢慢学会了一些常见的管道修理手艺。到了这时候，已经多少有些技术的我还会到外面揽一些活来做，五金店的老板也时常帮我招揽一些活，有时甚至帮我揽下来几十个单位整个公寓的修理活。

这段日子过得相对有意思些，因为这时候的我已经开始靠自己的技术吃饭，而且我也越干胆子越大，基本上什么生意都敢接，技术牛疏的活接下来之后我会仔细琢磨，干成之后等于增长一门新手艺。有一次我接下来的活甚至发展到了换整个房顶。

那次是一个黑人修理工说是可以帮助客人换房顶，当时他报价报得很低，公寓的负责人就让他来修理，但是等到他把屋顶全掀开之后，这个黑人面对复杂的工程害怕了，觉得自己干不了，他就跑了。那几天刚好赶上雨季，几乎每天晚上都下雨，房东急了，找到我头上。见活就接的我一听就接下来了。那次是我第一次帮人家换屋顶，对这行过分生疏的我甚至连报价也不会，问过别人的报价情形之后，我报了比别人价格低 20%的价，还答应给人五年的保修期，也就是说房顶换过之后的五年的时间内只要房顶有任何问题都由我免费修理。现在我想想都有点后怕，到了现在我们说话的今年，那个房子大概刚刚过我说的那个五年。

那天，我对房顶的修理技术稍稍进行了了解就开始干活了，我带了两个人从早上七点钟开始一直于到夜里一点钟才把这个房顶换好，我们的话儿于得非常认真，真好比是绣花一样。这是我干得最大的一个活儿，干完之后，房主相当感动，他说：“我们虽然说好了价钱，但是我还是要多给你几百元。”他对我说：“我告诉你，凭你在美国这么干活，你在美国一定能够成功。”

那些日子里我和我大大两个人每个月能够赚进一千五到两千块钱，我太太回家之后再给别人织一点毛衣，再给房东做一点饭菜，这样也能挣个一两百块钱，靠着这些贴补，我们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到了 1989 年 3 月份，我和我太太感觉到我们工作的那家汽车旅馆的老板对我们越来越苛刻，我们就离开了那里，这之后我又做过其它的工作，其中也曾有过非常惊险的经历，比如我曾经帮助一个也是北京来的朋友于送饼于

货品的运输活儿，在每天长距离的开车过程中，我差点就死在一次车祸中，但是事发之后，和我一向嘻嘻哈哈称兄道弟的北京老板怕我告他，就赶紧把公司关闭了。

那一次我伤得不轻，在家里修养了很长一段时间。

也是在这段日子里我就开始对自己美国生活进行彻底总结，我为自己计算过，当时我手里总共已经攒下一万八千块钱了，利用这笔钱我想我可以去上学，第一年我可以不拿奖学金，第二年我争取拿到奖学金，这样就可以支持下来，于是我就和我太太一起重进学校读书。但是很快地我就发现，三个月下来，我们的存款从一万八千一下子掉到一万三千，我一看撑不住了，觉得必须想出一条适合自己走的道路，不然我到美国后的生活就永远是为人家做事情，自己永远两手空空。

这时已经是 1990 年年初的时候了,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而关键的日子，因为我开始认真思索自己的未来，那时候，我的想法非常多，把自己所有经历过的工作经验搜肠刮肚地想了好几个来回，我记得当时想了十好几种商业道路，最后还是认为于服务业最有前途，因为这个行业每天都会进钱，一旦做起来了就不大容易倒。

最后，根据洛杉矶当时的商业机会大环境，我选择了做为客人提供接送服务这个生意，这个目标确定下来之后，我买了一部车子，专门于起了去机场接送客人的活儿。我买的这部新车是一辆白色的客车，车行的开价是一万五千，为了能够省下哪怕一点钱下来，我在车行整整坐在人家那里煞价煞了三天，把价格硬是煞到一万一千五。

车买下来了，我开始接人送人的生涯。

我记得第一次去机场送人的时候，我连到机场的路都不是太清楚，还是靠着已经坐上车的客人指点才顺利到达的，实在是在干中学。也是在第一次去机场的时候，我把车停在机场候机室外面想到里面拿一点宣传资料，拿完资料一出门就看到我的车子已经得到一张警察开出的违规停车罚单。不幸的是，这还是我得到的第一张罚单。紧接着，另外一个警察看到了我在车上贴满的我公司的商业招贴，这是我花了四百多块钱布置出来的，我被叫下车来，警察问我有没有做这种接送服务业特别的商业保险和执照，这两项，我都没有，警察就又给我一张罚单。这之后，我还没出机场的大区域，第三次又被叫下车来，这次和上次的惩罚内容有些雷同，同样是因为缺少从事运输方面必须具备的东西，我当时英文不好，不能非常精确地和警察沟通，就又得到一张罚单。

几张罚单一收到，一下子，几百块钱就罚进去了，而我那天的那单送人生意，总共收费不过二三十块钱。

尽管我是在三张罚单之中开始我运输生意的，但是我的生意却真正是这个行业里做起来的。我做机场接送的生意是从 1990 年 3 月 14 日正式开始的，第一个月我做了七百块钱的生意，第二十月是一千四，第三个月是两千八，生意势头很不错，每个月都是翻倍地上升。到了九月份的时候，我们用赚来的钱买下了我们的第二部车，我太太当时一直在读书，在西洛杉矶学院读呼吸治疗专业，她放学之后就在家里帮我接电话，有时生意忙起来她也帮助我接送客人，我这个人干活不计较，对人心诚，很快就赢得了不少客人的好感，他们还会再为我介绍其他客人，我们公司从做机场接送的小生意开始干，后来发展到接任何和运输有关的生意。

我的公司经营到第二个月就开始雇人一起干了，在此之后，我们添了人，也添了车，新车和新部下对我们的生意帮助很大。当然。和任何一个行业一样，我们的生意有非常非常好的时候，也经过差点要完蛋的关口。

其实，说起来主要的关口是由一次交通意外引起的。这是一次差点让我的公司经营不下去的大事故。

那一次，我们的一个员工带领一个旅行团到赌城拉斯维加斯，在路上他把车开翻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时我脑子里“嗡”的一下子，第一个想到的是可能会死人。我的司机在电话里告诉我车上没有死人，全团都已经从司机座里爬出来了，我立即从洛杉矶去了出事地点。那次的接送任务是当地的一个旅行社给我们的活，价钱非常低，带一个马来西亚的团，三大的时间才给我们三百三十块钱。

我到了出事地点时，希望能够尽量化解客人的情绪，但是见到我去，整个旅游团的人都不上车，都说自己身上到处疼，要求我公司赔偿。我告诉客人们说，有什么事情大家可以回洛杉矶再解决。听到这样的解释，客人们开始上车随同我们一起回来。其实，在去出事地点的路上我就想好了，摆在我面前的不外有两条路，赔得起就赔，赔不起就让公司倒闭，再大不了我去做监狱。

回到洛杉矶的旅馆，所有客人都不进旅馆，仍旧坚持说必须获得赔偿。这时候我提议由我来请全团客人吃饭。大家去吃饭的时候，饭菜都已经端上来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动手吃，面对这样的僵局，我开始向客人们说起我自己的过去，我告诉他们我到美国之后的状况，我告诉他们我是在怀揣着多少钱的情况下来美国的，我曾经是怎么节省地度过美国生活的，我的生意又是怎么一点一点做起来的，现在我的生意和生活又是什么样的状况……我告诉他们：“今天你们的要求如果是我可以承担的，我不说二话一定赔给大家；如果是我不能承担的，不是我不想赔给大家，而是我实在没有能力赔，那样的话我的公司只能宣布倒闭。

这时候，存人们中间的一些人的态度开始有些松动，一些客人提出因为出现这样·局车祸他们想获得一人一次免费到大峡谷的游览的好处。我当时算了一下，那个团总共有六七个人，一次免费的大峡谷游览大约要花七八百元钱，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条件。在这时，我对客人们讲：“今天，我赔给大家的免费旅游不是对大家车祸的赔偿，而是作为由于我们出了问题给大家在时间上造成浪费的一种补偿。因此我要求大家在我们方面拿出来的合约上签了字，保证今后放弃对此次车祸事件要求赔偿的权利，”

对于这样一份协议，客人们全部签名了，这也是在美国如果想把这类问题全部化解必须完成的一项法律程序。这样，我们的公司从这次几乎要倒闭的边缘被惊险地转回来了。

大概在这事情发生后的五个多月之后，也就是 1990 年年底，我就开始发迹了，实不相瞒，这个过程来得甚至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之外。

当时，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有一个计划，拿出五百万美元，把中国的 50 个司局级干部招到美国来培训，一共有三个月的培训时间，在这个培训计划中，我参与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接送学员的电灯，结果我中了。这是一个肥活，对我们公司未来生意的建立也是一个基础。我们的任务是每天早上、晚上各接送学员一趟，每天 160 元钱，而且节假日学员们出去游览，也用我们的平。与此同时，同时我们也接到另外的一种固定的运输生意：当时

我们和一个律师楼签了约，把每天从中国大陆偷渡到美国来的、一被保出来就要到纽约去的偷渡华人送到机场，这也是一个非常固定的活，每天晚上四五点钟的时候，这个活就开始了，送人这生意包一趟车 60 块·等候时间也算钱，一个小时 20 块，一晚上常常会有好几趟仟务，往往一干就是三四百块。那长长的一段日子里，我们于得很辛苦，我和我太太全部出动，我们每天平均只睡三四个小时的觉。1990 年 12 月份的短短一个月时间里，我和我太太两个人光是做运输就赚了一万一千块钱，那时候钱多得连我们自己也吃惊，我太太每天晚上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点钱，然后到处藏钱，说是要买房子。

进入这条线之后，我因为每天都会到旅行社去为偷渡者取机票，我就发现一个事情：律师楼需要的是大量的机票，而我如果能够拿到最好的机票价格，律师们就可能从我这里买票。

一问之下，果真。

这样就逼得我四处寻找便宜机票，经过各种线索我真的摸清了这条路，这以后，我觉得自己可以做这一行。自那时，也就是 1991 年 2 月份开始，我们开始在家里做起机票买卖业务了，我凭着一个飞机时刻表外加一部电话，在报纸上登了广告就做起生意来。我们把自己的运输生意交给别人去做，我们只从中抽取 20%左右的成。从这开始往后，我们的生意更加兴旺，每个月我们做运输的钱能够拿回三四千元，机票生意也慢慢做起来了。做到最好的时候，我们每个月都可以赚个五六千元，日子过得挺不错。

但是这时的我又发现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许多客人来到我的公司里，也就是来到我家里买机票，一进门就说：“哟，这是旅行社啊？”这样，十个人里有九个人不再来买票了，这也难怪客人，因为他们对这样的一个在家里办公的公司没有安全感。

因为这样的境况，我这才开始在外面租办公室、雇用员工，搞出一个正规的旅行社来。但是事情往往是这样，小成本制作的时候是赚钱的，一旦全面正规之后，生意就开始赔钱。好在这时的我们已经有一些底子了，经得住各种小考验，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的旅行社也拜中国大陆考察团来美访问考察事务的增多的好处，生意从赔钱开始走向正轨。

1994 年我在商业上又上了一个台阶，买下了现在我们办公室所在的办公小楼，再后来，我们在 1995 年初又发展出了一家机票批发公司，再后来又发展出了一家巴士运输公司，现在，我的目标是向外发展分公司，以完成我心目中的企业化事业。

在美国这么多年，我从一个对生意毫不知脉络、四处打工的人，发展成为一个有自己具有一定规模企业的公司董事长，走过的摸索之路，一步步都清晰地印在我脑子里。我甚至记得我生意上所有重大事项发生的准确日期，记得当时出现过的每一个细节。

回头总结起来，我在美国做过的许多生意都是因为我具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个性才做出来的，如果当时我什么都懂了，我可能首先就会害怕了，那样的话我根本就不可能无牵无挂地去闯天下。

现在想起来我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字眼来概括自己历尽艰险的昨天和小有成功的今天。未来，我还会有新的发展，以我今大的阅历，我等待着，相信下会比我的当初走过来的来时路更难吧？

人人都说自己的经历是可以写书的，但是我的经历，我必须说，的确是

一本书。

陈燕妮思绪：

袁志伟开初要讲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牵出的会是这么一个绵长的苦故事，这么多日子以来，为了这本《遭遇美国》的完成我一直庄重以听，充当所有过来人的“静静的湖水”。但是，听完袁志伟的美国甘苦后，我觉得自己的知觉都开始被延伸开来，他告诉我的，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和整个社会较劲的大故事。

尤其说到他姑姑在他抵达美国之初拿着要借给他的学费和红包对他说“祝你鹏程万里”的时候，他一时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眼睛全红了。虽然不知道他要讲出的后续，同是在这片土地上硬撑下来的人，心里，我对他的感慨已经全然明了。

我们相对无言，这一次停顿之后，他几乎说不下去。

他的经历是典型的靠自己在美国瞎摸硬撞而成的，没有援助和指点，有的只是他姑姑的这一句吉言。

他是我所有采访对象中美国之初生活最艰涩的一个，他的生存办法已经超出即便是在此类苦难方面见多识广的我的想象。

他的叙述，让我震动。

曾经在后来的日子里见到他时，告诉过他这次采访给我留下的无数余波，我知道，在美国发财的人中，他不是最有钱的，但他绝对是这之中“落差”颇大的一个。他知道这个结论之后想了一下，然后抬头赞同地告诉我：“对，自然是落差。”

他一直想把自己的美国足迹记录成文，从头到尾、无所间断，他一直说为了这个愿望的完成，他可以不惜代价。如今的他已经不那么介意代价了，最介意的，应是俱往矣的经验和岁月，那是他生命中无可奈何的一潭泥浆和宝藏，所有好的坏的，全在被尘封在里面，揭开它，为己，也是为人。

今天，他给人的感觉已完全企业起来，声音宏大、做事断然、一物一事一经认定和了解，所出的一定是结论。我和他是熟朋友，过去对他的决断一直不敢恭维，此番访谈结束，再看他时，身不由己已必须刮目相望，同时也知道这个有过十块多钱月生活费经历的人已经手拿把攥着数也数不清的生存证据，因此，他性格中的各种特征，出现了，就算是合理的。

他和曾经的中国篮球明星张卫平的美国故事是我最感慨不已的两个例子，但是写此思绪时，又觉得有很多情绪完全叙不干净。这种时候，纸笔的功力，已经不足。

官明军

官明军背景

1978 年，在辽宁省大连市上小学五年级时被选入北京舞蹈学校学跳民族舞。1985 年考入北京舞蹈学院主攻民族舞专业，1985 年之后曾经先后获得北京舞蹈比赛一等奖、1985 年中国“桃李杯”舞蹈比赛二等奖、1986 年全国舞蹈比赛第一名。毕业后留校，在北京舞蹈学院所属青年舞蹈团中担任主要演员，曾经在舞蹈《牧马人》、《白鹤》等剧中担任主跳，为中国一级舞蹈演员。在国内期间并曾连续担任各国际舞蹈团体的客席演员，曾经参加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舞蹈团的演出活动。

1989 年赴美，进入纽约朱利亚音乐学院学习，1990 年进入美国八大芭蕾舞团之一——波士顿芭蕾舞团担任演员，1992 年曾经获得纽约国际舞蹈比赛金奖，同年冬赴日本组建自己的芭蕾舞团——“福岗现代芭蕾舞团”，该芭蕾舞团曾到中国进行演出，参加过沈阳市艺术节以及辽宁省艺术节等中国国内大型艺术活动。

1995 年回到美国参与组建“汉弥尔顿芭蕾舞团”，现担任该团艺术总监职务。

官明军录音

跟很多走上舞蹈专业的人所经历的过程一样，我上小学的时候舞蹈团的人来挑学生，看到我长得还可以，就把我要走了。我当时的条件确实不错，直到后来，我的舞蹈表演也一直是以柔软和技术见长。在中国舞蹈界我是属于 1986 年那一批的，1986 年的时候，我、杨丽萍和刘敏等人一同参加过中国国家级的舞蹈比赛，大家都因此而成名。

但是，在当时，成名并不一定能给演员带来经济上的利益，我们和中国所有人一样挣很少的工资。我在国内时挣的工资是每个月两三百块人民币，在舞蹈比赛中得一次奖差不多能拿到八百块钱的奖励。

1986 年我到香港去参加国际舞蹈节，我演出的舞蹈《白鹤》非常轰动。在其中的一场演出中我遇见了纽约朱利亚音乐学院的校长，她看了我的演出之后告诉我：“你随时可以到我们学校来学习，我们一定给你全额奖学金。”

她给我了一张名片。

当时，我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演出回来之后也不知道把这张名片放到哪儿去了。再到后来，到了 1989 年的时候，我从新加坡演出回来，看到国内的局面有些紧张，我觉得如果这么下去，我的表演前景可能会受到影响。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朱利亚学院校长的那张名片了，我东翻西找地把校长的这张名片找了出来，然后我把自己要说的事情写在一张纸上，请会英文的人帮助我打电话给朱利亚的校长，我告诉她我现在非常想去她那里学习，电话那边的她很快就答应了。紧接着，我就开始向纽约寄我的个人材料。

朱利亚学院后来把我的资料传真到广州，我 6 月 1 日被告知说可以到广州去办理去美国的签证，才到广州，6 月 6 日我就得到了去美国的签证，时间很紧，我紧接着在香港还有演出，就干脆直接就从广州去了香港。我在香港参加完预订的两场演出之后，就又直接飞美国了。

从广州到香港，再从香港到美国，这之间我没有回我北京的家，我打电话给我当时在北京的女朋友，请她把我家里的东西该卖的全部卖掉。我在北京的家里那时有一辆丰田轿车，还有一个摩托车，我女朋友就把他们卖了，她人很好，把我的钱也寄给我了。

我到美国之所以赶得这么匆忙是因为朱利亚学院说有一个机会要给我，那就是参加国际舞蹈节，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要我 7 月份之内必须赶过去。

我就这样匆匆到美国来了。

到美同之后紧接着就开学了，我立即入学上课，那时的我虽然是第一年进校，但我还是被分配到了学院里的第五班，也就是学五年级的课程。即便是这样，我在课堂上仍旧感到很没意思，觉得没有什么可学的，做学生的大家还是练习在地上滚来滚去的，课堂里教授的东西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的地步。

面对这种情况我强忍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实在觉得自己呆不下去了，就决定不再在学院里学下去了。

说起来我的这个决定实在有点对不起朱利亚对我有很大期望的老校长，当时，学院里给了我不错的待遇，但是我在那里的学业还是才开始就结束了。

我整个在朱利亚呆了才两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我就到波士顿去参加芭蕾舞团的公开招聘考试了，一考就考中了，然后就进去这个芭蕾舞团跳舞了。在波士顿的芭蕾舞团，我的技术和待遇都属于不错的，我一个星期的工资是两千美元。

和很多从中国到美国来的人一样，我从踏上美国领土的第一天就相信自己一定能在这里站住脚。那时候的我在国内得到过很多东西，该得到已经得到了，不该得到的也得到了，其实，尽管我抱怨过在同内挣的工资数目实在太少，但我在中国时因为常在外国舞蹈团里当客席演员的缘故，经泞情况算是相当不错的。我记得我已经有了自己的轿车之后，我的无数领导还处在必须骑自行车上下班的阶段。在艺术方面，我也在全国最好的舞蹈比赛中得过奖，因此，我感觉自己在国内的发展已经达到顶峰了，而且每年国内都在培养新一代芭蕾舞人，作为一个处在发展顶峰的人光吃老本是不行的。到美国来对我来说无论从艺术眼界上还是从艺术发展上，都是一个转机。

我在国内是学民族舞的，但到了美国之后我下决心不再跳民族舞而改跳芭蕾，因为这里完全是看这个，我知道我即便是被撞得头破血流也必须改攻芭蕾舞。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受过一些苦，技术上的很多改变使我有些难于适应，在改变中，我觉得芭蕾舞所有的基本功中，男演员必须过关的托举技术对我来说是最难的，也就是人们常常看到的演出中男演员把女演员托举起来举到各种位置的技术。美国女演员骨骼一般比中国人大，身体重，托举起来实在是件很吃力的事。现在我在托举技术方面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但是那时候却拼得非常辛苦。那一阵子我每天必须在腰上贴八个大药膏，然后拿大宽皮带一绑才能上台演出，不然就可能顶不下来。

到美国这么多年，仔细分析起芭蕾舞这个艺术来，不承认这一点是不行的：芭蕾舞绝对是为外国人而设计的，因为不论是从脚背形状、身材状况等各方面情况来看，外国跳起芭蕾来就是让人感觉舒服。

我在波士顿芭蕾舞团就这样一直跳了两年左右。

两年之后，我自己又感到这种生活没有意思了，这时候，我正好在日本有一些关系，就到日本组自己的芭蕾舞团去了。

我在中国的时候就在日本当过当地芭蕾舞团的客席演员，因此有一些关系在那里，当然，之所以到那里去寻求发展机会，最主要的还是我当时已经和一个日本人结婚了。

到日本之后，我们就在那里组了一个芭蕾舞团，叫做“福岗现代芭蕾舞

团”，我们拿到一家日本大公司的资助，用以维持整个芭蕾舞团的运作和发展。那些年里，我们的芭蕾舞团演出过很多古典芭蕾舞剧，也演出一些现代戏。

这个期间是我美国和日本两头跑的时间，业务很繁忙。1995 年，我和我的日本太太离婚了，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就不想在日本那个地方呆下去了，我们一同创建的芭蕾舞团也交给她管理了，那时候，我们当初从无到有的舞团已经走上正轨了。

离婚之后的我就回到美国来了。

回到美国来之后我又参加美国的一个芭蕾舞团的建团工作，这个舞团叫做“汉弥尔顿芭蕾舞团”，是以美国东部的新泽西州为主要演出基地的舞团，这个团的状况不错，演出活动非常频繁。

我们的这个芭蕾舞团是靠几个财团共同做财务支持的，有的财团来自华尔街，在舞团里，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舞团演出活动中的艺术把关、编舞乃主服装设计。我对这个舞蹈团寄予了很大期望，最终的目的是想能够把舞蹈团和中国大陆的一些企业进行连体，希望能以商养艺。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在新泽西州普林斯敦的剧场演出。美国的色蕾舞团都是有休假的，东部的休假期一般是从每年的 5 月份到 8 月份，或者是从 6 月份到 9 月份，大约要休假三十月左右，当然这也就是失业三个月，美国的芭蕾舞团基本上一年一般只和演员签 35 到 45 个星期的合约，这个合约是以休假期为限的，团里一休假，演员可以自己去找其它工作，也可以到政府那里去领取救济金，美国的救济金一般是给你平时工资的一半，所以说起来数额还是可观的，而且你可以不工作就拿到这笔钱。但我个人来讲是比较喜欢休假的，这样的话我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做客席演出，可以赚更多的钱。

我们的团是 1995 年的 12 月份创建的，团里有 22 名演员，男演员 10 个、女演员 20 个。美国社会也是很讲究关系的社会，我们的舞蹈团和财团之所以能建立起联系，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个关系人在。当然，在各种关键人士中，我们的团长是关键的关键。她是一个美国人，我们是在一起排练时认识的，我和她合作建立这个舞团，她管理钱财、我管理艺术。

在舞蹈团里，我们的日常起居是每天早上十点开始上课，十一点半下课，我们请了一些老师为演员训练和排练。如果晚上没有演出，下午三四点钟大家就可以各自回家了。

现在的我基本上没有参加任何一十芭蕾舞团，不和任何芭蕾舞团签约，而是把主要精力用在搞项目上。比如在每年的 11 月份和 12 月份，美国人在传统习惯上要看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我就承包了几乎所有新泽西州的剧场，由我们的舞团做演出。

在这种项目的接洽和演出过程中，我自己出资请乐队、请舞蹈的各种制作人员，当然也包括请演员等等，我自己是不拿工资的，我拿的是整个做这个项目的钱。美国的舞蹈团是靠着大环境经济所影响的，如果世界经济大环境不景气，它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财团给钱一般是不营你演出细节的，他们只是拨出一笔钱来给你做这件事情，比如今年拔出一百万，这个概念就是一个数字。给舞团出钱，他们当然是要回收率的，如果是美国最好的芭蕾舞团肯定盈利状况不错的，我们的舞蹈团成绩一般，基本上上座率是在八成左右。现在我们团里的开销不算很小，财团一年大约给我们六百万艺术基金，由我们自己支配发挥。

但是说来说去，在美国做舞蹈千万不能指望着靠票房就能够来钱，从根本上讲，这个行业永远是要靠财团来资助的一个行业。

我身高一米七八，体重一百五十多磅，在美国这么多年来除了在团里参加排练，我已经不大练功，但是我现在时常还跳舞，但是我明白我身体的各方面状况已经开始受到年龄的限制，所以我的艺术目标是转向艺术总监方向发展。这个位置在美国是管舞台、编导、演员等所有事情的，任务细致到要管理演员的艺术素质、和演员签订合约、负责各种招生工作等等，类似国内的芭蕾舞团团长的角色。

在做艺术总监的事务中，我侧重的是搞舞蹈编导，我是靠自己多年的舞蹈经验做这件事的。中国的编导编舞一般是靠故事、靠沉重的历史、靠黄河长江之类，讲究寻找有深度的东西；而美国人的编舞是看你怎么样运用舞台、怎么样运用男女演员的身体结构、怎么样巧妙地运用舞蹈语言，虽然美国人编出的舞蹈也需要具有一定的思想，但主要的还是要看结构和搭配。我最近编了一个反映美国越战的舞蹈，名叫《大逃亡》，同时也正在编导另一个作品，名叫《罗马》。在后一个舞蹈中，我要求整个舞台能够旋转，然后由一个男演员在台上变换不同的类似于古罗马雕塑的姿势形成舞蹈，想法比较新奇。与此同时，我也编了些现代舞蹈作品，明年，我会带我的《大逃亡》到日本参加国际编舞比赛。

美国芭蕾舞团里的演员每年流动性非常大，在美国，没有演员是在一个团里呆很长时间的，演员最好的出路是考人在美国乃至国际上排名往前的大芭蕾舞团，进入这种团不但名声好、薪水也相对为高。美国的芭蕾舞团名次早有排列，大约是这样分的：第一，也就是最好的团是团址设在纽约的美国芭蕾舞团，接下来是纽约市芭蕾舞团，波士敦芭蕾舞团、纽约乔佛瑞芭蕾舞团、休斯敦芭蕾舞团、西雅图芭蕾舞团、旧金山芭蕾舞团和迈阿密市芭蕾舞团，这八个团体被称力美国八大芭蕾舞团，基本上即便是群舞演员的底薪也是从一个星期六百美元起的。

现在在美国的舞蹈界，很多人都领教了苏联人的实力，苏联人的技术确实不错，他们以前叛逃美国的那位世界著名演员由里烈夫就是技术非常非常好的一位。他绝对是世界上少有的舞蹈天才，外行人看舞蹈可能是只看外观，但是我们看舞蹈就是看技术，我相信，他的出现是一个奇迹，全球近代舞蹈演员中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比，真的是比不过他。可惜后来他因为感染艾滋病死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美国搞舞蹈的人中有大多人是同性恋。

对于他，我有很多记忆。1985 年我在中国读舞蹈中专刚毕业时他看过我的一场演出，演出之后他曾经请我吃过饭，那时候我就感觉到他可能有点生病的样子，人非常消瘦。说到这里我想起我 1992 年在纽约参加舞蹈节并获得金奖的时候，当时，有关的报纸就说我是“亚洲的由里烈夫”，看来，我和他还是挺有缘分的。在美国舞蹈界，特别是在纽约芭蕾舞界，基本上都是一些非美国人的外国人在竞争。即便是在美国最大的芭蕾舞团——美国芭蕾舞团中，主要演员中也没有几个人是美国人，他们团里现在最好的第一男主角是阿根廷人，第二男主角是古巴人，第三男主角是苏联人，然后就是意大利和法国的之类的人，这些人的年薪水大多是在数十万元，演员们都是从世界各国家来的。美国的舞蹈界其实对男演员是很偏爱的，现在在美国成名的芭蕾舞演员几乎都是男的，我觉得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爱看舞蹈的人一般以女性为多，她们喜欢反过来捧男演员的场，这样对男演员的发展就比较

有利。

从总体上来说，美国舞蹈界的发展其实不如欧洲，而且淘汰率也很高，中国舞蹈演员由于技术不错，到美国之后不少人能够很快找到工作，在团里也能扮演相对主要的角色，但是还没有一个演员能够在自己的舞蹈团里担任最主要演员的位置，实在是国为来自世界各国的挑战者太多的缘故，美国舞蹈界对年龄没有一个限制。即便是公开招聘演员的时候也是不看你年龄的，他们主要看的是你现在这一刻还能不能跳，其它的比如面部的一些年龄痕迹在舞台上一化妆就什么都看不出来了，芭蕾舞团与演员的合约反正是一年一续约，今天你能跳就让你跳，明年再说明年的事情，美国人一股来说很现实。

明年我很想搞一场单纯由我自己策划的芭蕾舞演出，在纽约的美国人剧场里搞，这场演出我想和国内的有关机构联手搞，目前我正向国内筹资，当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想搞的是一台非常非常中国的、但是又非常非常现代的演出，迄今为止美国人对中国舞蹈的了解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认识，大部还停留在红绸舞、铁扇舞之类的低级舞蹈上面，我想突破这个东西，我想告诉美国人，中国的舞蹈艺术其实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了，只不过还没人做国际上的推广行动，我就想做这事。

在海外生活的这么多年里，我个人生活的经历也是非常曲折，我结过两次婚，又离过两次婚，我第一次结婚是和日本人结的，三年后就离婚了；第二次是和美国人结婚的，没到八个月也离婚了。我的第二个美国太太一个空中小姐，我那时候老是从美国飞日本，总能在飞机上遇见她，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但是我们在一起有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两个人光是吃饭就吃不到一起去，我爱吃中国的回锅肉，她爱吃的却是美国饭，因此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是分开的，她一盘她的饭、我一盘我的饭，感觉非常别扭，和她们由结合到分离我已经熟悉了和外国人谈恋爱的程序和感觉，这么多年来我甚至已经对用中文谈恋爱的感觉完全生疏了。

我到美同时的身体条件、技术掌握等方面的情形还不错，我当时一直认为自己是可以成为美国一流演员的，这曾经也是我到美国来之初给自己定下的一个目标，但是今天我可以说自己没有达到当年定下的美国目标。这里面的原国有很多，可能是因为我的路子走错了，我的机遇也不行，因此我一直没有在美国成名。相反，倒是我的过去是让我最骄傲的。我最辉煌的时候是给英国女皇做演出，当时，英国皇室的人看完演出之后全部站起来给我鼓掌。

当然，我想我英文能力不够好也是一个导致我没能在美国成功的关键原因，我虽然和美国人结过婚，但是我的英文还是不能过关。讲句笑话，我觉得外国男人到美国来最好的学英文办法就是和美国人谈恋爱，这样，你根本不需要文钱给学校去学英文。当然，用这种办法培养起来的英文也有毛病，我现在对英文就是会说不会写，就像中国人说的“文盲”一样。如果我的英文水准能更高一些的话，我相信的发展前景会更好。

未来我不是太强求自己在艺术的路上能够持久地走下去，如果能够在艺术上发展就发展，不行的话就再说别的，我最眼前的愿望就是想努力把我的这个舞蹈团搞大一点。

什么事，人都不能强求。

这样人可以过的平静一点。

陈燕妮思绪：

谈到未来，我突然一问，他停顿了很久。

无论在美国发展得顺遂与不顺的人，遇到这个话题，都是一件必须得想好了再说的大事，漂洋过海的，多少构思和磕碰，不就是为了今天能够答出这句回话？

看得出他已经不是当年在中国只属于舞蹈和丰田轿车的他了，美国的粗磨早让他知难。他体型仍然不错，脸型也属于消瘦一类，但已经开始做些除艺术之外的商业贸易，他称此为自己“转行的前期准备”。

他的长相很国际，乍见之下，不知道的人见他首先的第一感觉一定是一片疑云，他的脸让人一下子辨不出国籍。告诉他这个念头时，他不惭地笑了，说是“为什么不往西班牙那个方向去想”？

倒也果真。

我们对谈的那天，舞团已经放假，他言谈间有些疲倦，看得出心里藏着很多高压，美国优裕的生活之外是会有拖泥带水很多副产品的。我们闲散地谈了很多，谈了美国人，谈了中国人，谈了中国人和美国人，也谈了比如他再娶个中国人或者美国人的可能性。

两次婚姻的经历摆在眼前，他对自己的婚姻未来有些意兴阑珊。

而在艺术上，虽然已经有了“前期准备”，仍然不妨碍他产生畅想，未来除了提到过的要把舞团发展大、自己也挤进国际得奖编导阵营之外，他还有一些具体的构思，比如带团去中国各地演出，演出一台台很东方的节目之类，目前基本成型的是他已经开始一步步地把中国当年的舞剧《红色娘子军》硬排出来了。

他说起他的舞团排演《红色娘子军》过程时，听得人有点发呆，他的《红》剧有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细节和关键。他让由人扮起了“党代表”洪常青，连被海南岛恶霸关过、被皮鞭疯狂抽过的吴清华也安排的是白女人出演。

更而且，狠毒仅次于南霸天的“老四”这个角色顶上去的是个黑人，这黑“老四”一冲上场，灯光稍微暗下来，那厮看上去“满台都是牙”。

张宁

张宁背景

张宁背景：中国著名的“林立果妃子”。

1960 年通过参加三军文艺联考成为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舞蹈文艺兵；1964 年参加全军文艺汇报演出，并曾在轰动一时的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参加演出。其父为军队七级高级干部，1957 年去世，曾任中国荣军总校政委。

1968 年底被当时的中国政治人物林彪的家庭选为儿子林立果的未婚妻，被中国人称为“林立果的妃子”。1969 年正式被借调到北京。

1971 年正式进入林家三个月之后发生了轰动世界的“九一三”事件。张宁此后被捕，收押在中央林彪专案组接受审查，后转送北京卫戍区劳改农场劳改。

1975 年 9 月获释回家南京，至此结束历时四年的审查。回到南京后，进入南京市文化局下属太平天国博物馆担任资料员。1976 年 1 月与当年林彪派系人物邱会作的警卫参谋结婚，生有一子，后离婚。

1990 年与现任丈夫、美籍华人林赛圃结婚。林为纽约布鲁克林假发商人，张宁遂因为婚姻关系移居美国纽约，现居新泽西州泽西市。

1996 年在美完成个人自传《尘劫——张宁自述体传记》，同年加入美国籍。

张宁录音——

我小时候身上毛发很多，家里人就一直叫我“毛猴”，连我家的警卫员、公务员和保姆也一直这么叫我。说起来，我直到上小学的时候才有一个大名叫做张宁生。后来我去当兵，我的舞蹈老师说我的这个名字实在不好听，就给我改名为“张宁”。

我家里一共有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我就是那个唯一的女孩。

我 1960 年离家当兵的时候还不到十岁，我参加了当时的三军文艺联考，因为成绩实在太好，因此，三个兵种都要我。在评分时，我的名字后面被打了两个加号，是特优人员。后来我们团和上海芭蕾舞学校互相观摩的时候，我也因为技术好而让对方想用自己的五个学员来换我一个人。

在舞蹈界，我的发展一直比较顺利，那时候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也就是 1950 年左右出生的人都是发展比较不错的一群。再后来就开始不行了，中国从 1957 年开始反右之后，各种运动越来越多，庐山会议之后直接影响到下面工作的方式方法，我们这批人就全都趴下了。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之中，个人具有再好的条件也没有用了。在运动中，我们全被荒废了，事业也全没有了。

不然的话，我当年的业务实在是很好的，未来当个舞蹈家，心里是笃笃定定的。

1968 年底的时候林彪家里开始搞全国范围的“大选妃”行动，我就被选中了。其实当时他们做这种事情的时候非常自然，我第一次被他们观察就是被叫到北京去，林家出厕请几个总长、副总长的夫人看了一看。那时候我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是作为出差到北京去的。来看我的那些夫人也不显得是特意来的，她们都是你带我我带你地来走动的，我自己的出身又是高级干部家庭，来的人都是“叔叔”、”阿姨”，因此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到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已经是被内定的了。为这样的一次“选妃”行动，

林家实在是大动干戈，他们从全国 28 个省市，在 12 亿人中做过选择之后，最后认为我比较合适，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而且我至今也不知道当年林立果究竟是因为什么看上了我。我自己在林家也看到过一两个女孩被选上来，她们都非常漂亮，我自己都觉得她们比我还漂亮，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她们最终还是被选下去了。

也是到后来我才知道，在这一次选妃行动中，全中国前前后后光是有资格送照片上去的就有上千名女孩子，有资格让本人到北京的也有二三十个。当然，在这些可以到北京去的人里面也有男孩子，这些男孩子是为了给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选丈夫的。结果，选来选去选到最后，最后剩下来的就是我和张青霖两个人，我是给林立果的，张是给林立衡的。张青霖也是军人，是广州军区的外事干部。

这次选人过程是一个非常大的行动，动用了很多人力物力，影响非常不好。至于我和被选上的张青霖，我俩对这件事情也都是不同意的。因为我觉得自己根本就不认识林家，而且我的家庭和林家的地位悬殊也太大，婚姻基础本身就不牢固。林立衡和张青霖对这件事情也是很反感的，选到后来，林立衡是想杜绝叶群无止境地选下去，就应付着假装看中一个人算了，要了张青霖。张青霖本人其实和我的态度差不多，但是后来他发现林立衡的处境很可怜，因此，他很同情林立衡，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就真的交了朋友。

1969 年的时候，因为这个选妃的事情，我就被正式借调到北京去了。我和林立果之间的关系，是他硬要我，我被他控制了两年，没有能够摆脱得了，别扭到最后还是被强行调动过去了。

我到北京之后，没有三个月，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就被捕，进入中央林彪专案组接受审查，一同接受审查的还有林彪周围的人士，加上当年林彪派系的“黄吴李邱”四个办公室的人员。再后来，我又被送到北京卫戍区劳改农场劳改。

我在这里对“九一三”事件不便多讲，因为我自己马上就要出一本名叫《尘劫——张宁自述体传记》的自传，我在这里是会清清楚楚地把这些事情讲出来的。

我的这本书刚刚完稿，大约有 30 万字。我在这里可以透露的是，我在我未来将要出版的这本书中所说的“九一三”事件里面的所有内容，与中国过去所有写“九一三”事件的文章完全不一样。我最近看到国内有一本书刚刚出来，书名叫做《林彪——九一三事件》。这本书我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翻完了，我觉得其中的内容全部都是以当时审判林彪和四人帮集团时候官方公布的文件为基础写出来的。而且这本书中写到很多林彪身边人的交代揭发材料，也就是当时我身边的人，我和他们很熟悉，我当时听到的很多事情和现在在这本书里面看到的不是一回事，和我自已所见到的事情也不一样。

林彪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有关他的书也实在是很多，但是我敢这么说，所有后来出现的写林彪的书写的全部都是老生常谈的东西。

“九一三”事件，我在我的书里面会有详细描写。我写这本书断断续续用了两年的时间，因为我有孩子，有家务事要做，自己身体也不好，再加上回忆过去的事情有一定的顾虑，即便是写来的，我也有相当的存留考虑。这个过程当中，纽约曾经有一家杂志杜采访过我，把我要写书的事情发表出去了。这篇文章一出来，马上就有人作出反应，说“她是林家的人，当然会为林家讲话”。实际上我觉得中国大陆方针政策上即便有错误，在它里面总还

是有一个相对而言对和错的关系存在，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不管谁对谁错，我是写事实，人们想去看一个问题和听一个问题总是想听真的，总不会是想听假的吧？

我和林立果没有正式结婚，他比我大五岁，是属鸡的，1945 年出生的，当时他曾经要结婚，征求我的意见，我没有同意，这样一拖就拖到了“九一三”。我当时只是找借口，因为我当时要去医训班学习，刚学习就结婚会影响学习，我就说要等毕业之后再说。这都是我给他的原话。

在和林立果之前我有一个男朋友，他是我们团里吹双簧管的，我们两人性格很合得来，都是从小在军队里长大，谈恋爱也很守纪律，但我和他不得不断掉了。因为我被选中之后从组织方面就开始对我们两人的恋爱施加压力，如果我不和他断掉，他的前途就会很惨。当初邱会作的一个警卫参谋也曾经帮助过我，但是这个人在里面也动我的心思，后来事情被察觉之后，他就被开除党籍，定了一个现行反革命罪。

林彪事件后这个警卫参谋彼平反放出来了，等到我四年结束审查从林彪专案组出来之后，他找到我，就和我结婚了。

但是这个人不好。

我结婚之后生了一个孩子，我死掉的大儿子就是和这个人生的。结婚后我发现这个人和我好的动机是出于非常卑鄙的目的，我想只能用“卑鄙”这两个字来形容。当初我不知道林彪家选妃内定的是我，但是他是知道的，他之所以帮助我，是因为看到我被选进北京之后的情绪和前面两三个女孩子不一样，前面两三个女孩子在北京住下来之后非常高兴，精神非常愉快，但是我不一样，我愁眉苦脸的不愿意，常常闹着要走。

结婚后我发现我和我的这个丈夫两个人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的家庭背景也很不一样，对事情的看法也完全不一样，拧不到一起去。当初他对我进行所谓的帮助也是有他自己私心杂念的。而且我们两个人结婚也是他一直坚持的结果，就好像是我欠了他的似的，他说自己是因为我的事情受迫害的，我当时头脑也非常简单，觉得也是，就很潦草、马虎地决定了自己一生中的婚姻大事。

说起来我这个人的命也是很苦的，我和自己真爱的初恋对象反而不能在一起，最后他和别人结婚了；和林立果的事情是大家都看好的，我又不愿意；我偏偏就和这个人结婚了。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心思结婚，刚刚从专案组劳改农场被放出来，心情也很不好，马马虎虎地就这样了。

我对这个婚姻的感觉很不好，结婚之后就感觉不好。结婚后当年我们就有了孩子，但是我们很快就离婚了。我开始一个人抚养孩子。

从专案组回来之后我被分配到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工作，担任资料员，那时的生活比较艰苦，我凭自己微薄的薪水养自己、养儿子。那时候日子比较难过，我因为有林彪家的背景，领导上也歧视，各方面的待遇也受到影响。那时中国各方面的物价已经开始慢慢地升上去了，物价高，工资又低，日子非常不好过。好在我的军龄很长，到地方军龄可以算工龄，因此那时候我的工资是一百零八块人民币。

但我群众关系不错，周围大部分人对我很好，很同情我。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我又曾经去经商，这样才赚到一点钱。

我和第一个丈夫离婚后，身边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人出现，有的人是很讨厌的。其实情况讲开了也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这种人还能凭什么，不就是

一个牌子扛在那里吗？我爸爸去世很早，我也没享受到什么高于家庭的好处，我自己的专业也丢掉了，不能继续干，身体也不好，论姿色也赶不上那些年轻貌美的小丫头了。那时候日子很不好过，我自己也很清楚，只是想安稳地过自己的日子。

但在追求我的人中有一个人相信是心理变态，纠缠了好一阵之后，知道自己迫不上我就害我儿子。那时候我已经独自把孩子抚养到了十二岁，孩子就去世了。

儿子死了之后我精神受到很大打击，为此我曾经准备出家。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本来想寄希望在儿子身上，现在儿子没有了，我也不想活在世界上。那一阵子我每天想到的事情就是如何给孩子报仇。

我后来还是决定要出家，但是几个高僧见了我之后告诉我，我的“尘缘未了不能出家”。我想这个尘缘可能是因为我儿子的事情吧，我就想等到给孩子报仇之后再出家吧。

我知道害我儿子的肯定是那个人，但是人证、物证和公安局办案的能力都出现了问题，所以也急不得。

没想到高僧们的话应到我现在的丈夫林赛圃的身上了。林赛圃是看了海外的华文报纸之后知道我要出家这件事的，报纸上登出来我是南京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就按照这个线索寄信给我，我的名字在附近单位里谁都知道，尽管他把地址寄错了，但是我的大工作范围是对的，信还是由邮局寄到我的手里。

他对我当时的处境非常同情，但是他认为我选择出家的举动太消极，正好那时他也已经离婚了，家里有一个儿子才五岁，又有自己的生意，一个人忙不过来了，他也觉得我应该有一个安稳的家庭。他原来的老婆也很漂亮，但是不安于室，因此他要找的是一个既有经历、心地又很善良、又能懂得人生的女人，他觉得我经历过一番苦难，应该比其他的女人好一些。

他就按照这个标准去想我，也按这个标准来娶我。

林赛圃是从浙江到美国发展的，他是 1978 年改革开放第一年就出去的人。他的家庭状况比较复杂，解放前他祖上就是经商的，家里国共两党的人全有。1949 年解放之后，他们家里跟国民党亲近的人就出去了，跟共产党亲近的人就留下来了。他家曾经是在当地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后来被扫地出门，赤贫得很，因此，林赛圃从青少年时期生活就很苦，苦得不得了。

他比我大十岁，是一个看问题比较客观的人，他比较喜欢读政治、历史方面的事情，也喜欢看一些史书传记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在写“九一三”的事情的时候，林赛圃也说了自己的观点，他希望我能够实实在在地写过去的事情。

我和林赛圃结婚之后就到美国居住了。

到美国之后我先是学过一段时间的英语，后来就安心在家里工作，家里也确实需要人，我就一直没有出去工作，把整个家务担子挑起来。林赛圃是个不愿意应酬的人，他从来不在外面吃饭，每天下班之后就回家吃饭。他做假发生意，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开了两个假发店，他的公司叫做“富尔顿集团企业有限公司”。现在在布鲁克林搞假发零售的大公司也就是我们这一家了。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一些其他的生意，但是零售方面就只是做假发一项。

我和林赛圃的相遇算是缘份，我相信这些东西。我的一生，包括我现在和林赛圃的这个孩子的出生也都验证了这些东西。

活到今天，我对生活的目标其实很盲目。我的性格是很收敛、很内在的，周围的人对我也都有很好的印象。

我这一生上去的时候很平和，下来的时候人家贱我，我不自贱。到林赛圃这里来之后，他的成长环境、性格脾气和我都不是一回事，但是我能够适应这种环境。而且，当年我和他结婚的时候也希望他能帮助我给孩子报仇，1988 年、1989 年的时候，国外的一句话在国内就像一个大炮那么响了，我儿子死后，我知道自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有一个最原始的条件，那就是我这个人，既然他林赛圃找来了，而且放弃那么多年轻貌美、急于出国的女孩子不要来找到我，那时候的我面黄肌瘦的，身体又有病，不知林赛圃怎么就能看上我。林赛圃的到来使我想到自己可以转变身份，从国外向国内施加压力，搞清楚儿子死亡的真正原因，为儿子报仇。

这样的话，我们就见面了。我当然主要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如果他愿意，那就可以随他而去；如果他不愿意，那我也不会求他。

他见到我之后，我就问他，我儿子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他说知道，我说：我们出国之后你能帮助我为我儿子报仇吗？他说自己会全力帮助我。紧接着，他就催着我去办理结婚手续。

和他结婚之后就出国了。他果然在国外给我很多帮助，我们出去社交的时候他都注意地帮助我介绍有关的人。然后我真的在国外造成了舆论，传回国内之后对国内触动很大，我儿子的案子马上就破案了。当时作案是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认定的那个追我不成的人，他姐夫是公安局的，本人是一个无业游民，曾经当过工人，在家里是独生子，因此家里能够养着他，性格非常霸道。

凶手终于伏法了，我终于为儿子报了仇。

我的心愿达到了，但是这并不是说我的生活也可以过得得心应手了。我在国内的时候一直起点是很高的，一直是尖子演员，就算在林立果这件事情上栽了跟头，但也是被捧在手心里送上去的。就算后来下来了，在地方上工作不顺心，但是基础还是高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到美国来了，没有根基，命运受人家的支配，自己不出去工作就没有经济来源，在这种状况下生活心情就会很压抑。在家里工作，一天到晚就是拖地板、做饭、打扫屎尿之类的，开始时总是觉得心里不充实，但是到了后来我终于适应了。

这个适应过程很长，大约花了四年的时间。

我不适应的那段时间非常难过。但是我们并不吵架，他性格内向，我是一个讲理的人，也不会无事生非，我这个人心里不装事情，有什么事情都会讲出来，这样我们之间的矛盾总是很快地得到解决。

我听他的亲戚讲，林赛圃娶了我之后改变很大，但是究竟改变了什么我也搞不清。

我和林赛圃目前已经到了这个年龄层了，一个四十岁，一个五十岁，我们已经非常懂得生活了，这里面也有珍惜家庭的意思。当年我和林赛圃也说过，我出国之后如果能把儿子的仇报了，我也会反馈回来，把你的家会搞得好好的。

我不会辜负他的，而且，重要的是，他对我也非常好。现在回过头来看林彪的事情，我觉得政治这件事情实在太可怕了。政治权力到了一定的程度，底下的人就被搞得像木偶一样了，在大人物手里，一个小小百姓算什么？我就是这种人，当时很多被选的人不都也是这样吗？整个人都被控制在那里，

一个组织命令下来，随便找一个借口就可以了，你还得服服贴贴的。因此，当年林家对我讲不上什么好与不好，因为权力到了那种层次之后，整个事情就会有分明的等级、待遇和规格，这些东西可以把你框起来。林彪和叶群用不着亲手来关照我，他们讲一句话就可以让整个医疗保健的、厨房的一套班子把你给围起来，我和他们之间没有感情上的交流。我在那时候必须用自己的心去感觉哪些人是比较有人味的。我感觉，林彪家里的人除了叶群之外，都比较有人味。林彪的妻子叶群的“人渣味”太重，身上不好的毛病太多。

我和林家唯一剩下来人——林立衡还有来往，当时和我一齐被选中的张青霖还是和她在一起，他们两个人是事实婚姻，江青当年在专案组的时候要害林立衡，想灭口，但是有张青霖在就多一点保护，她的命实在是拣回来的。我和他们乎时没有什么往来，打电话也太远了。

谈到未来的打算，我自己虽然有心但是已经没有劲了，因为我马上就快要五十岁了，我只想帮助老头子把家里搞搞好，未来再换一个大一点的独门独院的房子。

来美国的第三年我就可以加入美国籍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去办理，总觉得自己还是要回去的人，但是今年以来老头子催得很厉害，我就加入了美国籍。

我脑子里装的东西，这么多年来就是忘不掉。

一闭上眼睛，常常回到过去。

我的新作《尘劫》，算是个完完整整的总结。

陈燕妮思绪：

去找张宁，绝对极是有备而去，先是用长途电话透过中国当年大人物罗青长的公子再三劝说才获应允，后是非但整个美东的行程为她一个人而提前两周，甚至即便专程到了东部还早早地住到她家的附近等待那一刻。

见面的时候却觉得这个长约对她说来并不经意。到达新泽西州她家门口时，在她的楼下按了四五下长长的门铃后她才从三楼探出一个湿蓬蓬的头来，抱歉他说刚刚洗澡过后，正在睡觉。

她的个头竟是如此之高，站起来的时候我们两人竟快平齐，这种身高在她那个时代绝对珍稀。

她人已发胖，下腹也约略地隆起，但却有一副执拗的秀眉秀眼。

她和林赛圃的儿子长相漂亮，在我们周围不停地跑来跑去。这孩子叫林佛欣，是张宁好不容易地在四十三岁生的，不说高龄产妇的种种不适，单单是怀了四胎才保下来这一说，就已经稀罕。唯一可惜的是小小林佛欣虽已三岁多，但却还不会讲话，张宁比较着急。

但那孩子非常机敏，有很多灵气，眉眼也大气，将来又断会是一个深不可测。

后来，林赛圃从外面回来，屋里的大家猛地庄重起来，早闻听他的长相和林彪相象，有备而看他的出现，果真。他也姓林、也有大八字眉，初见之下，给人的感觉有些震憾。

他不大说话，大家不能免俗地猛谈中国时局的时候，他静默不语，像个深沉的长者。他一回来，张宁拢过去，姿态适中，也很和位置。

张宁很随意，不似想象中的拘谨，也不似想象中的开阔，即便后来她说起往事的时候，也是一副家常感觉。

我们都坐看，我面向着她，她却面向着电视中的奥运会韵律体操，几次

谈到紧要之处，我以为她就要哭了，可她一直没有。很想看看张宁年轻时候的照片，她说自己年轻时候皮肤颜色非常好，眼睛明亮，谁见到都忘不掉，“我自己经常也感到自己的肤色太美了”。几句话更勾起许多好奇和急切，但是她却遗憾地说自己已经没有过去的照片了。她的道理是，年轻时尤其是“选美”的时候她照片被首长左一张右一张地要走，因此“全没有了”。他们的房子在新泽西州的一个繁闹的路边,闹中取静地取在一些墙墙相连的‘城市屋”中，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我坚持问：你现在的生活是你所想要的吗？

她先是说这个问题是自己一直想到但是从来没有正视的事情，然后就谈了些旁枝的他事。

我坚持再问：你现在的生活是你所想要的吗？

她终于说：“不是我要的。但是我没有条件。”我一向不好读史，读张宁，虽是“野史”，终是破例。

毕琦

毕琦背景

1969 年初中毕业后从北京赴黑龙江建设兵团工作。1976 年回到北京，半年后参军，进入 63 军文工团工作，五年后文工团解散。1980 年进入刚刚复刊的《北京晚报》专刊部实习，三个月之后正式调入《北京晚报》做记者。期间，其采写的新闻《风雪夜赶牛羊》等作品曾获全国好新闻奖、北京市新闻作品一等奖及《北京晚报》新闻奖等多个奖项，并曾经成功地采访过船王包玉钢等著名人物，在 80 年代北京新闻圈中享有盛名。

1983 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深造，1986 年毕业。出国前，其为《北京晚报》经济部负责人。

1987 年赴美留学，进入洛杉矶成人社区学校学习英文，留学初期做过各种底层工作。

1990 年起进入美国华文电视媒体工作，曾在北美卫星电视台、中国电视台工作多年，1992 年开始创办美国东方电视台，任该台总经理职务。两年后，东方电视台关闭。

目前从事中美两地医疗器械、灯具和礼品等进出口方面生意。

毕琦录音——

实际上，找出国前的很多想法和经历，在当年中国很出名的一个由胡平和张胜友合写的报告文学《世界大串联》中都提到过，而且那里面用的是我的真名实姓。

当年他们采访我的时候正好是在我即将出国的前三天，实话实说，我当时是碍于情面不得不接受他们采访的。那时候，中国出国的人还比较少，我大概是我们报社第一个出国的人，我当时只想悄悄出国，一走了之，不愿意四处宣扬我的想法。他们来采访我之前，我们彼此曾经达成过协议，说好了不要在采访中写出我的名字。但是他们没有遵守诺言，我的名字还是出现了。他们的作品当年很出名，不但出书了，而且还在《光明日报》上连载了。

当年我要离开《北京晚报》的时候，我去和我的社长道别。他告诉我说报社里其实正要提拔我，他希望我能够留下来。但是我当时还是想走，我觉得我已经在中国呆了很多年了，我想出国去看一看，多学一点知识。

虽然当时我已经 33 岁了，但是我出国后还是想去上点学。直到现在我回国的时候辽常常还有人对我说：如果你当年不出国的话，如今会有多么多么好。但是，如果让现在的我想象“如果我当年不出国”的后果究竟会好到什么样，我心里也没有一个底。

而且我想，谁的心里也没有一个底。

说句实话，当年我在《北京晚报》当记者的时候虽然干得挺欢，但是有时也挺伤心的。我在北京曾经想采访西方石油大王哈默，因为我知道他是世界上唯一见过列宁的在世之人，但是直到最后我也没有被批准采访。那时候，有好几个我自己认为非常好的选题领导上最后都没有让我报导，比如说当时的“空军一号”事件、世界乒乓球冠军庄则栋复出写《闯与创》之类的事情都被压下来了。当然，当时的我并不在报社的领导岗位上，我不知道领导真正的苦衷，但是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来说感到非常难受。

说实话，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散漫的生活和工作的：早在我当兵的时候，我们的主任和指导员就说过：“从你身上看不出一点解放军的气质。而且，你一到来，我们这个部队就不是正规军，改土八路了。”

回忆起我过去走过的路，实在是丰富多采。我这辈子干过的工作不下几十种，在建设兵团的时候就跟人家盖过房子、打过小工，后来我又修过水田、挖过土方、割过麦子大豆、修过电线杆子，很多你想不出来的工作我都干过，各种各样生活的苦我都受过。我一直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为了争取入团，16岁的年纪硬是在野外干活把自己的后背全部晒出大水泡，每一个水泡都有拳头那么大。就凭我一米七零个头的身子板，到现在也没有人相信我能够扛着一个180斤重的粮食包走到三四层楼高的粮食库中卸下来。而且，这样的活我曾经和我的三个同伴连续干了三个月。那次发狠地干活，我们四个人最后算了一下，那三个月里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最少过了150万斤的粮食。

我那时非常渴望进步，由于总体表现不错，后来我终于人团我是 1980年进入《北京晚报》的，那时的《北京晚报》刚刚复刊，而我到报社最初的名义是去专刊部实习。我干得不坏，很快的，我就被正式调进去工作了。我在那里工作的时间并不算长，大约两年之后我就开始准备去美国留学了。

1985年的时候我去过德国采访，对海外的状态有一些了解，但是对于长期在海外生活我想我心里还是没有底的。我当时一句英语不会，出国的时候我只会说一句“谢谢”和“拜拜”。在到美国的飞机上每一个人境的人都要填写一份美国移民局要求填写的1—94表格，这个表格上要求填写人填写上自己的国籍，但是英文的“国籍”这个字我根本不知道，我就在那一栏里填上自己的出生日期了。等到我入关的时候，我的表格让移民官也糊涂了，他问我话我也听不懂，他一个劲地说“NO”，我就一个劲地说“YES”。最后，这个麻烦还是海关方面找到一个会中文的翻译说了半天才解决掉。

我是以留学身份到美国学习语言的，这个手续是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帮我办的，学校是洛杉矶成人社区学校。我到美国之后就只是在学校里学了十个月的语言，后来就再也没有进过学校。

我来美国最初是在加州的圣荷西住，当时我在国内的一个好朋友早我一步出国，他住在那里，他曾经在总政文工团当过导演，我来美国之后就去找他了。

我的美国打工生涯开始得非常早，我前一天晚上到美国后，第二天早上就和我的这个导演朋友去他所工作的餐馆里上班了。

现在和过去都有很多人说美国或好或坏，但是我总觉得任何人说的和写的，都比不上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我的这位导演朋友在这家餐馆是洗碗工人，我去了之后就把他的工作接下来，他升成推车去厅堂里收脏碗筷的小弟了。我刚开始洗碗的时候，工资每个月只有七百块钱，这对刚到美国的我来说是一个还不错的数字。但是，要命的事情是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干过体力活了，在美国被逼得没办法真干起来的时候，实在有点不习惯。

美国的事情就是这样，虽然你已经不习惯这类工作了，但是因为你没有钱、没有靠山，因此你不但要干而且还要忍气吞声。我的这个“洗碗”的职位是厨房里最低级的工作，任何人都可以指使和欺负你。这家餐馆的老板是一个台湾人，他对大陆人的工作态度有很多成见。

我干的这个活说句糙话，那实在是真他妈的累。每天早上十点钟一到餐馆，我就要先蒸上一大锅饭，把昨天晚上吃剩下来的碗洗出来，然后就开始打杂，这包括切肉、摘菜等等非常繁琐的事情。到中午十一点半客人一上来，我就像洗碗机一样必须一直不停地干，生意好的时候盘子周转不过来，忙到最后老板也不得不过来帮助我洗碗。

每天，我从早上十点钟进去之后一直于到晚上十点钟，基本上没有休息的时候。中午两点半之后没有什么客人来吃饭，餐馆等于打烊了，这时候，厨师他们可以在店里睡一下觉，但是我还是不能停下来，我必须把整个厨房的地洗了，然后把厨房中的垫子拿到外面去晒，晒到下午五点之前还要把这些垫子拿回来。

我就这么咬着牙干了二十多天，等到我觉得自己实在干不下去的时候，老板主动要求我留下来，并提出要给我多加二百块钱的工资。他说我和我的那位导演朋友是他所见到的大陆人中干活最踏实的。

到美国来，我其实对这种体力劳动还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我有上过山下过乡的基础。再后来的日子里，我还要上学，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我干得最苦的时候是每天早上 7 点半起床去上课，上到中午 11 点 45 分的时候必须趁着老师不注意从课堂上溜走以便能够准时赶到餐馆去打工。最忙的时候我打两份不同的餐馆工，就是 12 点钟去第一家餐馆打工，干到下午两点半钟结束工作。吃完饭后时间就已经将近 3 点，我开着一辆几百块钱买来的美国雪佛莱大破车赶到另外一家餐馆再做第二份工。我会在那里一直干到晚上 10 点钟，吃完晚饭后紧接着又打一个“夜宵”工。这些工作全干完之后就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回到家里的时候洗洗涮涮到 3 点钟，睡上三四个小时之后，早上 7 点半又得起床上课。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养成了抓紧一切时间睡觉的习惯，除了常常在课堂上睡觉之外，有时候中午两点钟我打完第一个工的时候也会到外面公共图书馆的草地上睡一觉，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这么拼命地打工我每个月辛苦下来多的时候能够挣一千五、六百美元，这种生涯也使得我对餐馆内部作业的一套非常熟悉。我知道我必须这么干才能在美国站起来。如果你问我在美国最深的体会是什么，那么我能够告诉你的就是：什么都不要说，先把自己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再谈其他的事业。

这么过了一阵之后，我在北京就认识的演员朋友王姬老说希望大家都能在一个城市里住着，她说这样会热闹一点，她提议我到洛杉矶去住。我一想，“人挪活树挪死”，我就开着我的破车，把自己的所有家当都放在里面，一车就把人和家当全挪到洛杉矶了。

我到洛杉矶之后就到好莱坞日落大道上紧挨着有明星手印、脚印的“中国戏院”旁边一家韩国人开的餐馆里给人家送外卖，我工作的地点是在好莱坞的中心区，马路的地面上到处都是以艺术明星名字命名的星星。我们餐馆附近有很多影视制作公司中午的时候会叫饭菜，我从这个时候起开始接触到好莱坞的一些事情。虽然我工作的这个餐馆条件不太好，工资给得特别低，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熟悉一下美国的电影工业环境，因此，我在这方面特别留意，别人送一份外卖可能 15 分钟就回来了，我送一个外卖可能 45 分钟也回不来，因为我时常有意地留在人家的制作间里和电影人打交道，每到这种时候，人家就会告诉我一些好菜坞的事情。

但是后来我还是和餐馆老板闹翻了，这时候正好赶上总部设在治杉矶的北美卫星电视台开张招人，我就去应征。我本身过去是干过新闻的，因此，没有费什么力气我就被电视台录用了。这个台最初的老板是一个台湾国民党中将，我在这个台里工作的时候和他一直没有关系缓和过，他一直说我是“共产党的特务”。

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工作是给这个台配台呼，就是给电视台的片头配音，

除此之外我还做一些简单的电视片剪接工作。这么干了三十月之后电视台的那一套东西我就基本上全学会了。

我一直在这个电视台干了两年多。

再后来我又转入一家叫做“中国电视”的电视台工作，老板也是一个台湾人，他为了省钱，整个电视台只雇了我和另外一个秘书小姐两个工作人员。当时，我在电视台里干几乎所有的专业工作，我编新闻稿、写新闻、配音、采访、摄像，所有的专业工作全部是我一个人干。

在搞这个台的时候我已经和一个朋友开始搞广告之类的业务，开了一个广告公司。我们当时做得不错，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在美国做的第一个路边广告牌就是我们帮助他们树立起来的。

但是，“中国电视”做着做着就做不下去了，在它要倒的时候，我和我的生意伙伴商量了一下，正好当时我们手里也有一些钱，就准备自己开设一家电视台。要关闭的“中国电视”正好想处理台里的旧机器，我们就都给买下来了，作为我们自己新台的设备。

我们的电视台就这么成立起来了，我任这个电视台的总经理。虽说是在美国办华文电视台，不属于主流文化，但是竞争也非常激烈，全洛杉矶最多的时候有 13 家中文电视台竞争，但是，在众多电视台中，亲中国大陆的电视台就只有熊猫电视台一家。我们的节目基本上全部来自中国大陆各电视台。

我们一开始是在有线电视台租频道，每天播出一个小时的节目，后来，我们改为每天播出两个小时，再后来我们把自己的节目挪到无线台上，这样，广告客户好拉了一些。

在美国做电视是要拿广告养人的，我们经营得好的时候一个小时的节目能够拉到十多个广告。但是后来传播媒体更加多起来，大家竞相杀价，盈利很少，我们的经济状况变得很紧。

在电视台的日常采访中，我还是又做剪接又做编辑，我们电视台人数最多的时候雇的人也没有超过五个，出去采访一般就是我这个总经理扛着机器。那个时候我们的电视台对美国当地新闻和大陆新闻的双向报导很多，而且和上海东方电视台也做过连网播出，他们把他们的新闻给我们，我们也把美国的地方新闻提供给他们。比如洛杉矶 1994 年北岭大地震的时候，很多上海观众打电话和发传真过来直接要求我们报导一下北岭地震时候洛杉矶的具体情况，我们就依照当时的情况采访当地的华人做出系列报导，这个新闻在当时的上海东方电视台是以头条新闻的位置发出去的。

我们一共做了两年自己的电视台，从长远看，我们的经济效益不太好，再加上这时候从国内过来的电视节目带子开始要收费了，因为国内台也开始强调经济效益方面的问题，我们一下子就变得非常难维持。当时我们和中国的很多电视台都有关系，河北、天津、辽宁、北京、安徽、陕西等台我们都跑过。但是关系熟归熟，国内提供的带子还是开始收费了，看到这样的情况，我的生意伙伴就说：实在不行，咱们两人也别干了，大家下海做生意吧。

这样，我们的电视台就关了。

不做电视台了，我们做开生意了，但是这对我个人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其实，我实在不是一个适合做生意的人。人家说，做生意首先要奸和狡猾，这些我都不占。我斗不过那些精明的生意场上的人，我在商场里吃过很多的亏。我最惨的时候被一个台湾人骗得身上就剩下六块钱了。当时我的银行帐户上还有七十六块钱，但是训人硬是有本事把我的那七十块骗走，就给我剩

六块钱，这点钱连银行的月服务费都付不了。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生意人，我做事情常常理想化，以往很多不成功的生意除了和台湾人做的，也包括和国内一些机构做的。我曾经做过中美两地公司联手交流的联络工作，有时候，当我把国内的公司和一个美国相关公司联系上之后，我就被完全被排除在外，没有下文了。

我说过，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讲我真不是一个生意人，但是我的生意历史也不是完全不成功，这么多年来我也组织过大陆访问团到美国来考察，也介绍过一些中国好的医疗设备到美国来。我在美国于过五、六年的新闻工作，洛杉矶搞新闻的人基本上我都认识，而且各个社团的头儿我也都比较熟悉。这对我的生意有些帮助。我现在一直做灯和礼品生意，最多的时候我一年回大陆七八趟。

到美国这么多年了，就我个人当初到美国来的目标而言，就对生活的经历而言，我确实是酸甜苦辣都尝过了。也就是说，一个从海外抵美的华人到美国之后所能够尝到过的滋味我全都尝过了，这里面包括吃过的苦，也包括人所能够享受到的舒适，当然也包括受过的骗，这些我都经历过，但是我当年想在美国完成学业的最初想法，是落空了的。

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概括我到美国究竟有没有实现自己的预期愿望这个问题。

到美国来之后，直到今天，我个人的温饱问题是解决了。当然，从温饱这一点上来讲，几乎所有在美国呆过一些年的中国人可以说都解决得不错。我太太就说过：很多人说美国生活苦，在美国的中国人一见面大家也都会有很多牢骚，但是中国人在美国的生活并不是真的那么清苦。我太太是 1991 年到美国来的，那时候她看到大陆人的同乡会或联谊会有什么聚会的话，来宾开的车子大多数是二手车，那时候如果有人能够开一辆 TOYOTA 的 CAMERY 之类的新车，就已经是蛮不错的了。等到现在再来看这个事情，大约是从 1994 年开始，大陆人如果再开各种聚会，你可以看到停车场上会有很多奔驰、宝马和凌志车，开旧车的人已经非常少了，偶尔能够看到的一两辆旧车也是新来的人开的。而且，现在从大陆再来美国的人，一起手也绝对不会像我八七年前来美国时候的那种样子，只买得起三四百块美元的破车。现在到美国的大陆年轻人，我几乎没有见到过像我们当年一样到餐馆洗碗去的人，现在洛杉矶的洗碗工全部是墨西哥人，没有一个中国人干这种事情。

回顾我过去十多年来走过的人生道路，我常常想，一个人做事不要后悔。我在美国呆了十年了，但是我知道我也没有白呆，我了解了另外一个生活的世界，我知道了美国的人是在怎么样生活，人家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下活着，这丰富了我自己的生活阅历。我这一辈子赶上过很多大事。我在中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那是前元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我想今生今世也就这一次了，不会再有了，但是被我经历了。而且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也赶上了，这是两次中国近 30 年来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现在我又赶上了中国的“出国潮”这样一个事件。

在国外的日子里，前几年我还是坚持写东西，主要给台湾、香港等地方的报刊写一些中国过去事件的报告文学之类的。在美国，我也拍过美国公司制作的广告，给人家配过音，做过很多方面的事情。也许我现在在某些地方不如我一直留在国内工作的一些旧同事，但是我觉得我在其他方面比他们得到的东西多，比如社会阅历方面的丰富，这是他们没有办法达到的事情。

但是，即便我有这样的感触，如果你问一个中国记者在美国能够有什么样的发展这个问题，我还是觉得我必须回答：发展前景不大。

而我今生最大的目标并不是想发大财，在美国呆过十年的我一直有自己的一个梦想：当我有足够资金的时候我就会躲到一个地方去，悄悄写作。

也就是，一个人，悄悄地，没有人打扰地写作。

陈燕妮思绪：

和他约在洛杉矶著名的一家港式西餐厅碰面，他的声音和语调有和周遭环境完全不相称的平和。记得我点的饮料名称恐怖，竟然叫做“地震”。

这次采访之后，我发现我价格不菲的一个皮包不翼而飞。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物件，样式和颜色都是我的最心爱。因为是约在餐厅中见面，因为录音的关系，噪闹之声迫使我们几次迁移，最后一次的时候，我相信就是在那时，我最心爱的这一件，离我而去。

多少天了，好长一阵子我放不下这件事情，那是那种 MCM 牌子、大大的澄黄手袋，丢失之后，沮丧良久，一段时间内竟然不愿意看到任何皮包之类的类同物。在后来必须要欢乐起来的多少天里，在心里一直用这次有关毕琦采访的价值来自我平衡，最后，对于那个皮包，我终于不得不想通了，情结也就淡化了。我知道，平衡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做各种比较。

常常有人在遇到抉择的时候就列出一个表格来，把两项的所有差异排列出来，划勾或打叉，看个明白。毕琦就是，我关于皮包的情结也很是。

后来我想，我的“皮包事件”大概可能是毕琦心中所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个联接和比喻吧。这么不恭地比下来，你会觉得，人如果有得，没有失自是最好，不然的话就得退而求其次地进行再比较。自然，人对于改变是有一些神秘意识的，中国人更就有“挪活”的说法，因此，“到美国去”就是这么在中国人中间稍成气候的。

如今再回头，过来了，就是过来了。

我问他如果让他重新再回到当年他出国之前的状态，同样的一个机会下,在已经确知自己在美国今天的发展前提下,“你还会再选择走出中国吗”?

他停顿了不短的时间，告诉我“这问题是不成立的问题。”他说自己之所以不后悔，是因为自己喜欢创新的东西，仅仅是出国这么十年来就丰富了他庞大的人生阅历这件事来说，他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如果这是一个经历，你能说什么呢？这么看来，与毕琦该分手的时候，竟然觉得眼前的他渐次地显现出若干的史学价值。

所有过去的，都是值得的。

对于过去了的澄黄皮包，我也就大释然。

刘禾

刘禾背景

1957 年出生，1974 年中学毕业后到西北河西走廊武威地区插队。1976 年考入甘肃师范大学英语系，1979 年毕业分配到武威师范学校任中专英文教师。1980 年考入山东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研究生，后获硕士学位。1983 年毕业后留校教授英文。

1984 年得到美国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基金赴美从事研究活动一年。1985 年考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90 年博士毕业后进入美国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跨系教授，1995 年获得伯克利加大终身教授职位。

刘禾录音——

直到今天我都坚持说我自己是适合搞理工科的。

我真的一直是想学理工科的，我在中学时就很喜欢数学。后来，即使是在插队的时候我也对理工有所偏爱。当年，工农兵大学生兴起的时候，我们知青点上只有两个名额，一个是到北京大学去读计算机数学系，还有一个是到甘肃师范大学学英语，后来因为我们那个地区书记的孩子走了后门，抢走了到北大的名额，我没有读成北大的计算机系，只好去甘肃学了英文。

我是 1979 年毕业的，我们这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当时，中国的各大学里正式考试进来的 77、78、79 级学生都已经进校了，我们因为是工农兵学员，和他们连吃饭的食堂都不一样，我们的食堂品质就会差一点。

1984 年，我得到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到美国来搞研究。从那以后，在美国多少年的学习生活里，我一直是拿着奖学金学习的，因此，一直以来我在经济上没有什么压力。

做了一年研究之后，1985 年我报考了哈佛的比较文学系和英文系两个系，准备攻读博士学位，结果我被两个系同时录取了，经过反复选择，我决定去读比较文学专业。

在哈佛读比较文学必须要读三种语言的文学，我就学了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我在美国的读书过程没有那么辛苦，但是也绝对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

我在哈佛读书时要看很多书，但是我的兴趣就在这里，这可能和我在中国的时候曾经当年没有书看有关系吧。我在中国武威的时候想考硕士研究生，但是一直找不到任何参考书，当地图书馆的藏书量甚主连私人藏书的规模都不如。那时，我报考的山东大学研究生考试要考核文学史而且需要考生用英文来答题，那时我简直被没有书这件事弄得很着急，迫不得已，我只好把一本名叫《世界文学史》的书找来，把里面有关的章节全部翻译成为英文，这是我唯一可以用来熟习材料的方法。所以，当我到哈佛读书之后发现可以有这么多书读，实在是非常着迷。哈佛的图书馆是一流的，每次，一到了里面就让我高兴得不行。

在美国，读文科专业是没有大多社会上的位置的，如果你读了文科的博士，那你的出路就只能是到大学去教书。我读的这个比较文学专业一直不是很好找工作的专业，即便是在读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所学的专业在未来除了当教授之外还能做什么。因为专业没有什么就业前景，我的同学中有很多人转行，但是我却一直觉得这个专业十分吸引我。

后来我终于毕业了，也面临到该找工作的时候了，这时候我已经知道在

美国找工作是有些规矩可寻的。在美国学文科的人找工作的情形是这样的：每年到 11 月份的时候，美国有一个组织叫做“现代语言协会”简称“MLA”，这个组织会把当年所有的工作机会都列在一起，各学校在招人的时候就都把广告打到那里去，所有找工作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翻查工作资料，如果你认为哪个工作跟你的情形符合，你就可以写信到用人单位去推荐自己，对方如果也对你感兴趣的话就会在每年 MLA 开会的时候对你进行面试。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我现在在伯克利加大的工作机会。伯克利一直是我向往的一个学校，1996 年初，全美极具名望的研究所 NATIONALRESERCHINSTITUTE 做出评断说，伯克利的研究生教育在全美名列第一。

曾经，有一个挺有名气的电影名字就叫《60 年代的伯克利》，你如果去看一遍就会知道，我们学校在 60 年代整个影响到美国的政治、民权运动，很多很有意思的事件就是从这里发起的。

我申请了伯克利的职位后，伯克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是要到 MLA 会议举办的时候对我进行面试。我面试的那年 MLA 的会议是在华盛顿召开的，我就去了华盛顿。

这种初次面试的一般情形是用人单位如果要招一个人，会同时请六七个人都去面试。我那次面试时，伯克利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的系主任都到那里去了，我不知道和我一同参加面试的人究竟有几个，但是我知道那次面试中总共有三个人被挑上了。

这三个被选上的人会再被请到伯克利加大校园里去进行演讲面试，经过校方乃至各部门评估之后再从中选出一个人来。这种竞争实在是残酷。

被通知可以到伯克利加大演讲面试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到过美国西部，哈佛在标准的美国东部麻州，而伯克利在标准的美国西部加州。2 月份的时候我接到要到伯克利演讲的通知，那时候哈佛所在的波士顿相当冷，冰天雪地的，但是一到了加州则正是最好的天气。我当时住在伯克利加大校园俱乐部的招待所里，我住的房子面向着一颗玉兰花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真好，我真想在这里工作，因为这个地方让我感觉十分随便，个像东部那么拘谨。

但是，进到校园开始面试之后的日子立即变得十分可怕，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真累啊。当然，这也是程序化了的过程。在那几天当中，从早到晚都有人陪着你，一会儿是去会见系里的同事，一会儿去见学生，你必须和各种人谈话。即使是吃午饭的时间也要和某些指定的人吃，所有人都来问你问题，晚饭当中又是问问题，从早到晚都要应付。

如今的我也开始面试别人，做当年别人给我做过的工作了，回想起自己走过的未时路，实在有很多感慨。

但是教授这行在美国也不是好做的。美国的大学分很多等级，研究生院越大，学校的程度就越高，教授不但要教学，还要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如果你没有做好研究，不但终身教职拿不到，而且后面的问题会非常多。美国要求学校中的教授首先就要是一个学者。美国大学中的教职总的来说是分两种，这在招人广告中常常就是明说的。一种是可以进入编制的，最后可以进入终身教职；另外一种是给你几年的合约，让你进来教书，这种教职不一定能得到终身教职。

作为一个教授，我的年纪不算很大，但是我到伯克利工作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最年轻的，因为我不知道美国同事们的年龄，我相信我们的年纪差不

多。比较特殊的是：我是第一个到伯克利这样的大学来教文科的中国大陆人，理科部分我知道伯克利有大陆人在当教授，和我同年来到的就有另外一个大陆女孩去了工程系。

我所在的学院是伯克利的文理学院，在我们伯克利，比较文学系二十多个教授中我是第一个获得终身教职的非白人女性。站在这个位置上，从族裔的角度来讲，我显得很特殊。

我们学校的族裔招生比例相当敏感，绝对可以反映出美国种族气候是怎样的，我们学校里有色人种学生非常普遍，但是到了教授这个阶层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想现在在我们学校里，非白人教授只占百分之十以下，女性也少。在美国的大学课堂中，白种男人的形象很自然地是和权威连在一起的，历来，女性进入美国大学中教学就没有很长的历史，更尤其是一个非白人的女性。当然，如果说到真正的种族歧视，我想我还没有体会到。但是有时尤其是教本科学生的时候，我一出现在讲台上，就会从学生的眼睛里读出惊讶来，潜意识里他们一定没有想到会有我这么一个形象的人出现在讲台上。

这种状况需要你用自己的教学和时间来消除，当你教过几次课之后，这种现象就会被他们习惯，这是要有一个习惯过程的。但是美国种族歧视的历史摆在那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的班上很少有黑人学生，我这么多年教书教下来，总共我只教过两个黑人，他们都有着很不容易的背景。现在在伯克利，白人学生和亚裔学生的比例差个多。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左右，但是有一年新入学的新生比例中，亚裔学生曾经超过了白人。

我来到伯克利加大之后，发现有许多非常有意思的学术问题一直展开不了，我就和一些历史学家以及一些搞人类学、文学的人商量着是不是我们可以搞一个会议，由我去申请有关的经费。1992 年，也就是我到伯克利加大工作的第二年，我们在伯克利搞了一个大型会议，这个会主要是东亚研究领域里的研究会议，这个会议的名字叫做“东方主义之后”，主要探讨的是一些在理论界争论了很久的问题，会议结束后还促成一个杂志的发行。

世界当代文学名人中有一个叫做萨依德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是近十五年来影响很大的理论家，他的有些理论在理论界争论了很长时间，我们觉得其中有很多问题能够往前再推进一下，这个会议就想起到这个推进作用。在我们的操办之下，会议果真开成了，参加会议的学者都是在各自有关领域中做理论的人。这个会果真是一个盛大的会议，甚至有几万人参加，这些在美国大学中比较活跃的中青年学者聚集在一起，讨论今后的东亚问题研究究竟如何展开、如何和过去的研究做出区别等方面进行事情。在这个会议上，我们强调要加强理论上的创新，不光在萨依德的理论上有讨论，而且对东亚问题研究的展开也做了探讨，这个会和刊物都是基于这样的目的构想和产生的，在当时的学术界成为很大的一件事情。

那时我刚刚从哈佛毕业，刚到这里教书，事情主要就是我和一个历史学家唐尼巴勒两个人一起搞起来的。现在，她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是个白人女性。对于整个会议，我们是发起者，我们一起讨论会议的内容？讨论请什么人？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使这个会开成。那一阵子，我忙极了，我写各种报告、为会议找钱，当我真的找到钱后，连我也很吃惊为什么有人给我这个钱。

不光如此，这个会也让其他很多人吃惊。我们的这个会议是不负责参加者路费的，只管住宿，但是大家还是都来了。后来，配合这个会，作为后续的部分，我们在杜克大学出版的相关杂志也结学界带来相当的影响，这个杂

志培养了相当一批中青年学者，把东方和西方研究的事情理论化，而且铺得比较远。更可贵的是，我们的这个会议把我们这样一帮学者联系在了一起。

当然，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和我的专业紧密相连的。我所在的伯克利东亚系主要是研究语言和文学的，我是负责中国文学的现代文学方面课程的，有时候也教文学史。在教学中，我通常安排一个是研究生的讨论班，一个是本科生的课。在比较文学系里，我的教学任务则主要是教当代文学理论。我最近上过的一门课是叙事学理论、翻译理论，再有就是文化批评方面的课。

一个星期我通常上六个小时的课，研究生的课是三个小时一块上，一星期一次，本科生的课则是一次一个半小时。在美国当教授有很多隐藏着的工作，这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但是相当花时间，比如讨论系里的事情、讨论学生申请钱方面的事情、讨论系里财务问题之类的，会议多极了。我们学校规定我们的课时是一年四门课，我因为跨着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教书，我的时间是由这两个系平分的，所以我在每个系都教两门课，带七八个博士研究生。我的这些学生的素质很好，其中有两个是大陆来的，也有从台湾来的，也有美国人。

伯克利是美国的名校，并不好进，我曾经参加过的一次系里研究生招生，那次我们大约要从八十个申请者中挑选三四个人录取，竞争也非常激烈。

在美国的大学里，文科中有许多教语言的教师，但是他们一般都是讲师以下的职位。如果是搞研究加上负责教学的教授，一上来先会当助理教授，这其实相当于中国的讲师及副教授之间的一个位置、然后当副教授，再然后当正教授。在年薪方面，伯克利和其他美国学校基本一样，1990 年我刚来工作的时候，文科助理教授的年薪一般在三万五到三万六之间，现在，因为有通货膨胀等因素，刚进来的文科助理教授年薪会在三万七左右，然后一级一级地向上升，等拿到终身教职的时候再跳一下，到最后，文科教授一般会拿到四万七到五万之间。

相对而言，理科教授的薪水比较高，因为他们还可以有咨询等方面的收入，他们的年薪甚至可以拿到十几万。

在美国任何大学里要想得到终身教授职位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过程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1995 年我在得到教授终身职的时候情况十分顺利，大家都挺支持我的，我的运气挺好，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运气，有的系为这种事情闹得十分激烈，简直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拿到终身教职之后，如果想再往上升迁比如从副教授到正教授之间，在文科教授来讲，起码还需要出版一本书的资格。这之间的过渡时间长短看个人情况而定。也有的人在拿到终身教职之后就不再向往从副教授升正教授了，这完全是看个人的意愿。

但是说来说去，在美国大学里，最重要的也还是钱的问题，没有钱的话，任何学术都繁荣不起来。美国大学近年来缺钱的情况很严重，这种例子随手就是，比如说我所在的东亚系，系里的语言教学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情况一好，想进来学汉语的本科生就特别多，但是学校里因为没有经费，没有能力雇人来教学，因此，我的同事告诉我，他们一年内常常会推走两百多个学生。与此同时，美国的终身教授是不能被裁员的，经费一短缺，所有的教授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减薪水，我们学校就有过这样的事情，开始是大家的薪水减少百分之五，后来又减了百分之二点五，最近才恢复到正常的薪水数字上来。当然，这是一种度过难关的办法，这样就不用裁员了，也算是大家共

甘苦吧。学校里再一个节省经费的办法是最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那就是将许多系合并，这样可以裁减下去一些公务人员。

在我们学校里，各系的系主任是轮流做的，这个职位实在占时间太多，因此大家都想免掉，做系主任你要于很多事务性的工作，你要去找钱，要为了自己系的利益和别人打架，你要凶。当然，如果你做了系主任，学校方面会给你减课，也会给你一点点钱，但是不多，和你付出的精力和时间相比远远不够，系主任五年一换，但是如果你当到第三年不愿意继续再做下去的话，也可以推掉不做。

美国大学里也和中国人的情形差不多，有很多派系，有的系严重到每个人都不和其他人说话，最后连系主任都选不出来了，只好从别的系派人过去，因为只有这个新人才可以和其他人讲话。我们学校里曾经有一个很大的系长时间没有系主任，全由他们系的秘书来代为召集会议，他们系里采用全部民主、集体投票的形式来决定任何事情。很多年了，他们一直这样做，直到最近他们的系里才终于选出了系主任。

这种派系有的是来自个人私怨、有的是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有的是来自年龄上代与代之间的不沟通，挺复杂的。到伯克利来了这么多年，我从没有卷入任何派系。这几年我虽然做研究比较累，但是我没有受到来自人事方面的干扰，从这一点上来说，我的运气又比较好。

在美国做文科教授收入不是那么高，但是你可以有很多自己的时间来看书。我相当重视每年暑假的时间，平时相比之下没有什么空，暑假的时候我就用来写自己的书。伯克利的学术风气比较活跃，便于发挥个人的思维，不像哈佛风气那么保守。我到伯克利之后，发现在教职员工中，做类似工作的同龄人之间哪怕是不同领域的人，大家都会彼此对对方所做的工作感兴趣，大家常常互相交换论文。与此同时我还参加了一些教授之间组织的阅读小组，大家一同读理论，非常有助于提高。

最近几年我常常回国，和国内的同行们进行各种交流非常愉快，也积累了很多心得。如今，我已经在伯克利周围买了自己的房子，养过一只很机灵的猫叫做“猫仔”的一同生活，生活很安静。

如今的我还有当年做学生时的毛病，只要有书，生活就觉得有意思。我知道我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也全是因为我从骨子里就爱读书，读书这事，永远使我兴奋。

陈燕妮思绪：

“教授”这词从历史上就让人肃然起敬，无论中外，这点规则再没有了，也就乱了。

但把“教授”一词和她交叠，觉得有些难办。而且还是伯克利的教授。

伯克利是一个非常难进的学校，有一个说法是：在美国，哈佛是私立大学中最好的、伯克利是公立大学中最好的。而两校之间的这种玄妙关系又构成了一种“私相授受”的公开状况：伯克利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想去哈佛教书，哈佛的学生又大多想去伯克利，说是既新鲜了大家，也保持了品味。伯克利的文科科系中有很多著名的汉学家在那里教过书，中国人大都熟知的赵元任，也曾是伯克利教授。除此之外，校园内还有很多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人士，比如李远哲。

伯克利的比较文学系更是全美国的前一、二名，刘禾的位置，就在于此。

伯克利一直领美国风气之先，学生反叛得相当有传统，久了，竟成为使

命般地卸不下来了。直到现在，这个学校里的学生每年还要罢一次课，你会怀疑他们这么做已经成为对历史下意识的延续了，不做的，像是“孙子”。

我在采访她的时候，今年伯克利的罢课又开始了，每次一到这样的时候，刘禾就带着自己的学生们到咖啡馆里去上课。

她拿给我看由史坦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她四百九十多页的论文《跨语际的实践》，这本巨大厚书从理论方面探讨了中国和西方刚开始接触时在语言、文化、历史上产生了哪些现象，又是怎样落实到语言实践层面上的，并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她研究的是 19 世纪的事情，讲完之后又从那时往前推。

听她谈说她的厚书已经感觉玄而又玄的时候，她引伸出来的另一个新想法竟又是要“再往前推”，看着她小小的神态，我的意识常有错乱，面前的她和社会位置上的她概念上的不合，感觉中是她强加给他人的一个固执结论。一直听到她的朋友说样子娇小、1957 年出生的地进入伯克利的时候给整个学校一个相当的震憾，就这个的话题我问她时，她无论如何也不承认。

她爱穿牛仔裤，足登新式马轧，脖子上常常出现三件以上的悬挂，和她的很多接触中和漫长的谈话里，自然会平铺直叙地断想不起她的公众面目，更断不能想到她的“再往前推”。如此，奈何。

丁绍光

丁绍光背景

1939 年出生于陕西，1955 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学习。1957 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画系。1962 年毕业后赴云南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画、油画及版画，同年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曾经多次参加全国及省市美展。1979 年为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创制大型壁画“美丽、丰富、神奇的西双版纳。”

1980 年 7 月赴美，1983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中国水墨画及中国现代重彩画，作品在南加州大学（USC）纪念马丁路德金绘画比赛中获得首奖，同年以国际知名艺术家身份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

1986 年与美国海鸥艺术公司（SEAGALFINEART）签约，开始发行自己作品的丝网印版画，自 1986 年至 1996 年间共发行丝网印版画 80 种，在全球上千家画廊中展销。同时，其在世界各地举办个人画展四百多次，作品收藏者遍及美洲、欧洲、亚洲各国和地区。1992 年加入美国籍。1992 年 3 月佳世德“中国 19 世纪——20 世纪绘画拍卖”中，其作品《白夜》以 220 万港币售出，创中国当年在世画家历史拍卖金额最高记录，同年并曾捐款四十万元人民币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设立“张光字艺术奖金”。

作品《母性》等曾多次被联合国邮政局指定为流通世界的邮票及首日封画作，现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名誉教授、山西大学容座教授、云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昆明师范大学名誉教授、深圳大学名誉教授、“国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长、“世界美术家联盟”主席、美国百人会会员等职。

丁绍光录音——

1980 年 7 月 19 日是我到美国的日子，我是以探亲身份到美国来的，当时我妈妈从台湾到美国来见我。我妹妹那时也已经在美国了，她来得比较早些，是 1976 年来的。

和很多写中国人在美国生活的书中说的一样，我到美国来的时候和不少人相同，口袋里确实只有 20 美元，来美国之后我先在我妹妹家里住了四个月左右的时间，我没有多带我个人的作品，只带了一些素描和一些宣纸。我来的那个时候美国美术界对中国画家成见很深，我曾经拼命地为自己找过画廊，但是没有一家画廊要看我的画，根本提不到要不要我。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妹妹带着我去挨家寻找画廊时，对方总是先问“这个画家是从哪儿来的？”当他们一听说我是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画家时，就立即说“我们没有兴趣。”

我想当初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态度，是因为如果一个来自中国的画家是画中国画的，那么他在美国一定没有卖画市场；如果是画西洋画的，那么他们认为这个画家的创作一定是对西方艺术的一种临摹。

当时，我们把能够找到的画廊都找遍了，大概总也有百八十家吧，这里面包括洛杉矶的、纽约的乃至美国其它州的，但结果都一样，没有一家对我有兴趣。当然，等我后来真正成事之后，很多画廊很后悔，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来看看我的画。

后来有一天，我听说洛杉矶拉古那海滩那里画廊比较多，我就让我妹妹开车带着我去了那里，一到那里我们就进了一家画廊，这个画廊是法国人开的，我把我的画打开之后，画廊的人一看就说；“喔，你是从巴黎来的？”我说不是。他说：“那你一定在巴黎留过学。”我说也没有。这么多画廊里

只有这家画廊对我的画有兴趣，但是不巧的是它很快就关门了。

当时在拉古那海滩有一些画家在摆地摊卖自己的画，我妹妹就说我们似乎也可以在这里摆一些画来卖。我在那些地摊边上看了一圈，觉得实在没有顺眼的东西，就坚决地说：“不，我的画不想放在这儿。”那时的我之所以这么说倒不是因为狂，我只是还有一点自信。在那段时间里，也有一些美国的学校要给我奖学金让我去上学，但是我还是放弃了，我想我在中国的大学里已经是教了二十多年书的人了，跑到美国来反而要当学生，我不愿意。

但是即便四处碰壁碰到这么惨，我当时的生活来源主要也还是靠卖画。在这个期间，我进入了当地的华人社区，同时也进入了洛杉矶邦克黑尔艺术家团体，在这个团体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包括黑人画家、墨西哥画家和亚洲画家。这些画家们的水平都不是很高，但可贵的是大家很团结，经常联合起来开一些画展。那时候我还不会开车，都是黑人画家们帮助我拉画。

在那个时期，我在洛杉矶的五六年时间里总共参加过三十多次画展，其中有个展也有合展。那时候我不拒绝任何画展，只要有可以露头的机会我都参加。

记得那几年我已经从我妹妹家里搬出来了，就住在靠近中国城的一个小破房子里，每个月的租金是 180 元。那间房子的面积大概只有我现在比华利山房子中厨房里吃饭区的一小半大。那里住着很多中国穷留学生，大家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洗澡，洗澡房间里也没有淋浴，只有一个澡盆子。我们的房东是一个广东人，养了六个孩子，全靠出租这个房子过日子，因此非常穷，也非常节省，我们每次洗澡时他都把水控制得很紧，洗一次澡要等水“嘀哒”两个钟头才能洗完。我那时因为房间太小，我又常常要画一些比较大的画，就只好把桌子和床搭在一起，睡觉的时候，人要钻过去才能上床。

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名叫“亚洲艺术节”的画展，地点是在中国城的华人服务中心，参展的作品有上百件，主要是亚洲人的作品。在这些参展作品中，我的画相当突出，我记得有一个大学的美术教授一进展厅之后直奔我的画，然后就和主办人讲：“这个人的画怎么能摆在这里呢？”他后来执意要和我见面，我们见面之后他又一定要到我的画室去参观。我因为自己的房子状况非常不好，就一定不要他去，但是他坚持要去，我就只好带他去了。他到了我住的房子之后，看到竟然是那样一种情形，一进门他就开始骂美国。这件事情给我的印像很深，我直到今天都记得。不但记得这些，我也一直记得当年和我在一起的艺术团体里那些黑人兄弟。

这之后的我开始得到美国社会的一些注意，也陆续得了一些奖，我逐渐在美国绘画界的非专业区取得了一些名声，美国的一些大学也开始注意到我。我在美国生活，经济方面一直没有出现过很严重的问题，以前赚到的钱很少，但生活也简单，我卖自己的白描，买家基本上以华人为主，我的一批白描画就是在那时被全部卖光

在这时候，我的人生中发生了一件大事。

1983 年我和一些美国朋友到墨西哥去玩，当时我的绿卡还没有拿到，在美国合法居留的身份也过期了，自己觉得过墨西哥边界有点困难，不过同去的美国人说我只要持有加州的驾驶执照就行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听从了他们的说法，和他们一起上路了。车子开到墨西哥的时候没有任何麻烦，但是再回美国的时候我们就被堵住了。当时和我同去的美国朋友和边界上的人撒了一个谎，说我是美国公民，因为这样就可以不需要看绿卡

或者身份证件：但是我的英文一问就落馅了，我立即就被卡在那里了。我这时赶快给我在洛杉矶的移民律师打电话，说我已经被困在墨西哥边界上回不了美国了。我的律师一听情况就说“那你完了。”确实也是，从很多前例来看，这时的我绝对是完了，因为我首先是在美国非法居留，在这期间离开美国又没有签证。当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回中国重新办签证，这在美国移民法规上讲得是很清楚的。

巧的是，这次和我一同到墨西哥的美国朋友中有一个人是英文《洛杉矶周报》的记者，他回到美国之后，把我的画放大了十多张，然后拿着这些画到处为我回美国的事情奔走。他的这一工作非常有效果，加州一些大学的校长后来联名给美国移民局写信要求准许我回美国，而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也出面聘请我到他们学校里教授夜校学生的中国重彩画。再后来，加州州长身边的一些相关人士动员了很大一批力量，纷纷写信到白宫。接到这些信函之后，有一个众议员叫做约翰路斯明的带着他的助理康尼明斯基特别到墨西哥去看我，告诉我美国方面的情况。这些曾经帮了我大忙的人的名字我都记得非常清楚，我能有今天，和他们当年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同时，他把我安排进当地的一个别墅里住，他说是因为安全方面的考虑。后来，白宫方面给了我一个特别文件，当时白宫和移民局提出的条件就是准许这个特殊人才进入美国，但是不要登报。白宫方面说，这种特别文件我们只发给过两种人，一个是边界上的严重病人，因为来不及办理美国的签证，就让病人先进入美国国境进行抢救；另外一例是发给政变国家的国家领袖。

我在墨西哥总共呆了 21 天。关于我的特别文件批准之后被寄到了美国的边界城市圣地亚哥。但是当地移民局局长正好外出度假，因此没有人做主，我就直接上飞机飞到洛杉矶由当地移民局官员接待我重进美国。

回到美国之后我的合法居留身份问题就解决了，绿卡也有了。后来我考公民的时候也还曾有一些麻烦，因为我拿不出任何有关的私人移民文件。当然这样一来虽然开始在做手续的时候有些不方便，但是后来在宣誓加入美国籍的时候我竟然被选成一个移民典型。1991 年，我的入籍宣誓是在台上单独进行的，是在几千人的注视下由大法官单独主持的。

我其实一直不愿意加入美国籍，因为我想保持一个中国画家的身份，但是后来我在全世界各地总是有画展，我意识到如果有一个美国护照会非常方便来往，这是我入籍美国的唯一原因。

我来美国时已经 40 岁了，从到美国来的第一天起我就下决心要在这个世界里闯出自己的天下，从来没有打过退堂鼓。从到美国开始，我的画一直还是可以卖的，只不过那时和现在卖画在价钱上是有很大距离的。当时，我卖得最便宜的画是小素描画，大约四百块美元一张；大的色彩画可以从八百块钱起价。到了我后来正式进入美国画坛，开始发行自己的丝网画的时候，也就是在 1986 年左右，我的一张画已经可以卖到八千多块钱。

我在美国的前六年中虽然不如后来那么成功，但是这六年实在是我的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那时候美国画廊对中国画家一概拒绝的风气让我很生气，所以当时的六年对我来说等于是一个学术上的准备过程。当然，认真说到我在学术上的观念这在中国时可以说就已经确定了，我要搞能够和西方艺术平起平坐的中国的现代艺术。到美国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把东方和西方艺术在学术上做一个比较。

通过对东西方两地的艺术进行比较，我意识到：我在西方看到任何艺术

状态都能在中国找到同样的东西，真的，真的能找到。而且，我觉得，从二十世纪开始的西方现代艺术运动是西方向东方靠拢的运动，因为西方过去走的是一条艺术科学的道路，主张正确的解剖学、透视学，也包括十九世纪之后开始的色彩学。十九世纪末，摄影的出现，对整个画坛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打破了绘画是人们留下肖像的唯一手段的局面，电影出现之后就更加完善了把人的音容笑貌留下来的科学，因此，科学从某种意义上代替了绘画艺术，绘画艺术出现了危机。这样，很多画家就开始找出路。第一是很多画家开始搞电影，世界上很多好导演都是学美术出身的；再有就是画家们开始寻找电影和摄影所代替不了的艺术品，这就是现代艺术的开始，它提倡画家不仅仅是画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还要画心灵感受的东西。在这里，西方现代艺术家们找到了两个主要的学习方向，一个是东方，一个是非洲的原始艺术。我所说的“向东方靠拢”也就是这样产生的。

西方人在这个时候选择靠拢东方完全是站在现代艺术的观点上的，他们从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但没有背上东方艺术的包袱。

我来美国的前六年中觉得自己的立足点有了很大的转变。我个人的学画过程在青年时代基本上是学西方，从古典主义走到西方现代，然后我到了云南，我当老师的时候才开始搞传统画。我的中国画是自学的，我研究了版画，研究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版画。到了美国之后看到西方的现代艺术，我首先知道自己要把立足点放到世界的角度上来，然后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去找营养，这样，我发现了很多很好的东西。比方说中国的彩陶文化、画像砖和年轮画等等，从这些原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现代画家可以吸取很多营养，然后用现代的观点重新创作，这六年时间给我的是一个沉恩的过程，东方、西方的艺术我已经全部经历过，与此同时，我也想清楚了自己未来的创作应该走以下的道路：首先是东方和西方结合，但是根在东方；第二是古典和现代的结合；第三是抽像与具像结合。

到了 1986 年，我觉得自己比较成熟了，就开始再次正式地找画商，当时我通过一个律师楼协助，请他们帮助我找。我在律师楼中挂了我的几张画，我后来的画商让·西钢（RON.SEGAL）就是这么找到的。那一次他告诉那位帮助我的律师说他“今天从那里过，只能进去二十分钟”，但是他一进去就坐到了天黑，一直没有离开，然后他带着我的画参加了在纽约召开的艺术博览会，当时他准备在三张画里选一张作为第一张丝网印刷画的原作，但是他带去的三张画当场就被全部抢掉，三张的丝网印也被全部订光了。这也就是我后来出版的第一、第二，第三张丝网印画。这三张画因为身份特殊，我牢牢地记住了它们的名字，它们分别是《和谐》、《落日中的阿诗玛》及《母亲和孩子》。

从这以后我在美国画界的发展基本上就开始一帆风顺了。西钢也开始代理我的画，他一直代理直到 1994 年。在代理我的画之前，他只是一个很小的发行商，当时他手里只有两个画家，口袋里也只有两万美金，连印一张丝网印的钱都不够，去印刷的时候只能忖一半定金。但是因为我的画出来之后就被抢光了，所以他就这么接下来了。他在后米的七年里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发行商之一，甚至是美国三大发行商之一。

从 1986 年开始到 1994 年，我的画连续在世界上举行过三百多次个人作品展，作品的收藏面扩大到四十多个国家。最贵的时候我的一张原作可以卖到五十万美元，丝网印作品可以卖到一万八千美元，在日本的价格还不止如

此。我提出的与画商的分成的比例也很高，那就是去掉成本，利润对半分成。我的这种条件是很厉害的，我想不是很多画家能够做到这点的，即便是美国画家也难做到。

我的作品一般是走原作和丝网印同时出售的路子，开始的时候我的每张原作一般印 450 张丝网印，后来增加到了 500，再后来又再增加到了 550。我作品产量最多的时候是在 1986 和 1987 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想法多，出的东西也快，每年大约能画出 70 张画。后来，我的社会活动多了起来，画展也多起来，创作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现在，我在创作方面的数量一直保持在每年 25 张原作的水平上，已经不想画那么多。特别是美国乃至世界经济萧条的这几年，我的原作就一直保持在这个数字上，丝网印刷照样发行。现在我的原作价格一般保持在 8 万美元起价，最高可以达到 50 万左右。

在美国，我一直被画商们称为是“云南画派”中发展最成功的一位。但是对“云南画派”这个词我从来不认同。这个名字是画商们这样叫的，我认为这是极没有水平的叫法，在艺术上毫无价值，在现代艺术上以一个地名来称呼一个画派是很没有水平的。我想我的画可以称为“现代重彩画”，这是我自己这么叫的，但是我的画不属于“云南画派”。我的画出来之后因为受到欢迎，因此有一些旅美画家开始模仿，但我个人对此一点也不在乎，近两天的伦敦拍卖，又出现了我的一张假画，照片刚好今天寄到。

有些人说我的画是在迎合商业市场，我想世界上是有商业画的，也有人画商业画，但是我想这种画只能够保持一个很短暂的寿命，如果能够在画坛上保持三年不倒的地位，那这个画家一定是有一点东西的。当年，所谓“云南画派”的画好卖的时候，很多人临摹我的画，我当时就讲：“幸运的话，这些人当中将来只可能留下一两个人。”事实证明这话是对的，如果你不能继续向前走，你就会被淘汰。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来。几年前，我曾经在纽约达延森画廊举行个人画展，这个画廊在很多画家眼中属于商业性画廊，因为它大多卖一些很流行的作品。在画展举行的前一天，我和一群北京画家到家住纽约的中国画家袁运生家里来会，在那里，画家们大发牢骚，大骂美国如何不懂得艺术。我因为当年从工艺美院毕业后一直在云南工作，因此大部分到场的画家我都不认识。聚会到最后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第二天会有一个画展在达延森举行，请大家出席。

那次我的画展卖得很好，所有的画几乎全部卖光了。这时候就有一个北京画家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如果有本事，就去打进 STIDI047。”听他这一说，我一下子就记注这个画廊的名字，不然的话我还不知道美国有这样一个画廊。回到西部之后，西钢问我下半年的画展计划，我就要他去打听这个“STIDI047”，我说我要在那里举行画展，他一个电话打过去，还没说几句事情就 OK 了。

目前中国画家在美国发展普遍成为这样一种状态，专业技术很好，但是个人风格不明确、创造性不强，因此，整体的艺术地位在美国基本上处于中下。很多中国画家在靠画画肖像和教学生维生，再差一点的可以到街上去画像。

1994 年之后我作品的发行方式有了重大改变，我开始自己经销自己的作品，我的公司就叫做“丁绍光艺术中心”，对于这个中心我不需要自己去经

营，我只要参加一些重大决策，作品的销售基本上沿着以前的路走。之所以走上自己经营的道路，是因为我和原来的发行商西钢的合约已经到期，当年我和他签下的合约是七年，后来合约期满的时候我要离开，但我如果离开的话整个西刚办公室的人就可能要失业。这样，我就又延长了十四个月的合约，所以，我前后和西钢的合作大约进行了八年零两个月。在这之间，我们的合作也有一些不愉快。合作的前一两年时他还是埋头苦干的，但是后来他整天去打高尔夫球，常常是画展要开三个星期，他最多只在画展上待一个星期，其余的时间就到夏威夷去打高尔夫球，我本人还要在画展那里呆着。而且，我和他的合约标明了是要在四家报刊上刊登广告为我的作品做宣传的，但是他后来只登两家，再后来就干脆不登了。基于这些不愉快，我本人也想早日结束我们之间的关系。

现在，全球整个大经济环境不好，我采取的销售策略是不涨价也不降价，最近几年画界受经济低迷冲击很大，大约从 1991 年底 1992 年初开始，画家们都在降价卖画，这样又造成新的恶性循环。那两年，整个美国的画廊有百分之六七十关闭，但是我连续几年仍旧是世界画家在日本卖画头号纪录的保持者。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我在全世界的代理画廊达到一千五百家，但是作品只有四百五十张，根本不够分。其实我觉得，世界上真正的卖画市场还是在美国。美国的画坛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规矩，在世界上来讲这些规矩都是相当先进的。如果你看苏士比等国际拍卖会的情况，世界性的艺术品中有百分之五十是美国人买的，欧洲占百分之二十七，亚洲人只占百分之三，这里面包括日本、台湾和香港，这个数字令人吃惊。

未来我想我绝对仍旧是一个画家，不是一个商人，商人总是在搞数字比赛，我不想和别人比这个。我想我艺术创作的关键是要在历史上站住脚，我想在学术上多下点功夫，所以，三年之后我将可能停止出售我的原作，丝网印刷也要把数字减下来，争取减少到 99 张，或者 199 张。这样的话，丝网印刷的价钱可以提高，原作积累起来可以到世界各大博物馆进行巡回展出。用这种手段控制原作的发行，我原作的价格也会跳上去，我的收入不会比现在少，但是我在学术上，完全变了一个样。

一个画家其实最需要有自知之明，要能很准确地把自己的地位明确，这点是不能动摇的。在不动摇的同时，为人处事的姿态要尽量低下来，我想，这才是完善艺术家人生的一条正途。

多少年来，我对自己从没动摇。

我并且竭力遵循这条正途。

陈燕妮思绪：

他位于世界著名的豪华之区比华利山的房子是 1990 年买的，当年和至今都曾引起许多在美华人的仰望和耳语。他买的时候，一说当时曾有三个人对这房子属意，其中一个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是由其胞弟出面斡旋价钱的。对于他房子的真正价格，也是一个著名的争执，一说是两百万美元，一说是一千万，也有一说甚至反而是六十万，认真问他的时候，他说出的数字是“ 总共四百五十万 ”。除此之外，去年和今年，他更买进一个更加令人晕眩的比华利豪宅和一个商业中心。

他为人不错，属于有钱人中的一介怪异，只要他能，他会尽量帮助任何人。美西很多有求于他的人都得到过他很多很多的帮助，明面上和暗地里。

他年轻的爱人是一个英文极佳的北京女孩，也是和我年龄相同、颇为投

契的朋友，我们常常就一起约了到家边上的小吃店里吃粗饺子，讲小时候攻占煤堆的很多往事。该女孩不做作，对丁绍光崇拜有加。去年国内曾有摄制组来美拍丁绍光，作为解说词撰稿人的我和她一起同往机场迎接来人。在机场出口外才稍做停车就有警察黑头黑脸地上来斥责停得不是地方，并要我们出示驾驶执照，该小爱人当时正规地从怀里抽出一张“丁绍光艺术中心”的名片，一递出去，说是“我们和他是一起的，他是很有名的一个艺术家”，那警察大批被她淡定的表情所惊讶，竟微笑着挥手放了我们的行。她是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近水楼台，多年来已经成为丁绍光艺术思想最完整准确的领悟人。

我前往采访的时候，两人刚刚有了一个女儿，雪白的通体。这小丫头满月的时候我曾应邀到丁家庆祝，再后来，小丫头周年的时候，我又被邀参加预订在外的酒席。席上感人的高潮，是做母亲的一下子当着众多的注视哭了出来。那一刻，四下寂静，自然每个人都深知，那个位置，那个众人明了的位置，是一个舞台。因为缔造出极多现像，丁绍光担当了极多说法，不变的是他一直的顺境。对于这种成功，值得领域遥远的我，遥远致敬。至少，他炮制奇迹。

于萌萌

于萌萌背景

1966 年文革开始时父亲去世，由母亲带着赴河南农村劳动六年，期间经历丸死一生。1975 年回京，进入一机部精密机床修理总站，在热处理车间当工人。1978 年在《工人日报》经济部任记者。1979 年曾因其现任丈夫、新西兰华侨扬知行的原因牵连入狱。

1983 年出狱后与已为美国公司工作的杨知行在中国结婚，婚后赴美定居，在美期间曾在餐馆、贸易公司、银行等行业做过多种工作，三年前与人联手开设美国东方旅游公司至今。

于萌萌录音

每个人到美国来的动机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我仍然相信我的动机是最特殊的我是因为认识了一个人而必须到美国来的，这个人就是我的丈夫杨知行。

现在，每次说起“美同不是大堂”这句活，我即便是跟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说，他们也不相信，他们好像看穿一切似地看着我，说我这么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说起来，我和杨知行是在很早以前认识的。他的出身情况比较特殊，他是在新西兰出生的华侨，他们家在新西兰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家庭，他爸爸是一个工业家，也是有名的侨领。他们家的兄弟几个也都常在中国呆着。我之所以能和他认识是因为当年我们曾经一同在干校里劳动过，那时候是 1969 年，我才十六七岁，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出生在新西兰，十三岁时到了香港，后来就一直在新西兰电影公司做事，虽然不是中国人，但是经历并不复杂。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读书，后来他走了，离开中国又到别的地方生活去了，十三年之后他又回中国来了，当时他是回来上研究生的，又回到中央美院学国画。恰恰在他又回来的这一次我们很偶然地又碰到了。

这一次巧合让我感觉到很多东西，我感觉我们之中有一种默契。我们自然就开始交往了。

这种时候，找周围的很多人就开始说话了。在那时的中国，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展开交往，尤其这个男人是从海外来的，别人就会觉得这个女人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更何况当时的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当时我刚刚开始成为《工人日报》的记者不久，工作不错，工作得也不错，上上夜班、划划版，有时候也外出采采访。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又遇到杨知行的，那一年是 1979 年。

我和杨知行的交往从一开始就很著名，对我而言，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和杨知行这个新西兰出生的中国人来往，这里面也可能存在一些杨知行自己的其他原因。

这件事情成为当时《工人日报》的一大新闻。我们报社的党组要我做检查，说我有“思想作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我当时非常火，我对他们说我既不是“思想作风”也不是“生活作风”问题。党组说，如果你不做检查，你就不能继续在经济部做记者，你只能到发行科去工作。当时我所在的经济部在《工人日报》中算是最大的一个部，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经济日报》，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就很吃重。我们部主要是管工业、交通和经济

方面的报道。当时国内刚刚开始比较注意经济恢复，所以在报社里我们经济部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部门。因此，把我调出这个部门也算是对我的一个惩罚。

我出狱之后，杨知行对我不错，他主动提出要和我结婚，说句实在话，我虽然是因为他的事情进的监狱，但是真正想到要和他结婚，我又犹豫起来。这时，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对我说：“按照你的这种情况，如果在中国这个社会里你还想继续生活下去的话，你就必须和杨知行结婚，哪怕你和他结婚之后再离婚，你也需要做出这件事来证明你这个人。”

当时我的确不知道自己今后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我甚至连自己能不能在《工人日报》呆下去都不知道。我原来的那个男朋友当时在事业上已经很辉煌了，科学院数学所只收一个名额的时候，他就考上去了。但是，我和他交朋友四年，他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和我结婚，反倒是我和他提过这种事情。我和杨知行在一起之前，我曾经和我的这个男朋友提过，我问他“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婚了？”他说“我现在还不知道。”因此我们就分手了。

而我和杨知行在一起，已经是这以后的事了。

我和杨知行的年龄相差并不是很大，我们只差十三岁，但是有关我们的传言却五花八门，很多传言说我在和一个外国老头乱搞。其实，在我生活当中只是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其实还在团中央呆过，甚至也认得不少团中央高级人物，我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和他的交往以及随之而来的事情把我自己给自己设计的一步步向前走的路一下子全都打乱了。那时我 29 岁，他 42 岁。

因此，在当时这种没有其它选择的情况下我就和他结婚了，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从那时直到今天，这个人确实对我也不错。

但是，认真地说起来，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在人生的道路上，作为一个女孩子我跌的跤确实不小，我想我再翻过身来非常不容易。

当时，我对外界的感觉只是厌恶和疲劳。那个时候中国人结婚是要经过领导同意的，我们报社的第二把手非常好，我虽然和他谈话不多，但是当我和他说我想和杨知行结婚的时候，当我请他不要相信外面流言的时候，他二话没说就同意我结婚了。他对我的理解和我终于能够结婚，是我生活上的一个大转折。如果当时他不同意的话，我不知道后果会怎样。

这之后我就申请到美国上学，因为当时杨知行拿的是新西兰的奖学金到中国来上学，同时他已经成为美国的一家公司驻中国的工作人员，所以他在中国刚一毕业，他的美国公司就把他调回美国来，帮助他办了绿卡，所以我也自然选择了到美国生活的道路。

事实上，他是在公司将他调回美国之后，返回头到中国和我结婚的。我虽然确实是利用了我的婚姻关系到美国的，但当时我如果不依靠他，也同样能够到美国，因为我家有亲戚在美国，亲戚们也曾经替我办理过留学之类的手续，因此，当他和我的结婚仪式办完之后，我们决定到美国去生活的时候，我手里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护照。

1983 年，当我拿到护照之后，我和他决定在中国结婚，我态度坚决地把他从美国叫到中国就是专门为了去结这个婚，我就是要让人们知道，我要和他结婚。

结婚之后的第十天，我们就出国了。

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到的美国。

杨知行虽然是出生在国外的人，但是他在中国呆了很多年，他认为自己对东西方文化能有一个深入的比较，他也是在这种自信下和我结合的。而我虽然按照自己的心愿在中国结了婚，但是到美国之后我的心情仍旧非常非常压抑。我知道我到美国来这个现实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仍然怀念过去在中国的一些人和一些事。这时候，杨知行对我说：“出国的道路的确很难走，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好的：当你出国后，冉返回头来看中国，你会比在中国里面看中国来得清楚。”

到美国之初，我们在经济上没有什么压力，但是我在心理上感到压力很大，因为我那时还没有一个心理准备。并不像有些中国人早在出国前就做好了“洋插队”的打算。1983 年我出国的时候，我丢掉了自己在中国所拥有的所有东西。我知道我在中国得到的位置和机会并不容易，《工人日报》是一个很好的地方，80 年代初在中国做一个记者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那么轻易地就丢掉了自己为之奋斗这么多年得到的一切。我心里出现的那种失落感是没法解除的，我丈夫可以在任何方面给我帮助，但是这方面的帮助他给不了。

更何况接下来我又遇到了很多外国人在美国生活都会遇到的实际难题。

我到美国之初，感觉自己实在是“又聋又瞎又哑又瘸”，不会听英文，也不会看英文，不会说英文，更不会开车，这样的人在美国人眼里就是一个“白痴”。从中国的一个大报纸的记者到美国的“白痴”，这两者的社会反差实在太大，面对这一切，我感到非常承受不当时的杨知行是美国第五大建筑公司贝克特公司大老板的助理，这个公司承建中国的长城饭店。我们吃穿无忧，生活闲适，在别人眼中的我们是出入住大饭店的人，但是我自己心里的苦楚没人知道。

局面逼得我不得不从头开始学英文，从 ABC 开始。当时我已经 30 岁了，为了能够早一天在美国摆脱困境，我每天唯一的事情就是拼命读英文，杨知行是在新西兰出生的，英文应该算是他的母语，因此他成为我最好的老师。这样下来，我用了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就练习得可以看英文了，后来我就选学了电脑专业，那段日子里我得到大量练习读英文的机会。除此之外，我也偶尔做一些事情。杨知行的堂姐那时正好开了一家餐馆，我就去帮忙做一点事情。在那之前我也有一份工作，就是在我的一个远亲开办的旅行社里一边读英文，一边做工。

我和杨知行的婚姻是在逆境中出现的，但是当年在中国的时候我们的感情都没有出现太多的毛病，反而是到美国之后，我们的婚姻开始经受过考验。

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两人的感情不好，实在是因为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选择到美国来生存实在不是一件聪明的事情，因为我对这个新世界的适应实在太困难了。尤其是当你自己认为自己智力发育比较高，但你自己又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智力的时候，那种感觉十分恐怖。

因为我不能很快地适应这一切，我就十分悔恨我和杨知行的这个婚姻，我不是怨别人，是在怨自己。从杨知行方面来说，他其实也挺无辜的，我们的婚姻出现了麻烦并不是因为他对我不好，反而倒是正因为他对我大好了所以我就到美国来了，到美国来之后我就变成了“白痴”。每次，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的心情会变得非常糟糕，现在想起来我那时的情绪甚至有些变态，有时候我发脾气时能把杨知行的真丝衬衣撕成一条一条的。这种时候，杨知行就对我说：“认命吧。”他说：“就算你是一朵鲜花，给你换一个花

盆，你不是也要蔫两天吗？”他知道我现在所经历的这种痛苦，他见得多了。

也是从那之后，我就开始相当信命。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的命，命已如此，我自己是无法抗拒的。

那段日子里，我时常想起自己在中国时候的生活，我过去的朋友们也都在中国活得很好，那是我向往的生活，我并不想在自己已经不年轻的情况下到美国来重新闯荡。

我知道我没有退路可走。我也曾想过，解决这种痛苦现状的唯一办法就是离婚，但是那样的话我和当初没有和他结婚时给大家的印象是一样的。更而且，我如果这时候放弃他转身和别人去再结婚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不是因为这个婚姻不好才离婚的。其实，杨知行也是一个新移民，他是从新西兰来的，到美国来也是需要适应的，只不过当时我的情况表现得比较突出罢了。

知道这是我的命之后，我的心情就慢慢好转起来。我知道我还是要尝试着适应这个社会。后来，我就利用自己爱买东西的爱好，时常在商店中有意识地转一转，有时候和服务员讲讲话，有时候和闲着没事干的老人聊聊天。

我其实深深明白，我自己虽然为这个婚姻付出很多东西，但是，从杨知行的方面来讲，他也付出了很多，最起码的事情就是他必须在美国这个社会中帮助我适应过来。如果他不找我，完全可以找一个西方人结婚，他曾经有过一次婚姻，对方也是中国人，上次婚姻的失败曾经让他发誓不再找中国人结婚，因为他认为东西方文化差得太远，这种文化差异之下结合起来的婚姻是不完美的。他的这个念头很多朋友知道，所以，他周围朋友们也大多不理解他为什么会娶我。

再后来，杨知行曾经陪我去英国看了一些博物馆，直到那时候我的心情才更加明朗起来，我已经知道了这个世界很大，需要了解的事情也很多。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家在经济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情逼得我们当时差点跳楼自杀。这件事情的起因是我丈夫当时想画画，想搞一些自己高兴做的创作，但是，你如果在美国一直打工是画不了画的，必须拿出时间来，当时我们的积蓄是允许他在家里停留一年的。他就开始在家里画这一年的画。但是，当他再想回到社会上去的时候，他忽然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在美国生活就是这样，你实际上的生活开销越大，当遇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你就越是栽得狠，当时，我们全家人即使是不吃不喝，每个月汽车、房子的贷款也需要五千块钱，两个月就是一万块，这种积欠是完全不能停止的，一下子就会堆得很高，非常恐怖，找不到工作除了自杀没有什么出路。

当时，情况糟糕到杨知行曾经找到一家汽车旅馆要求每天晚上做工，只要别人付给他最低工资并且自己负担汽油的开销，别人都不敢要他，因为他过去优秀的工作背景资料摆在那里，人家觉得这个人很奇怪。所以我特别能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一失败就自杀这种事情，因为那真是除了自杀没有路可走，能翻起来非常难。

就在我们完全没有话路的时候，杨知行忽然收到了一封信，信中邀请他到联邦法庭里去做法庭的双语翻译工作，正走投无路的他马上就接受了这个工作，这个突然到来的机会其实是我们以前曾经想争取的工作位置，申请寄进去之后，州里面把他的名字忘记了，等到他查找到自己的文件后，才被重视起来。

这时候，我的情况也有了相当的好转，也经过朋友介绍进入一家华资银

行做中国部的助理，情形也很顺利，我去面谈之后第二天就上班了。自然，我们之所以能够度过这个难关也靠朋友们帮忙，杨知行家里也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到此，我们总算又翻过身来了。

这真是一次非常非常恐怖的经历，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起明一翻就能翻上来，我知道在美国确实能够那样的话实在是要扒几层皮。

在银行做过一年之后，我觉得自己不太适合这种天天坐班的工作，而且我天生不大善于同数字打交道。这样，我就出来了，后来我因为做过旅行杜的事情所以就和朋友合开了一个旅行杜。我刚来美国时学过电脑，而且国内来美国的人很多，我觉得能帮助国内的人一点旅行方面的忙，从自己的良心上也会认为自己为同胞出了点力气。

但是即便如此，现在的我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常常认为自己一事元成。看到有些朋友出书写东西，我心里常常很难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还曾经想去报社找个工作，但是后来终于没有做成。

我反复想过，做旅行社是我确实能够做的。

最近几年我几乎每年都回国走走，最可笑的是，我第一次回国的时候，一直还记挂着我当年事情的旧熟人一见面就说：“ 呦，萌萌，杨知行没有把你卖了？ ”

我说：“ 对不起，我还不够分量。 ”

我的美国生活在别人眼里看来还不错，但是在我看来却是命运的强行安排，现在回头看，我实在觉得不够充实，但是也无可奈何。我哥哥现在在国内办一家汽车杂志，这是他的兴趣所在，我觉得他生活得内心特别充实，他没有白活。

有时我想，如果我当年没有出国，我可能不一定穿得那么漂亮，吃得不一定那么好，也不一定有自己的汽车和房子，但是我内心充实，我想，当初一直留在国内的我也可能会象我哥哥那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但是，我谁都怪不了。

我见过那些特别想来美国的人，他们说是一下飞机就爱上了这个地方。有的人到美国之后每天到餐馆里工作十多个小时，脚都走肿了、鞋都破了，但是其乐无穷。

我见过这类人，我不能理解他们，感受这种事情，完全在自己。

回顾我自己十多年的婚姻，我觉得不错。但是体验虽然是这样的，必须说明的是当初我并不是因为想找一个外国人而结婚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今天已经身在美国十多年的我会感到幸福。

我的婚姻给了我的很多新观念，而且对于人的理解，我的丈夫杨知行对我帮助很大。

一个人，改变了我的一生。

陈燕妮思绪：

于萌萌快人快语，聪明敏捷，有一种稍稍凋谢了的美丽，但是还好。坐在你对面，她的热情状态庞大得足以全部感染你。

这么多年了，她对自己过去在中国承受到的东西仍不能释怀，一脸无辜和愤忿，很多机会里，大家坐下一谈话，她先语出惊人地就唐突冒出“ 把我关进监狱的那年…… ”

她在乎名声其实就像在乎生命，常常听见她回忆起过去的点滴生活，眼中飞光流彩。她说起去年的时候他们当年周围的一干 40 年代后期及 50 年代

出生的人在北京大酒店相聚时的情景,说他们一到就是将近一百多号 70 年代北京台面上的玩友，心都翱翔起来。

她当年一定是那种光芒万大的女人，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眼中所有 50 年代出生的女人都是最美的，她们生在我前面，成熟得长我一个年轮，胸部突出，腰身丰腴，最先对女人的秘密胸有成竹，懂得修饰也懂得使用，我所朦胧钟情的男孩看上的全是她们。与我和如我同龄的一些干瘦人等与生在 50 年代末尾的几个同院女孩玩了一阵她们童年的最后一小截，她们就金不见了。

于萌萌属于打败过我的她们。因此，她说聚会，说流失的过去，说光彩照人的曾经，然后她转头望着我直突突地问；你觉得我们这些人优秀吗？

一个人的一生被另外一个人扭转，这在当今并不多见，也已经不年轻的我看着重回过去的她，感慨不断。

让她离开她的那个过去，绝对艰难，好在他们开始聚会了。

曾也惴惴地问过地，如果你们在聚会的时候我正好也在北京，如果你们当年的欢乐也想和善解人意的别人来分享，如果你们人数众多并不在乎一两个不属于你们的局外人进入……

我说，如果是我，你可以拜托招呼上一同也去吗？

她跟真的似的赶快沉吟不语。

黄秋燕

黄秋燕背景

中国著名武术运动员·中国著名武术高手、电影演员李连杰前妻。11 岁开始学习武术，1971 年 13 岁时进入北京专业武术队，擅长练习枪、剑，曾经获得北京武术比赛蛇拳、双剑项目奖。

1982 年开始参加电影拍摄，在香港拍摄的影片《少林小子》中扮演女主角“三凤”，并拍摄了《南北少林》，引起各界注目。1985 年进入北京体委下属服务公司“北京体育服务公司”工作。1987 年与李连杰结婚，婚后赴深圳李连杰创办的“国际武术发展公司”工作。

1988 年 7 月份和李连杰一同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发展，1990 年与李连杰离婚。1992 年赴香港拍摄一些小制作片子。1992 年回到美国进入旧金山，现任美国旧金山蒙妮坦美容美发中心美容师。

黄秋燕录音

我从很小就开始学习武术了，以前，中国没有武术专业队，所有的专业队都是从 1974 年那时候开始有的，所以，那时候我们一批二十多个学武术的人就变成专业队员了。在专业队里我们什么都要学，但好的是你可以找比较适合于你的项目去练习。这么多年的武术生涯下来，我在北京的一些武术比赛中得到过奖，但是在全国比赛中我就没有什么机会，因为队里的运动员很多，大概有二十多人，但一般参加全国比赛的人基本上是男、女各六个人，因此不是每个人都能参加全国比赛的。但是，李连杰就能够经常参加全国比赛，而且他曾经是全国武术冠军。

1982 年的时候，电影《少林寺》出来了，我不在这个戏里，这是李连杰的戏，其实，这部戏前前后后差不多拍摄了一年多。李连杰是 1980 年开始到戏组去拍电影的，但是这部片子上演的时候就已经是 1982 年了。在这之后，1982 年下旬，他又参加拍摄了《少林小子》，这时候，剧组就把我邀请去了，我应该算是李连杰的师姐了，我在电影里演女主角“三凤”。那时候我们都还年纪小，差不多才 22 岁。那个戏的故事蛮好玩的，现在看起来像连环画，那个时候这部片子出来后反应不错，主要是在香港受到很大欢迎。那年的下半年这部片子在中国大陆上演，反应也不错。趁着这股武术热，跟着 1984 年开拍了影片《南北少林》，这些片子都是香港的，但是他们要到中国大陆来找演员，因为，会武术的运动员技术比较全面，做动作比较漂亮，香港的演员那时候达不到我们这些运动员的技术状况。

再隔了一年多我就到了北京体委下属的“北京体育服务公司”专门为境外进来想学武术的人安排吃住，甚至帮助他们训练。有些人如果想拍电影，就可以从我们这些人中间寻找演员，如果我们服务公司里有人可以去的，我们就去，如果我们不行的话就帮助他们找更合适的人。

这样做了一年多之后我就和李连杰结婚了，再后来我就到车连杰自己在深圳开办的公司“国际武术发展公司”去做事，又过了不到一年我就到美国来了。

我是和李连杰一同到美国的，那时候有人邀请李连杰到美国访问，有人来请他拍电影，这个公司就帮助我们转换了签证，我们就留下来了。我们一起美国呆了一两年，在这期间他拍了两三部戏。我在美国的生活重点就是生孩子，我是挺着肚子到美国来生孩子的，我们最先到的是旧金山，呆了大概三四个月就搬去洛杉矶，再然后我们就有了第二个孩子。

但是李连杰这时候因为要到香港拍电影，他就香港、美国来回跑了。到1989年底的时候，香港公司希望他整个人都过去拍戏，因为在美国拍戏的开销太大了，他就去了香港。

这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来过美国，我想他一直很忙。

我们已经正式离婚了，1990年下旬的时候我们其实就离婚了。我们的婚姻失败究竟是因为什么，这很难讲，我们以前一直都是在一起的，我对我过去这段婚姻的感觉是很享受。结婚之后我一直在养孩子、在照顾家庭，我们那时候只有一点点钱，没有太多钱。

我自从跟他离婚之后就一直没有联系了，其实，他到香港拍电影之后不到一年，我们两人之间的问题就出现了，就开始谈离婚方面的事情。在我们谈到离婚的问题之前，我一直在美国的家里没有出去做事，我没有任何经济能力，所以当时对于离婚这件事情我实在很怕，很怕。后来，到了1992年初的时候我们已经彻底离完婚了，就把当时一直跟着我的两个孩子送回中国去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一个人在美国做事，或者我哪怕只是想出去在社会上试一试的话，拖着两个孩子会非常非常的艰难。而且，美国的社会并不安全，孩子跑出去不论是上学还是做其他的事情，做父母的唯恐他们会变坏。我的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的孩子在美国都已经上中学了，家长每天还要车接车送。时间全部被孩子占去了，我是把孩子们送回李连杰家里的，他们家里人口比较多，因此我比较放心，大家都可以帮助照顾孩子。

那时候虽然我已经来美国两三年了，但是真正到自己做事的时候一切就好像全部重新来过，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懂。最初我把孩子送回大陆时，再回到美国来之后我常常在想“我回来究竟是要做什么”？那时我任何依靠都没有，但是也得回来，总是要试一试。离婚之后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做。但是那时候，我已经不能回大陆生活了，因为我已经离开那里很多年了，再回去一切又得重新来。

我到中国送完孩子回美国后就搬回旧金山去了，那边的不少朋友对我很好，而且我自己也想离开洛杉矶这个伤心的地方，换一换环境。

我到旧金山之后，香港有些人也想找我拍电影，那时候李连杰刚刚拍完电影《黄飞鸿》，有名气，人家很想利用李连杰的名气来“抓”我，因为多少有一点宣传的价值。但是香港有些小公司制作费用很少，电影拍摄出来效果也不是那么好，因此比较难。虽然当时我拍过一些戏，但是后来都没有上。对于当时的我来讲，这是一个过渡，多多少少可以赚一点点钱，起码在半年或者一年中让我感觉平静一点。

香港公司拍戏，大都是在大陆拍外景，拍了半年之后，1993年初我又回到美国，回来以后又没什么事情做了。当时从香港回到美国，开始的时候很开心，好像是回美国度假了，但是时间久了之后，没有什么事情做这种现实给我的感觉很空虚。刚好那时我在香港的朋友郑明明在旧金山有一个美容店，那一段时间正好有一些人走掉了，也刚好我那段时间没有事，她就打电话给我问可不可以去美容店里帮帮手，因为以前在洛杉矶住的时候我曾经到她的店里学过一点美容的事情，这样，我就去做了。后来，过了半年多，我又回到香港修了一些美容课程，做这一行我不是很久，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因为这些工作中有很多事情是有艺术性的，需要灵感，我喜欢。对我来说很容易，我很喜欢帮人家化妆。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很爱漂亮。现在我做化妆美容实在是做得很好，我可以说自己在周围的圈子里是做得很好很好的。我以

前拍电影的时候就很注意化妆师给演员化妆，我很喜欢这种东西，在潜意识中就汲取了有关的知识。

我在蒙妮坦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做了三年，收入普通，这一行有季节性。在美国我已经很少再练习武术了，我觉得我已经懒了，我有些朋友在美国带学生，教人家武术，但是我觉得他们很辛苦，相对来讲赚钱也不是很多。有些人很喜欢挑战，但我想我怕这些，我不是一个很喜欢闯的人，我比较喜欢相对安定的生活。

和我后来在社会上的经历相比，李连杰是很幸运的。中国武术的难度比较高、比较全面，除了拍电影，武术这一行在国外发展艰难。美国人喜欢用业余爱好的方式来搞武术，但是他们又急于达到我们当年的成绩，这就不太容易了，因为你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训练，这样就浪费很多时间。我当年在武术队的时候是中国武术的全盛时期，现在局而已经有了变化。

是的，我和李连杰已经离婚了，但是我们曾经是一直在一起的夫妻，离婚这么多年来，李连杰从来没有帮助过我。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个性。他比我小两岁。当初我和他谈恋爱的时间，前后有八年，我一直是很爱他的，所以我追得很厉害。但是现在我已经不爱他了，因为当你真正认识清楚一个人的时候，而且当你把前前后后事情分析清楚的时候，更而且你已经年龄大了，那种感觉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的武功很好，在技术上来说真是很不错的，接连拿过五届全国冠军。你现在看他演的电影，他的每一场打斗演出都不错，和他恋爱的时候我很小，像很多初次谈恋爱的人一样，一喜欢起来就什么都不顾了。当时有很多人反对这件事，他们说我们不相配，包括我的教练也反对，但是那时候有些压力对我们来说反而更好。也许是因为当时我追得太紧了的关系，因此他当时习惯了那种感情很容易得来的感觉，因此他并不是很珍惜我们的感情。如果他现在去追一个女朋友的话，他会明白，其实爱一个人、追一个人是会很痛苦的。

以我今天的角度想起来，他从来不是个很好的丈夫，也许是那时他年纪小，那时候家里的很多事情他都不会去照顾，他不管。当然对于一个年轻的人来讲，结婚之后有了家庭和孩子，要养一家子人，压力也是蛮大的。因此，离婚的时候他也不想要这么多负担，我想他已经觉得大累了。虽然组建家庭、生孩子是我们两人的共同决定，但可能人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会有一些变化，一旦感到压力的时候就受不了了。

我们的女儿现在一个七岁多，一个六岁多。李连杰回北京的时候会看看女儿，他会给孩子一些钱，但是这些钱的数字是每一个人都能给得起的。小孩子最需要的是爱，我很想带着他们到美国来，但是我这里的条件太差。

我们分开一年之后就完全没有联系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又结婚了。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他的行踪。即便我到香港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联络。每次我回北京的时候就会到他家里探望我的孩子，也看看他妈妈。他妈妈现在对我还不错，但是刚离婚的时候对我就不好。我的很多朋友都不是这样，有些朋友离婚之后两个人为了孩子的事情和彼此之间的一些东西，总是要有一些联系和沟通的，李连杰和我之间是没有这些的。离婚之后，我不常常看他的电影，两三年前他的《黄飞鸿》出来后我没有去看。现在香港电影不景气我想他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因为现在他正是最走红的时候。他自己在香港也有一家公司，自己拍片，但是片子不是很多，大多数是人家来请他拍戏。

离开李连杰之后，我也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新感情，对于我未来的爱情我

希望能找到一个各方面稳定一点、成熟一点的男人，我也希望彼人家多关心一点。我希望别人能体贴我一点，温柔一点。以前，我和李连杰在一起的时候，我关心他、照顾他的时间比较多，以前我很爱他，和他在一起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从这个婚姻出来之后，我回想起来，其实蛮苦的，因为他是从来不会管家的。当年的我有两个 BABY，如果他在家，就是三个 BABY，通常就是这样子。所有的事情从早上到晚上都属于我，他连一点想帮助你做事情的想法都没有，也不会很关心我，在那个时候人家讲我鬼迷心窍，现在我一个人生活很多时候很开心，我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生活的模式，虽然不是那么有钱，但是很开心。每天上午我去读读英文，下午就去美容院里上班，周末的时候，我就去教堂，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每个月我会和教会的人一起到街上去为流浪者分发一些衣物、食品，给他们一些帮助。我觉得我很开心，有时候看到这些流浪的人们，觉得自己很幸福，上帝给了我很多东西。在我感情最艰难的时候，我的宗教信仰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信教是在离婚的时候开始的。因为那个时候人的情绪是非常不好的，而且那时候我所需要的帮助都好像是朋友们给不到的。朋友们会很关心你，安慰你鼓励你，但是你要的东西不是他们能给的。那时候我思想很混乱，很希望找到一点平静，我就只能靠祷告。祷告了一段时间，我自己觉得产生了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它让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当一个人开始平静下来的时候，你遇到的一些问题，你的观感就会改变。所以在离婚的那段时候我很坚强。我离婚时表现得很坚强，我的很多朋友当时都问我为什么会那么坚强？国为他们看到很多朋友在离婚的时候的样子变得很可怕，很痛苦。他们惊讶我为什么好像没什么事情一样。其实当年的我心里不是没事，但是我觉得神给了我一些力量，帮助我一定要度过这样的难关，因此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认识了主。在我最难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人在一直保护着我，有人在陪着我，在我顺利的时候，开心的时候，我都会感激上帝。主给我力量。

当年，我也曾经努力挽救过这个婚姻，但是我失败了，李连杰对此没有兴趣，当你付出努力的时候，对方也要努力才可以，你一个人努力是不行的。但是离婚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打击的确很大，我曾经说过我曾经很坚强，但是那只是最初的时候，最初的时候你还很坚强，过了一两年，当你看到有些朋友过得很好，或者看到有些朋友有些什么不好，你时时都会感受到给自己的一些冲击。我走出这段失败婚姻的阴影整整走了三年左右，从去年开始，我的心情大概才好了一些，这些创伤是需要时间消除的。毕竟以前的婚姻、以前的丈夫是我生命的全部，所以我感觉不同，不是说可以潇洒就可以潇洒起来的。

有时候想到自己的婚姻常常会觉得“何必当初”，但是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我的父母很担心我，希望我早些找一个好一点的丈夫。我选择丈夫的时候，我不会把李连杰放在那里做比较，但是很奇怪的是，我也交往过一些男孩子，但是他们自己会自己和李连杰比，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男人就是这样的。相处下来，我觉得关系就很复杂，我不喜欢。但是比较难，我的名字在中国人圈子里不少人是知道的，因此这种事情就只能随缘。

我现在在美国的生活和我当年到美国之初的想象差别很大，但是人总是要接受生活现实。你向往的生活得不到的时候你一定要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来适应，人的适应能力很强，主要看你愿意不愿意去适应。我以前的想法一直很传统，觉得嫁一个人就是要为一个家而付出自己的一切。我现在的想法已

经变成“人是很不可靠的”，所以感情的东西也很难讲是可靠的，不论你做什么，你的那个“窝”其实应该是永远安全的，如果相反的话，还是自己强起来才行。我从离婚之后到现在，经过自己的做事经历，我发现自己有很多地方比别人好，自己就有很多信心。拍电影我想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兴趣了，从我自己的条件、年龄和个性来讲，对我来讲拍电影都不是最好的事业，但是我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变化，人总是爱变的。我不喜欢交际。我现在在美容院里除了头发，什么项目的美容都做，皮肤保养、化妆等等都做，我对我现在的工作很满意。未来我想我会在美容方面发展。

生活经历，使我已经彻底地改变了我自己。

这么多年的美国生活下来，我也好像变了一个人。

我会一直这么坚强下去。

陈燕妮思绪：

她远比我想象中要漂亮很多，最初的一见面，竟被她突如其来的漂亮吓了一跳。

她脸庞适中、皮肤亮丽、装扮入时，非常的精致，眉眼、指甲甚至坐姿都已经表现规范过后的状态。北京姑娘我过眼如云，她整体给人的感觉仍属少见。再说，也完全看不出她当年“武术”的痕迹。

她的名片也很精致，英文名字已经是赫赫的一个“ZOE”，再来的职务称谓就是“美容艺术家”。

虽然她说自己已经从过去的婚姻中走出来了，但是我想我依然看出她心中还有着太多李连杰的痕迹。交谈之中我曾经再三追问，“到底你和李连杰是因为怎么样的一个关键原因离婚的”？我跟她说“我想知道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因，这样关键的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在你们之间一定是有的”。她支吾再三，仍是艰难地缓缓抱歉“这点我就不太想讲”。

我们的交谈是在我办公室里一个小小的单间进行的，关起门来，她和我与门外嘻笑叫闹等着她的朋友们完全隔绝，谈话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直觉得整个小屋中充满着她的委屈，弥天弥地，我知道我短短的一席话和随后而来的几千字中，断不可能涵盖她全部的心灵过往，很多次，她眼看着就是要落泪了，我就也鼻子酸酸地回看着她。她已经从容，但是地不可能心境恬淡、一如止水，和她同来的朋友直说是“看着有什么合适的人给我们秋燕找一个”，但是我想，今天的她已经不再那么简单。

她的前一次婚姻和前几年的美国生活，已经强制地把她生命的直线变成曲线，她不能回转和改变。只有顺着这条曲线走下去。顺应而去的人，也就得变成曲线。

人生就是赌博。

你下注，下很多注；然后放心血在里面，放很多心血在里；然后等待，然后花很大心思地去等待；不幸的人就会落空了。人生就是赌博，婚姻更是。

王洛勇

王洛勇背景

1971 年上小学四年级时被选入湖北十堰市京剧院学习京剧，毕业后进入湖北省十堰市文工团工作。1976 年进入湖北艺术学院学吹法国号，1981 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6 年被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戏剧系录取，后因为英文过差，1987 年改赴波士顿莎士比亚剧院进修发展，为期三个月。1987 年在波士顿排演的舞台剧《国王与我》中扮演“国王”角色，获得当地艺术评论界极大好评，后破格被波士顿大学戏剧学院录取为研究生，1989 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 8 月起受聘于威斯康辛州州立大学组瓦基分院教授戏剧，自 1990 年起至 1994 年连续四年被学校评为“最佳教师”。

1990 年开始正式参加美国舞台剧演出，1990 年在华裔剧作家黄哲伦所编写的著名舞台剧《蝴蝶君》中担任主角。1992 年将中国轰动一时的话剧《狗儿爷涅槃》引进美国，并于 1995 年在纽约外百老汇剧院正式上演。

1993 年 4 月份在美国著名舞台剧《西贡小姐》芝加哥地区演出中扮演男主角“工程师”，同年参加了中国电视剧《新大陆》的拍摄，担任剧中人“江建国”一角，并曾参加过美国环球片场拍摄的电影《龙》片的演出，担任片中“武术老师”角色。

1994 年年底在拿到威斯康辛州立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后把教职辞掉，专心参加各种舞台剧的演出活动。同年，因为在《女斗士》美西演出中的出色表演而荣获美国西部戏剧最佳男配角奖。1995 年 8 月份正式开始在竞争最为激烈的纽约百老汇大道上的百老汇剧院演出《西贡小姐》男主角“工程师”至今。

王洛勇录音——

我的演艺生涯开始得很早，确切地说，在我 13 岁的时候，它就开始了。我从小学的是演京剧，当时之所以选择这条路其实主要是为了逃避下乡。我外公是“历史反革命”，他曾经是翻译中国逻辑数学的人。细说起来，我妈妈家里的人全部是搞文化的，比如，我姨妈家就是搞高能物理的，但是，与此对应的是我爸爸却是一个当兵的，一点文化都没有。因此，在家里的时候年幼的我常常身处两种文化类别之间，母亲家里人谈的都是法国巴黎之类的地方，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对西方文化有了很多好奇。

后来，有一次练习翻跟头的时候我把手摔断了，我就开始进入湖北艺术学院学习法国号，我也是在这个时候系统地了解了西方艺术。这种学习让我眼界开阔很多。

1979 年之后我开始对表演特别感兴趣。1980 年我去投考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在第一拨考试的时候我就被刷下来了，老师告诉我：“你根本不是做演员的料”。

但是即便在听到这种结论的情况下，我回到家里自己一泡澡，独自一个人没人打扰地仔细一想，还总觉得自己是个能干事情的人。1981 年我就又去投考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结果我考上了。当时，我们文工团的领导死也不放我走，最后我急了，我跟他们说：“如果我是你们的儿子，如果我有这么一个理想，我又考上了理想中的学校，这样的情况下你们会不会放我走？”最后，我终于算是遇到好人了，我被放走了。

直到我到了戏剧学院学习的时候才知道，我小时候在京剧剧团里学到的

严谨的、注意力集中的攻读艺术方法，对我的学习很有帮助。

我学得还算不错，1984 年毕业的时候我被分配留在上海戏剧学院教书。

我家里在美国有亲戚，他们一直告诉我应该到美国去学习，他们把我的表演磁带寄到美国学校去，美国的学校认为我的表演确实很好，但还是认为需要知道我的英文程度，他们要我录一盘自己口述的英语带子寄给他们。这时候是 1985 年。那时候我根本还不会英文，这事情就这么拖下来，一直到 1986 年都还没有一个结果。最后我一想，不能这么拖下去了，我就找人为我录了一盘英语带子，这样，我把带子寄到美国，学校方面一听这盘录音就决定收我了。

给我发录取通知的这个大学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他们并且给了我奖学金。

可是真正到了美国之后，一到学校去报到，我糟糕的英文程度就暴露了。学校看我的英文实在太差立即决定不给我奖学金了，让我先去补学英文。这一下子，我突如其来地有了一种完全崩溃的感觉。因为，如果按照原来校方答应我的条件，我本来还可以一个月有几百块美元奖学金收入的，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初来乍到的我反而还欠学校三千多块钱。

那时的感觉就好像连自我都没有了。出国之前我好歹是一个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师，是一个艺术家，但是到了美国，出了这样的事情，“欺骗”在美国人眼里是很大的一件丑事。这时的我又不能完全放下架子到餐馆打工，即便是去打工，老板让我干什么我也都不去，感觉真的是走投无路。

那一阵子我甚至曾经连续一个星期坐在房间里一直一动不动，眼泪哗哗地往下流，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怪什么。

1987 年元旦的时候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开车到美国东部找出路去了。因为我在路斯安那州的学校里实在呆不下去了。我说过美国人对欺骗是十分痛恨的，我知道自己在他们眼中的形象，我自己也感到无地自容。我的一个老师这个时候把我介绍到波士顿莎士比亚剧院去，我就真的想在那里寻找一下我新的机会。

在波士顿的莎士比亚剧院里，我遇到过一位导演，他看过了我用中文做的朗诵后告诉我：“如果你能够接受我的挑战，我敢肯定你会做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因为你在舞台上太有魅力了。”他告诉我，他给我的挑战首先是要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学英文。他说：“你能吃下这个苦。”

我就这样和这个老师学习了三个月。三个月下来，我在这个剧院里演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片断，我演罗密欧。当时的我对自己仍不是很有自信，我深深地记得跟我演对手戏的女演员每天都一再告诉我：“你一定要学出来，你一定能学出来。”那时候其实我还是一个没有正式大学接受的学生，我的内心感受仍然不好。就在这个时候，波士顿当地有一个剧院要排舞台剧《国王与我》，正在找演“国王”的人，这个剧的导演正好看过我在莎士比亚剧院演的罗密欧，他就找到我跟我说，“你的英文不好不要紧，你只要保持自己在舞台上的风度和气质就行了。《国王与我》这个戏中的国王英文也不好，还有一点口音，你如果能够把你不懂得英文的那个劲恰当地表达出来，就正好。”

我去试戏的时候，他们要我背一段中国词，以此来考察我的舞台感觉，我就为他们背了一段屈原的《九歌》。因为这段表演，主考人认为我的表演力度不错，我就得到了这个角色。

但是等到我拿到剧本的时候就有点傻眼，在这个剧中国王总共有一百多句台词，这一百句里面我弄不懂意思的起码有九十多句，当时我连英文中“菩萨”这个词都不懂，别人说起来我还一愣一愣的，等回到家中我一查字典，懊恼得我直想用鎯头把自己的脑袋敲下来。

那段时间相当紧张，我每天都在回家的地铁上背台词，我也记不清有多少次我背词背得忘记下车，坐过站了。我知道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到了莎士比亚剧院之后就下了决心，我一定要干一件全中国没有人干过的事情。

我是 1987 年 2 月份开始在波士顿演出《国王与我》的，我当时没有工卡，也没有美国绿卡，更不是美国演员工会的会员，本来，我的这个角色演一个星期是应该得到八百美元薪水的，但是因为我本身在身份上有上述问题，我得到的酬劳一个月就只有 24 块钱，这几乎就等于白演。

剧组里的人知道这种情况后，自发地发动起来，每天每个人轮流给我带饭。除此之外，几乎每个星期大家都会送给我一个小礼物，有时候是短裤，有时候是袜子。

到了 4 月份，我的《国王与我》快要演完的时候，波士顿大学戏剧学院的系主任也来看我的演出了，演出完后他还专门到后台来看我，因为当时波士顿的大报纸评论说我比原来演国王的美国演员演得还要好。他到后台和我聊起来才知道当时的我正苦于没有学校接收。

听了我的话惊讶不已的系主任第二天又来看我的戏了，这一次，他把他们系里的七个老师都叫来看我的表演，戏演完之后七个老师一致通过给予我全额奖学金，我就连托福也没有考，直接上了波上顿大学戏剧学院。

我当时得知自己被这个学校接收了之后心情激动得不得了，我曾经因为做假在路易斯安那大学呆不下去，后来也曾经到纽约的大学去再试着进去，但是我连边都没有沾上。曾经经历过的失败一直让我非常不自信。可是现在我一下子从没有学校接收的九丈深渊里上来了，一下子好像登天了一样，状态简直是屁颠屁颠的，整整一个星期，我的脑子都处在一种极度兴奋的状态中。

进入波士顿大学之后，我学的是戏剧教育和表演专业。我知道我的艰苦生活又要来了，我在自己的床头写下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样一段毛泽东的话，我把自己的头发留得很长，也不刮胡子，我暗下决心：我一定要等到毕业的时候、把戏演出来的时候再剪头发。

我首先遇到的当然又是英文关。我的英文老师告诉我，你们中国人大多数牙关太紧，元音不准，爆破音没有力量，因为中文中没有以爆破音结尾的字。为了提高我的英文发音，他给我设计了一种“木塞英文练习方法”，也就是把一个本塞从我的两排牙齿中间卡进嘴里去，从发 E 的音开始一步步地张大口型。我每天如法练习，不知道有多少个木塞被我咬碎了。后来有一天，我发现地上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的形状有点像一只脚，我突然想到：这块石头如果代替木塞子放进牙齿之间不是正好从小到大什么发音位置都有了？试过之后，果真。从此之后，我就开始用这个石头来代替过去使用的二十几个木塞子。

为了锻炼自己的胆量，我也曾每天拿一个小破录音机到市中心站到街上喊叫，我把破衣服一穿，在大街上疯狂地嚷嚷，人家都以为我是个神经病。这样做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好处是我可以把自己的声音放出来；第二个好处是可以练习在洋人面前不胆怯地说英文。这么锻炼到后来，我真的不怕在洋

人面前说英文了。美国人问我一句“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如果在过去我一定会慌张，但是现在我已经可以做到完全不慌了。

当然，我也会在自己的房间里抓紧练习，但是我的这种练习把房东都打扰了，有一次他甚至把警察叫来了，说我在房间里像神经病一样地独自吵闹。

每天的练习让我对原本非常非常陌生的英文熟悉起来。在读书的这两年时间里，我平均每天睡两到三个小时，最多也只是睡四个小时，每天晚上就把自己的头发吊在天花板中间的电扇上学习，手边的英文字典一放就是几十个。

六个月之后，当我再听自己的英文朗读磁带，我真的对自己信心百倍。其实，我在学习过程中才知道自己是一个非常笨的人，常常是学了就忘，但是我用几百次的重复练来强化记忆。我想我做一件事如果做不成的话是会疯狂的，因为我实在太投入了。

我这样认真地坚持练习英文之后，我感觉到自己以前背英文时脑子里像一个冰冻的混饨鱼缸，里面是不透明的，鱼在里面也动不了，什么都看不清楚。但是到了后来，我感到自己脑子里鱼缸的水化了，脑子里清极了，每掉进来一个字就像掉进来一个石头一样，不慌不忙、清清楚楚地进入脑子，这个字的发音、拼写、元音，在我脑子里清清楚楚。

这么练了两年之后，我变得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

1989 年，我从波士顿大学毕业之后，我基本上对自己有了一个感觉，那就是“我可以在美国演戏了”。

毕业之后，1989 年 8 月份，我找到了一份在威斯康辛州立大学纽瓦基分院教书的职位。我去那个大学应征的时候实在是凑巧，那里的戏剧系主任当年在中国的时候就看过我 1984 年演出的《别人的脑袋》，他说当年他对我的演出佩服极了，但是因为自己是随着访问团去中国的，所以没有机会和我有所接触。

我就这样开始在这个大学里教书，开始是只被允许试三个月，后来是一做就做了四年多。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我又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历。

我第一次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其实心里还很茫然，我站在讲台上，我告诉学生们：“今天上课每个人到我这里来拿一张纸，请你们告诉我：你们最想跟我学什么？你们最期望学的是什么？”

在美国当教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教学中需要使用的词汇实在太多了，甚至需要说仅仅在美国人之间流传的很多即兴词，作为一个教师你什么都要掌握。面对这种挑战，一度，我感到自己简直是没有办法教下去。

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人要以“诚”字为鉴，我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学生，我也把我的强点告诉他们，我通过我的教学想让他们知道我的眼力很好，我知道他们表演的毛病在哪里，但是我也要他们知道我的语言能力十分有限，学生需要多花功夫来理解我语言的内涵。我想出来的办法是让学生们每个星期五给我布置作业，我让学生们写出一个星期以来把我在教学过程中他们听不懂的句子、发音不准的词全部记录下来。当然我也会给他们布置作业。在周五过去之后的周末，我把学生们交上来的小品和表演阐述，计划等资料全部读完，也把他们告诉我发音不对的记录全部认真地研究完，下一个星期一到来的时候我会用我焕然一新的发音，向我星期一要说他们的表演问题进行挑战。

这么做，我反而觉得和学生们亲近很多。

我教课的班级里差不多有三十五个学生，我从第一个学期平均每星期五接到六十到七十页信纸标明“听不懂意思”的纸条，我从每周改正一点做起；从改正百分之十到二十到三十，一年之后我基本上已经能够做到百分之百地使用标准的发音了。我当时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和学生一样，也是在拼命地学习，带着一种强大的好奇心，这在美国学生的眼里是不可以理解的，也是他们没有见到过的。

这样，第一个学期下来。我就被提名为学校里的四个“最佳教师”评选的候选人之一，但是第一学期我最终还是没有被评上。但是，从第二个学期开始我连续六个学期被评为学校里的“最佳教师”。

这个结果当时把我激动坏了，我怎么也搞不明白我的学生们为什么会对我这样一个有口音的外国人有这样的评价。后来我才发现，在美国学校的教学工作中，教师完全强调的是“完成任务”的概念，强调的是和学校间的雇佣关系，老师在课堂上讲完课之后拍拍屁股就走人，没有像中国的教师那样，提倡“教书要教人”。

在美国的课堂上教表演，我会特别强调对戏德的教育，在美国这种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很容易就会产生你嫉我妒的现象，每个演员都想拿到好角色，每个学生在老师面前都想表现得最好，这在全世界其实也都是一样的。但是，中国的老戏班子里有一种传统，叫做“注重戏德”。美国的学校里是不讲这些的，学校里只教技术，所有的事情需要学生将来到社会上去乱碰乱磕自己体会。因此，美国的学生演员在演技上通常是非常好的，但是他们在心理上是非常脆弱的。从某种角度来讲，他们的心理卫生是非常不健康的。我告诉我的学生们，不要怕出丑和失败，就像我一样，我在学生面前出丑是为了我自己的进步，学生在我面前出丑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进步。我告诉他们：在学校里争高低是非常肤浅的，你在我这里争出了高低，你到外面世界里不一定能够打出天下来，关键是要在自己的心理上、生理上乃至整个技术上做好充分准备，才能够在社会上高度竞争、互相打压的市场中活下来。

我说过，我的这一套并不是我自己的发明，这是我在中国上学的时候我的中国老师教给我的。从学生们对我的肯定中我也第一次看出来，中国文化在我的身上竟然有这么深的影响，我才知道：在美国呆了那么久的我仍旧是那么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在美国这么多年的生活中，有段时间里我不说中国话、不吃中国饭、不交中国朋友，整个地变成了一个“香蕉”，黄色的外表，白色的内心。在 1989 年之前，我一直把自己关在美国人家里，常常几个月见不到中国人，这样做非常适合我校正自己的英文发音，因为，连孩子都可以教会我如何正确发音。有一段时间，我感到自己如果不去照镜子感觉上就是一个白人。

但是我对戏德方面的传授和我很中国的新感受让我意识到，当我在美国毫无希望活下来的时候，完全是中国老祖宗的东西让我在事业上得到了平衡。

因此,这个想法也促使我在教书教到 1992 年的时候产生了回中国大陆找剧本的强烈愿望。我在美国 1991 年读到的美国出版世界戏剧集中，翻到的中国剧本仅仅是《万水千山》和《智取威虎山》。我当时感到非常气愤，我气愤的不是要说要美国人应该如何如何做，而是为中国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做这样一件介绍中国戏剧到美国来的事情而难受。我们在美国的中国人都在忙着为能够变成美国人而进行自己的资本积累，别的，实在是缺少人关心。

我后来就给美国很大的一个基金会写了一封信，我告诉他们我最大的愿望不是把美国的文化引进中国，而是想让西方人了解中国，因为我觉得已经到时候了。当今的中国已经完全改变了，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回中国去寻找中国剧本。

这封信本来是我在一个冲动之下写的一个计划，但是没想到这个计划被批准了，不但被批准了，而且基金会还为我配备了两名大学教授做助手。回中国之后，我们到北京人艺选到了《狗儿爷涅槃》等剧本，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狗儿爷涅槃》1995 年终于在纽约上演了。

这个剧在美国演出之后，反应非常强烈。很多人说：“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中国的剧作家里还有一个有如美国名作《愤怒的葡萄》作者约翰史坦拜克一般的天才。”但是当问到《狗》剧作者的创作初衷时，他说他其实根本没有读过约翰史坦拜克的东西，他的剧本是早年间他在农村搞土改时候写下的。

我觉得中国人真行。

但是，这个时候我对我的教学产生了另外的想法。我当时计算过，我在学校教书三年只能够教一百个学生，我如果去演出一场戏的话起码是吸引一千多个观众，而我如果做一部电影的话我的观众是好几百万。当时，我已经知道自己是可以教书的了，我又正好拿到了终身职教授的位置，我太太刚刚生下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孩子才三个月大，这个时候我大胆地觉得我应该把我这个才刚得到的终身教职辞掉。

从下这个决心到真的这么做，过程非常非常痛苦，我太太对此顾虑重重。她告诉我我要走的路是一条“鸡飞蛋打”的路，她说：所有到美国来的中国留学生寻求的就是一个稳定的工作，你现在有了稳定的工作，也有各种保险各种福利，然而你自己却不要了，这不是有点浑吗？她觉得我太自私了。

我当时对我太太说，我可以暂时不把教书的职位辞掉，但是我可以去找一个哪怕工资低一点的其他事情，只要是从事艺术实践的工作，我都愿意去做。我恳求她能够给我两年到三年的时间让我去社会上闯一下，如果我在表演上于不出来我会知道自己不行，那时，我就再回去教书。

我离开自己的学校的时候，最怀念的是自己的学生，但是美国是一个开明的社会，学生们告诉我：“老师，如果这么做你感到高兴的话我们就为你高兴。”我的系主任也对我说：“只要你自己心里甘心，我们就愿意你走，因为这是为了你的前途，如果你哪天想回来就再回来。”

1994 年，我正式离开了自己的讲台。

其实，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我一直也没有放弃争取演出机会。1990 年夏天放暑假的时候我参加了舞台剧《蝴蝶君》的演出，而且是在西部首演中演出，我演男主角。《蝴蝶君》的故事讲的是一个中国的京剧男演员男扮女装变成了特务，骗上了一个白人男子寻找情报。我其实对这个剧本是有看法的，因为中国的男人在西方人眼睛里往往不是变态的，就是女人气十足的，一直不能以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形象出现。但是这个戏我觉得还是有可发挥的地方。比如说男主角在第三幕变回男人之后，我可以轮圆了膀子表现自己的男人形象。

我的演出成功了。头一次得到成功之后，紧接着西雅图到了 1991 年的时候也邀请我去演出这个戏。1991 年夏天，美国国家巡回演出团要演出《蝴蝶君》，便又把我请去了。当时有人评价我是全美国头一个不是同性恋男人演

出这个角色的演员，而且演出时是最像女人的演员。

说句实话，在表演上，我对自己一直有一个诚实的评价。我通过到观众中检验自己，也通过无数其它的机会鉴定自己，我发现我确实可以在美国做好表演这件事情。

1991 年我参加完全国巡回演出团之后，快开学之前我曾经利用休假的时间到纽约去玩。当时，我看到大街上有很多演员在抗议，说是百老汇的一个新戏《西贡小姐》中的一个黄种人角色“工程师”被白种人演了。我看到剧院正在卖票，70 块美元一张，就买了一张票进去看戏进去一看我就傻了，我心里说：这个“工程师”就是我要演的角色，无论从造型和表演上都适合我来演。我第二天就给这个剧选演员的导演打了电话，我去见他之后，他首先试了我的高音，感到满意，然后他让我见了剧院的导演和副导演等很多人。那时候我还不会唱英文歌，但是要接受考试，我记得我唱的头一个歌曲是《轻柔地爱我》，我没有经验，我还是用中国人唱英文歌的状态唱的，效果并不好。但是当他们提出要我读一段戏中的台词的时候，我则发挥得非常好。

后来他们告诉我：“我们之所以没有找一个黄种人来演出这个角色，是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亚裔演员同时具备演员能唱、能跳、能演、能说的多种本领。我们多半找到的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你是什么都行，但只是英文不好。你如果能把自己的英文提高，我们随时欢迎你来。”

这个时候也正是我要到北京选剧本的时候，回国的一路上，我一直坚持背剧中的台词。我还在北京的时候，剧院打长途电话到我住的北京饭店，告诉我可以把我安排在 B 组去学习演出“工程师”，他们说我可以在回美国之后，8 月份就参加在芝加哥演出的第一国家巡回演出团《西贡小姐》B 角演出。我当时激动极了，我把剧本的事情赶快做完就急忙回美国参加演出了。

我当时还是教师，芝加哥离我任教的学校不算太远，学校里也准许我在不耽误教学的情况下参加演出。在接下来的演出和教书两头兼顾的日子里我每个星期平均开车六百英里。从我的学校到芝加哥 99 英里是一个单程，我每星期要开三个来回，一个星期在芝加哥的演出要有八场。与此同时，我在学校里每周还有八个小时的课时，要批学生作业，那时的工作量简直是大极了。

我这么整整拼了六个月，终于我可以演出 A 角了。

到了 1993 年的 4 月份我就演出了这个我梦寐以求的角色。当时演出这个戏的 A 角病了，我就顶上去了，我演出了两个多星期。在我演出的这两个星期里，当时的剧院简直闹翻天了，观众对我的演出非常有兴趣。一般来说，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中国演员大多数人是没有经受过演员训练的，但是从中国来的、接受过演员训练的演员大多数人语言又不行，我正好夹在这两个情况当中，位置非常有利。

大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参加了中国的电视剧《新大陆》的演出，为了能够争取到这个用中国话演出的机会，我把一个星期就要花费 60 万美元的《西贡小姐》戏辞了，连《新大陆》的剧本都没有看就到剧组报到演“江建国”了。如今，回想起这一段经历，无论我对《新大陆》剧本本身的看法如何，我还是觉得这次演出是有价值的，通过这次拍摄，我认识了一些国内来的好演员，也学到很多可贵的东西。后来，我还参与拍摄了美国环球片场制片的描写武打明星李小龙生涯的片子《龙》，我在里面演出一个武术老师，从 40 岁一直演出到 70 岁。

也是经历过这一系列磨练，到 1994 年时我实在是认为自己应该从学校出

来了。

我就这么离开教授的职位，我出来了。

离开学校没有几天我就得到一个在舞台剧《女斗士》中演出的机会，这次是在洛杉矶、旧金山等地演出，我和剧院一下就签下了 11 个月的合同。演出之后，我得到了美国西部戏剧最佳男配角奖。

但是说来说去，我在美国当演员，最渴望的事情还是到纽约的百老汇去演出。在美国戏剧界，如果你能参加纽约百老汇的剧院演出就像在中国参加了样板戏的“ 板团 ”。全世界戏剧最高的顶尖演出，可以这么说，第一步上演一定是会在英国，然后一定会挪到纽约百老汇来，这在世界戏剧规律上是一定的。

1995 年的 4 月份，我正在洛杉矶演出《女斗士》，国际戏剧界的重量级人物、英国人坎门 · 麦肯塔士也到洛杉矶来看我的戏了。这个人在世界戏剧史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现在在纽约百老汇上就有他的五个戏在上演，《猫》、《歌剧院幽灵》、《西贡小姐》、《日落大道》等等著名的百老汇剧都是由他担任制作人。他在全世界拥有的演员有十万人，光是《西贡小姐》在全世界的剧院就有十六个，《歌剧院幽灵》剧院有二十几个。

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经因为我在芝加哥随便地放弃他的《西贡小姐》而跑去拍《新大陆》而对我有一些看法。但是这次他还是到洛杉矶来看我的戏了。他看完我在《女斗士》中的演出之后非常高兴，以前我在纽约曾经因为试演《西贡小姐》的时候和他见过面，但是当时我的英文还不够好，这次看了我的演出他没有想到我的英文已经进步这么多，演出结束之后他到后台来找我。他对我说：你如果不在意的话，下个星期我们的指挥和作曲想再听你一次音，因为从芝加哥演出到现在，你毕竟已经三年没有演出《西贡小姐》了。他说：“ 但是我暂时不能够告诉你我会给你哪一个剧院。 ”

《西贡小姐》的作曲和指挥又听了我一次音之后，我又被叫去和新的编舞见过一次面，这一切都做完之后，麦肯塔士跟我说：“ 你的声音我们从近距离听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拿下一个大剧场来。 ”我当时以为他会给我全国第二巡回演出团的演出机会。

再后来，他又请了一个在纽约百老汇专门纠正发音的老师见了我，等到我《女斗士》的演出完成之后，人在纽约的麦肯塔士打电话给我要我去纽约参加排练。我当时还和他开玩笑说：“ 你们要我去纽约干啥？你们想让我在那里排练一下然后把我塞到其他剧院去演出？这样可以省钱是不是？ ”

但是他在电话里告诉我：“ 我想把纽约的百老汇剧院给你。 ”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傻掉了，这是我多少年在美国苦苦演戏所憧憬的一个梦想。当时我兴奋得把电话扔了起来，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激动。但是他随后在电话中对我说：“ 你先不要太激动，我们想先试你三个星期，如果你能把美国 7 月 4 日国庆日左右的观众抓住，不让票房掉下来，我们再谈下面的合同。 ”

美国夏季的票房是最淡的季节，我接到这个演出之后心里忐忑不安。纽约 1995 年的夏天简直是热得出奇，从 7 月份到 8 月份没有一天气温不是在华氏一百度以上的。

我刚去参加连排的时候那些已经在剧中演出过很久的群众演员对我的态度非常牛气，因为这个戏在纽约已经演出了五年了，我一来这个戏就好像成了我的，底下的演员有些情绪，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我也没有在百老汇演过

戏。

但是，一次排练下来，我知道他们已经开始从心里赞叹我的演技。

我真正开始在百老汇演出的头一天，剧院给我准备了超长豪华礼车和专职按摩师，准备按照惯例接我去参加专门为我举行的“首演之夜派对”。但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我根本就不知道。那天白天，我到中国城吃樟茶鸭去了，吃完之后我买了胖大海一大包，再买了一个装黄瓜的罐子，把胖大海装在罐子里穿了一双凉鞋和短裤就到剧院去了。到了剧院之后我看见大家都穿得很正规就问他们要去干啥？他们惊讶地问：“你难道不知道今天晚上是你的首演之夜？纽约戏剧界将为你举行一个非常大的庆祝聚会，很多大明星都会到场的。”

我当时一听就吓坏了。那天我们剧院的许多人都感到奇怪，说我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作为一个百老汇男主角在公演的头一天居然这么平静，好像和没事一样。我告诉他们不是我平静，是我根本不知道会有这件事。

我第一天正式演出之前，麦肯塔士也来了，在台上和我握手的时候，我摸到他的手心里全是凉汗。我是第一个演出这个角色的黄种人，我前面的一个前任是非律宾和法国人的混血儿，这个领域非常残酷，他的合同满了之后，剧院就让他去休假四个星期，在这四个星期中剧院让我来试演，结果我演出得不错，他就被顶替掉了。

我的首演非常成功。

那天晚上，我演出完之后，我们剧组里很多亚裔男演员和女演员都跑过来抱住我，很多人都流泪了，他们告诉我：你不知道，我们这些在百老汇做亚洲演员的在这里给白人演员跑龙套的滋味，今天虽然不是我们自己演出这个角色，但是就好像是我们在演出一样。

我的经纪人对我说：如果你仅仅是在 7 月份演出了四个星期，而没有得到合同，那么只能说你王洛勇终于登上了百老汇，当然，即便是这样的一个四个星期的机会也是无数演员的梦想；如果说你在 7 月份演出之后得到了百老汇的合同，那么就可以说你已经“占领了百老汇”。

事实上我在演出到第二个星期的时候剧院就通知我了，剧院告诉我：“你可以把家搬过来了。”

现在说起来轻松，但是当时那段日子并不好过，天气又热我又着急，很快就上火了，嗓子有点哑。结果，不知道冥冥中是哪位神明保佑了我，在我三个星期的 32 场关键演出中，出现观众连续站起来为我鼓掌的场次达 21 场之多。

那一段关键的日子里，我度过了生命中重要的一个阶段，现在想起来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东西。初到百老汇，和早已在这里混熟了的演员相比我确实相当土气。百老汇是一个管理严密、有很多规矩的地方，比如说它甚至对布景的选择都有非常严的规定，百老汇的布景要求在遇到超过 15 磅重的物体时必须自动减速；为保证演员的健康，舞台上使用的烟幕也必须是用冰块加水制成的；按照规定，剧院每周必须做大吸尘一次，《西贡小姐》剧组并为演员配备四个专职接摩师，在众多的演员中，我作为男主角一同可以随意使用两次，其他的演员则必须按先来后到顺序排队。

演员们每人都有周全的人寿保险和医疗保险，在这里演出，你一般是不能生病的，倒不全是因为演出原因，而是因为竞争原因。常常，B 组的演员会很“关切”地问 A 组的演员“你最近身体怎么样”？要知道在这个地方连

一个群众演员生病都会有五六百人来应征。我的这个角色 199l 年的时候曾经有一千七百多个人来试过，复试的时候也有二三十人。因此，在这里的每一个演员得到自己的角色之后都非常珍惜。

与此同时，剧院对演员的要求也非常多。群众演员在和第一主角配戏的时候只准出现五次错误，因此，我要想坏一个人非常容易。剧院并规定：每天晚上八点钟开始的演出，演员必须提前半个小时到达剧院，否则就不准参加演出。

我通常在演出开始之前一个小时就会到达剧院，先到的我基本上会利用这段时间来做气功，让气沉丹田。我自己在百老汇这么多时间演出下来大概只缺演过两天，那次我重感冒，水肿。

我在百老汇干得确实不错。去年和今年的演出，我的票房全超过了百分之九十的上座率，而往常别人的演出卖票通常只能卖到百分之七十六。我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不容易的，十亿人没有干的事情我干了。常常，我演出之后，在剧院后台通往街道的后门外有很多亚洲人在等我，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黄种人永远不能登上美国戏剧的主角位置。”但是他们看到我之后，知道自己的父母说错了。

现在，我走在美国的大街上，也时常有观众能够认出我来，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停下来和他们聊上一阵，我会和他们谈中国，谈中国的现状，感觉蛮开心。

这种时候，是我感觉收获的时候。

我直到现在还常常想起 1979 年我在中国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时的情景，那一年我因为要从湖北去北京考试而且也认为自己绝对能够考上，去北京之前就和所有的朋友做了最后的道别。当时，我光是收到朋友们临别赠送的笔记本和钢笔之类的东西就几十个，但是结果是我没有考上。军艺老师给我的评语是：“此学生表演太木，没有发展前途。”

没考上大学的我只得再回湖北去，我一回去，就成为湖北的一个大笑话。

1981 年我再考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也非常危险，初、复试虽然终于通过，但是文化课考试的时候百分制的考试我的英文只考了四分。我划破手指在卷子上写了一封血书，我告诉老师：“只要能让我上学，我一定会好好学习。”那次考试我最后虽然算是通过了，但是老师的评语却是：“此学生表演素质极好，文化素质极差，可留校观察。”

回首时，往事如烟。

我深深感谢中国给予我的一切。在美国，有一天我忽然产生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想法，我想我从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成长为一个中国戏剧学院的教师，我自己一分钱都没有花过，全是国家出钱供给我的。而在美国，如果你想完成这样一个过程，大概需要三十万甚至一百万美元的铺垫，这时候我突然有一种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非常非常幸运的感觉。

我明白，人呐，最不能忘恩。

陈燕妮思绪：

演出一完，在给他的隆重掌声中，我就到他的后台去了。

美国的这类戏剧往往是打有空前的花费余量的，一部戏根据自己的场景需要来搭台，耗费无数之后就看天算了，演出行为紧接着就无休止地转起来，能有多久，就有多久。

他的剧院是纽约百老汇最大的剧院，可容一千八百人。他一周演出八场，

平常每天一场，逢周三和周六演出两场。准时参加演出和排练之余，他一直保持自己的一贯体重，175 公分高，153 磅重。

绕过挂有他大小演出剧照的正门侧门之类，他的化妆间在所有后台小屋的最里间。和剧场座席间的豪华相比，他一人独用的第一主角化妆间简陋得令我惊奇。但是，这个位置，这个化妆间即便是已经到了如今的这份简陋，也是他的多年之梦。也就是这个化妆间，美国的大明星劳伦斯·奥立佛（《王子复仇记》中男主角）、费文利（《乱世佳人》女主角）以及近十多年来走红国际影坛的著名演员达斯汀·霍夫曼等人都曾使用过，对着一进门摆放在右手边的大镜子，这些先后的戏剧巨人从容淡定，对镜理妆。

他比在台上的样子消瘦很多，嗓音一轻下来就显得非常沙哑。我也看到他拿给我的那块著名的“发音石头”，那是一个黑色的俗物，他把它用胶纸和毛泽东像章拴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带着它。”

他为我示范当年他是怎样用石头练习英文口型的。看着石头一厘米一厘米地进入他齿缝的时候，我忽然就有一种难过。他是代表一种精神的，一个人、一件事件都不足以涵盖。他是一个过程。死而复活，活可见死，辩证法如果让他解释，一定是演变得有声有色，大喜大悲。

他没有英文名字，就叫“洛勇王”的汉语拼音发音。这个时辰，在这个号称百老汇最大的、能有罗斯莱斯豪华车开进开出以及直升飞机起降的剧院内，随便问一个哪怕是卖纪念 T 恤的女孩，都知道这个来自中国湖北的十堰人。

他一站出来，就是自然的和历史的。

全世界的演员，最大的梦想就是在百老汇演出第一主角，也就是最后一个出来谢幕的人。百老汇确实是一个好光环，剧院一周的毛利润在 59 万到 64 万美元之间，其中花费在演员等方面的钱只占大约 21 万美元。百老汇演员中，收入最低的群众角色，也就是最早出来谢幕的演员大约是一千五百块美元一周；最后五名谢幕的演员从两千八百美元一周起薪；《西贡小姐》中演女主角儿子的小儿童演员，演出九个月之后，未来大学的所有学费全有着落了。因此，美国戏剧界盛传这样一句话“在百老汇，如果你能拿到任何一个角色，你就已经成为中产阶级了。”

而最后一个出来谢幕的第一主角的酬劳在这个基础上听凭你的想象，所有假定都不过分。

我知道他实在不容易，从十堰这个地方到百老汇，一路上岂止是火车、轮船、飞机的。

而且真的隆重到最后谢幕。

独自一人。

张慧明

张慧明背景

原籍广东，1972 年进入广州市建筑第三公司工作，1977 年带薪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更名为重庆建筑大学）攻读建筑机械专业，1982 年毕业后分回原单位，参与公司承建“中国大酒店”工地工作、负责进口设备采购及各种有关技术工作，技术论文《高层建筑的外墙装饰》等曾在《中国建筑》杂志发表。

1986 年 1 月以留学身份来美，进入加州太平洋大学攻读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就学同时曾经先后在华文报社任打字员、电话接线小姐、分类广告业务员等职。1989 年与丈夫钟猛共同创办建筑设计公司“PERFECTDESIGN”，同时创办“大中华影视公司”。

张慧明录音——

出国前，我在中山大学交过五块钱，为的是听一个叫做“如何才能到美国去”的讲座，那时大家都想到美国来，讲座上能够告诉我们美国有哪些学校？它们分别在什么地方？我就把这些学校的资料抄下来，写信到学校去，学校就发给了我 I—20 录取书，我就这样到美国了。现在的我想起当时的过程来非常害怕，今天如果有人要我像当时那样重新再来一次，我想我绝对不会那样做了。

我记得我是 1986 年 1 月 1 日从广州过香港,从此踏上我到美国留学道路的。促使我到美国来的主要原因是觉得在自己原来的单位里混已经没什么意思，当年我大学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单位里许多比我年龄还小的人，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但是房子也分到了，工资也比我高，我分到的房子比他们的都小，所以我觉得很没有意思。我曾经想到要去深圳发展，但也没去成，这时候正好我有一个朋友到美国去了，我就想何不也试一下到美国去呢。确定了这个想法后，我就开始找我在香港的一个亲戚帮我做经济担保人。当然，这个担保和其他任何人的都一样，担保中说是要结我多少多少钱作为我到美国之后的生活费用，但是这些话全是一个空架子。

我去签证的经历非常奇特，至今每次回想起来仍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出国前是在广州签的证，美国领事馆的人一看我的材料就说“你的担保钱不够，”我问他如果我有其他很多份担保这样是不是看起来会更好一点，他说是的。我回去就求爷爷告奶奶地找了另外一些朋友帮我的忙，一共搞到了三份担保，等我回去再到领事馆签证时，同样是那位领事接待的我，他看着我的材料说“你这三份担保中每个人都说要每月给你七百美元，如果真是这样，那你不是太富裕了吗”？他一下子看穿我似地接着说：“你的担保每一份都是假的。”然后他给我一张纸说我有多少条理由不够资格到美国去，我记得反正那张纸上有多少理由就给我勾出了多少理由，然后把纸一扔就扔出来了。

我当时很火，就开始和他吵架。我说“这几份担保书每一份都是政府发的，如果这都不能说明是真的话，那你说还有什么文件才会是真的？”他说不出来，转身走进去不再理睬我了。

这次签证的不愉快经历使我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希望到美国去了。等到我的 I—20 到期的最后一天，我先生说你为什么不去再试一下呢？这时的我已经说什么也不肯再去了，但是我先生一大早硬是把我从床上拉起来，带我到领事馆去，硬是把我塞到队伍里。

迫不得已，我还是要进领事馆去签证。这次我用的还是过去的那份担保书，什么材料都和过去的完全一样。那个领事一看见我就说：“你又来了，我让你带的东西你带来没有？”我立即说：“全带来了，全在我交上来的文件中了。”他紧接着就问我“你想什么时候走？”我说“越快越好，”他就莫名其妙地给我签证了。

几次签证和我打交道的都是同一个人，我曾经很恨他，但是后来却很感激他，因为，他改变了我的一生。

但是，这时的我又开始面临另外的麻烦，即便我已经拿到去美国的签证了，但我在美国一个熟人都没有，我的担保全部是来自香港的，想到去美国后不知未来的日子，我有点心慌，我的机票是由我表叔在香港为我代买的，因此，我必须过境到香港去拿。我从广州坐火车到香港时，在火车上很巧合地碰到一个我 13 年没见过的同事，我告诉她我要去美国了，他说她的女儿刚刚嫁到洛杉矶去，女儿和女儿的先生一同在那里开了一个餐馆。我一听这话立刻说“拜托你可不可以让你女儿来接我的飞机？”她说她不知道女儿愿意不愿意，我赶紧求她，说是可以帮她带行李。

她女儿后来答应来接我的飞机了。

我记得我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一下飞机，就看见同事的那个女儿举着一个大牌子上面贴着我的一张小照片在外面等我。我是 11 点钟下的飞机，这之后就跟随她到她的餐馆里去了。这之中，她曾提议说要立刻把我送到我学校去，但是我推说她妈妈给她带了很多东西，我一定要先到她家里去交给她才放心。我这样说当然是一个借口，我那时真的很怕她会把我送到学校去，我出来的时候身上只带了一千多块美金，我明白我一旦交了学费之类的费用之后自己一定所剩无几，我很想赖在她的餐馆里先挣一点钱，同时观察一下美国是怎么回事。

当天下午三点钟开始，我就在我同事这个女儿的餐馆里打工了，她不付给我钱，但是可以提供我吃和住，这当然也是临时性质的工作。

安顿下自己之后，我就给我的学校打电话说自己来晚了，想先进修一下英文，学校说可以，这之后的每一天，我都去拼命翻中文报纸，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最后还是没有找到，两个月之后，同事的女儿还是把我送到学校去了。

我一进学校，校方就让我交了 560 块钱的学费，医疗保险费一下子又是两百多块，反正我从中国带来的一千块钱没有剩下多少钱了。在住宿方面，我还要住在学校指定的当地洋人家里，一个月要交三百多块钱，全部搞妥这些之后，我身上只剩下一百多块钱了。我当时急得要死，打电话回去给我先生，他就把家里的高级音响之类的东西全部卖掉，又给我寄来一千多块。那时候我根本没有心思上课，整天力自己的未来发愁，每天都是恍恍惚惚的。

没过多久我就找了个借口转学到一个学费相对便宜的学校去了，我在新学校的老师曾经在广州中山大学进修过，非常理解中国人，对我也不错，他甚至给我开出一封信，帮助我申请我先生到美国来陪读。

在我先生来美国之前的这段日子里，我终于找到了一份在洛杉矶一家华文日报做打字员的工作。那个工作的上班时间比较特别，需要每天下午三点钟去上班，一直工作到深夜三点钟下班。我和我的报社同事一同住在报社租来的廉价公寓里，一个公寓住四个女孩子。我进报社工作时稍微有点不巧，我要去住的那个公寓已经住满四个人了，我只好在房间一进门的地方放一个

床垫，就睡在地上。即便是这样的居住条件，每个月我还是要交一百多块钱房租。

从此我开始了自己亦学亦工的生活，我每天早上迷迷糊糊地七点钟就醒，要转两趟公共汽车才能转到学校上课，一路上要花费两个小时。每天上课一直会上到中午十二点钟，一下课我又回过头来坐公共汽车回家，然后接着去上班。那时候我没有钱买自己的车，每天夜里三点钟打完字之后，三更半夜地要独自走路回住处，从我上班的报社社址到我们住宿的地方，走路要走二十分钟。当时我也不知道怕，只知道拼命多赚点钱，直到后来我们的一个打字小姐半夜回家的时候被人害死在街上，我才不敢再这么做下去了。死掉的那个小姐是个台湾人，还是个有车的人，她的车还是辆新车，她有一天半夜下班开车迷路了，下车间路的时候问到三个墨西哥人，那三个人一个告诉她怎么走，另外两个人就上了她的车开车就走，她转身去拦，她一拦，墨西哥人就开车从她身上轧过去了，她就死了。我听说这件事后很害怕，正好报社里总机小姐不做了，我就顶替她做了总机。从这往后我开始在正常时间里上下班，但是做这份工作虽然时间正常了，但是待遇却低得可怕，每月只能挣 550 块钱。

就在这个时候，我先生到美国来了。他一来，我们就一起出去租了一个房间住。我们在美国建立的这第一个新家条件非常简陋，我们只有一间房间，所有的事情全需要在房间里做。桌子上放一个电炉子就算是厨房可以做饭了，而且这个炉子紧挨着我们的床，因为吃饭和住房全部挤在一起的缘故，我们每天早上起床时，脸上都是一层油。房东当时还不知从哪里拣来一个破冰箱，那个冰箱我至今还和我先生开玩笑说：“喂，你还记得不记得那个冰箱的门应该怎么开？”那个冰箱的门每次开和关时人都要事先夸张地准备好，憋住气之后喊一，二，三，悠着劲喊着号子才能打开和关上。

来美国之前，我先生在国内是做空调设计的，我们 1982 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广东省设计院一直做到 1986 年，深圳最高的大楼就是他们设计院做的。他在国内的位置很不错，因为有很多生产厂家希望自己的产品能被选用上，因此每天都有人求上门来。在国内时，他是一直被别人捧在手里的人，这样的人到美国来自然非常不习惯。来美国后，他死活不愿意去干粗活，我们为他找了很多工作但都没有结果，好在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了他的简历，因此有一个老板的朋友看到他的资料后就打电话来问他是不是会做空调设计，这个电话也成为我先生抵美初期找工经历中最关键的一个电话。

来找他的这个老板是个台湾人，那时他公司的规模非常小，只在一个仓库中分租了别人的一个角落，在人员方面他也只请了一个人。我先生当时的工作是帮助老板做设计。这个老板所请的另外那个人是个台湾人，曾经担任过蒋中正侍卫队队长之类的官，他为了自己的孩子教育而到美国来，从我先生当年和他同事到今天差不多已经过了十年，在这十年中，我们开了自己的设计公司和录影带店，有一次几乎已经淡忘了他的我们却看到他来给我们的店送中文报纸。我们看到他之后心里很不好受，马上就送我们录影带店的会员卡给他，他很高兴。我相信他的状况很不好，当年我先生的那个台湾老板用了我先生之后马上就把他解雇了，重新碰到他之后，我先生有一天在加油站里又曾经碰到过他，看到他给报社的车加完油之后又从车上拿出一个罐子，接着把汽油加到罐子里去，我们想，他大概是想把这些油拿回家倒到自己家的车里吧。

我先生上班两个月的时候，我们用存下来的两千块钱买了一辆二手雪佛莱轿车，买完车后我们的银行帐户中就只剩下三百块钱了，一贫如洗的我们索性不给车子买保险了。车子买回来的那天，我们实在很兴奋，半夜两点钟都要爬起来看一看自己的车子还在不在。那个晚上我和我先生高兴得几乎整夜没睡，过两个小时又会再爬起来看我们车是不是还静静地停在家门外。

当时我们一起畅想过，我们觉得无论是他还是我在美国最大的理想就是拿到绿卡，然后我们两个人分别月入一千，我们的女儿再能够从大陆过来，我说“这样我就什么都不求了，我真的就满足了。”我们当时住的那条小街叫做“RAMONT”，我就给我先生起了与这条街一模一样的英文名字。

我先生一直在台湾老板那里做事，做到老板一连搬了三个办公室，事业从小到大，从一个人的公司一直扩大到有十个人的企业。这时候，我在我的报社里也已经从总机小姐做到专做招租、招工分类广告的业务员了。我的这个工作虽然不那么重要，但我还是想出很多点子来改进这个小广告专版。那时候，我有底薪，也抽这些小广告的成，我一个人把分类广告业绩一直做到每个月六万多块，我自己每个月也可以拿到四千多块钱的佣金，这样一来，我的老板十分心疼给我的工资，我们之间开始出现不愉快，再往后，我辞职离开了这家报纸。

这时候我生下了我们的儿子。

在这段日子里，我先生公司里的生意仍旧不错，进来的工程做不完，我们就从他老板那里接一些设计工作回家做，做完之后按项目和老板结帐算钱。我也是学设计的，我先生的专业也是我的专业，我记得第一个月我们一起在家里做设计，每天从早上八点直到夜里十二点不停地工作，一个月下来，我们竟然拿到了二万块钱。尝到了甜头的我们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回到自己的老本行来，从此，我们开始在自己家里的车库中为别人搞设计，我们给自己的公司起了一个非常吉利的名字，叫做“PERFECTDESIGN”（完美设计）。

在美国开公司事实上是非常需要勇气的，我先生在我们已经在车库里为客人搞设计后，也没敢把自己的工作丢掉，他一直在外面给别人做工，晚上回到家里再做自己公司的工作。当时我们已经买了两个房子，女儿也从大陆来美国了，生活开销非常大。到了 1991 年 5 月份时，我先生被公司裁员了，这一下子，对我们生活的冲击非常大，我们的收入立刻不稳定了，这时的我们每天都有太多的帐单要付，有太多的支票必须开出去，我们有两个房子的贷款要付，钱上的压力非常大。他被解雇之后，我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每天早上一醒来常常就是一身冷汗，也因为这个原因，现实逼得我们必须把自己已经在车库里开起来的公司撑下去。

在我们撑下去的过程中，我们的生意开始越来越好，我也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但是做着做着就出问题了。我们的客人大多是美国人，他们每次来找我们的时候，拿着地址打汽车电话找来找去最后发现我们的公司原来是在自己的家里，这样就产生了很不好的后果。我后来才知道美国人是最不愿意到别人家里去的，因为别人的家属于别人的私有财产，外人进入的后即便被主人打死也可以被说成是外人私自违法闯入别人家里，没话可说，因此，我们的客人一般来过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找我们做生意了。

现实逼得我们必须寻找出路，我们出去租下了一个办公室，每个月的租金是九百块，这时候我们感到自己身上的压力更大，因此，我们寄托在生意上的希望也就更大。最初的时候我们每天坐在办公室内眼巴巴地盼客人来，

但是来来回回就是那几个老客人，情急之下我就开始给客人们写信，到圣诞节又寄圣诞卡，也翻黄页电话本给客人打电话，慢慢地客人就开始出现了。

我们公司的业务主要做房屋的空调设计。这里面的专业程序是这样的：建筑工程师把房子设计好交给结构工程师，结构工程师配好钢筋后再把图纸交给我们，我们负责房间内各个地方的电路和开关、水管、给排水之类的设计。其实，这种设计公司在市面上虽然听上去很专业，但是也多如牛毛，如果认真问到我们公司为什么会在整个美国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中得到很好的发展？我想我们是依靠自己的一个安身立命之本来带动整个生意的。

我们公司最擅长的业务是为客人做“TATAL24”计算书。美国加州政府规定，所有加州的新房子以及旧房子都必须做能源设计和计算，也就是说你的房子中装了多少台空调机器乃至窗户和门开了多大，这都必须经过计算，看你的房子是不是节省了能源。政府规定，所有房屋的结构必须符合能源节约要求，即便是你很有钱也不能浪费。一般美国公司算这种计算书的价格是三百块钱一份，当时我们只收一百块钱就能做下来。打出这样的低价格我们当时的考虑是，我们把自己做这份计算书的低价格打出去，靠着这个低价格如果我们每天能有一份这样的计算书进来，就能够打平我们的办公开销，如果还有其它工程帮补我们的生意就可以发展了。

我们公司里最早的客户基本上都是我们翻查电话黄页找出来的。当时我们划出自己认为最有可能的客户名单，寄各种宣传信给他们，告诉我们能做“TATAL24”。这样做下来，我们的回收率勉强可以，寄一百封这类的信，大约会有三四封信回头。就是靠这样一点点地磨，我们硬是把公司做稳了，低价计算书生意也真的把其它工程项目带进来了。现在，我们的公司一年大概要算五百多份这个计算书，这个数字已经比我当年希望得到的一天一份强多了。这种计算书计算起来一点都不复杂，因为美国的法规制定得非常周密，阳光进入房间的角度不同，需要反复计算，有时候房子转一个角度又要计算一份，我基本上在 15 分钟之内就能算出来一份，我最高的记录是一天之内算出了六份。

我们公司做完这个计算就把它交给市政府进行审核，如果计算书没有通过，市政府就会告诉你说哪里哪里有错误，我们重新再算一次就行了，这种计算对整个房屋工程来讲没有很大的责任要负，计算即便有错误，房子也不会塌。我们的收费标准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变化，计算商业房屋时每份我们收 150 块、私人住家收一百块，我的公司每年光是靠这一项就能收到五六万块钱。

这样的一个逐渐向前发展的步骤使得我们公司开始进入良性发展，1991 年当年之内，我们的公司开始请进来第一个员工。到了 1992 年 5 月份，我们公司的生意很稳定了，我们总共请了三个员工。这个过程为什么那么顺利，我的感觉仍旧是“自己也不知道”。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从我们当年在自己家车库里开办公司为客人做设计直到今天，我们多年来可以说从来没请过任何一个客户吃饭，没有送过一份礼，只是到最近几年我们和市政府的人实在已经很熟了，我们就在圣诞节时买一份便宜极了的食物礼物给他们，大概也就只会花八九块钱左右，即使是这样的东西，也是几乎是我们送出的最大礼品。多少年来，我们在生意场上一直以平常心待人接物，多大的合约对我们来说都一样，接十几万块钱工程的情形也很平淡，客人一个传真过来，我们签个名一切就都 OK 了。

到了 1993 年我们的公司已经赚了一些钱，我们决定买下一个商业办公室。后来我们花了三十多万块买下了一个破产商人的仓库房，经过几万块钱的装修和改装之后，我们的公司正式迁入办公。我先生一向喜欢看电影录相带，正好我们的建筑设计办公室用不了全部的新房，我们就又开起一家录影带店，出租港、台、大陆等地出品的华语录相带。我们开这家录影带店的行动其实也是靠一些其他的想法促成的。美国的很多华人都形容自己的美国生活是“三等公民”，这个意思可不是我们通常字面上能够理解的意思，这个“三等”真正的意思是“等吃饭、等睡觉和等死”。尤其是很多中国老人家到美国之后无所作为、无所事事，我们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一些乐趣，也是很高兴的事情。

我们的设计公司目前有两个电力工程师、三个设计员工，加上我们夫妇两个人总共就有七个人，公司收入高了，我们给员工的福利也正规化了，现在我们连员工家属的医疗保险也管了起来。到了这个时候，我知道公司已经不可以再壮大下去，因为我已经可以预见到未来，我们不是工厂，我们的每一项设计和计算工作都要经过我先生亲自看过批准才行，他一个人管五个人的工作量已经是极限了，在这种情形下，我想我们的未来只可能向其他方面转向，目前我一直也在寻求各种新的生意机会，未来我可能会摸索出一条做健康食品的生意道路。

我自己在美国干事情其实都是被逼出来的，不是我个人有什么过人的毅力。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特性可能和我今天的发展状况不坏有关，那就是我是一个如果没有争取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会很努力地去争取的人。

但是后面紧接着的另外一面则不那么好，那就是，我所拼命追求的东西一旦被我拥有了之后，我就觉得拥有它的感觉不再刺激。

我现在已经有好几栋房子了，但是我相信现在的我即便有千万美元也不会快乐，原因也如上述所说。

越到近年来，我发现造成我快乐的源泉越来越多地来自我的孩子。每天晚上，如果不加班，如果能和孩子们抱在一块看看录相带，在今天的我来说，实在是最好的事情。

陈燕妮思绪：

事业有成，丈夫没有一阔脸就变，按说她生命中的很多预期已经在预期中完整实现。她质朴不改，在人来人往的办公室里，习惯于素面迎人。

她有两个孩子，小的一个男孩生在美国，就是她从报社辞职之后生的那一个。在她的公司里，我曾经见到过这个孩子状态独立地走动，这小人年龄很小，眼睛很大。他一出现，张慧明的眼神立即柔软下来，所有的关爱刹那间当着我的面铺天盖地冲他呼啸而去。

这当然是个极有命的孩子。他对各种来自母亲之爱想必早习以为常，看见母亲有客人，不经意地又眼睛大大地出去了。

她的大女儿是在大陆出生的，就是被她曾经与丈夫一起留在大陆的那个让她牵肠挂肚的孩子。她的这个女儿现在和他们夫妻两人的感情有些疏远，尤其和做母亲的她已经到了完全无话可说的地步。张慧明说，每次，当她看见女儿和同学聊起电话来滔滔不绝，但是转过脸来看见她就三缄其口，心里就涌上无边无沿的难受和不解。

家大业大、已经挣到足够家产的张慧明低声下气地表白，她自己目前每天的重要家庭工作就是尽量讨女儿的欢心，努力让女儿对自己产生本该就有

的亲和之心。

话说至此，她说自己也知道“已经非常非常难了”。她发誓对于才刚开始成长的儿子，自己不会再掉以轻心，不会再放弃任何一次和儿女相对而拥的机会，她会做得“很小心很小心”。

但在我看来，校正儿女对她而言真正去践去蹈，还有悬念。虽说已经彻底今非昔比，但是现在的她仍旧很忙，我和她相约采访十分艰难，双方都曾提出过无数时间方案，但又被一一推翻不能采纳，见面的时间也就一周一周地后推。上班时间她有永远接不完的电话，下班后她提出可以谈一下的时间又晚得连我这个已经比较“夜猫子”的人听了都不寒而栗。

和她有关孩子感情的弥补计划有悖的是她大抵仍不能补牢自己儿女债中的残缺，因为她的时间摆明了是不可分割的单独一份取舍，不能辩证，“可则因，否则革”，在她也就不是简单的延续和阻断，更何况分割。

这种女人自然潜力无边，一旦发动起来一定成为永远向前的行舟，空水澄鲜处，她可以俯仰留连。

陈烨

陈烨背景

1974 年进入上海五四农场纸袋厂做工人，1976 年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成为正式演员，曾经在电影《难忘的战斗》、《阿夏河的秘密》、《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及多部电视剧、舞台剧中担任重要角色，成为中国颇具名气的演员。

1985 年赴美进入休斯顿大学戏剧系攻读，期间曾参加澳大利亚 ABC 电视台和英国 BBC 电视台联合拍摄的英文电视剧《龙的子孙》演出，担任剧中女主角，并曾在中央电视台与海外合拍的电视剧《新大陆》中扮演主角。在美国《机器警察》、《审判》等电视剧中演出角色，并曾担任多个广告的演出，1995 年为休斯顿儿童博物馆编写《红绸舞》和《大头娃娃》舞，在当地巡回演出达数百场之多。

1996 年开始为美国东方剧团编写《孙悟空》舞台剧。

陈烨录音

我在中国能够走上演电影的道路是很戏剧性的事情。

当年我还在农场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回家时在公共汽车上，一个男人一直盯着我着，下车之后他对我说：你别害怕，我是上海儿童剧院的导演，我们正在排演一个戏叫做《运动场上》，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晚上就可以来见我们的院长。那时候我家住的地方离那个剧院其实不远，我就让我妈妈陪着我去了剧院。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这个戏现在需要的是女主角，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演员，只不过普通话说得不错，因此，我反倒希望自己能演个配角。后来我果真就演了一个配角。

自此，我开始在那里参加正式演出，我们整整演了两个月。

我演完《运动场上》之后就又回到农场工作。

其实在农场的这段生活对我一生起了很大作用，我反而感谢那时候的生活。现在，我有些同学还在那个农场里生活和劳动，不同的是那里已经发展得很好了，非但是很好，实在是太棒了。那个地方虽然在奉贤，但是在我的感觉里甚至比上海都要好。

我前年回去的时候把家里的录相机也带了回去，我把我过去待过的地方全拍下来了，我想让没能够和我一同回中国的先生看一看。

我演完《运动场上》之后不久，正赶上上海电影制片厂开始招演员，我的一个邻居在电影厂里是做字幕的，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了，我给了他两张照片，请他拿到厂里去问问看行不行。正好那时电影《难忘的战斗》正在挑选演员，已经选出七个人了，但是一直没有最后定，得到我的照片之后，摄制组的七个人就带着照片到农场里来找我。

然后，我就开始试镜头，结果就试上了，这之后我就一直留在上影厂工作，再也没有回到农场去。

我接着又拍过三部片子之后，上影厂就把我从农场正式调过去了。我就是这样开始我的拍戏生活，一直到我出国。

在中国，我演出的最后一部电影是《黑蜻蜓》。

我到美国来是到休斯顿大学读戏剧硕士的，我到我的系里之后才发现，整个系里只有我一个亚洲人。在美国，学戏剧是很难找到饭碗的，因为很难竞争，因此大家都改行了，但是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念完这个自己喜欢的专业。我曾经也觉得这张文凭不是很重要，但是后来我明白：重要的是这个学校是我了解美国文化大社会的小地方，这些在学校得到的经验，比我的一张文凭重要得多。现在回头再看看，我如果没有这么多年在学校和同学们在一起滚，在一块排练、上课、演戏，未来的我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在美国的戏剧行业里做事情。

我开始到美国来念书的时候生活也是很苦的，那时候我通过这里的中国领事馆找到一个美国人家里住，我出去教别人中文，也教游泳，我游泳水平非常好，我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参加过训练班，上五年级的时候就教过一年级的孩子学游泳，从小就是一个小教练。

与此同时，我也在学校里干一些零活，我读语言的时候，每天都负责把学校里的报纸整理好，给别人倒咖啡，做一些简单的清洁工作，这样我可以得到钱，可以免除一半左右的学费。

到了体斯顿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后我是有奖学金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一点。这时候我就也学了一些大学本科的有关课程。在表演上，我在学校里一直是领先的，从经验上来讲，我想我比任何一个同学都有经验，我不足的是语言方面的问题，但是后来我的语言关过了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在美国读戏剧系的课程不是只学表演，而是什么都要学，包括导演、舞台设计、化妆、服装设计等等很多领域。在这些相关的课程中，除了灯光课我不太感兴趣之外，其他的都是用心学的。

在美国发展的不少外国来的演员都想进入好莱坞圈子里去成名，对于“进入好莱坞”，我觉得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我也曾经到那里去试过戏，也曾经试过后来比较出名的电影《喜福会》中的“妈妈之一”的角色，那时候我还怀孕了。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事情还是要考虑天时地利的关系，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现在看看《喜福会》这部片子，电影里演四个妈妈的演员本人都已经接近六十岁了，国内虽然有演员参加进来，但是因为有些戏是在国内拍的，所以我在那里的年龄是不上下下，所处位置也是不那么恰好。

但是说实话，电影这个事业已经融化在我的血液当中了，我一看到摄影机就会很激动。但是我做演员有自己的一个标准，我的标准是：当一位明星很容易，一部戏就可以让你当明星；但是当一个好演员很不容易，你要通过很多角色让自己站住。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好演员。

我是不会放弃电影这行的，有机会、有合适的角色，我会去拍；但是如

果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给我，我也不遗憾，因为我还有很多其它的事情可以做，我有儿子要照顾，我觉得教育他们，这也是一个比上班还累的事情。如果说我现在就拍电影去了，但是等到我回来之后儿子也变坏了，到那时候，你在一个“坏孩子”的基础上再想去塑造一个“男人”，就很难。

我现在对我的儿子们教育得很严，而且我和儿子们只说中文，因为我不想他们未来到中国去的时候连中文都听不懂。

我先生是一个美国人，他是通过一个中国朋友认识我的。那时候我还在念书。在美国拍戏是要有经纪人的，我当时没有经纪人，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就帮我把我现在的先生找来了，他是一个做律师的，懂得经纪人之类的事情。

第一次我和他见面的时间只有五分钟，我最初的感觉是这个人很可信，你可以完全相信他。尽管他是一个外国人，你也可以从他的眼睛里看出“诚实”来。

我其实从来没有想到要和一个外国人结婚，但是我们结婚了。结婚之后，我发现我们两个人其实有很多的共同点。

他是比较保守的美国人，相对来讲有时候甚至比中国人还要保守。他之所以和我结婚是因为他对中国很热爱。

当然，我们两个人比较距离远的地方也有，比如说吃东西方面，美国人不吃鱼皮和鱼骨头，他们多半只吃烤鱼，吃那些没有骨头的东西。中国人喜欢吃广东饮茶，我去饮茶的时候就会叫一个“凤爪”，第一次看见我吃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先生非常不理解，他问我：“你知道鸡的爪子是踩在什么上面的？”

但是他不吃归他不吃，他很能理解你，后来每次吃到他不喜欢的东西时，他会说：“你可以只叫你一个人的，但是我是不吃的”。这些方面的差距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生活，比如说饮茶，我吃凤爪他吃虾饺就行了。

这么多年来，我丈夫对我的事业很支持，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他叫查理·福斯特，比我大 12 岁，因为年龄相差不小的缘故，他比较知道照顾我。他是美国亚洲协会的休斯顿分部的主席，这个组织是个全美范围的组织，总部在纽约，底下有四个分部，休斯顿是一个，洛杉矶有一个，华盛顿有一个，香港有一个。即使在总会里，他也是董事会成员。他本人是律师，以前曾经在休斯顿法学院当过教授。

在亚洲协会，他的工作是属于义务劳动性质的。美国人有关义务劳动方面的事情，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国同胞应该知道这些。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人现在还不是很明白，也不是很流行，可能以后会流行起来。

美国有很多组织部不是赚钱的，其中只可能有一两个职员是拿工资的，其他的人没有工资可拿，都是义务劳动，我先生所在的美国亚洲协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国人的组织，它的宗旨是要帮助美国人民了解亚洲各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我自己也是这协会的会员。

我们经常举办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曾经把美国前驻中国大使夫人包博滴请来讲解她自己的书，也请曾经在海外非常有名的小说《上海生与死》的作者郑念来演讲，我们的活动形式非常简单，大家就是开一个会，吃一顿饭，会员们听他们讲一讲，互相可以得到一些信息。

到美国之后，我自己参加了很多义务劳动性质的公益活动。很多到美国来的中国人都觉得不赚钱还老要花时间开会之类的事情是不能做的，但是我

觉得公益事业是挺要紧的一个事业，我是受到我先生的影响。以前的我也是讲究“自己管自己”的，我现在好多了，在这一点上虽然没有全部美国化，但是有很多时候实在是觉得这些组织确实帮了很多人很大的忙。

我虽然嫁给一个叫做“福斯特”的美国人，但是我在舞台上、电视里、写东西所用的专业名字仍旧叫做“LILYCHEN”，而不叫“福斯特太太”。因为我的导师说，“你看上去不像是福斯特太太这个人。”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些波折。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美国人叫我‘烨陈”，在英文里“烨”字的发音像是在说“YES”，所以一喊起我的名字感觉非常别扭。而“丽丽”是我在中国家里就有的小名，发音正好和美国人的“百合花”——“LILY”一样，所以，我就顺理成章地用这个新名字了。

我觉得现在的美国社会对中国文化乃至亚洲文化比以前要重视得多、也因为这个关系，在美国发展的亚洲演员就多了很多演出机会，比如说美国近来比较著名的华人题材的《喜福会》等片子的出现，以及它启用了大量的华人演员的事实，这些你都是可以看得见的。相比之下，现在的好莱坞对亚洲题材已经好多了，但是我觉得即便如此，如果你是一个演员，你想演戏的话还是要回中国，因为美国毕竟还没有那么多亚洲角色让你演。

我在上学期间也曾经拍过一些戏，比如中央电视台和美国 3C 公司合拍的电视剧《新大陆》，我也曾经把学停下来，到澳大利亚去拍一个由澳大利亚 ABC 电视台和英国 BBC 电视台联合摄制的四小时连续剧《龙的子孙》，这是我第一次演出英文戏的女主角。

我现在在生活来源上基本上是靠我先生的收入，我自己拍戏、做广告，也有钱进来。最近，在我们休斯顿这里的高速公路上挂出我的一个大幅广告画像，我在这个广告中为休斯顿的哥伦比亚医院演出一个护士。这个广告影响面很广，很多中国人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这个广告之后搞不清状况，以为我本人去当护士了，纷纷来问我。

我到美国来，接受了美国松散型的演员结构，我知道美国演员都是这样的，倒也没有什么不适应。我最不适应的就是美国拍摄公司挑选演员的“公开招聘”。我在中国的时候，直到我走之前都是我挑本子、我挑导演、我挑我喜欢的角色。但是在美国不一样，在这里你得在五分钟之内把自己卖出去。“公开招聘”的时候你拿到两张前后不搭的台词纸，然后到一个房间去，把立在那里不动的摄像机当对手念台词，我当初非常不习惯这种做法，因为我觉得这样没有办法准备表演。而且公开招聘之后如果你入选了，那么你还要有一次“CALLBACK”，就是胜出的三两个演员再争一次。

这种事情是非常残酷的，我开始来的时候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事情，我参加“公开招聘”时，一进去就带着抵触情绪，其实，这对自己绝对没有什么好处。陈冲在自己的书里也写到过这些，你进去之后，你越说自己的过去，你就越跌得惨。美国人才不管你的过去，他们要的是你现在这五分钟的状态。

但是对于这种事情，我现在觉得挺平衡，因为好莱坞除了个别的演员以外，所有的演员都要经过这一关。如果人在外州，事情又要麻烦一点，我和我的经纪人说，试镜地点远的话、角色小的话就不去了，这样，我的机会就会少一点，但如果不然，路费也是一个麻烦事。

但是我对好莱坞有些入选演员也有一些看法，他们选的中国人往往是瘦小的、戴着斗笠的那种人。休斯顿今年亚洲节，开幕的时候放映我过去演出的电影《黑蜻蜓》，在开始的时候我上台去说了几句，我说：“美国人对中

国的张艺谋等人的片子比较熟悉，但是这些电影讲的是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事情。《黑蜻蜓》讲的是 80 年代的事情。”美国人看完片子之后觉得非常有兴趣，赞扬中国有和平的感觉，街上的情形也不错。

在艺术的道路上走到今天，我已经开始成为美国儿童舞合剧的编剧了。

我一直觉得美国儿童在精神生活上很可怜，他们可以看的东西很有限，美国的电视节目出来之后你常常看到每分钟都是在暴力当中，除了暴力，他们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我觉得自己有义务为他们提供一些歌颂美好的节目。

我同时时常在想，我自己的孩子以后大了之后能够知道什么有关中国的事情呢？这时候我就想到了中国的“著名人物”孙悟空。我自己从小就一直认为孙悟空像个英雄一样，我觉得它比美国的“超人”之类的玩艺不知道要好到哪里去。我曾经为美国的儿童剧院编写过大头娃娃舞，这个舞蹈也是这样的，它从小就能够首先打动我自己，小时候我每次看每次都激动。我就开始自己动笔写了，其实这并不是我的最优项目，但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儿童精神环境，坐在家里等别人来写是不行的，我知道美国芝加哥那边有人也在写这类的东西，但是情形好像有些不对，那里面的“观音”还抽烟呢。

确定了想法之后，我就开始着手动作。

美国人原本根本不知道中国的这个故事，我把中国有关孙悟空的故事从头到尾地仔细告诉他们，也把我在中国给儿子买的连环画小人书拿给他们看，过了几个月，剧院方面给我打电话来了，说是我曾经提到的孙悟空他们决定在 1997 年 4 月底的“休斯顿国际艺术节”上演出，需要由我来编写这个剧本，剧本写好之后，1997 年 3 月份的时候在儿童剧院先行公演，艺术节演出之后，也将在学校里进行巡回演出。

说于就于，剧团要我在 1996 年 8 月中旬交出演出稿来。

我的任务不轻，我不但要交出剧本，而且要把动作也写上，甚至还要把音乐配好。在这个剧开始徘练的时候，我并且还要参加导演。

所丰这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这个剧的演员我们前一阵子举办公开招聘的时候已经选出来了，剧本在 1996 年 7 月份已经基本写完了。

我的剧本是用英文写的，我想，如果我把它搞成中文的剧本就又成了在美国的中国城中搞文艺了，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多华人，我想我要做让“中国英雄”进入美国社会的实验。

为了写这个剧本，这个夏天，我把两个儿子送到夏季学校里去，也不心疼。尽管我做这件事情是半义务性的，当年我写《红绸舞》和《大头娃娃》舞的时候就没有一分钱拿，而且还要自己出钱买绸子之类的道具，几百个小时花上去。这次的酬劳可能即便有也不会很多。尽管我的“孙悟空”工作在财务收入上会非常微薄，但是我一提到这件事情仍旧很兴奋。我甚至时常设想未来的剧中孙悟空不一定是要光在中国待着，他也可以到印度去，或者到世界各地去。只要这个人物成立了，美国的小朋友就能接受他，不论他到哪里去都行。

也就是说，必须先让孙悟空在美国的舞台上立住脚才行，这样，就已经是胜利了。

说实在话，我是从教育我的孩子身上得到启发开始编写“孙悟空”的。

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儿子，他们一个七岁了，今年秋天上小学一年级；另外一个四岁。大的叫陈霞客，小的叫做陈安东，他们的中英文名字都是我起

的。

我大儿子的英文名字叫做“ZACHARY”，这个名字是美国南方第一个总统当选人的名字。给大儿子起名字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名字作为候选，但是我觉得这个名字比较特殊，不是那么多人在使用，像其他的一些“约翰”之类的名字美国到处都是，我不想用，是等到我儿子用了这个名字之后我竟然听到周围的很多人都叫这个名字。“霞客”这个中文名字和他英文名字的发音接近，所以就这么叫了；我的小儿子英文名字叫做“ANTHONY”，这个名字我非常喜欢，这是莎士比亚笔下一个人物的名字，曾经和埃及艳后狂恋。“安东”这个中文名字也有非常好的意思，昭示着“东方平安”的意思，我先生也说好。

我的两个儿子的英文名字一个是以英文字母“Z”开头，一个是以“A”开头，就是一头一脑的意思。

在美国，我很多精力都用在照顾家庭上面了，这些事情有时想想会很烦，觉得婆婆妈妈的，不如去拍戏，苦一点也行。但是如果反过来想想就会觉得其实培养孩子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电影上，即使是你拍了奥力佛史东导的戏，你很出名，但是两年之后人家也把你忘记了。但是你儿子呢？在美国要想培养出一个好孩子是件竞争很大的事情，你的对手主要就是美国的暴力电视。

但是，我还是没有彻底放弃我的表演事业，有机会的时候我也会全身心地投入。我当年拍《新大陆》的时候花了四个月之久的时间，那时候我的小儿子才一岁，都是我爸爸妈妈在这里帮忙，还请了阿姨，如果从经济上来讲，实在是非常亏本的。

作为一个演员，我感到自己目前的竞技状况仍然非常好，尽管我已经离开学校了，但是我仍然不断地让自己努力。这两天我和许多美国人一起看奥运会，这是一种可以得到很“精神”方面东西的事情。奥运会中的运动员练了四年，但是在比赛的一刹那失败了，你说他们该怎么办？他们必须从精神上经受得住。干我们这行虽然没有他们那么明显，但是也要有这种承受精神。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的阅历多了，这对表演有很多好处。比如说现在我去演一个母亲就会比以前在中国时演母亲感觉要丰富多了，我会加进去很多细微的真实东西。

你越是丰富人生，你的电影创作就会受到越大的影响，这是一个规律。我对自己的艺术前景还是感觉挺乐观的，走着瞧。孙悟空的事情就是我在各方面都已经有把握、有准备的条件下碰上的机会。

我现在全身心都已经投入到“孙悟空”当中去。前一阵我为了看中国人王洛勇在百老汇演出《西贡小姐》，就第二次去纽约再看一遍这个戏，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就听到外面有一个黑人拿着棒子在打一个翻过来的塑料破桶，打得之棒，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旁边还有三个人穿着美国国旗的衣服在翻跟头，我当时就想，如果是孙悟空在这里翻跟头该多好。

事后，我就给王洛勇打电话，他告诉我百老汇目前正在有一个黑人戏，里面有很多这种打击伴奏。我现在正在等待这类打击伴奏录音磁带的寄到，如果可能的话，我合采用一些作为我的作品伴奏。

我未来很想回国去发展，但是我的孩子们年纪还很小，我想以后如果是为了他们学中文的理由倒是可以同他们一起回去，我现在也不知道未来自己的发展，有的朋友说：快回来，咱们一起做生意吧。但是具体地想下来，究

竟可以做什么呢？

而且一旦做起生意来，人也需要常住在国内，有些不实际。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我回国去发展的想法很多，但是具体做起来就有很多局限性。

那就再等等看吧。

对自己的信心，我很有。

陈燕妮思绪：

或者说孙悟空，或者说儿子，她的话题说着说着自然而然地就转到这两个大项上来。

和她的对话是在长途电话中进行的。一个星期前就约定了日期，结果到了应该的那天，我做好了各种准备，录音电话、电池之类一一检查到家，也嘱咐办公室内的同事千万在一个半小时内不要让我接听任何电话，同事善良，一一应允。

一切鼓捣停当之后，越州长途一拨过去，对方竟完全没有回音，复又不敢置信地拔过去三五回，始终是一个细小的录音留言主持接听，懊恼之下，不免极不受用，平生最讨厌失信之人，设想到好好的一天让一个远方的人给折腾了。

半个小时之后，陈烨急急地拨电话过来给我，说是她那边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把她截在正要回家的半路，而且“这雨之大，你简直不能想象”。

再后来，她的照片从遥远的穗州寄了过来。她寄来了自己的三张黑白大型照片，才一抽出信封内的它们，一颗悬挂在她手里的心全然放下。

细看照片，做了幸福母亲的她眼角已经开始有纹路了。在中国时看过她的一些片子，印象有，记忆却不足够深。那时的她长相清嫩，不老道的缺点显而易见。

现在出现的纹路，可能是一个早该出现的丰富。

答应了要在这篇访谈稿件写好之后或传真给她，或在长途电话中念给她听的，但是我完稿的时间被拖了一下，真正完成时，整个人已经急着要回国了。正巧那几天中我电话的长途线路也发生了一点问题，情急之下，轮到我爽约了。

想到此，很不过意，回听和她交谈时自己一方的信誓旦旦，觉得自己的嘴脸腻歪。但愿此稿顺利出笼之后，陈烨你不怪我。再者说，你怕什么，你有孙悟空，有儿子，有纹路。

著 者 后 记

人一过三十，思绪陡增，很能理解多少敏感的老人常会有的那种深藏在回忆间的脆弱。采写此书，让我感觉大病一场。

对这个选题其实早就有心，但一直找不到一个可以游刃自如的写法，直到想出今大的这种格式，我的有心才变为凭证。这是有关我和我们的袒露，想起过往的美国艰辛，过来人会一下子增添很多不堪回首的脆弱和坚强。

这一年多的采访时间里，我催促曾坐在面前的每一个过来人讲自己的过来事，他们从头说起的时候，每一个过程都庞大得像是一条长无边际的思索之海，很多时候，我和对方静静地就那么坐着，相对无言。

从第一篇落笔写出刘索拉，直到最后一个写到王洛勇，在美西持之以恒的散线采访过程中，我先后曾展开两次美东采访之旅。这种旅行过程对我的写作也是一个平展思路的机会，飞机上，是个去处，无事可干的人在高空中一下子能没有杂念地想到很远的地方。

每次朽稿完成把稿件交给出版社，我的很多后悔一定在这之后逐一滋生，翻看前书，感觉上永远负疚和自责，很多当时为了赶时间而绽露的敷衍一望便知，这成为我的包袱。我知道自己常常炮制粗糙，但是每到重新再来时，时间又是那么紧，上了时间的套之后，就卸不下来，好比驴们在磨旁。况且紧紧索命般伴在旁边的，还是毫不通融的美国之磨。

感谢本书责编李威海老兄，《陈燕妮：纽约意识》及这本《遭遇美国》两度著和编的关系，使我们成为知己。也感激胞兄陈西林，他学油画出身，眼力的独到，是我生命中的重要骄傲之一，他为我书所作每一次准确的封面设计，给我平庸的文字安上了优秀的翅膀。本书中，举凡涉及货币金额未经特别标注者，概为美元。思绪里，所有叙述嗟叹，均是由衷。

陈燕妮
今天，也是我生日
我的朋友们正在我书房之外
欢乐不已沸反盈天
非常想再次感激
生活和读者给我机会